



# 人间鲁迅

上

还在督促自己每天进步一点吗？

还在坚持每天阅读的习惯吗？

还在为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书籍烦恼吗？

那～

你愿意与我成为书友吗？

国内外当下流行书籍

各图书销量排行榜书籍

大量工具书籍

使我们受益终生的书籍

.....

海量电子版、纸质版书籍及音频课程

还有贴心的“学习管家”服务哦！



微信: shuyou055



鲁迅

# 人间鲁迅

上

# 目录

[引言](#)

[第一部 探索者](#)

[一、 困顿的少年时代](#)

[1. 无声的中国](#)

[2. 绍兴：一个人的诞生](#)

[3. 母爱·社戏·“义勇鬼”种种](#)

[4. 长妈妈和《山海经》](#)

[5. 自由而整饬的三味书屋](#)

[6. 百草园·友谊的种子](#)

[7. 从“少爷”到“乞食者”](#)

[8. 在当铺与药店之间](#)

[9. 最后的挤压](#)

[10. 八元川资与一江离恨](#)

[二、“戎马书生”](#)

[11. 水兵之梦](#)

[12. 县考：第一次妥协](#)

[13. 《天演论》·真理的第一道台阶](#)

[14. “英雄未必忘家”](#)

[15. 大海行](#)

[三、 岛国的热血与星光](#)

[16. 燠热的东京气候](#)

[17. 弘文风潮与辫子问题](#)

[18. 哲学和文学成了异国游子的精神家园](#)

[19. 科学救国的前沿](#)

[20. 需要独立行动](#)

[21. 离离草](#)

[22. 仙台·现代医学·从灵魂到躯壳](#)

[23. 悲壮的间奏曲](#)

[24. 幻灯事件](#)

[25. 婚姻：第二次妥协](#)

[26. 后死者的先驱道路](#)

[27. 《新生》运动,杂志的流产与实力的转移](#)

[28. “伍舍”时代](#)

- [29. 盗火者兄弟](#)
- [四、暴风雨前后](#)
- [30. 灰色的教师生涯](#)
- [31. “木瓜之役”](#)
- [32. 葬礼](#)
- [33. 两次风潮](#)
- [34. 革命·辫子·我们都是“草字头”](#)
- [35. 新校长](#)
- [36. 大胜利中的败退者](#)
- [五、夜茫茫](#)
- [37. 范爱农之死](#)
- [38. 官吏生涯：不满与无为](#)
- [39. 补树书屋·佛经·古籍·碑帖·沉默的深渊](#)
- [第二部 爱与复仇](#)
- [六、最初的战叫](#)
- [40. 关于“铁屋子”的议论](#)
- [41. 狂人：救救孩子](#)
- [42. 全方位进击：打倒国粹派](#)
- [43. 明天与梦](#)
- [44. 别故乡](#)
- [45. 八道湾·绥略惠夫和他的影子](#)
- [46. 教坛上：中国小说史](#)
- [47. 《新青年》的解体](#)
- [七、冰谷中](#)
- [48. 《阿Q正传》：国民灵魂的肖像画](#)
- [49. 可怕的“互助”](#)
- [50. 盲诗人和小生物的故事](#)
- [51. 估“学衡”·批评家的批评·女娲与弗洛伊德](#)
- [52. 声明：人格与艺术](#)
- [53. 八道湾院内的战争](#)
- [54. 砖塔胡同](#)
- [55. 《呐喊》：悲剧系列之一](#)
- [56. 《彷徨》：悲剧系列之二](#)
- [57. 西三条新居·老虎尾巴·闯“盗窟”](#)
- [58. 西安行](#)
- [八、女师大风潮](#)
- [59. 讲台上：《苦闷的象征》](#)

60. [《语丝》与《现代评论》](#)
61. [奇袭](#)
62. [碰了两个大钉子](#)
63. [悲怆交响曲](#)
64. [爱情，别一种火焰](#)
65. [在《莽原》周围](#)
66. [女师大事件：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67. [“未名”的一群](#)
68. [5月潮汛期：闲话·流言·新的鬼魅](#)
69. [两难中的选择](#)
- 九、[地火](#)
70. [免职令：枪打出头鸟](#)
71. [胜利者没有胜利](#)
72. [姐妹篇：《孤独者》与《伤逝》](#)
73. [“痛打落水狗”·信的纠葛·诺贝尔文学奖问题](#)
74. [“三一八”：血写的和墨写的](#)
75. [《华盖集》及其续编·虎与羊](#)
76. [离京种种](#)
- 十、[孤岛上](#)
77. [印象：有费而失了生活](#)
78. [《坟》](#)
79. [回击高长虹：夜·太阳·月亮](#)
80. [“置首于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
81. [放火者](#)
- 十一、[梦与醒](#)
82. [大钟楼内外](#)
83. [香港三日](#)
84. [改造“沙漠”的工作](#)
85. [“文学无用”论](#)
86. [熔岩喷出了地面](#)
87. [白云楼：现代的隐者](#)
88. [爱就是成为一个人](#)
89. [两次演讲·一场官司·系列杂感与“包围新论”](#)
- 第三部 [横站的士兵](#)
- 十二、[盗火者](#)
90. [上海·内山书店·艰难的结合](#)
91. [演讲系列：真假知识阶级·指挥刀和文学家·新女性与传统](#)

- [92.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共同靶子](#)
- [93. 战争升级](#)
- [94. 思想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升华：革命·流氓·投机主义·人格·自由](#)
- [95. 盗取“天火”·托尔斯泰和人道主义·“同路人”·《奔流》的诞生](#)
- [96. 北京—上海：小白象—小刺猬](#)
- [97. 版税官司·“怎样做父亲”成了现实问题·女工的故事](#)
- [十三、浴火的道路](#)
- [98. 左联：作梯子的与爬梯子的](#)
- [99. 新月派诸君子：刽子手、皂隶、乏走狗之类](#)
- [100. 会见李立三·五十诞辰·木刻讲习会](#)
- [101. 柔石之死·避难花园庄·《前哨》与《北斗》](#)
- [102. 《上海文艺之一瞥》与《创造十年》·才子加流氓·《十月》·《毁灭》·《铁流》](#)
- [十四、大旗下的战斗](#)
- [103. “民族主义文学”·救亡中的启蒙·“一二八”战火中](#)
- [104. 迟迟出战：关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
- [105. 北平五讲·致周扬：“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 [106. 丁玲失踪与杨铨遇害](#)
- [107. 萧伯纳在上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杂感选集》及序言](#)
- [108. 明枪暗箭种种](#)
- [十五、内战与溃散](#)
- [109. 刨祖坟——中国文化心理探微](#)
- [110. 分道扬镳：笑是什么？](#)
- [111. 如此“同人”：林默与田汉](#)
- [112. 和青年奴隶在一起](#)
- [113. 家庭：“以沫相濡究可哀”](#)
- [114. 瞿秋白死讯·《海上述林》·《译文》事件](#)
- [115. 鞭子从背后抽来](#)
- [116. “一二九”运动·萧三来信·左联的溃散](#)
- [117. 中国文艺家协会·两个宣言](#)
- [118. 《故事新编》·匆匆来去的《海燕》](#)
- [十六、反抗死亡](#)
- [119. 冯雪峰返沪·“两个口号”论争](#)
- [120. 万言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 [121. 以工作对抗死亡](#)
- [122. 木刻展览会·谈孔子、鬼、自杀及其他·在壕堑中仆倒](#)
- [123. 民众的葬礼](#)

[修订版后记](#)  
[第四版后记](#)

# 引言

一个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时代是大时代。大时代总要产生巨人。

鲁迅是巨人。他不是帝王，不是将军，他无须挥舞权杖。作为旧世界的逆子贰臣，惟以他的人格和思想，召引了大群年轻的奴隶。他把对于民族和人类的热爱埋得那么深沉，乃至他的目光，几乎只让人望见直逼现实的愤怒的火焰。数千年的僵尸政治、“东方文明”、专制、强暴、虚伪、保守和蒙昧，都是他攻击的目标。他教奴隶们如何反抗，如何“钻网”，如何进行韧性的战斗。他虽然注重实力的保存，却不惮牺牲自己，必要时照例地单身鏖战。在一生中，他呐喊过也彷徨过，甚至在横站着作战的晚年仍然背负着难耐的寂寞，但是从来耻于屈服和停顿。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赢得众多的“私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招致密集的刀箭，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获得更为辉煌的战绩。他所凭借的仅仅是一支“金不换”，便在看不见的但却是无比险恶的战场里，建树了超人一等的殊勋。

在他身后，自然要出现大大小小的纪念会、石雕、铜像，以及传记。可悲哀的是：当再度被赋予形体的时候，这个始终屹立于人间的猛士，却不止一次地经过有意无意的铺垫与厚饰，成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平凡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鲁迅是“人之子”，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正因为他耳闻了愚妄的欢呼和悲惨的呼号，目睹了淋漓的鲜血和升腾的地火，深味了人间的一切苦辛，在他的著作中，古老而艰深的象形文字，才会变得那么平易，那么新鲜，那么富于生命的活力。

引言人间鲁迅（上）对于这样一个毕生以文字从事搏战的人，他的形象，其实早经文字本身表达无遗了。世间的纪念物，丝毫也不能为他增添或减损些什么，无非是后人的一种感念而已。如果它所激发的，不是对真理的渴求，不是奔赴生活的勇气和变革现实的热情，而是宗教式的膜拜，那么毋宁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

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拒绝他的灵魂的参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把黄金世界轻易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生命，成为千千万万追求者的精神的火光。

真正的巨人活在时间的深度里。应当相信，历史终会把最有分量的东西保留下来。人间鲁迅

# 第一部 探索者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鲁迅《野草》

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鲁迅致赵其文信

# 一、困顿的少年时代

他才来到这个世界不久，便被猝然摔落社会的底层。不幸是一种财富。假如不是太多的屈辱和痛苦构成了坚实的底座，那么，我们很难想像，凭什么可以支承一个伟大而沉郁的天才？

## 1. 无声的中国

沉默是可怕的。

一个从黄河流域繁衍起来的民族，在磐石般的黑暗底下，竟沉默了五千年！

骊山墓背后，夜狐不复悲鸣。篝火陡然升起而又旋即熄灭。没有引火物。金田起义的旗帜虽然蔓延为流火，也不过是大泽乡的回光返照，天京之变拖曳了一条长长的阴影。盛极而衰，乱极而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震荡，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依然雄踞于民族的肩背之上。汨罗江畔的骚吟消歇了，以宫刑为代价的著作成了史家的绝唱。自从嬴政的大手笔成功了焚书坑儒的杰作，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也便成了思想史上永远无法赅续的篇章。孔子的伦理哲学，被权力者当作维持封建大一统的有力的杠杆。在文字狱的空隙地上，科举制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万劫不复的奴才。人才被埋没了，自由被扼杀，多少智慧的花果纷纷萎落。长城，在荒远的年代，只是作为大汉族的一面盾牌出现，不意却成了闭关自守的象征。丝绸之路被切断了。贸易风徒然在远方呼息。麦哲伦的船队完成环球航行之后数百年，天朝帝国仍在加强海禁。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辽阔的国土，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孤岛。

探索者/困顿的少年时代人间鲁迅（上）可是，无论是治者强力的控制，还是顺民坚苦的忍耐都无济于事。历史不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哑默。1840年。铁锁沉江。英国的大炮，终于以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闭。新的时代开始了：隆隆崩溃的时代，崛起的时代，一个充满危机感而又有足够多的期待走向开放的时代。作为民族的时代喉舌，在我国第一台火车头诞生的同一年

——1881年，一个人诞生了。

## 2. 绍兴：一个人的诞生

绍兴。南方的一座古城。

远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在这一带蛮荒里奋力开拓了。他们的骨殖，热血，连同沉重的岁月，凝积为深厚的火成岩。绍兴的东北部，平原漠漠，河汊如网，是有名的水乡泽国。乌篷船，白篷船，往来穿织其间，构成东方威尼斯的古典的美。曹娥江水浇出了刚厉的青铜，秀美的越瓷，不歇的钱塘江潮，淘洗出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王思任，无数壮烈和哀婉的故事，以及他们的思想与艺术的珍品，如同醇香的绍酒一样飘送了数千年。

绍兴的西南部高高隆起，那儿布满群山，布满崎岖的道路。山地是意志的象征。于是有大禹，有卧薪尝胆的勾践。高大的禹陵，越王台，会稽山头的烽火墩，都可以令人遥想往昔的艰厄和仰慕先祖的光荣。

绍兴人是历史的骄子。可是，在现实的土地上，他们却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就拿东昌坊口来说，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就连结着众多杂色的人家：地主士绅的大台门，有名的当铺、商店，和无名的摊档，此外是大片拥挤不堪的低矮而潮湿的贫民屋子。在土谷祠、长庆寺和穆神庙，则日夜麇集着流民、乞丐、捕蛇者和狂热的赌徒们……

在东昌坊口、张马桥的北边，有一座聚族而居的大宅——新台门周家。

周家是世代的仕宦人家，早在嘉庆、道光年间，曾经有过一个购地建屋，设肆营商，广置良田的煊赫时期。由于生齿日繁，房族发达，覆盆桥西面的老台门不够使用，才又添置了新台门。移居到新台门的，是智房与仁房分支的成员，一共六个房族。后来，在太平军的冲击之下，这个繁盛的大家族便开始迅速败落了。

新台门占地一千多平方米，是五进的大宅院。宅第坐北朝南，走进竹丝大门，穿过铺着石板的天井，就是名为“德寿堂”的大厅。高高的金匾底下，有一副颜色暗淡的抱对，上面写道：“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再从这个聚众议事的厅堂走进去，就是各房的住宅

了。西边有一排五间楼房，由西往东数的第二间楼下，一天突然传出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诞生了。

9月25日，成了兴房的特大喜庆的日子。因为男丁，只有男丁，才有重振家声的希望。于是，环绕着孩子的降生，一家人立即变得忙碌起来。

按照当地的习俗，孩子出生以后，必须先尝五种东西：醋、盐、黄连、钩藤、糖；依次尝遍了不同的几种味道，领受过小小一点刺激以后，才将奶汁送进嘴里。这样，待孩子渐渐壮大起来，便有能力去应付未来的复杂的人生了。这是祖先的一种祝福。只是人生未必按照一定的公式进行。譬如这个周家的孩子，此后成长的道路，就几乎没有一处不践钩棘。

孩子的祖父周福清正在北京当“京官”，接到家里的来信，倒也并不特别地激动。当时，恰逢一位官员来访，他也就十分随便地用了这位官员的姓氏为长孙命名：阿张。随后，找出一个同音异义的字作学名，便是樟寿。不过，寄托还是明显的。既是官员，便有功名，借作小名总不失为一个吉利的兆头吧？而且在中国，福禄寿从来是连在一起的。

周围的老人有一个很神秘的说法：在闰年出生，又是“蓑衣胞”，又跟菩萨同一个生日，那是极其罕见的；这样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就怕难养大。惟一解脱的办法，就是到菩萨那儿去“记名”。

为了这个小生命，家人最先寻得大桶盘的女神记名，然后把他抱到长庆寺里去，拜住持和尚龙祖做师父。

龙师父是个瘦长个子，高耸的颤骨，夹着一双细眼睛。本来，和尚是不该留须的，他却留着两络下垂的小胡子；和尚是不该娶妻的，他却讨了老婆。在娶过“师母”以后，龙师父干脆让寺里的和尚都改当了吹敲和尚，这样在佛门里就可以争得更多一点的支配自己的权利。他特地请来了艺人，整天整夜教小和尚们唱“绍兴大班”。从此，长庆寺的和尚再也不必同普通的和尚一样要出门募化，而可以靠吹吹打打的技艺谋生了。

这个人浑身充满着叛逆色彩，却又出奇地和善。他会行医，常常给土谷祠里的逃荒者看病，给穷汉看病是从来不收诊金的。他对小樟寿也非常和气，不教念一句经，也不教一点佛门规矩，只送了三样东西：一

个叫“长根”的法名，一件“衲衣”，一条“牛绳”。“衲衣”是模仿袈裟，用各色小绸片缝缀而成的斜领衣服。或许，凡是拼凑出来的东西，都被认为具有某种神力。“牛绳”是用红丝线编成的装饰物，上面挂着历本、铜镜、银筛，还有一种叫“鬼见怕”的贝壳。小弟子倘要出门，是必须把它戴上的。只要稳稳当当地戴到脖子上，就百无禁忌，可以避邪消灾了。

到了后来，中国的邪鬼们的确都很害怕他，但却也一直把他纠缠住。小小法宝，竟使他成了一个一生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这是师父所始料未及的。

### 3. 母爱·社戏·“义勇鬼”种种

小樟寿一天天地长大起来了。

他聪明、活泼，很讨大人们喜欢。平日，他最爱穿一件大红棉袄，耍弄“和尚”师傅送给他的木头关刀，跑到大人跟前示威；又爱热闹，常常玩着玩着，就跑到大厅的牌桌间去。有一次看玩牌，一位长辈逗趣问他：

“你欢喜哪一位打赢？”

“我愿意大家都赢！”

回答是意外的敏捷。从此，他便得了个“胡羊尾巴”的绰号。

可是，在祖父和父亲面前，“胡羊尾巴”却变得不大爱活动了。

他有点害怕祖父。虽然祖父不常在家，有时候也那么慈蔼地唤他“大阿姑”，那么仔细地给他讲说戏文里的故事，就是爱发脾气，动不动就骂人；骂得凶了，还咬得指甲戛戛作响。父亲也不好亲近，不是喝闷酒，就是端端正正地整天站着或坐着，沉默得活像一堵墙。

保姆长妈妈像影子一样跟随着，简直无法摆脱。要是只会讲“长毛”，讲美女蛇，讲小百姓怎样愚弄皇帝之类的故事是好的，可她嘴里总有那么多的道理，那么多的“不应该”：什么人死了，不应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什么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不应该走进去；什么饭粒掉落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什么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千万不可钻过去的……每当她向人们低语些什么，或是竖起手

指，在空中划来划去，常常要使小樟寿感到莫名的不安。因为她是保护人，保护人就得首先保护规矩。自己要是多一点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她都会认为是不可原谅的顽皮，声言要告诉母亲去。别的不说，单是跟她一起睡觉就成了一件苦事。她伸开手脚，在床中摆成一个“大”字，足够可以把你挤到角落里；有时候还把臂膊搁在你的颈子上，令你动弹不得，任随怎样地又推又嚷也没有用。

在家里，他最喜欢的，要数祖母蒋老太太和母亲鲁瑞了。他愿意靠在她们的怀里，膝下，或身边，在绵长而又有趣的说话里，静静地领受从别人那儿所无法获得的温柔。

蒋老太太是周福清的继室。她从鲁墟来到周家，常常遭到丈夫的叱骂。在兵荒马乱时，她曾因一度陷入太平军中，故常常被骂作“长毛嫂嫂”。中国妇女是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可是她能向谁倾诉呢？只好独自一个人偷偷哭泣。周福清在京娶了潘氏以后，她更加忠守于命运派给她的那份寂寞了。她没有儿子，惟一的女儿阿康也已经出嫁，年幼的孙子们自然成了生活中最大的慰藉。

她的手巧，会把鳊鲞骨头拆开，洗净，折叠成精致的仙鹤，还会将一只螃蟹壳拼成漂亮的蝴蝶。她特别会讲故事，又幽默，古老的传说只要经过她的叙述，就变得非常的生动迷人。每当夏夜，大桂树在堂前洒下浓荫，樟寿们就来找祖母和她的大蒲扇了。

有两个故事，使小樟寿特别难忘。其中一个说“猫是老虎的先生”，不免要加深他对猫的仇恨。早在长妈妈报告了猫吃隐鼠的事件，他就决心与猫们为敌了。隐鼠会舔吃桌面上用余的墨汁，会办事情，像贴在床头的年画“老鼠成亲”里画的那样。他爱隐鼠。再一个故事是“水浸金山”，听完以后，心里一直压着一座雷峰塔。后来，在大舅父那儿看到了一部弹词《白蛇传》，上边印的法海的绣像，全叫他用指甲把那眼睛给掐得稀烂。

鲁瑞是官宦人家出身，虽然只进过一年私塾，凭自学的的能力，也能读些弹词和小说。母亲比祖母知道更多的书本上的故事，常常选一些婉曲地说给孩子们听。即使什么也不说，只要坐在自己的身边，默默做着针线或者看书，也很好的。

鲁瑞特别喜爱看戏，曾经不只一次凑集了瓜果，请族人围坐到新台门道地里看平调艺人的演出。母爱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温暖，它对孩子的

心灵的熏沐，有时甚至是无法察觉的。像小樟寿，就很受了母亲这种特殊爱好的感染，常爱坐在一家扎肉店门前，看高调班、乱弹班的戏子在台上串来串去。

由于外婆家在城外三十多里的安桥头，小樟寿便比城里的孩子多了一个机会，可以相随着母亲到乡间看社戏。那才是自由广阔的舞台呵！那才是真正辉煌的演出呵！每次到外婆家，他都觉得身上好像快要长出树杈一样，有一种伸展开去的感觉。

绍兴有句俗语：“外甥大如皇帝。”身为“外甥官”的到来，每次都受到村里大小格外的爱护和尊重。在安桥头，他结识了两个好朋友：六一和七斤兄弟。论辈分，他唤他们做“公公”，实际上并不存在尊卑的界限。没有等级，没有猜疑和隔阂，只要他们在一起，有的就是亲密和愉快。划船，看戏，放牛，钓虾，捉鱼，摘罗汉豆，看煮盐和观潮……在群体中，小樟寿懂得什么叫友谊了。

安桥头的迎神赛会，实在太热闹了。这村子，平常也会同邻近的里赵合伙做社戏的。虽然小樟寿同野孩子一样爱看翻筋斗，跳老虎和烟焰中显现的妖精。忽略过许许多多的剧情，但却能以一个城里少年的敏感，在看戏的夜晚，深深感受到那诗一样的氛围：朦胧的月色，白篷船，潺潺的水声，豆麦和水草夹杂的清香，远处的灯火和隐约的歌吹……多少年过去，这情景于他仍旧是一个巨大的蛊惑。

至于皇甫庄的社戏，就更显得气派非凡。皇甫庄是外祖父移居的村庄，它比安桥头大多了。每年包爷爷菩萨生日，人们都要在贺家池畔的包殿面前搭起河台。到了演戏的当天，远近的人们摇船汇集到这儿来，四周黑压压的。台下满布着赌摊，豆腐摊，茶摊，瓜摊，馄饨摊和酒摊，那扬起的喝彩声，和台上粗犷豪放的唱腔混成一片。村里人还会在“火烧场”上演出“大戏”和“目连戏”，吊慰当年就地遇害的太平军将士的鬼魂。

鬼戏是小樟寿最爱看的了，莫非他喜爱那谜一样的神秘幽深么？一些鬼戏确也令人神往的，“目连戏”开场的“起殇”，就很悲壮。薄暮中，喇叭响了。十几匹马，都已站在台下。“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随后的是十几名由孩子扮演的“鬼卒”。这些小鬼给涂上油彩，接过钢叉，便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连连用力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前台，再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到台板上……做鬼也要有勇气。小樟寿就充当过这样的“义勇

鬼”，不过这已是十多岁以后的事情了。

人不是生而喜欢孤独的。即使喜欢孤独，也只是以别种形式对世界的接近而已。那时候，虽然也添了弟弟，但毕竟还小，小樟寿依然是家中的一把独弦琴。只是到了乡村，他才会找到共应的弦索，找到和声。

从此，安桥头和皇甫庄一带成了小樟寿最依恋的地方。每当风起，鸟鸣，树叶哗哗响动，或是无端地感觉孤寂的时候，他都会想：为什么属于自己的世界只有一块四角的天空和一个小小的园子呢？有限度的自由，的确不是那时的他所能理解的。

#### 4. 长妈妈和《山海经》

按照古老的传说，“七”是一个巧数。到了七岁那年，小樟寿结束了单纯的玩乐生活，开始进私塾了。

私塾设在新台门里，启蒙老师是一个远房叔祖周玉田。他小名蓝，侄孙辈都称呼他蓝爷爷。他学识渊博，却无意于仕途，考取秀才以后便再也没有应试。惟靠坐馆教书来维持生计，可以想见，家境是不会宽裕的。可是，他偏喜欢种点花木，养些虫鱼，像那些富贵人家一样。金铃子呀，金鱼呀，油蛉呀，珠兰、茉莉呀，都是他所珍爱的。此外，还有来自北方的极罕见的马缨花。谁能理解一个种花人的寂寞？他的夫人就很作贱这些花草，有一回，将晒衣用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条给弄折了，还愤愤地咒骂道：“死尸！”他只是慢慢地把花草弄好，并不答话。日间，他除了做做诗，自个儿倾吐些积愆以外，有机会就亲近小孩子们，也许是想在这群小友中间寻到失落了的童心吧？因此，樟寿和别的孩子都喜欢这位胖胖的老人，喜欢他那整天挂在脸上的微笑。

绍兴的普通私塾都把《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作为蒙童课本，而樟寿读的却是《鉴略》。这是一本中国历史的简明读物，无论祖父还是蓝爷爷，都认为它可以教人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是很有用处的。可是，《鉴略》那么艰深，全不像蓝爷爷和他养的小东西一般有趣。可恶的是，一场观赏五猖会的好梦，竟也被它给破坏了！

有一天，嫁在东关的小姑母回到家里来。她是接母亲和侄儿去看五猖会的，这使樟寿十分高兴。小姑母从前在家常常给他们做游戏，猜谜语，讲故事，还唱好听的儿歌。后来出嫁时，小侄们都哭嚷着不肯让她

走。这回可好了，可以跟小姑母一起痛痛快快地玩，听她唱歌说话儿。再说，东关镇也还没有到过，听说是很远很远的。小樟寿想，那里的赛会一定会是世界上最热闹的赛会……

第二天清早，大家忙着出发。夜里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陆续搬到船里去了。小樟寿正笑着，跳着，催工人尽快地搬，忽然瞥见工人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父亲慢慢地说。

他忐忑地把《鉴略》拿来了。他只有这么一本书。父亲叫他坐到厅堂中央的桌子前，教他一句一句地往下读。大约读了二三十行左右，便停下来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说完，父亲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樟寿觉得头上登时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只有遵从的份儿——粤自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他觉得头脑里似乎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类夹住；同时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在发抖，仿佛蟋蟀在秋夜里鸣叫似的。

应用的物件搬完了，家中由忙乱转为静肃。母亲，工人，长妈妈，谁也无法营救他，只得默默等候着他读熟，而且背出来。这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

他忽然似乎变得很有把握，于是立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也似的背完了。

“不错。走吧。”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重又活跃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他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他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可是，樟寿已经再没有来前的那份兴致了。开船以后，两岸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直到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也都同样梦一般从眼前过去……

不是所有的书籍都像《鉴略》一样可怕。蓝爷爷的书斋里就收藏着不少珍奇，其中一些关于花鸟虫鱼的，还配了插图。没有什么比画书更迷人的了。像《花镜》，不但把许许多多自己认识和不认识的花草都画了出来，还分别介绍了栽培的方法。读过以后，他不由得也学着蓝爷爷种起花木来了。

姹紫嫣红，组成了大家庭以外的别一个热闹的世界。映山红，石竹，盆竹，平地木，万年青，黄杨，栀子，佛拳，巧角荷花，雨过天青，羽士装，大金黄，芸香，蝴蝶花，吉祥花，兰花，荷花，夜娇娇，鸡冠花，凤仙花，乌罗松……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芬芳。为了充实这个世界，小主人真有点不识劳倦，其中有些花种，还是跟随大人到阮港、乌石头一带扫墓，从山上迁回来的呢。

从掘坑下种，嫁接新枝，到施肥浇水，插竹编篱，他总是自己动手，不愿意大人帮忙。每当栽种一种新的植物，他都在盆上插一根短签，写上陌生的名字。他已经学会观察了，可以根据实践得来的经验去订正一些书籍的错讹。当一星新绿爆出泥土，当蓓蕾什么时候悄悄绽放，当奇葩在暴风雨后依然保持着固有的风姿，当花树以成倍于种植时的果实盈盈在手，他都会深深地感觉到一种创造的满足。

蓝爷爷见樟寿喜欢画书，有一次向他介绍说，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里面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长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用双乳当眼睛的怪物等等，尽是人间所没有的异类，可惜的是不知搁放到哪里去了。樟寿想不到世间还有比《花镜》更好看的书，但不管如何渴慕，也不好意思逼着蓝爷爷去寻找，他知道这位老人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吧，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压岁钱还有几百文，无奈书店离得太远了，要买也没有机会。玩的时候倒不觉得什么，只要一坐定，总会记起绘图的《山海经》。

也许是期望太殷的缘故，连长妈妈也来过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了。的确，樟寿没有向她说起过。她又不是读书人，有什么透露的必要呢？而且根据后来得到的情报，正是她踩死了自己养的心爱的隐鼠。为此，他曾经严厉地诘问过她，并且直呼她为“阿长”的。但既然问起来，他也就不忍缄默，只好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差不多一个月过去，是长妈妈告假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做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小樟寿，高兴地说道：“大阿官，有画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似乎突然碰响了一个霹雳，樟寿全身都震惊起来，赶紧接过纸包，打开来一看，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里面。呵，她还记得这样的事情吗？除了她，谁还会记住这样的事情呢？别人不肯做，或者不能做的事，她却是一声不响地做成功了！他心里起了无限的感激，从此，谋害隐鼠的怨恨也就完全消释了。

《山海经》成了他心爱的宝书。那些充满奇幻色彩的图画，激发着少年人的最大胆的想像。他开始画画儿了。

他临摹，也创作；画过插图，也画“壁画”，还有不少漫画。其中一幅“射死八斤”，可以说是小画家个人最得意的作品。邻居沈四太太的儿子八斤，大约要比他大三四岁，常常光着胳膊，手里拿着竹枪，跳进跳出的乱戳一气，还不住地嚷道：“戳杀伊！戳杀伊！”附近的小孩子都怕他，可自己也没有刑天那样丢了脑袋还能“操干戚以舞”的本事，家里又严禁打架，只好眼睁睁地看他逞蛮。可是，他心里憋得不行，便在本子上画了一个死了的八斤，平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完后把字题上。他把画册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不时翻出来看看，作为对八斤的严厉的报复。

有一位长辈见他爱画，便送给他一本画书：《二十四孝图》。起初，他非常高兴，可是翻呀翻呀，便觉得比家藏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之类更加可恶。

画的什么“老莱娱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莱子，手拿“摇咕咚”，倒在地上撒娇啼哭，讨父母的欢心，这还不够做假么？还有“郭巨埋儿”，为了省下粮食供养母亲，居然要活埋自己三岁的儿子，实在太可怕了！为什么如此残暴的行为，会被尊为“孝道”呢？听老人说，有一个叫曹娥的姑娘，她的父亲在迎神时失足淹死了，为了尽孝礼，她也便投入江中去寻找。可是，当死了的曹娥和她的父亲的尸体面对面抱着浮上来时，为什么人们要嘲笑她呢？为什么非得要背对背地负着不可呢？她才不过十四岁，连一个小小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起，也有这么艰难！……他感到，过去传下来的不少道理都是教人死而不是教人活的，于是不禁暗暗起了心反抗。

从《花镜》、《点石斋丛画》、《诗画舫》、《海仙画谱》一类画书开始，樟寿陆续购置了多种书籍。他把母亲床边的大红皮箱搬出来，算是有了藏书箱；他把四仙桌揩干净，也便有了书桌。往书箱里倒放樟脑，用栗色纸包掖封面，他像珍护花木一样珍护着书籍，整天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它们。漆黑的大门和四围的高墙把他同外部的天地隔开，他只能从书籍里探索着和发现着那个开阔的世界。书籍的价值具有多重性，有人利用它消遣时日，有人利用它猎取名利，也有人利用它同人间的恶鬼苦斗。知识，最初便以一种美好的人性定向为道路，从樟寿的脚下伸延.....

此刻，他来到了地狱的入口。

## 5. 自由而整饬的三味书屋

Ade，我们的蟋蟀们！

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

当樟寿告别百草园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依恋。

百草园是屋后的一个菜园，虽然不算很大，可是在被门墙围困起来的世界里仍然是最大的乐园。碧绿的菜畦，洁白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在一片彩色的交响里，曳出了长长的清亮的鸣声。黄蜂静静伏着，而蝴蝶翩然，叫天子那么轻捷，一眨眼工夫就从草丛中直蹿到云霄里去了。西边的短墙，住着一个小小的乐队：油蛉低唱着，蟋蟀们幽幽奏着风琴.....翻开断砖，会不时遇见蜈蚣和斑蝥；斑蝥很好玩，只要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地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和木莲藤纠缠在一起，覆盆子像红珊瑚攒缀而成的小球。采一颗尝尝，又酸又甜，那味道实在要比桑葚好得远.....

可是，从此再也不能常到百草园了。他十二岁了。父亲要他进三味书屋去。他知道，园子在他走后会有多么的寂寞。

三味书屋是城里颇有声望的书塾。它坐落在城东郭门内的覆盆桥，正好同樟寿的祖居老台门隔河相望。离新台门也不远，出门向东走上半里路，再跨过一道石桥便到了。

从一扇黑漆竹门进去，有一排西向的平屋，书房设在第三间，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方是一幅画，画着一棵高大的老松，一只梅花鹿在松下屈腿而伏。书屋两侧的木柱上挂着一副楹联：“至乐无声惟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书屋正中放着一张八仙桌，一把高背椅子，这便是塾师的座位了。书屋正厅的南墙开着圆洞门，里面有一间平房，上悬小匾：“谈余小憩”；北面两间小屋，则写着“仿佛陶庐”；书屋后面有一个亭子间，匾额是“自怡”。亭前有一个小园子，花木的种植很见主人的匠心：左右挺立着两棵桂花树，秋天开一冠金黄，那是很壮观的。东墙脚下是砖砌的花坛，南端种着大天竹，结实累累；腊梅种在北向，每遇冬寒，繁花似雪，香气特别幽远。

三味书屋没有孔子牌位，樟寿和孩子们只好对着“松鹿图”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在一旁答礼，待答礼完毕，就是正式的学生了。

塾师寿镜吾先生像蓝爷爷一样，不求闻达，而以清高自许。传统知识分子的怪脾气。其实，教师历来是清而不高的。镜吾先生穿的衣服相当破旧，夏天，只有一件夏布大衫，算是“礼服”挂在书房的墙壁上，父子三人谁个外出就让谁穿。家人给他做了一件皮袍子，他一直舍不得穿，只是有一次，当他赤膊坐在书房里，见有客人到来，慌忙间找不到长衫，才临时抓来披上。他不抽烟，只喜欢到谢德兴酒店吃点儿酒，算是人生的一大陶醉。吃酒时，总得走进店里，不让学生看见。他常常替师娘淘米煮饭，每次提着淘箩打开沿河的小门时，也得先向两边望一望，遇上没人，才快步跑到河埠头伏下，迅速淘好米又跑回屋里去了。

小樟寿是不晓得这些的。他只听说过这位须发花白，戴着大眼镜的高而且瘦的老人是城中极方正、质朴而博学的人，这书塾也是城中最严厉的书塾。镜吾先生生活那么清贫，却从来不滥收学生，而且一定要经过他的亲自考核才准予入学。只要送进了三味书屋，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必须恪守塾规，刻苦用功。他备有一根竹制的戒尺，也有罚跪的规则，只是不大使用。当学生将他气得不行的时候，他会坚决地推出去，任是怎样说情也没用的。

起初，先生对樟寿便很严厉。他太调皮了，居然跑到庙会里去扮小鬼，油彩没抹干净，就跑回到书房里来；又爱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问：“‘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拿先生开玩笑吗？可是过了不久，却喜欢起这个常穿一件竹布长衫，扣门吊着钥匙，辫子编成三股而又垂得最长的学生来了。

酷爱自由是孩子的天性。既然有一个世界在书塾外边喧闹，自然要引起他们窥探和涉足的欲望。就算塾内只留了巴掌大一块园地，也成了樟寿和一群孩子最活跃的场所。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寻蝉蜕，捉苍蝇喂蚂蚁，都是很有趣的。由于家教长时间的约束，他不可能变得像其他孩子一样的撒野，像捉了蟑螂从锁孔里放进抽屉，咬坏别人的纸盔甲，或是用锥子钻破别人的茶壶，然后用黄蜡封好之类的恶作剧，都与他无缘。一次，有一位同学分赠印有花卉的漂亮的信笺，大家都喜滋滋地收下了，只有樟寿执意不收。后来才发现，这些信笺都是偷来的。他不干预别人，但更厌恶别人的干预。在听讲新书或偷看闲书的时候，就有同学硬拉着他一起玩纸盔甲。为什么要勉强别人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呢？他很不满，裁了一张红纸条，写上“君子自重”四个字，然后端端正正地贴到书桌上。

每天早上，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孩子们便抱着蓝布包陆续到齐了。向“松鹿图”行过礼，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背书、读书、写字、对课，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没有波澜，没有节奏。而且，这样枯燥的日子都挤得满满的，除非赶上端午节、中秋节，再有就是先生扫墓的日子，不然，根本找不到可以挣脱课本的羁绊，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光。儿童毕竟脆嫩，都给沉重的功课压迫得疲乏了。

樟寿仿佛具有先天的适应性。他聪敏过人，喜欢思索，且又特别执拗要强。这种气质和性格的结合物，具有足够的抵抗力，使他不致像其他同学那样感到窒息般的难受。

譬如对课，他就觉得有点像猜谜似的好玩。有一次，先生出了一个五字课题：“陷兽于阱中”，大家都对不上来，他忽然记起《尚书》里“放牛于桃林之野”的句子，便有了“谜底”，随即对道：“放牛归野林”，受到先生的夸奖。

一天，高幼文趁先生走开的间隙，从桌上翻见了课题。这时，恰巧樟寿到后园去，他赶忙追上，说：

“阿樟，知道课题了，你看怎么对？”

“什么课题？”

“‘独角兽’。”

樟寿笑道：“对‘四眼狗’好了。”

对课时间到了，课题果然是“独角兽”。高幼文不假思索，抢先叫道：“‘四眼狗’！”

同学哗然大笑起来。先生发火了，呵问道：“‘独角兽’是麒麟，‘四眼狗’是什么？你有没有见过？”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开了：“二头蛇！”“三脚蟾！”“八脚虫！”“九头鸟！”……樟寿根据《尔雅》，对了个“比目鱼”。先生马上称赞说：“‘独’不是数字，但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字，但有‘双’的意思，可见是用心对出来的。”

课后，樟寿对高幼文说：“你也真呆！我是和你开玩笑的，你怎么好当真呢？”

还有一次，先生出了“月中桂”的课题，有的对“风前柳”，有的对“雪里梅”，樟寿却出人意外地对了个“星里麻”。这回，连先生也不禁要问：“‘星里麻’是什么？”他不慌不忙地答道：“星里有牛郎织女，织女星不正是织麻的吗？”

至于写字，也是他所喜欢的。从字的形体结构中，他慢慢地领悟到了一种建筑的美，就像在百草园里用砖头和木块砌房子一样。每次习字，他都先把裁好的黄色毛边纸摊向桌面，用铜制镇纸圈小心压好，然后才提起“十里红”毛笔，从容地一笔一笔地写。他宁可写得慢些，也要写得工整些，漂亮些。完后，在纸的中间写上“×月×日周樟寿字”。先生批阅时，习惯给写得好的画上红圈，同学们都管这些红圈叫“红鸡蛋”。每次把习字发下来，同学都会叫起来：“阿樟的‘红鸡蛋’最多！”

诵读经书最乏味了。樟寿最初翻开经书，那字里行间，往往要叠印出《鉴略》的句子，或浮现出父亲威严的眼睛。同学们都喜欢大声唱读，每到读书时，有的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的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有的念“上九潜龙勿用”，有的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嗡嗡嚷嚷，直把整个书房变作一座大蜂房。孩子们要用声音的滚筒，一遍又一遍把生硬的句子碾成碎块，然后强吞下去。只有樟寿懂得用心咀嚼。他曾经制作了一张小巧的书签，两端剪贴着红色的花纹图案，中间用工笔小楷写着：“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其实，他并不怎么动口，平时几乎听不到他有诵读的声音。

背书的作业很重。月半要背半个月里上的课，月底要背一个月里上

的课，待到年底，就要把一年里上的课全部背下来。背不出来，自然要挨受责罚。一到年底，同学们就都急急忙忙地读书，然后拿到先生面前疙疙瘩瘩地背。读熟一本，再背一本。樟寿的记忆力极强，直到腊月中旬以后，才开始在家复习。过了几天，他抱着一叠一尺多高的课本回到书房，往先生的桌前一放，好一会儿就背完了。

先生有事外出，便由他的儿子洙邻在房里临时照管。一天，大家提议猜字默词，小寿先生对这也很感兴趣，于是顺口念了《诗经》里的一段诗，念过一遍，便交代默写。同学们都呆住了。经书里的字，往往不读本音而读破音，在《诗经》里面更属常见。因此，大家提起它都感到特别头疼。课堂里，搔首者有之，咬笔者有之，搓手者有之，怎样也写不出来。只见樟寿把竹布长衫轻轻一摆，侧着身子，提起笔一挥而就：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

施，

鱣鲔发发。

葭莩揭揭，

庶姜孽孽，

庶士有。多么古怪吓人的方块字呀！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一种内驱力，驱使人们奔赴一个潜在的目标。内驱力是对自由的渴望，是奔泻无己的热情，任何外部强力都无法遏止它。

在同学中间，樟寿应该算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了。可是，上课的时候，他也会不时地从那无形的牢笼里逃脱出来。自由有选择。他喜欢玩，常常把晚上在家做的纸糊盔甲，用装洋线团的纸盒装着带到书房里来。但那是留给小园子的，他不会像别的同学那样摆到课桌上，驱使指头去开辟古战场。他的指头别有指派：或者翻看绣像小说，或者把荆川纸蒙在绣像上面，像描红一样描摹。

先生不像他祖父，在他读《鉴略》的时候，也同时让他读《西游

记》，读《水浒》。这位老人一生厌恶科举考试，但却一直忠诚于支配科举制度的经典，而视小说为闲书。描画儿也不许可的，让他看见了就要挨骂：“摆着书不读，画这些做啥？”甚至拿过来当即撕掉。为了满足心灵的欲求，就得寻找机会，寻找可以对付强力和回避危险的办法。樟寿的课桌最初安设在南墙下面，靠墙的光线太暗，他把小说放在抽斗里，老是模模糊糊的，得弯下身子才能看清，这样目标就大了。于是，他借口说是靠门风大，请求先生让他移到西北面临窗的地方。同时，描画儿也不好叽咕叽咕地磨墨，先生讲课是不许下面有声音的。为此，他常常借用周梅卿的铜墨盒子，那盒子里填着浸透了墨汁的棉花絮，只要用毛笔蘸一蘸，就可以静悄悄地进行了。

最好的机会是在先生念书的时候。他是那么忘情于书里的文字和自己的声音，当学生的书声已经渐渐低下去、静下去的时候，他仍然大声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喏……”

读到这样的地方，先生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这时候，同学们便纷纷做起纸糊盔甲来了。樟寿则慢慢拉出抽斗，把“闲书”翻开，或是把荆川纸和铜墨盒悄悄拿出来……

## 6. 百草园·友谊的种子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欢乐。失去的欢乐，总会从繁富的世界中找到新的补充。惟有友情不能代偿，那种默契的愉快，一旦失去便永远无法填补；乃至重新回忆起来，也只能令人感到无限的孤独与忧伤。

这种本不属于少年人的心事，开始折磨着樟寿。

那是冬天。雪下得很大。百草园里，绿的叶子和红的浆果都消失了，墙根的乐队也不再发出乐声。不过，雪地里仍然可以做许多事情：拍雪人，塑雪罗汉，都很新鲜的；只是不及捕鸟的紧张而有趣。

樟寿放学回来，马上扫开一块雪地，把家里的大竹筛搬了出来。他学着庆叔的样子，用短棒把筛支起，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了长绳，然后蹲到远远的地方牵着，等候着贪食的鸟雀们飞下来。倒霉的是，每次

拉了绳，都只捕得三四只小麻雀。庆叔可不同了，不到半天便能捉到几十只，什么鸟都有，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真叫人眼馋！

由他传授的方法，怎么总是不灵验的呢？樟寿跑去竹作间里询问究竟，庆叔只静静地笑道：“你比张飞鸟还要性急，不等它们走到筛子中间，便忙着拉绳子了。”

接着告诉樟寿：他的儿子运水，是一个捕鸟的能手。

章福庆是海边的农民，在杜浦村，靠租种地主的沙地度活。忙头过去，就上城里来做工了。经一个竹作师傅的介绍，樟寿家里便成了他的老东家。他最擅长的是竹作，村里人都叫他“竹作阿福”；除了做竹作外，收割晒谷，牵砬舂米，各样杂活也都能做。由于勤劳能干，人又老实和气，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他。他做竹的细工，如提盒、花盒、编字的考篮，还有“嬉家生”，都十分精致；给樟寿做的“竹鸭蛋”，也是匠心独具，市面上没有卖的。平时，就算他劈篾片、补簞，孩子们也喜欢看。手指，刀子，篾片，参差错落，那是何等的轻快利索！甚至在园子里晒谷，那高高的谷堆也会成为孩子崇拜的目标，一如埃及人眼中的金字塔。早上，他把簞摊开；到了中午，便拉起簞的四角，再使谷集中成堆，重新摊布，教它翻一个面。孩子们把这看做晒谷的正宗，每当看到许多人使用猪八戒式的木钉爬，在簞上爬来爬去，都觉得十分可笑。

——要是运水来了该有多好！樟寿想：那么，就立刻给他装竹筛去，那么就下雪，整天整天地下……噢，他是怎样一个模样儿呢？像六一、七斤他们吧？也许更能干，他像庆叔……呵不，连庆叔也那么赞叹他，他准能捉到更多更多的鸟……自从庆叔提起运水的名字以后，樟寿便快快地整天惦念着海边那个陌生的孩子。

除夕之夜，曾祖母戴老太太去世了。新年的第二天，他家里又轮到周氏九世祖“佩公”值年祭，于是人来人往，特别哄闹。“佩公祭”资产较多，古铜的祭器又很值钱，加上摆放的大书房比较偏僻，需要有人专门看管。周凤仪正担心分派不出人手，章福庆提议让他的儿子前来帮忙，主人自然应允了。

一天，鲁瑞告诉樟寿说：运水来了！

他高兴得跳起来，飞也似的跑去看。运水正坐在灶头间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他很腼腆，怕

同别人答话。也许是差不多大小的缘故吧，只是不怕樟寿，没有旁人就一起说话儿。于是不到半天，他们俩便厮混熟了。

清早起来，樟寿就到竹作间里去找运水。头一件事，就是要他捕鸟。

“这不能。要下大雪才好。”运水接着告诉他说，在海边捕鸟时，稻鸡、角鸡、蓝背、鹁鸪等等，什么鸟都有。

樟寿想往不已，不禁说：“要能下雪就好了！”

“不是下雪天也好玩的，”运水笑着说，“夏天，你到海边来，我们就一起捡贝壳去。那贝壳也像鸟毛一样好看呢，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吗？”

“不管。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在我们那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野兽：獾猪，刺猬，还有獾。月亮地下，你听，啦啦地响了，獾在咬瓜了。这时候，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过去……”

樟寿并不知道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问：“他不咬人吗？”

“有胡叉呢，”运水说，“走到了，看见獾了，你便用力刺过去。这畜生很伶俐，倒会向你奔过来，反从你的胯下逃走了。你不知道，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哩！……”

樟寿没有想到天下还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这样好看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先前只知道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还有呢，”运水憨厚地笑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跳跳鱼。只是跳，只是跳，都长着青蛙似的两只脚。”

“不会跳上岸吗？”

运水说：“我们海边的人都这么说，‘跳跳鱼，水里会游，岸上会走’。”……

几乎所有读过的书籍，在他的叙说中，都仿佛一下子变得黯淡无

光。樟寿说不出怎样地喜欢这位月亮地下的小英雄，一有闲空，就陪着到处玩。他愿意这么陪着，听说着海边的事情，或者把自己和另外几位乡下小朋友的事情也说给运水知道。在他看来，运水的身上，总好像有着六一和七斤他们的影子，那紫红的圆脸和闪闪的银项圈，会不时地幻出蔷薇般的夜色、月光、灯火、戏台、猪和船、啦啦的响动和潺潺的水声、西瓜和罗汉豆……只要同运水在一起，他便觉得自己变得特别爱幻想，爱动，爱絮絮不休地说话。

运水一样地愿意亲近这位少爷，他向樟寿说，在城里也看到了许多海边没有的稀奇物儿。樟寿听了，心里很替他高兴。

忙碌了将近一个月，杂活做完了。正月十八日以后，运水就要随同他父亲回到乡下去。他们的根在那儿。

樟寿早起照例去找运水，听说他要走了，顿时急得大哭。这时，运水躲在厨房灶下，也哭着不肯出来。可是，章福庆的包袱已经打叠好了。埠船正在等候。

百草园，碧绿中曾经多出一片西瓜地，一个大海。可是，毕竟都是幻梦中的影子；连运水也是梦，一个早上就消失得没有踪影。他变得有点害怕这个“鬼园”，每当放学回到这儿，都会感觉到一种失落的虚空。离别，对于他本来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不过，离开安桥头时，向六一、七斤他们一挥手，怅怅中倒也还夹杂着一点嬉玩的余兴，至今连这点余兴也没有。比起一个集合体，单个人的交往，也许会被赋予更多的情愫，且离别的忧伤也是一种认识，它将随着年龄的递增而加深着灰黯的色彩。谁知道呢？反正樟寿不会去咀嚼这些干涩的哲理。他才十三岁。

过了许久，庆叔回来了。

在他身后，当然没有运水，却意外地为樟寿捎来了运水的礼物。樟寿把一个小纸包打开，不禁一怔，眼眶里随即涨满了泪水——

那是一包不同颜色的贝壳，和几根不同颜色的鸟毛。

## 7. 从“少爷”到“乞食者”

还有更惨痛的人间离别。

离别不复是少年人的烦恼，半年之后，命运把樟寿连同家人一起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接到戴老太太去世的电报，内阁中书周福清告了假，携着与他的小女儿一般年纪的潘姨太太和十二岁的儿子伯升，一道从北京赶返绍兴。

丧事料理完毕，他一直闲居在家，很少出门走动。一天，家人突然发现他带上听差陶阿顺出门去了。

这一年，正值慈禧太后“万寿”，由光绪皇帝颁旨，在全国各省举行一次“恩科考试”。周福清的五家亲友，都有应试子弟。他们得知他同主考殷如璋是同科进士，有同年之谊，于是就凑集了一万两洋银，央求他去买通主考，赚取举人。科场行私贿赂，虽然已成风气，但毕竟是渎犯国法的事情，这使周福清足足犹豫了好几天。

周福清，字介孚，生来就是一个强人。他从小家道贫寒，没有钱上学，经常在王台门族房书塾里旁听。凭他的天资和勤奋，收获最大，当时族中的人都赞许他是“收晒晾”。三十岁那年，他考中了举人。第二年会试落第，他并不甘心，又觉得报考誊录之类不是正路，就算将来当了知县，也不会比科班出身的官员更有前途，于是以非凡的大胆，少报了七岁，再度参加会试。这一回，他终于为周家老台门赢得了一块翰林金匾。然而，仕途从来都不平坦。后来外放知县，由于同僚的排挤，结果他被勒令辞职，改充为教官。当此失败之际，他咬咬牙，选定了一条为当时的读书人所不齿的出钱捐官的道路，以图东山再起。在京整整候补了九年，才当了一个专事抄写的七品小京官。

虽然他不认“天命”，无奈已经年过半百；回顾夙仪，又屡试不第，这是不能不使他深感焦虑的。但是，他绝对不愿意承认，后代会屈身庸下，而不能成为延续自己事业的强壮的枝芽。深悉官场种种积弊的周福清，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借此机会孤注一掷。

周福清赶先来到苏州，当他打听得殷如璋的来船已向阊门码头泊定，便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除了写明那五家应试子弟以外，还特意加上“小儿第八”，并将洋银一万元的钱票附入封套，差遣陶阿顺去船上呈递。

这时，刚好副主考周锡恩在船上同主考叙谈。殷如璋知道来意，见信并不拆阅，等闲将信搁在茶几上，继续谈话。陶阿顺等急了，忍不住

嚷了起来：“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

这么一嚷，风暴便来了。

当年周福清考取进士，在“京报”敲锣报喜的时候，戴老太太却在屋里放声大哭。人家问她：“这是喜事呵，为什么要哭？”她连声说道：“拆家者！拆家者！”这是绍兴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想不到一位老太太的话，居然成了预言。

周福清逃走了，家里的其他男人也都先后逃走。樟寿被母亲安顿在三味书屋里，连饭也得送到那里去，完全成了小囚徒。几个县衙门里的皂役，身穿皮袍，腰束宽带，手里拿着捉人的小木牌，经常来周家搜查和盘问。每到门前，就高声叫道：“捉拿犯官周福清！”……新台门，曾经显赫一时，如今却是充满了凄清和恐怖。

在一个人治的宗法社会里，权力，金钱，伦理，纠结而成巨大的关系网，狠狠抓住每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目标，可以不经“后门”而径情直达的。贿赂，自然成了沟通上下层社会的必要渠道。

走投无路的周福清，这时痛苦地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本家礼房的女婿陈秋舫。他想，如果此人愿意帮忙设法，法律这东西，绝不是没有折扣的可能的。可是，当他登门求告时，陈秋舫却避而不见了。他没门了。

什么时候有过像现在这样低眉敛手的境遇呢？周福清生性怪僻、傲慢，而喜欢骂人又是出了名的。他平常所赞许的，只有父亲周苓年一个人。此外，上自“昏太后”、“呆皇帝”，下至家族中的子侄辈，无论远房近房，一律加以痛骂。身为知县老爷，可以让女佣呼他小名，催他用膳；而在上司和同僚面前，则从来是独来独往，绝不逢迎。有一次，他到抚州府晋谒，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同知府当面顶撞起来。知府下不了台，只好搬大帽子压他，说：“这是皇上的事情。”不料，他竟反诘道：“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皇上？”知府气愤之极，喝一声“大不敬”，随即“端茶”逐客。此后，他横被揭参，与这件事是不无关系的。

不巧得很，这次求见的陈秋舫也是被他讽骂过的。陈秋舫初做姑爷时，住在岳家，留连忘返。他就对人说：“躲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这话传到陈秋舫的耳朵里，一气之下，立即告辞，并且扬言不“出山”决不再进周家大门；后来果然中了进士，做了苏

州府的幕僚。周福清的案件正好要经由苏州府审理，于是戏剧性的安排就这样决定了。陈秋舫不但托故不见周福清，当知府王仁堪找他商仪，打算从宽处理时，他也执意不允，一定要“乘法公断”。王仁堪无法，只好把在押的陶阿顺移送浙江。周福清不知道：一个人，要坚持个性有多么困难，尤其在官场中间。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除了最高统治者可以唯我独尊，纵意而为以外，所有官员，都必须不同程度地卑躬屈节。周福清太任性了。结果，他的怨敌得以联合社会，以十倍的惩罚报复了他。

周福清在上海避居了一段日子，不得已还是投案自首了，他不愿意看到儿孙们因为自己的株连而栖皇终日。从他入狱的时候起，鲁瑞把两个大孩子迁移到了皇甫庄。樟寿寄居在大舅父鲁怡堂处，二弟櫛寿随了小舅父鲁奇湘，他们俩就这样开始了少年时代的流亡生活。

岁月，此刻对于樟寿来说是多么的漫长呵！

一样随着母亲前来，而大小村舍、天空、人们的脸，都似乎显出异样的颜色来了。笑容消失了。没有响亮的招呼。樟寿觉得四围的目光，总包含了一种什么东西，冷漠而尖刻，像锥子一样扎向自己。从前在家时，不是老想念着皇甫庄吗？而今反倒翘盼着返身归去的日子了。百草园呵，大桂树呵，四仙桌和大皮箱呵，甚至连三味书屋的桌椅也变得那么亲切。为什么不能回家呢？到底祖父出了什么事故？他已经能够体认祖父对自己的那份怜爱了，尤其在读书以后，除了像以往一样解说戏文以外，祖父还常常为自己批改文章，甚至亲自做出范本。过去同学取笑他，把“豫山”念成“雨伞”，不也是祖父给改成“豫才”的吗？祖父说，“豫才”就是“豫章之材”，比原来的更有意思呢。只是骂人太凶了，他不明白祖父为什么对大人会那么暴躁；最不好是骂祖母，只有那潘姨太太是不骂的。为此，他曾常常感到不平。可是这时候，一切都似乎变得可以原谅，祖父再也不能骂人了。他怀念祖父。

只有失去了社会的温情，而感到严霜四逼的时候，一个人，才可能真正认识周围那许许多多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

从前，樟寿一直觉得农民和盐工的生活是那么自在有趣，跟花鸟一样。其实，他们被囚于一小块可以出卖力气的土地上，终年流汗，都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没有天空，没有可炫耀的云彩。他们的命运那么暗淡。最悲惨的是妇女和小孩子了，他记不清看过和听过多少回关于抢亲和溺婴的事实。住在自家斜对面的翠姑，她被抢的惨况，就是亲眼目睹

的。翠姑从小被母亲许给山里人家，长大后决意不肯，要求退婚，男家便摇了船来抢。翠姑见到来人，慌忙关上大门，由兄弟阿仙握着柴叉在门口守卫。怎敌抢亲的人多势众，结果还是蜂拥而入。翠姑爬出后楼，想逃到东邻躲避，急忙中失足掉落河里。碰巧男方的船停靠在那儿，于是像捕鱼一样把她捞起，拖到后舱里去。由于阿仙的威胁，最后男方还是放了翠姑，只是翠姑经不起这场惊吓，不久也就得病死去了。为什么城里和乡下都一样有这样的事情呢？锡箔店里的工人，还有摇船的，剃头的，做泥工的，抬轿的，那许多在酒店外头站着喝酒的人们，不也是靠卖力气过日子吗？那些漂聚在土谷祠、长庆寺、穆神庙和街边埠头的褴褛的人们，谁分得清他们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呢？许多记忆中的场景被思索一一粘连了起来，樟寿便觉悟到，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人：上等人 and 下等人。威严和逸乐都属于少数的上等人，而下等人是只供奴役的，除了流血流汗，他们不可能有别的权利。如此祖祖辈辈遭受剥夺和凌侮，本来不是很难忍受的吗？可是，他们竟活得那么安稳；奇怪的是，还会瞧不起同样穷落的人们。他清楚地记得，以奚落的目光看待自己的，其中就有他们。人，为什么要变得这样的冷酷无情呢？

母亲不在身边，没有哪一个大人会理会到孩子的寂寞。幸好在舅父那儿发现了一部《荡寇志》，他从来没有见过那般生动的画像，像赞用篆隶楷草各体分书，也非常的精美。他到附近的杂货店里买了一种叫“明公纸”的竹纸，一张一张地描写，其中像赞的字也都照样写了下来。除了表兄绅哥哥帮写过几张，所有图画都是他画的。他怕见户外的目光，愿意这么呆在屋子里做事情。他把全副精神都倾注在描画这上面，仿佛从这时候起，便已开始试验着某种麻痹自己的方式。描绘的时间长了，当小兄弟也不来，他就会跑到隔壁大舅父那儿去看看。大舅父嗜好鸦片，终日垂着床帐不起来。醒着的时候，烟灯就像鬼火似的，在烟雾迷离中一闪一闪地放光。樟寿平时很少见到他，此刻也无从亲近，只隔着帐子叫一声：“大舅父！”就惴惴地退了出来。

一次，他在外边看见一位亲戚同他的邻居在挤眉弄眼地说话，便下意识地走近去听。早在长妈妈的时代，他就害怕那类猫一般轻悄的说话，总是疑心别人在说着自己。果然，那亲戚说了一句：“要饭的.....”他的脸腾地烧了起来，耳朵随即像塞了沙泥似的，嗡嗡地再也听不进去。

他飞奔也似的回到屋里，随即又想跑出屋外。可是，往哪里去呵？母亲嘱咐过是不能回家的。什么绣像都画不下去了，即使坐下来，也每

每提笔摆弄一下，便抱头想起自己的母亲、祖父和家人……

母亲来了。他小声地诉说了听来的言语，还有寄住的各种委屈，完了便厮磨着一定要回去。母亲还是那句话：“孩子，再等几天吧，要回去的！”几天过去了，又几天过去，依然是有什么动静也没有。

险恶的环境教人忍耐。自然，再没有什么比忍耐更难堪的了。可樟寿不知道，就在他描画绣像的当儿，他的父母正忙于变卖田地，投托亲友，去打通关节——祖父的案件还没有了结呢！

无休止的等待是一场精神酷刑。后来，每到不堪忍受的时候，樟寿就会放下画笔，找野孩子去。

只有孩子们像过去一样亲热，他们没有大人的势利眼。在他们中间，不但用不着设防，还可以接受他们的拥戴，做“破洋山”的头领。他最喜爱这个游戏了。选定了最大的坟墩做“洋山”，然后把小伙伴们分成两部分，让一部分在山上守卫，他率领另一部分向山上进攻。当目标已经攻克，高高站立在“洋山”之上，那有多么痛快呀！“弹地毛”也很好玩，把坟地里的荒草割来堆在一起，用火点着，大家就围着火堆蹦呀、跳呀、叫呀、唱呀……在窜动不息的火焰旁边，他便把人间的冷酷全然忘却了。

还可以看鬼戏。只有到现在，樟寿才真切地体验到了鬼戏的价值。公正的无常，复仇的女吊，都不是他在人间可以见到的形象。活无常浑身雪白，粉面朱唇，双眉紧蹙，似笑似哭。他出场一连打了一百零八个喷嚏，同时也放了一百零八个屁以后，才诉说起自己因为同情一个被庸医误死的鬼魂，遭到阎王的责罚而感到的冤苦。其中，有几句斩钉截铁的唱词是樟寿最难忘记的：难是弗放者个！

哪怕你，铜墙铁壁！

哪怕你，皇亲国戚！在樟寿的眼中，活无常成了正义的化身；他因了这具鬼魂而有所期待，期待着好人的得救和恶人的没落。他甚至暗暗祝祷：让祖父也能遇见活无常。多么富有人情味的鬼魂！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他就一面紧张，一面高兴起来了。

目莲戏里有“跳吊”的戏。男吊登台以后，就轮到女吊出场了。她穿

着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项间挂着两条纸锭，低头垂手，弯弯曲曲地在台上走了一个“之”字形，然后将披着的头发往后一抖，露出灰白的圆脸，漆黑的眉毛，乌亮的眼睛，猩红的嘴唇。在阵阵悲凉的喇叭声中，只见她两肩微耸，转脸四顾，倾耳静听，似惊，似喜，似怨，似怒，终于唱了：奴奴本是杨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然后，她就唱着自己如何去做童养媳，备受虐待，最后投缳自尽，想化作厉鬼去复仇。樟寿想，一个人受了冤屈，为什么不复仇？女吊的倾诉，使他感到自己的胸怀也舒缓了许多，于是以为：在所有鬼戏中，没有哪一个鬼魂会比她更坚强，更美丽。

不久，大舅父移居小皋埠，樟寿自然也跟着过去。直到这时，他绷紧的神经才开始松弛了下来。

新居也是台门，东首住着胡家，西首住着秦家。大舅父的前妻是秦家人，所以当皇甫庄的房屋典期已满，便向秦家借住了厅堂西面的部分厢房暂住。秦家已故的主人秋渔，是前清的举人，诗画很有点名气。他在屋后建造了一座花园，叫“娱园”；那里有一“微云楼”、“留鹤庵”，还有假山、藕池、洗砚池，周围植着奇花异草，乃是当年一批文士雅集的地方。现在，多半已废弃了，但总算给了孩子一个可供活动的地方，虽然这蚩蚩笼式的庭园，在樟寿兄弟看来并不如百草园般的有趣。

秋渔的儿子少渔是大舅父的内弟，小孩们叫他“友舅舅”。他也是个抽鸦片的，但没有整天地卧在床上，午后仍照常行动。这时，樟寿会常常上楼去找他聊闲天，或者央他画梅花。樟寿爱梅花。几年前，一位中房叔祖曾经给他刻过一枚图章，就叫：“只有梅花是知己。”他喜欢那横枝，喜欢那无须绿叶陪衬的雪白的花朵。

友舅舅还像他一样喜欢小说，凡是当时流行的小说都会买来看，只是并不像蓝爷爷那样爱惜，看过的，都被扔到一间小套房里。真不失为一种机缘。虽然寻觅起来很费时光，有些也残缺不全，却毕竟可以自由取阅。在杂乱的书堆里，樟寿不但可以看到家里有的《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还能捡到种种《红楼梦》和侠义小说，以及从别处很难见到的东西。《红楼梦》，这部封建大家族的衰亡史，把他从怪诞的神话想像中拉回到不公平的人间，那底层的众多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一个少年人，未必能领会“满纸荒唐”的底蕴，然而受伤的心，却也能随着迭起的波澜而俯仰沉浮了。

中国式的人文主义传统，使最庄严的官场充满着暧昧不清的私人感情。周福清投案以后，知府出于个人私交，有意为他开脱，便提示说他原来患过神经病，因为丧母的刺激以至再度错乱，造成犯罪。倘情况属实，那么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理的。可是，他本人怎样也不肯承认，执意以个性碰撞法律。在公堂上，他振振有词，说自己从来未曾昏乱过；并且列举出历届由于疏通关节而中举人的一批名单，试图证明他自己无非按照通例来它一下罢了。腐败，作为个别的存在或许可容暴露，但是如果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却是不能轻易动用舌头或指头的。倔强，将为自己赢得什么呢？在刑部上报的周福清的案子上面，光绪皇帝钦批道：“斩监候。”

这是一个绝望的结果。但是，对这时候的樟寿来说，仍然是一种希望。他毕竟可以回家了。

## 8. 在当铺与药店之间

“斩监候”：把犯人监禁起来，听候斩首。至于斩与不斩，那得看皇帝高兴。秋审时，只要朱笔轻轻一点，一个人的生命就将长此了结了。为此，每年秋前，樟寿家里都得花大量的钱财进行营救。无论对于犯人或是家属，这都是一场精神虐杀，而虐杀往往要比暴杀更为可怕。

在监狱，囚犯也分等级。要是官犯，待遇就比普通的犯人要优厚一些，可以免受脚镣、手铐一类刑具，甚至还能役使禁卒，环境也比较舒适。由于知府大人的通融，周福清终于租住了杭州府狱附近花牌楼的一间房屋，并且由潘姨太太和她的少子凤升陪住；此外，还雇佣了一个厨师，一个保姆。

这一切负担，都落到长子周凤仪的身上。

周凤仪，小名宜，一介书生，有什么能力去负担一笔巨大的费用呢？惟有在变卖田产的契据上画押罢了。他是如此不幸，到杭州参加乡试，就遭逢了父亲的贿赂案，结果被查出扣考；父亲投案以后，又被拘捕审讯，虽然无罪开释，秀才的身份却被革夺了。从此，再不堪设想可以重踏父亲亲自铺设的道路，为后代做出做人的楷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古已有之的株连，把他所有的好梦都一举击破了。

一个人面临绝境时，可以有两种抉择：或者奋起抗争，或者甘于沉

沦。周凤仪选择了后者。借酒浇愁，是中国士人的习惯的解脱方式；而绍兴，又盛产这种解忧的尤物，这样，他便轻易地开始纵酒了。一个平素严谨的人，几乎完全失去了节制，酒喝多了，温厚的面孔常常涨得通红，而且歪扭得可怕；于是摔碗筷、拍桌子，每天无端地大发雷霆。

百草园的天空蓝得那么可爱，风暴一来，便全被乌云给覆没了。宁静和温暖，都已经成为可怀念的往事。樟寿心里常常感到郁闷，感到骚动不安。即使仍旧回到书塾，同样摆脱不了家庭问题的困扰。在皇甫庄避难时，他是多么的想望回到家庭，回到自由的怀抱，现在才知道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一致的地方。他想不到，为自己所稔熟的空间，竟会变得这般逼窄！

早上走进书房，听到一位同学报告“矮癞胡”虐待学生的事情，樟寿立刻想到报复这上面去。一个人受到太多的压抑，总要找寻一个反冲的机会，况复这回又是遇上“矮癞胡”！

原来，在新台门与老台门之间有一个旧家王姓，称作“广思堂”，也叫“王广思”，那里有一个塾师开馆教书，因为外貌特别，身矮头秃而且多须，于是得了“矮癞胡”的诨名。他对待学生苛刻极了，痛打罚跪固然是常有的事，又设了一种制度：出去小便，必须向先生领取“撒尿签”，否则便要受罚。以前听说这类事情，大家都觉得可气可笑。这回又说的是有小孩在那儿上学，拿了什么糕干或烧饼去，被查了出来，不但挨了责骂，点心也被没收了。大家议论道：没收以后呢？自然都是先生吃了吧？于是动了公愤，决定惩罚这个贪婪的家伙。

放午学的时候，樟寿约同几个爱管闲事的商家子弟，一起前去问罪。恰好“王广思”这边也放学了，师生全都不在馆里。他们搜出笔筒里的“撒尿签”，便全都给撅折了，又把珠墨砚台翻过来放在地上，表示曾经有人袭击过。他们想让“矮癞胡”知道：学生不是好惹的！

不久，大家又做出一项决议：打贺家的武秀才去！这贺家住在附近的柔邈弄内，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要听说是“武秀才”便引起普遍的恶感。有同学报告说，他动不动要出门恐吓路过的小学生。好嘛，再来一下，像惩罚“矮癞胡”一样惩罚他！可武秀才不比“矮癞胡”，既有力气，又懂武艺，怎么办？大家商量过后，决定由各人携备武器，然后集中行动。孩子们不相信，天下还有斗不败的敌手。待到傍晚，每人都提着棍棒陆续来到约定的地方，樟寿则把祖父做知县时给“民壮”挂过的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了出去。大家像《水浒》里的好汉一样，分批摸到

贺家门口屏息等候。可是，奇怪的是等了老大半天，还是听不见大门的响动。于是有人说，大约是走漏了风声，让武秀才知道了，才害怕不敢出来的罢？战争虽然打不成，大家还是得胜也似的走散。樟寿走在最后，心里怎样也拂拭不掉那么一层辜负宝刀的歉意。

在这个少年人的身上，潜流着祖父的强悍而执拗的血液。经过《水浒》、鬼戏和侠义小说的蛊惑，以及现实生活的痛苦的熬炼，一种同强暴对抗的精神，得以时时勃起。然而，一场更为巨大的不幸，却几乎整个地压倒了他。

父亲病倒了！

那是冬天。

周凤仪突然口吐狂血，全家在惶恐与忙乱中研了墨汁，倒进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医者意也”。用墨，正取其色黑可以覆盖红色；至于要用陈货，大抵出于“老资格”的缘故罢？本来，是很有点诗意和哲理在的。而这时的樟寿，却根本无法领会此中的妙谛，眼看着父亲脸色苍白，满嘴墨迹，只感到可惨而可怖。父亲不是隐鼠。

不过，吐血确也很快停止了，病情于是逐渐地归于平稳。最初请了一个姓冯的医生，穿着古铜色缎制的夹袍，肥胖的脸总是醉醺醺的。正好榭寿也害病，便请他一起来诊治。看过以后，他对凤仪说：“贵恙没有什么要紧，但是令郎的却有些麻烦了。”隔了两天，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不料说的完全相反，还说“舌乃心之灵苗”，有一种灵丹，点在舌头上面就会痊愈云云。周凤仪觉得他不可信赖，应付一阵，就将他打发走了。

那时候，他的病不算很严重，还可以独自到堂前廊下随便走走。晚饭时，偶尔还喝点儿酒，差樟寿上街买来鸭儿梨、苹果和花红类的水果作下酒物。孩子们常常围坐在他身边，听他讲《聊斋志异》里的阴惨的故事，分享他的水果，那在平时是很难得的一种父爱。

仅有的一点宁静也没能维持长久，一年多以后，周凤仪的病势突然变得严重起来。起先是脚背浮肿，后来便发展到了小腿，逼得延请城内的名医姚芝仙。

姚芝仙出诊的惯例是每次大洋一元四角，隔日一诊，数目是很可观

的。名医用药就是与众不同，药引更是奇特。他决不用什么生姜一片、红枣二枚、竹叶十片去尖之类，而是一尺长的鲜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都是很难搜求的东西。

樟寿十分踊跃地寻找药引，他想，名医的神妙也许就在这个地方。听人家说，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子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其时正值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先前百药不效，今以秋气动之，正好是以气感气。于是樟寿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那些求仙的人，甚至还拼了性命，跑进深山里去采呢！

芦根，要到河边去掘；甘蔗，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这样天天地跑，樟寿不免要感到疲劳。

有一天，他起来得迟，又帮母亲做点家务，这才到书房去。于是迟到了。

先生很严厉地责备了他，他只默然无语。还能说些什么呢？他总觉得，解释是多余的事情。趴到桌子上，他感到心跳得厉害，手有点儿抖。这时，他简直顾不上先生在做什么，从兜里掏出刀子，就一个劲儿地向桌面划！划！划！每划一刀，心里就觉得舒服一些。最后，他鼓起腮帮用力呼了一口气，桌面立刻棱角分明地露出一个字：早。……

责备完学生，镜吾先生一直觉得不安。

这个学生秉赋不凡，品格高贵，平日也很用功；九经读完了，特意给他加读三经，照样能够领会。至于自己嗜爱的汉魏六朝文章，意义艰奥，本不是学生习用的，他竟然也喜欢诵读。一个可造之材，就是太不幸了！周福清已经下狱，凤仪又得重病，这样家庭的担子就只好靠他来承担。如此过早地应付生计，还怕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吗？……

先生把樟寿叫来，问他父亲的病况。樟寿如实讲了，话间还说了一种几天来遍找不到的药引“陈仓米”。先生当即道：“我想想办法看！”然后，又说了好些抚慰的话。

其实，樟寿并没有说全，对于家境，就隐瞒了上当铺的事情。当时，家庭经济已经到了完全破败的地步，卖剩的水田只有二十多亩，仅够一年的吃食费用；至于医疗方面的支出，除了领教当铺，实在再也无

法可想了。

这差使自然落在樟寿的头上。几乎是每天，他从母亲手里把衣服或是首饰拿到塔子桥东咸欢河沿的恒济当去。这家大当铺是一个绰号叫“夏末代”的人开设的，盘剥特别厉害，伙计也比其他当铺的更傲慢。穿过一个坚固的墙门，再走过小门，就站到了比自己高出一倍的柜台面前。他什么也看不见，幸好什么也看不见，只须仰起脸把东西往上送，许久许久，才从那些人称“朝奉先生”的手里接过当票和银钱；然后，跑到大云桥的光裕堂，甚至远至轩亭口的天保堂和水澄桥的震元堂去，再从一样高的柜台上买了药回去。默默地把事情办好，默默地把银钱如数交付母亲，从来也不肯吐露此间的曲折和苦恼。

十几岁的樟寿，就这样作为家庭的全权代表，第一次同社会进行交涉。没有公道，没有人情。任何的不平和愤懑都是多余的激动。一个人的力量太微薄了。不幸毕竟需要忍耐。命运既然扔给他的道路是：从当铺到药店，那么这就是惟一的，别无选择的。

一天忙过之后，樟寿照例坐下来读书。忽然，耳边响起一阵滞重的足音。抬头一看，原来是先生背着钱搭，蹒跚地走进门来：

“樟官，陈大米寻到哉！”

一个荒寒中人，只要给一丝温暖就觉得浑身灼热了。樟寿木然站着，看老人气吁吁地倒出陈米，一时竟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两年从忧患中过去。艰难寻得的药引无补于事，父亲的水肿逐日加重，快要不能起床了。

一天，姚芝仙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我荐何廉臣先生看一看吧，他本领比我高。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樟寿恭敬地送他上了轿，转身进门，就听见父亲用了很异样的声音对大家说，自己的病大概是没有希望的了；先生荐人代替，不过觉得难为情，好同自己完全脱掉关系罢了。但另外又有什么法子呢？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何廉臣了。

无论姓姚姓何，先生的诊金照例是一元四角，不同的是，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是长而胖。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

个人可以办的，这回一个人便有些办不妥了，因为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甘蔗之类，他是不用的。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边还用小字加注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则连做药的资格也要丧失了。对于药引，樟寿虽然逐渐地丧失了信仰，但毕竟还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它偶生奇效，父亲也便从此好将起来。由于蟋蟀要成对的，不得不唤来二弟一起到百草园中去搜捕。翻开土块，同居的本来也不少，可是逃走得快，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有了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假如运气不好只捉到一只，让另一只逃掉了，那么这一只也算是白捉。好不容易找到一对，直到用棉线缚紧，这才相对苦笑着宣告了成功。

药引寻到了，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败鼓皮丸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水肿，中医叫鼓胀，自然用打破的鼓皮就可以尅伏它。这种神药，全城中只有天保堂独家出售，这是何廉臣开方以后特意加以说明的。原来这药店同他很有点关系，樟寿到那里一问，果然顺利地买到了。

然而，败鼓皮丸也并没有什么效用，凤仪的水肿已经漫及胸腹，连呼吸也有些困难了。他常常向鲁瑞诉说身体像被一匹布束紧似的难受，有时还疼得厉害。于是有人劝他吸鸦片救急，他便暗暗到一个本家烟盘里去尝试，渐渐地，也就似乎真的非此不能止痛。事情被鲁瑞知道了，一天带了樟寿到那家窗外察看，见凤仪果然坐在屋内。她再也不敢往下看，便赶忙一边擦眼泪，一边拉着孩子的小手走了回来……

“我这样的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何廉臣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吃了一百多天的败鼓皮丸，就这样停止了服用，周凤仪这时只能躺在床上喘气了。

最后，还请了一回何先生，这回是特拨：大洋十元。他仍旧泰然地开了一张方子，药引不很神妙，只消半天，药就煎好了。可是，待灌下去，却从病人的嘴角倒流了出来……

昏沉的午夜。

周凤仪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樟寿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鲁瑞劝慰

过蒋老太太，送她睡下以后，便赶紧出来同长妈妈站在一起。

父亲吃力地喘着粗气，樟寿感觉着自己的呼吸也变得不均匀了。有时，他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吧……”但立刻又犯罪似的觉得不该这么想，然而，有什么法子可以帮助父亲结束这种痛苦呢？

凤仪看了樟寿他们一眼，问道：“老四呢？”

鲁瑞慌忙把椿寿从睡梦中叫醒，抱到他的床前。他看了一眼，像是放心了，于是闭上了眼睛。过了好一会，他把按在腹间的手轻轻举起，又轻轻放下，嘴里喃喃道：“呆子孙！呆子孙！”说完就不再言语了。

长妈妈急忙按老例给他换了衣服，又将纸锭和经卷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手里做“路引”。这时，他的呼息已经是听不见的微弱了。

突然，长妈妈推了樟寿一下：“大阿官，叫呀，快叫呀！”

樟寿于是着急地叫道：“爹爹，爹爹！”

“大声叫！”长妈妈催促道，“还不快叫？快叫呀！”

“爹爹！爹爹！”父亲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起来，双目微微一睁，仿佛有着一些苦痛，接着便咽了气。

——“爹爹！！！”……

几天过后，樟寿蹲在地上，给一口棺材用朱漆慢慢地画着“寿”字。小妹死时，他才八岁，曾经悲伤地哭过；姑母死时，他写了悼文，愤慨地诘责神明。如今，他好像没有悲伤也没有愤慨，只不时地停定笔杆，凝神注视着面前的那头巨兽：死亡。

## 9. 最后的挤压

衰落将意味着兴起。

自从虎门的炮声沉寂下来以后，头戴花翎的天朝代表，就在谈判桌前俯身接受了成打成打屈辱的和约。门户开放了。“租界”出现了。招商局、电报局、矿务局、织布局，和各种机器制造局迅速兴建起来，成为

贵族官邸和地主庄园以外的最有身份的建筑。石油、机器、传教士、后膛枪和铁甲船，源源进入中国海域；而茶、丝、商标为黑头发黄皮肤的劳动力，以低廉的价格同时出现在西方市场。鸦片，一种麻醉品，反而成了民族的刺激剂。少数为洋炮所惊醒的老官僚，成了第一批改革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了最开明的政治口号；“官督商办”成了最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中国在选定了一个新的出发点以后，就这样最先通过上层社会体现它的前进趋势。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了。新的历史契机打起手势。原来试图对现成的政治体制不加触动，而实行纯经济改革的主张，已经到处碰壁；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正在同步地，甚至更为紧迫地成为变革的目标。《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康有为联合了在京会试的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光绪皇帝，激烈主张变法。《强学报》、《时务报》、《苏报》，一时形成的舆论旋风，开始左右人们的视听，政治变革的思想潜流，于是冲出士人阶层，在社会上迅猛地奔涌开来……

新台门周家同样无法回避这股维新思潮的冲击，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分化开始了。

自周凤仪病故以后，为了办理丧事，家里把仅有的二三十亩水田也变卖干净。于极端困顿之中，作为未亡人，鲁瑞贞守丈夫的遗愿，仍让孩子留在三味书屋里，两年后才改作“遥从”。

那时候，樟寿正在学习制作八股文和试帖诗。一个破落家族的嗣子，必须以原先的惯性，沿着祖父和父亲的道路继续滑行一些时候。但是阻力逐渐加大，他已经变得不大适应于正统的东西；比如读书，便喜欢那些杂书野史、异端邪说。九岁时，祖父曾把一本木板的《唐宋诗醇》寄回家里，并且指示说，学诗必须先诵白居易，再诵陆游、苏轼，然后是李白、杜甫和韩愈。他偏偏喜欢李贺，像喜爱鬼戏一样喜欢这个鬼才，喜欢他那读不懂的朦胧，朦胧中所传递出来的心灵的狂喊和呓语。在汉魏六朝文中，他喜欢愤世嫉俗的嵇康，还有范缜，那无视一切鬼神和威权的朴素的雄辩，使他起了深深的仰慕。

在小寿先生那儿，他读了不少明代遗民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还有《明季稗史汇编》、《明史记事本末》、《经世文编》等等，知道侵略的残酷和反抗的激烈。历史的真相往往为正史所掩埋。当他一旦读到《玉芝堂谈荟》、《鸡肋编》一类笔记，才不免要暗暗吃惊于古来吃人的事实。先前看《蜀碧》，曾经那般痛恨张献忠杀人的凶

残；待偶然从破书堆里看见了永乐的上谕，憎恨便从“流氓”转移到皇帝身上去了，永乐的凶残实在远在张献忠之上。他于是想及祖父遭遇的折磨，自己身受的株连，还有那许许多多不幸的人间故事，都或多或少地跟皇帝有关。在一个少年人的丰沃而又荒凉的心地里，思想的种子已经播下。凡有种子的地方都会有生命的萌生。

后来，在水澄桥墨润堂书坊看到一份《知新报》，使他激动不已。这种激动，不再是乍见《山海经》时候的童稚的好奇，也不比野史杂书所给予的知性的开启，那里完全是另外一种知识结构，与自己过分熟悉的现实世界是如此的紧密相连。在家里，他曾经看过《点石斋画报》，看过英人傅兰雅编的《格致汇编》，但却不如《知新报》的丰富而新颖。它除了报道国内的重大新闻，重要的是译录了西方各国的政事，以及介绍西方先进的农业、工业、教育、商务和科学情况；此外，还有论说和上谕。一些维新派议论，读起来简直风一样令人畅快。少年的目光，从此越过稽山镜水而探向一个更为广远的世界：西方！……

而他毕竟植根于东方的大家族。大家族里总有那么多挣脱不掉的纠缠。一天，本家长辈又在德寿堂里集会了，这次商议的是重新分配房产的事情。作为家中的长男，樟寿出席了会议。

商议结果，樟寿分内分得的房屋既少又差。在族中，年纪也成了一种资本，长辈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利用族权，共同侵吞一家寡妇孤儿的利益是十分轻易的事情。因此，整个会议的气氛，确如厅联所写的那般和平而宁静。

但当樟寿当场做出不满的表示时，空气就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了。长辈们纷纷凑过脸来，疾言厉色地不许他发言，并且胁逼他在议单上签字。樟寿凝视着那里的“豫才”两个字，沉吟少顷，便说：“我做不了主，得请示爷爷。”话音未落，一个熟悉的声音吼了起来，他抬头一看——蓝爷爷！

自己才恭恭敬敬地抄完他的《鉴湖竹枝词》，呵，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就不再叫“小友”了？平日那么好看的笑容都逃到哪儿去了呢？樟寿可以最终拒绝签字，但却无法拒绝心灵所受的强大的刺激。原来人们还有这么多好看的脸谱，底下藏的丑恶谁也不想知道。什么“品节”！什么“德性”！虚伪呵！可怕呵！别人预约给你的东西可不能当真。不要轻信。人可复杂着呢！……

对于一个少年人，书籍，毕竟不可能完全成为灵魂的避难所。他不能整天倾听死人的默默的言说，他需要倾吐，需要寻找活人。然而，新台门上下，有谁可以说话的呢？

惟一能够消闷的去处，就怕只有叔祖母衍太太那儿了。

樟寿从小就爱在她家里或是她家的四周玩。衍太太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是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也能替孩子“保密”，绝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比如冬天，当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孩子们早上起来看见便抓过来吃。有一回给房客沈四太太看到了，她大声道：“不要吃呀，肚子会疼的呢！”樟寿的母亲闻声跑了出来，结果给孩子们一顿痛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从此，大家就给沈四太太起了一个绰号：“肚子疼。”衍太太可不像她，看见孩子们吃冰，一定会和藹地笑着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得多。”樟寿也有不满她的时候，一回，偶然走进她家里去，见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便走过去。她将书塞到樟寿眼前道：“你看，这是什么？”樟寿看那书上画着房子，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像。正迟疑间，他们便哈哈大笑起来了。还有一次是和几个孩子比赛打旋子，看谁旋得多。她就从旁计数道：“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阿祥旋着旋着忽然跌倒了，碰巧他的婶母走过来，她接着便说：“你看，不是跌了吗？我叫你别旋，偏不听我的话……”虽然如此，总还是喜欢到她那儿去。

可是，现在，樟寿已经不是和孩子玩耍的时候了，他到衍太太那儿去，只是同她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有一天，他谈到有许多东西要买，就是没有钱。衍太太便说，“母亲的钱，你尽管拿来用就是了。”樟寿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樟寿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意。到大橱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

不到一个月，樟寿就听到了一种流言，说他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他不禁顿时觉得如同掉进冰窖里。这是他第一次碰到“流言”这东西。流言太可怕了，无可追踪，无从辩白，甚至弄得连他自己也仿佛真的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两岁的时候，在他种完牛痘之后，父亲送了两件玩具：一件是鼗鼓，一件是万花筒。万花筒实在奇妙得很，摇一摇，就变了花样。为了探究那五颜六色、变幻无穷的底蕴，他曾背着大人，走到僻远处，偷偷

剥去万花筒外面的花纸，使它暴露出难看的纸版，再挖掉两端的玻璃，一些五色的通草丝和小纸片便散落下来，然后撕破圆筒，结果发现它原来是三块合成的玻璃罢了。花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他几次使它复原，然而都没有成功。至今，家族、世人、生活，不也像拆毁的万花筒般过早地露出本来的面目了吗？冷漠，伪善，阴险，狠毒；周围是溃疡，是无法排泄的脓臭，是有形无形的不堪忍受的挤压。

——那么，走吧！

他决心离开这个生养自己的地方了。当他举目四顾，寻找出路的时候，却又觉得茫然无绪……

科举道路是走不得的。为此，祖父锒铛入狱，父亲忧愤辞世，明爷爷发疯致死……摆在眼前的可选择道路，只有做幕友和当商人。所谓“无绍不成衙”，全城以做师爷为业的人太多了。在同学中间，吴书绅不是也千里迢迢跑到保定去当师爷了吗？经商的也不少，家里开机房织丝绸的高幼文，早就辍学回家帮忙了；章祥耀虽然没有马上回家经营锡箔铺子，毕竟也跑到钱店里当了学徒；还有胡昌训学衣庄店馆，周兰星则回家管账，总之都陆陆续续地这样分途走散了。樟寿并不羡慕那些阔少爷和幸运儿，即便贫困，也不愿仰承官家的鼻息，去邀财神的恩宠。

最后，他决定进洋学堂去。

绍兴历来有“锡半城”之称，众多的锡箔店，象征性地显示了这座古城的迷信色彩。但是，由于靠近作为重要通商口岸的宁波，因此在中国，它仍然是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地区之一。于是，在衙门、庙堂、店铺和住宅群中，相继出现了教堂、洋学堂、照相馆，和其他洋房。任何新鲜事物，都未必能够马上唤起新的价值观念，尤其在一个封闭已久的地方。在绍兴，凡有带“洋”字的东西，就无不招惹人们的敌意、恐惧或鄙夷。关于洋鬼子的传闻可多了。据说，一个曾经在教堂里当过女工的老妈子亲眼看见他们挖人的眼睛，挖出以后，就放进坛子里像腌咸菜一样渍起来。那用途，又据说是拿来照相的。试看，人的瞳孔里，不正好有一个瞅看它的人的缩影吗？难怪连老寿先生也不用洋货，不穿洋布，甚至照相也不肯。还有这样的说法：半身像是照不得的，因为形同腰斩；至于头像就更不能照了，照了就相当于被砍下脑袋，很不吉利的。又传说洋鬼子能寻宝，因为人心贪财，他们便挖了人心去熬油，用这“人心油”点灯寻去，只要遇到地下的宝物，灯焰就往下窜了。至于洋学堂，也不得人心。城里成立不久的中西学堂，由于有洋文和算

学的课程，便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那些熟读圣贤经书的秀才们，还特意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文来讥诮它。文章既就，便名满全城，被人们当成笑谈……

进洋学堂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呢？樟寿不是不知道。然而，母亲愿意吗？祖父应允吗？寿先生知道了，一定以为有违师教而愠怒的吧？但不管怎样，总之是要走了。

每当眼前浮现出周围那许多熟透了的脸孔，樟寿心里就会产生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就说周家，像《红楼梦》里说的那样，都从内囊里尽上来了。不但相互欺压、凌侮，而且一个个纨绔子弟也都沦为流氓、地痞、烟鬼、酒徒、嫖客、小偷和乞丐。他不想做一个“多余人”，不愿堕落，也不甘平庸。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绍兴人都要使他感到讨厌和憎恶；他要远远地走开，去寻别样的人们，寻那些跟绍兴人不同的人，为绍兴人所诟病的人，无论他们是畜生还是魔鬼。

只有进洋学堂的道路，他想。哪一个学堂呢？中西学堂？那里只有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没有什么意思。杭州的求是书院？功课虽然别致，只是学费太贵了。那么，可有不需要学费的学校吗？

命运的偶然性就在这里。恰巧，他有一个族叔祖周椒生，在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做管轮堂监督。这位叔祖回家时，曾经说过所在的学校是公费的，每月还发点贍银。诚房的鸣山和小叔凤升，都是通过他的关系先后进了这所海军学校的。族人说，“好男不当兵”，那就正好当兵去。《知新报》不是介绍了美国和德国的海军吗？美国和德国都是强国。当军人总比当腐儒好。军人能雪耻。每当想起报上的那份“瓜分中国图”，他的心里就像火燎般的焦躁……

樟寿把去南京的心思告诉了周椒生的次子仲翔，并托请他写信同他的父亲联系。为了促成这次行动，自己又另外写了一封给小叔的信，匆匆投向信局……

## 10. 八元川资与一江离恨

一个身陷困境的少年，根本不敢想像事情会进行得如此顺利。

不久，樟寿便接到了小叔的回信，要他立即动身去南京。跨出人生

的第一步，完全是自己拿的主意，至今还没有禀告祖父呢！这个被科举制度打翻在地的老人，直到狱中，仍然没有放弃把孙子培养为翰林的夙愿。他不但命樟寿兄弟学做应制的诗文，而且经常督促，亲自评阅。樟寿想：不管如何地拂逆祖父，这回也非去南京不可了。

他写信告诉祖父道：“欲往金陵，已说妥。”为了加重分量，还特意把小叔的来信附了进去。意在暗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才过两天，不等祖父回信，一种对于新生活的渴望，便怂恿着他直奔花牌楼，向祖父和顾看的二弟辞行。

为了与命运相对抗，出走是这般决绝。可是，只要想到行将离开自己的母亲，依恋的情绪，便浓雾般弥漫开来，笼罩了他自己……

母亲！五年来，营救祖父，照料父亲，变卖田地和典当衣物，哪一天不处于忧患之中呢？父亲病故以后，生活日益艰难，还独力撑持着不让自己失学；如果说，她在困厄中还寄存着一点希望，那希望，不全在自己身上么？而今，自己走不成正路，却要把灵魂卖给鬼子了！她该怎么想？她不会感到绝望么？况且，从此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儿子了……想到这儿，樟寿心里一阵阵揪得紧。

但不管人的心情如何，离别如期而至。

五月的黄昏。细雨濛濛，江面和天空粘在一起，四围一片苍茫……

远远地，从街道上走过来两个人，来到东双桥便站定了。水天反衬出来的轮廓分明，正是樟寿和他的母亲。此时，母子相对，都默默没有言语。

说什么呢？要是他父亲还在，当不会让他进洋学堂的。可自己当了首饰还凑不够盘缠，能把孩子打发到哪儿去？二十岁也还是孩子呀，而且还是第一次出远门哩。虽然几年来都是打熬着过日子，可毕竟有自己跟在身边；如今出去，自个儿地，他过得惯么？……

鲁瑞想着，心中不免酸楚。她慢慢解开布包，取出八元川资，递给樟寿说：“你自便吧。”说罢，眼泪簌簌地滴落在樟寿的手上……

船快开了。

她揩干净眼泪，给樟寿掖了掖衣领，说：“阿樟，不要想娘。绍兴有句古话，让你记住，叫做‘穷出山’……”

船儿渐渐离岸。靠岸的江水没有漩涡，流得那么平稳……

## 二、“戎马书生”

南京成了人生的第一个驿站。

不是人选择道路，就是道路选择人。选择的结果，他学开矿而开掘了人类的灵魂，想当兵而成长为别种类型的战士。

### 11. 水兵之梦

一个虎踞龙盘的古都。一个矮小憔悴的少年。在同一度空间里，两者的分量，显得何等的不相称！然而，彼此都无法预料：若干年后，由于各自成为不同的社会势力的代表，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殊死的对抗。

凤仪门。

少年放慢了脚步，背上的铺盖卷和手中的网篮仿佛顿时变得沉重了许多。他拧起眉毛，打量面前的由丘陵、墙垣和佛寺组成的庞然大物。正是在这里，清政府与英人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走向社会的第一个驿站，命运，便为他选定了这样一个家庭与民族的屈辱的连结点。

直到望见水师学堂的桅杆，他才从梦魇似的沉思中清醒过来。桅杆，高高的桅杆！他吁了一口气：桅顶那天空多么的蓝呵，简直像大海！对了，大海！大海就这么辽阔地展开，连白云也哗哗地淌出水声了……心，突然跳得厉害。蓝色一下子把他抛到另外一个梦境中去。海之梦。轮船。战旗。火与浪花……

这个生性敏感，容易激动，且又具有一种坚忍气质的少年，在周椒生的眼中不过是一个可悲悯的孩子。虽然他在这个学堂里任职，却并不怎么看重它，甚至以为它所收受的无非是一群失意者、低能儿；他们只因为绝望于仕途，才来这里找一个饭碗的。自然，有一个正当的职业，要比那些“破脚骨”终日闲荡和鬼混好得多。

几天过后，他来到后房，郑重地对少年说：“豫才，把名字改掉

罢！”

“为什么？”少年惊呆了。

“水师学堂本是当兵的去处，而你，正好走到读书人的末路上来了，”周椒生缓缓说道，“新台门周家乃书香门第，若用宗谱上的名号，那是要辱没祖先令誉的。”

探索者/“戎马书生”人间鲁迅（上）他是个举人，一贯以小小功名自诩。分明知道人们都熟识新台门周家，每次写信，都得在封套上写明“文魁第周宅”。确实，他是这个大家族的当然继承人自居的。

旧小说里不是常常写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么？使周椒生大感意外的是，樟寿竟爽然答应了。

不错。周椒生点点头，然后，摆了摆肥大的衣袖，伸出一根指头说：“古语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唔，我看就叫‘树人’。”

在名与实之间，他从来看重实。且不必说后来不断改换名字，成为全世界笔名最多的一位作家，即以此时而言，名字这东西，尚能唤起某种依恋者，也无非是由此而想及在辞海里寻到它，在生活中呼唤它，在过往的岁月以无限的温存庇佑它的家人罢了。祖父，祖母，母亲，还有父亲……然而，既然走异乡，逃异地，又何必拘泥于一个异名的使用呢？几年来受驱逐，受凌辱，受谣诼，简直把自己作为人而活着的事情都给忘了！从今开始，那么就让自己认认真真地做一回人罢……

考试是极容易通过的。做过试题《武有七德论》，录取的试习生里，就有了这样一个新的名字：周树人。

当了洋学生以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完全移用官场的一套，糟糕到了绝顶。譬如编级办法，就是仿照官阶拟订的。它规定，遇缺才能补入高一级的班次。周树人“试习”的三个月，事实上等于候补；正式补班时，由于二班没有缺额，这才补了三班。

试习期间，零用钱只有五百文，候补期满，便可以递增到每月二两银子。至于其他方面的待遇，低班生与高班生也相去甚远。当一个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桌凳足足增加两倍，床板也多到三块。开早饭的号声一响，低班生就得立

刻奔到饭厅里去，而高班生则仍然高卧不起，因为厨房里自会有人托着长方形的木盘，把稀饭和一碟腌萝卜或酱莴苣送上门来。午饭和晚饭，本来是八人一桌的，而高班生每桌至多只坐六人，并且座位都有一定，席间可以从容谈笑，不必互相抢夺，狼吞虎咽。低班生可狼狈了，一到饭厅，急急地到处乱钻，只要在桌间见到一个空位，便赶紧坐下，有时好容易找到了位置，而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几片肥肉早已不翼而飞了。

等级化制度培养了高班生的优越感。他们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大而且厚的洋书，昂昂然使低班生不敢正视；就算空着手，也一定要将肘弯撑开，大摇大摆地走，像螃蟹似的。这时，低班生只好忍住气，跟着屁股慢慢位移，很少有人敢于僭越。

学生共分驾驶和管轮两科，互相之间相当隔膜。驾驶科毕业的可以做到“船主”，而管轮的前途顶多也只配做一个“大俵”，终归是船主的下属。这种近于宿命的安排，便别立了一种界标，使学生各自显示出自卑或是倨傲的态度来。

这所为福建人所垄断的学校，如果不是同籍，或是同当局有点关系的，是不可能分配到驾驶班的；只要不在驾驶班，就永远别想上舱面去。周树人当然分在管轮科。水兵的梦是幻灭了。

即使不去考虑未来的去向，而专注于眼前的功课罢，那课程的刻板 and 单调，也不免令人气短。一个星期中，几乎有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凤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光看这题目，就够稀奇古怪了，怎么可能提起学习的兴致？

由于“中体西用”体现了近期官方的精神，教育方面，当然要求读经与外文并重。不过，既是“水师”，除了功课以外，总需有一点与“水”相关的实习的。奇怪的是，学生无须乎谙习水性；说到专业训练，只有爬桅杆一项而已。

桅杆是可爱的。如果爬到桅顶，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但是，这样驰目骋怀的机会并不多。人不能整天悬在空中，最后仍得降落到地面上。

那桅杆下面，据说原来有一个大池，专供学生学游泳。由于曾经淹

死两个年幼的学生，才把池给填平，上面再建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有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也许是怜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水池，难讨替代，或是别的莫名其妙的原因，每年七月十五，还特地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由其中的一个红鼻子的肥胖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一串无人能解的咒语：“回资罗，普弥耶吽！唵耶吽！耶！吽！！！”……终年被关圣帝君镇压着，算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得到一点好处，真足令人寒心。周树人偶尔也会想：做学生总得自己小心些。

其实，呆在这样的地方，小心与否又有什么意义？况且他本来就不是那种害怕烧伤小指头的人。

有一天，他果然玩火了。

学校来了一名新教员，势派很大，目空一切，不幸的是在班上点名时把“沈钊”读成了“沈钧”。于是，周树人和别的一些同学就把这名教员直呼为“沈钧”了。历来师道尊严，像这般肆意侮辱师长，怎么了得？学校当局随即给他们记了两大过两小过，只需再记小过一次就要被开除。

官办的学校，必然具备官府式的威严。在这里，学堂总办是由候补充任的，担任总办也等于补了道台。监督则用州县级官吏，周椒生虽然有候补知县的资格，也得通过一位妻族长亲的幕后外交才占上这个位置。由官吏执掌的学校当局，不但迷信鬼神，重要的是迷信在握的权力。大堂上，就陈列着“令箭”，只要学生违犯“军令”，插上一支，那么被割下脑袋也不是什么可骇怪的大事情。

这样乌烟瘴气的学校，难道还能呆下去么？

回想初来时，抄写《水学入门》讲义真是太认真了。水，水，当一名水兵的念头曾经怎样地唤起无边的幻想呵！校门的柱对，居然还写什么“中流砥柱，大雅扶轮”！战战兢兢地读经拜鬼，何敢奢求那般独立支持的大气魄？至今，自己连一个支点也还没有找到呢！

周树人常常望着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发呆。那周围，什么也未曾改变，却依然在一个劲儿地蓝……

## 12. 县考：第一次妥协

少时放过风筝。那些纸糊的玩物，扶摇直上，全凭牵引和提举。不能自主的飞翔是悲哀的飞翔。一个人，难道就不能依靠自己的意志去选择道路吗？周树人决心作一次尝试。这时候，他仿佛已经感觉到翅膀的活力了。

要求变法维新的浪潮不可遏止。紫禁城的朱墙，不可能隔绝近代文明的冲击和可怖的回声。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背着幕后的慈禧，召见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的头面人物，决定实行变法。于是，各种新政诏书和谕令陆续颁行：废除八股，改革科举，裁汰冗员，设办学堂，筑路开矿，派人留学，等等；整个社会的轮轴开始变得松动起来。

一股生气勃勃的新思潮一旦找到了它的物质形式，便构成了对于既存制度的致命的威胁，因此，遭到顽固势力的抵抗是不可避免的。9月21日，当慈禧再出“训政”，光绪随即被幽禁深宫，康、梁流亡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则以殷殷血迹，在菜市口写下历史上醒目的一页：“百日维新。”

悲剧的结束，也就是正剧的起始。“西学”的影响，变革的思潮，经过血的洗礼，而日益扩展开来。扩展的结果，致使把握最高权柄的反对派也不得不敛容迁就。洋务派官僚两江总督刘坤一听说青龙山煤矿潜力很大，便呈请在陆师学堂内增设矿务铁路学堂。这时，正值政变过后不久，慈禧为了粉刷自己的面目，不出半个月就下诏批准了。

周树人参加了矿路学堂的考试，很快就被录取了。好梦也罢，噩梦也罢，随着当兵计划的幻灭，事情总算有了一个成功的过渡。

这时候，他想家了。

其实他是常常想家的，惟此际的乡思愈加纷乱，不可收拾罢了。故乡，一个曾经诀袂径去的地方，为什么值得如此频频回首，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由于外国教员尚未到校，不得不推迟上课时间，这样正好留下一个可以回家的间隙。

到了下关码头，树人快步走上“长江船”。不料，统舱的床位，全被担杆、绳子、破衣服之类占据了。

他早就听说过客船上这类事情：只要占了空铺，就可以恃强发卖。

如果有谁要卧下休息，除了船票以外，必须另外掏钱把“铺位”买下来。简直是强盗！他搁下行李卷，干脆一屁股坐在上面，呼呼地假装打起盹来。他那般坚执，像一个小无赖，任随强人从旁怎么吆喝，也一动不动，从不松一松眼皮儿。

“当！”铜锣一响，轮船将开了。那些临时主人不得已，只好放弃地盘，抓起搁放的东西愤愤而去。直到这时，树人才从容地站起身，觑一眼岸上的背影，然后把铺盖慢慢打开来……

游子滞留异地，总想望回到故乡；而一旦来归，却又怕见家中的寥落。自从父亲去后，什么天伦之乐，都成了永远无可填补的欠缺了。

岁月不居，带走那么多，带来也那么多。祖母突然变得这般苍老。见面的话分明少了，虽然依旧亲切，已不复如从前的风趣。母亲的宽脸膛，再也寻不到往日的笑容，大半年间，倒添织了不少细密的皱襞。她那么仔细，乍一见面，就从儿子的身上看出了破绽。

“阿樟，你过来。”

她伸手在树人的两肩摸了摸，立即掉过头去。原来，黑棉袄早就穿破了。谨防棉絮从破洞里探首而出，树人裁了一张白纸，用墨汁涂成一个颜色糊在上面。

良久，母亲才叮嘱道：“晚上，你脱下来补一补吧……”

尽管有一些亲人和同学前来看望和交谈，也有二弟不时说些书里和城里的新旧掌故，树人还是郁郁寡欢。他知道自己在家庭中所占的位置。当初离家时，以为把灵魂卖给鬼子，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道路；结果呢？收买灵魂的，仍然长着同绍兴人一样的面孔和心肝。至于即将就读的矿路学堂，谁知道是不是同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处所？二弟聪明，读书也不少，三弟也进县学堂了，他们将来都得跟随自己走异端的道路么？世人的冷眼，对于自己来说还算不了什么，可母亲怎么能长此承受下去呢？

十一月初六，是县考的日子。

个别好心肠的亲人，便自动上门当说客了。他们劝说鲁瑞，说树人兄弟学识不浅，应当让他们俩前去应试。命中怕也未必注定穷落，由此

一改从前的窘状也说不定的。樾寿早就抱有这种想法，于是也极力撺掇着，让大哥相陪同去。

对于县试，树人未尝没有心动过。他想初试锋芒，吐一口气，但又随即为自己感到羞耻。祖父，父亲，那么多热心科举的先辈，其结局还不够悲惨吗？即使在考场上做一个战胜者，又有什么意义？但是，他终于去了。他可以抵抗各种的压力和诱惑，却经不住母亲的劝说。

晚上，树人兄弟同伯文、仲翔一起应试回来了。

樾寿一进门，就告诉母亲说，在考场怎样碰到阮家、郇家、鲁家的表兄，又说上辈连襟相逢在杭州考场，现在晚辈又在绍兴考场巧遇，诸如此类，絮絮不休。

树人看过卧病的四弟，就从里屋出来了。二弟的诉说，使他感到十分烦躁……

入夜，椿寿喘促着，翻来覆去老是睡不安稳。树人挨近母亲在床沿坐着，不时摸他的额角，发觉手烫得厉害。

母子俩一夜没睡，但也无法可想，城里并没有专看儿科的医生。好容易熬到天亮，鲁瑞便差樾寿坐了小船，赶到小皋埠把做医生的大舅父怡堂请来。

静静地把脉。树人的目光，不时地从大舅父的手指头移到四弟有点发青的脸上，那鼻翼一扇一扇地，使他顿然想起父亲当年去世的情景，不由得全身紧张起来。

“怎么样？”

鲁怡堂没有回答妹子，起身走到廊下，才回头说：“我看没有办法了。”说完，低着头出了房门。

听得没有办法，鲁瑞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灰白，身子摇晃了一下，松寿急忙把她扶住，送到小堂前坐下。这时，祖母、长妈妈和宝姑也都陆续来到。看到大舅父没有留下药方，她们都很伤心，知道椿寿快不行了。

鲁瑞定了定神，把所有的人都打发去睡觉，只留树人一个人陪着她。

过了好些时候，椿寿才慢慢睁开眼睛，对母亲说：“娘，我难受呀！”

鲁瑞握紧他的手，凑近脸说：“阿囤，你难受，阿娘知道……”

长妈妈进来，见椿寿喘得厉害，便抱了起来，让他伏在自己的膝上，抚摸他的背部。突然，他喉咙里“咯”的一声，就透大气了。

“四阿官！”长妈妈叫唤道。

此刻，椿寿已经不会答应，接着是一片凄凉的哭声……

把四弟收殓完毕，树人便走了。本来，距府试不满一个月，且看大案出来，如果榜上有名，应了府试再回南京读书也并不晚的。而且，才失了四弟，母亲也很需要他的慰藉。但是，无论多少人的苦心规劝，也终于挽留不住。他走了，像受了驱赶似的，那么匆匆，简直是逃跑。

### 13. 《天演论》·真理的第一道台阶

矿路学堂位置在三牌楼，离水师不远，坐北朝南，面临妙耳山。有两座高耸的建筑物，那是总办的办公楼和德国教员居住的小洋楼。其余校舍都是平房，整整齐齐地站在一起，显示着一种应有的秩序。

学生宿舍东西两厢各有四幢，矿路学堂的学生住在西面第一幢，周树人是宿舍总门右首第一间的主人。这所十四平方米左右的狭长居室，开着一个宽大的木窗子，每天，它最先迎来东方的晨光，每当夜色阑珊，却是最后一个抹去那橘黄色的灯影。

树人不爱游玩，不爱交际，不爱说话，他把几乎整个的夜晚都揉进保险灯的小光圈里。精神危机已经过去。此时，他是那般亢奋，勤勉，精力充沛。

最使他满意的是新学校的平等空气。不多不少，他也分得了半个房子，一张木架棕棚床，一台双斗小木桌，一张黑漆小凳和一只小书架。虽然学的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外加一点也无非是《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是什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之类，但毕竟来到了一个可以读书的地方。况且，还有不少科目：格致、算学、地

理、历史、绘图和体操，都是过去所未曾学习过的。还有德语。至于生理学，虽然并不讲授，却可以看到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比较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他已经悟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罢了。想起已故的父亲、康姑、四弟，还有那么多被骗的病人和家属，他的心中充满了怜悯。

他以非常浓厚的兴致，学习这些课程，尤其是地质学和矿物学。一本英国赖耶尔的《地学浅说》，就不知给了他多少惊奇和喜悦。无论在课堂还是在课后，他的讲义，都用毛笔抄写得十分细致和工整，插图则用铅笔绘制，也一样的精密。由于平素喜欢整洁，讲义全用毛边纸，对开折叠，再用纸捻装订；而且封面也取一例的格式：在左上角竖写讲义名称，右下角署名“周树人”。

凡是新课程，都得使用洋课本，这些课本对于中国的情况是无从顾及的。为此，他常常联系对比中国矿冶的实际，在《金石识别》一类的边页上写下批注，补订其中的纰漏和错误。纸上谈兵，照抄照搬，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他满足的。他特别喜欢采集矿石标本，不但因为标本可以加深对矿物知识的理解，而且喜欢那嶙峋而不规则的形体本身，它们以最质朴的方式，在荒无人迹的旷野间显示自己的存在。

他于物质生活无所求，穿一条夹裤，吃吃辣椒，照样过长长的冬天；而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他的心灵，似乎长驻着一个火热的季节。坐在桌子旁边，每当功课复习完了，笔记抄得久了，他便从中脱身出来，从书架上检取一部《红楼梦》，或是《西厢记》，或是别的小说杂书，徜徉于人类历史的原野和心灵的幽洞之中。那里，是无法窥觅的又一个奇妙的世界。

知识之火既然点燃起来，他就不会围着炉子取暖。比起周围的同学，他越来越热心于阅读课外的书籍。他愿意像篝火那样，在无遮的天幕下作野性的燃烧……

第二年，总办换了一个新党人物俞明震。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鼓吹维新的《时务报》。考汉文由自己出题目，跟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弄得汉文教员也得惴惴地向学生打听：“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学校变得相当自由化，看新书的风气也流行起来了。校内设立了一个阅报处，除了《时务报》，还有《译学汇编》，那封面的四个字，在

树人看来，就蓝得非常可爱。这时候，听说《天演论》出版了，他特地趁星期天跑到城南书店去，花五百文钱买了回来。这白纸石印的厚厚的一本，只要一翻开，就使他坐不住了：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籍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多么优美的文字！多么恢弘的气魄！多么新颖的思想！一口气读下去，苏格拉底出来了，柏拉图出来了，斯多噶派也出来了。这些人物，各各带着自己的思想，走向纵深的历史。思想超乎一切，甚至比创造它的思想者更崇高！“物竞天择”呵，“适者生存”呵，“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呵，“保群进化，与天争胜”呵……他觉得，“天演”的思想，无不与矿石、动植，以及自己周围的物质世界息息相关，但显然有着更为炫目的光耀。他读得那么贪婪，一遍又一遍，《察变》和另外的好些章节，他都熟络得能够背出来了。

《天演论》风靡一时而成为知识界的“通币”，绝不是偶然的。时代需要思想。一连串失败的事实，把一批又一批民族出路的探索者投入更高层次的思考。从本国到西方，从科技到体制，从经济到政治，历史规定了这个有序的演变过程。如果不从价值观念、思想方法乃至民族心态方面实行全面更新，很难设想，改革将把一个积弱挨打的民族导向何处。但是，从林则徐到洪秀全，从张謇到康有为，不管他们变换怎样的角度楔入思考，都不得不借用中国传统思想的衣钵，因而也都一例无力擎起一代思想的火炬。新时代的思想，不可能从封闭落后的小生产的土地上产生，它只能是近代工业和科学的产儿。于是，中国呼唤“盗火者”。随着戊戌政变的失败，当自立军和革命党在一片浸渍着血迹的沼泽地上先后行进的时候，严复裹挟他的译著《天演论》，乃从另一条战线冲杀而出，成为完整地引进西方哲学和科学方法，实行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开山。

《天演论》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一头猛犬”赫胥黎于1893年在牛津大学做的演讲，原题为《进化论与伦理学》。1894年，他加写了导论，并与其他三篇论文合编成集。他坚持了达尔文学说内在的真理性，把关于生物学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开拓了近代科学思想的新课题。严复，这个同样曾经就学于传授驾船技能学校的人，将其中的导论及前半部意译出来，结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的思想，淋漓酣畅地发挥了自己的观点。由于严复立足于民族存亡的基点，以最富于说服力的科学事实和最富于煽动性的文学

语言，阐述“取法于人”的中心思想，得出“非最宜不能独存独盛”的结论，因此，《天演论》在中国的出版，首先引起的就不是自然科学的革命，而是整个思想界的“一种当头棒喝”。

每读到澳洲土蜂的沦灭，美洲红人和澳洲黑种的耗减，周树人就明显地感觉着一种危机感在压迫着自己。民族的危机。家庭的危机。个人的危机。危机感使人意识到生命的力。自力，自强，自立，自主，这就是一切。正是由于这被唤起的人类的自觉意识，推动着他奔向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前沿。

当一个受创的灵魂沉浸而且震颤于《天演论》的时候，事情让周椒生知道了。

周椒生对新学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有一回看见櫪寿的来信，外面只写公历日期，他便说是“无君无父”，训斥了一大通。在水师时，他就教训树人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倘看新书报，自然要入康党一流了。

他把树人叫了来，问过话，便沉着脸道：“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那样的东西怎么能看的？要知道，那是祸根。”

树人觉得好笑，只是不说话。

“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叔祖说罢，立即递过一张报纸来。树人一看，上边写的是：“臣许应骙跪奏……”原来是一个参康有为的奏折。

树人自然不抄也不看，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只要有空，就照例嚼他的倭饼、花生米和辣椒，看那看不得的《天演论》。

这个重精神而轻物质的少年人，对于生命以物质形式寄存的躯体并不介意；加以平时多吃辣椒，胃痛便发生了。痛得剧烈时，他不吭一声，只是把肚子顶在抽屉角上。但书是不肯放手的，仿佛新书本身就是一包止痛剂。

对于功课，他不再像从前那样用心温习了。即使这样，考试时，同学们还是看他第一个交卷出场，而且看他以优异的成绩站到班中的最前列。当时学堂规定作文每周一次，其他小考每月一次，优胜者发给三等银质奖章。按章程：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在全班中，得到这种金质奖章的，只有周树人一个人。

这个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却并不懂得爱惜荣誉，奖章到手就都变卖了。除了留一点钱给母亲，几乎都用来买严复和林纾的译著，以及其他新书报；再就是买点心和“摩尔顿”糖，邀几个要好的同学大嚼一通。

同学们发现：周树人并不只是具有处子般的沉静，他的豪侠和勇武之处，往往也是过人的。

他喜欢骑马。对于他，骑马与其说是为锻炼身体，无如说是为了锻炼意志。而今学的开矿，当兵固然是当不成了，但他仍然神往于战场上那血的驰骤与白刃的格斗。马和缰绳，可以带他去追逐那么一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幻影。

最初，他曾经从马上坠落，直到皮破血流，也不间断练习，每天照例骑上一两个钟头。他常常对人说：“落马一次，就会增一次进步。”等到熟练一点的时候，便约同陆师学生一起租了马，跑到附近明故宫一带的旗营里去，同那些善于骑射的旗人子弟竞跑。有一次，在竞赛中他吃了旗人的暗算，差点儿被刮断腿脚。少年是圣战者。暗算又怎样呢？哪怕面迎旗人子弟恶毒的骂詈和纷飞的石块，他一样策马前往。穿一身黑绒镶边的酱紫色粗呢制服，快马轻鞍，风生蹄下，那是何等的英迈呀！

这期间，他刻过三枚图章：文章误我；戎马书生；戛剑生。

## 14. “英雄未必忘家”

又是黄昏。

一个影子在操场上徘徊。四周很静，只有一串若断若续的迟重的蹙音。

周树人还不是那种绝无返顾的行者。他的负担太沉重了。就如一匹

初上征程的马，正欲扬鬃远去，又不免顾影低回起来。倒不是因为恋栈，即使依恋，也不为自身的温暖；在家庭的围栅内，有的只是亲人的忧烦而已。他是一个善感的人。

现在，首先是个人出路都成了问题。

听说学堂快要裁撤了。这是很有可能的。本来，矿路学堂就是因为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才给开办的；实际情况则不然。在煤矿方面，大约觉得开采并不难，又嫌先前的技师薪水太贵，便辞退掉，另外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不到一年，竟连煤在哪里也闹不大清楚，结果掘得的煤，只够供烧矿坑里的那两架蒸汽抽水机，即是抽了水掘煤，掘了煤抽水，算是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既然无利可图，学堂自然也就无须开设了。从绍兴而南京，从水师而陆师，辗转之余，弄得连一个出卖灵魂的机会也没有。如果学堂真的裁撤了，那么自己将投寄何处？……

暮春天气，微飏乍起，遂使人遍身感觉着凉意。

两年来，除了一纸漂亮的成绩单，自己再也拿不出什么可以告慰母亲的了。家庭是如此暗淡。春假回家过年，虽然可以见到老亲弱弟，还有先生，还有运水，可以游长庆寺、应天塔，可以看社戏，可以在浓厚的情爱和恬静的自然中沉浸一些时，但毕竟无法逃避贫困的威逼。送灶那天，做过一首诗，有意跟灶君先生调侃一下。阔人家才怕他说坏话，自家还怕他什么？难道世间还有比这更坏的境况吗？可怜母亲典了衣物，还得买供神的香烛和饴糖——希望，千百年来捏就了多少愚人的偶像呵！同二弟作文祭书神，虽然尽可以啸傲笔海，淹留文冢，渎钱神而嘲钱奴，而临末写的“他年芹茂而樨香”，不也是类似的自我安慰是什么呢？……

一轮圆月正在东边慢慢地升了起来……

自从院试落第以后，樾寿便显得相当消沉。他收了一个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阿九做学生，其实并不像师生，倒常常在一起游荡淘气。什么书籍之类，已经无心闻问，有点兴致时才叫三弟帮助收拾整理，或者在院内种点花木。祖父怕他荒疏了学业，在狱中曾写信要他力求上进，投考求是书院；岁暮时，还特地把一本书院章程交给了他。莫名其妙的是，他全然不想到书院去，却跑到杭州服侍祖父去了。2月，祖父被释回家，他才表示无论如何也要从家里脱逃出来。一怕祖父平日的胡闹，二怕每天上街买菜的苦差事。他从小爱体面，上街就怕穿长衫，以为是

一种无形的虐待。他简直经受不起一点小小的刺激，一有点小刺激就诉苦。也难怪，娇宠惯了。虽然家境贫寒，毕竟比自己年幼呀！连自己也不堪忍耐的事情，为什么非要他甘于忍耐不可呢？……

祖父也太糊涂了，经历了这样的大劫难还得骂人，难道就不可以安静一点吗？前些日子手抄过他的《家训》，明白其中的苦心孤诣，可他为什么偏偏不守自立的训诫？身处恶劣的境地，而要使暴躁的性格变得温和，确乎不是容易的事情。倘一旦完全改变过来，处处息事宁人，那也是一种悲哀呀！……

灯火疏疏落落地，月夜是无边的苍白……

他不自觉地逃避空旷了。

回到房内，上了灯，他便打开抽屉，取出二弟寄来的诗稿，重新铺在桌面上：一片征帆逐雁驰，江干烟树已离离。

苍茫独立增惆怅，却忆联床话雨时。

小桥杨柳野人家，酒入愁肠恨转加。

芍药不知离别苦，当阶犹自发春花。

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

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眼前波光粼粼，重现了兄弟俩执手言别的一瞬……

惭于家食，自是有出息的想法，可是，举目人间，哪里有一条可以任意驰骋的道路？“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而今，当兄弟伸手求援，自己却不敢把手递过去！……

他感到有一种黏糊糊的温热的东西涌上心来，于是抓过纸笔，写了三首诗：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树人喜欢按二弟的诗韵步和，希望二弟知道，他的呼唤不是没有一个切近的回声。

喃喃了两遍，觉得意犹未尽，又添了一段尾巴：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笛，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他放下笔，觉得胸口有些闷，于是走近窗前，把脸凑到柱子上——

蓝色的月亮。

## 15. 大海行

榷寿为了脱逃，转弯抹角地想办法，最后仍然通过周椒生的渠道考进了水师。像他的大哥一样，原名也给改掉了，从此他以“作人”的名字进入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

矿路学堂这方面，一直拖延着没有裁撤。于是，兄弟俩经常借两个学堂之间的一条小路往返互访，一同阅读，一同倾谈，一同饱餐廉价的风光。就在命运给周氏兄弟着意安排的不到半年的聚会时间里，他们以彼此的唾沫和共同的志趣互相濡润着，画着好梦，将灰暗的日子涂出蔷薇的颜色……

人生真也匆匆。年底完了毕业大考，树人就要离开南京了。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着这一天；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茫然若失。树人自个检点了一下：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吗？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底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长，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这样浅薄的根柢能够干什么呢？为了充实自己，看来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现在，树人已经不比三味书屋时代的单纯了。每当考虑个人出路的

时候，除了家庭，他总不免要连带想及自己的民族，一个不幸的民族。

在南京的大街上，他曾经看见新式陆军荷着枪，操步从面前经过。在疲惫的脚步的陪奏下，他们唱着军歌：“请看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其实，比起印度、波兰一样的国度，中国的境况并不见佳，有什么资格讽刺人家的奴性？当时，他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许多汗珠来。

他下过矿洞，亲眼看见过那种凄凉的情形。抽水机有气无力地转动，在几根松树圆木撑拄着的黑暗的洞窟里，积水半尺来深，上面仍然在渗水，几个矿工鬼一般地工作着……

维新派是失败了，洋务派又能有什么政绩？为了抗拒洋人的侵入，民间乃有“义和拳”兴起。他们是骁勇的，乃至到处都在谣传他们有着了不得的法术。一时间，家人也颇为之不安，弄得自己不得不去信纠正。那是怎样的一种愚昧的抵抗呵！有一次上街，看到一个大汉骑着马，东倒西歪，像喝醉了酒似的嚷道：“我有一支白蜡杆，可不是普通的白蜡杆呵，这是玄母娘娘赏赐的上方宝剑。只要我用力一挥——喳！鬼子的头就得统统落地了！叱……”听人们说，这个人就是“义和拳”。

可悲的中国！可悲的国民！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种备受奴役的境遇呢？而洋人，又凭什么赢得这般鱼肉异国的权利？“弱肉强食”，难道民族的优劣是先天命定的吗？经过《天演论》的一番敲打，他决心要去看看，去比较，去亲自找到真理的所在。

“必须到外国去！”他终于这么想。

康有为变法，义和团起事，那可能的结局都被历史省略了。圆明园的大火，使所有关于旧日的完好的幻想濒于毁灭。于是满朝官民又掀起了一个维新的热潮。按照老谱，照例派官员出洋考察，派学生出洋留学。经两江总督出面保送，矿路学堂也便决定派六名优秀学生，由总办俞明震率领到日本去。其中就有周树人的名字，毕业执照记录着他的成绩是：一等第三名。

面临出国，未尝没有牵挂，但已经不是初次离家时的那种忧怨了，自然也没有别的一些官费留学生那般亢奋。他，是在深沉的思索中选定这条道路的。

出国前，六名同学中间，有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结果不去了。剩下的都不知道：到异国去应该准备些什么？于是相约了一同跑去请教一个曾经游历过日本的前辈同学，那人教导说：“日本的袜是万万不能穿的，要多带些中国袜。我看纸票也不好，你们把钱带去，不如都换了他们的现银。”四个人都说遵命，于是，树人也便买了十双中国袜——白袜，准备带出去。

看过二弟，次日就匆匆回到了绍兴。

祖父出狱后第一次看到长孙，看到长孙执照上的成绩，心里颇感欣慰。树人告诉他说，要留学日本去；他点头“嗯”了一声，同意了。他认为能够留学就意味着获得了自立的能力，而自立，正是他一贯的人生主张。母亲见他考得好，自然十分欣喜，但听说要到比南京还要遥远千百倍的外国去，眉端不免要流露出一些忧戚来。

树人出洋的消息，一下子轰动了新台门。他依次到各个房族去告别，惊奇、惋惜、鄙视，各种各样的目光投落到他身上。

到了伯文叔那儿，还没把话说完，这位痛恨新党的叔祖便一掌将他推了过去。他猝不及防，打了一个趔趄，在背后的一堵墙上停定了。他想不到会在大家庭里演出这样一个场面。像被钉子钉住一样，他紧紧地贴在墙上，看这位叔祖恨恨地掉头走远……

大局已定。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束缚鼓动的双翼，也许，这一幕恶作剧更加坚定了振翅高飞的决心。半个月后，他草草收拾了书籍，便动身去南京了。

这回携带的书籍很多，除了预备出国阅读的十本《科学丛书》，两本《日本新政考》，一本《和文汉读法》以外，所有都是留交作人的，连同大衫，连同食物。

是最后一次给自己带书了。在远离乡土的南京，可以取暖的算只有大哥的温情。此后，海天相隔，茫茫间怎么好递一声柔弱的呼唤？大哥的离去，使作人顿然失去了依傍，心中有说不出的空虚和怅惘。

周椒生特意设了便宴，为树人饯行。

次日，天空作铅灰色，细雨纷纷扬扬飘落脸上，凉丝丝地，就像离

愁般不可掸拂。

作人让叔子去找大哥，自己陪着坐车到了下关，看过太古怡和各个码头，都不见影子，心绪十分烦乱。返回后街，打了酒，本意在浇浇愁闷，结果喝不上半杯又坐不住了。最后，还是在顿船上找到了树人。

兄弟俩对坐着，许多要说的话，此刻都化作了沉默。

晚上，作人跑去看胡韵仙；仿佛能够看到大哥的好友，也算是一种慰藉似的。

刚进门，韵仙就抱住他问：“大哥走了吗？”

“还在下关等船呢。”

“我做了三首诗，你带去给他，算是我送行了。”胡韵仙说罢，掏出诗来朗声念道：英雄大志总难侔，夸向东瀛作远游。

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流。

总角相逢忆昔年，羨君先着祖生鞭。

敢云附骥云泥判，临别江干独怆然。

乘风破浪气豪哉！上国文光异地开。

旧域江山几破碎，劝君更展济时才。第二天上午，当作人遣人带去下关时，已找不到可读诗的人了。

大海。“大贞丸”号。树人靠船舷站着，脚底的波涛像心事一样翻腾不已……

真正的朋友，空间可以把他们随意割切，而相通的心灵却可以占据同一个时间。就在胡韵仙感怀赋诗的同时，周树人也想到这位挚友了。

在学堂，能够纵谈家国者，二三人而已。丁耀卿算一个，可惜死得太早。记得获悉他死的消息，曾经和二弟一同感叹过，还写过挽联。再就是胡韵仙，他有志向，能说话，善诗文，而且很有活动能力。在驾驶堂的宿舍里，他独自占了一间，将床板拆开，只留三张半桌子，放在房

子中间，晚上便睡在上面；平时将衣服打成背包，背着绕桌子走。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回答道：中国这样下去非垮台不可，大家还是学习逃难要紧。听的人都说他是狂人，可没有谁知道，他正在暗暗地锻炼吃苦哩。然而这一回，他却不能同自己一块走了……

在彼岸等待自己的，将是一些什么人？一个什么世界？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翻腾的大海。轮船，在海浪中颠簸得厉害。从前曾经去过镇塘殿，从一个缺口观潮，即使潮来如盖，那也不是大海呵！周树人向远方望去。远方，海面那么辽阔而平静；与天相接处，有一道银线正闪烁着神秘的辉光……人间鲁迅（上）

## 三、 岛国的热血与星光

青年，是人生中最富于幻想与热情的时期，同时也是危机四伏的时期。他的青春岁月，是在一个多火山的岛国里度过的。故国的危难，异邦的刺激，婚姻的悲剧，事业的挫折，使他从激奋、骚乱和痛苦中迅速走向成熟。在与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处于同一向度上，他终于确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坐标。

### 16. 燠热的东京气候

中国历史的造山运动出现了这样一种变化：在20世纪的海平线上，具有全国规模的纯粹的农民暴动渐渐沉降，作为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开始迅速上升。

分裂是伟大的。从一个古老而庞大的体系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不到十年，就暴露了臀部的封建纹章，于是新的裂痕又产生了。革命派高喊着一个口号走向时代的前台：“排满！”这个口号不但使整个那拉氏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一群维新派分子也不禁为之惊惶不安。他们躲进残旧的古堡，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布置了一场对革命派的抵抗。然而，抵抗是没有力量的。科学的、民主的、进步的世界性潮流奔腾激荡。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由于以强旺的民族意识进行鼓动，很快便博取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同情。革命派的旗帜不可阻挡地成了社会的意向。

时间越来越明确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依靠落后的生产方式孕育起来的愚昧的阶级或者集团，根本无法开拓历史的新场面。近代科学知识，作为新型的生产力，大大推进了历史的进程。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复为陈腐的儒家经典所可以囊括；其中的一部分，由于西方科学的灌输而充实成为国内的第一批先进人物。正是在这批人物中间，产生了不同于过去的草莽英雄的职业革命家。在近代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不是经历过欧风美雨洗礼的。

留学成了新的时尚。当时，日本历经明治维新的阶段，奇迹般在东亚崛起。尤其在甲午战争以后，它不但获得了巨额赔款，而且掠夺了大片的中国领土。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和战争胜利的刺激，国内经济和军事实力出现了巨大而迅速的增长。一衣带水，相形之下，益加显示了中

国的劣势。清政府为了挽救自身的危机，不得不忍受战败的屈辱，把这弹丸岛国当成为取法欧美的样板，不断地派遣留学生负笈东来。就这样，东京，一时间成了中国留学生的中心，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领袖云集的所在地，成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颶风口。

周树人刚刚踏上日本国土，随即面迎了东京的一起爆炸性事件。

国学家章太炎选定明末崇祯皇帝自缢身死的日子——4月26日，即阴历三月十九日作为国耻日，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借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他亲自起草了一篇措词激烈的宣言，并拟定东京上野公园内的西式菜馆精养轩作为开会地点。留学生报名赴会者多达数百人，孙中山署名为赞成人，梁启超也悄悄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大会召开的消息，惊动了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由于他的干预，日本政府明令警视总监取消这次会议，传讯章太炎等十个大会发起人。

杯水车薪。反抗的情绪一旦燃烧起来，便不会轻易被压服。在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人的努力之下，会议终于在横滨如期举行。香港的《中国日报》为此发布了消息，以反清为宗旨的大会精神，弥漫了整个的中国知识界。

东京气候变得相当燠热。这种气候，使一个青年爱国者的头脑更快地成熟起来。

周树人温着“戎马书生”的好梦。因为有消息说，他们有可能进入成城学校去学习。靠近“三桥旅馆”的窗口，望一片异国的轻云，他兴奋地将情况写信告诉了二弟。

可是，他不知道，原来的学籍虽然附属于江南陆师学堂，学的却不是陆军而是采矿，根据清朝公使与日本政府所订的定例，那是没有资格进入这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的。这次偶然的否决在一生中带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再也无须留恋滴血的锋刃，而有了一个从容选择别种武器的机会了。半个月以后，他成了弘文学院的学生。

弘文学院，是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一所速成教育学校。1902年1月，校部迁至市内牛逾区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此后又另外开辟了两处校舍。后来因为有些留学生以为“弘”字与乾隆皇帝的名字弘历相忤触，为了避讳，于是改为宏文学院。

学院以教授普通科为主，学习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为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下基础，同时兼设各种速成专科班，供学生在短期内获得一些知识和一纸文凭。此外，还为赴日考察或学习教育者开办旁听班。周树人和同来的同学都被编入普通江南班，期限二年，学习时间是相当紧迫的。

当时，留学生大多从旧式学塾和书院中来，他们可以作漂亮的八股文和试帖诗，至于什么声光化电，几何代数，ABCD之类，向来是陌生的，因此，对于学院规定必修的自然科学的课目，都感到极难应付。周树人由于在矿路学堂时期经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加上基础扎实，自然绰有余裕，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致力于攻读日语。日本译书既快且多，掌握了这样一门语言工具，便可直接或间接地阅读更多的世界名著，而无须经过严复、林纾之流的中介，即使他们的译笔曾经那般地令他沉醉。

在学院里，学生每人收费二十八元日金，除了二十五元作学费外，另发三元零用，周树人的生活，不会比南京时候有更多的宽余。从国内带去的十双白袜，因为常穿皮鞋，结果既不能自用，也不能卖钱；至于一元的银元，日本早已废置不用了，只好赔本换了半元的银元和纸币。他想起出国前措置这些东西的小心备至的情景，不免哑然失笑。没有任何积攒，三元零用钱，都叫香烟和零食给花光了。买不起高贵的“敷岛”牌香烟，就抽廉价的“樱花”牌。他喜欢樱花、爱吃的零食有蛋糕和落花生，买来就放在抽斗里，随时取出充饥。香烟是最可亲近的。它不但能为人驱赶倦意，夹一根在指间，看火星乍灭还明，烟云依依不散，在一个寂寥的世界里，于是也就有了一个可以相对守坐的朋友了。

新异的国土，新异的语言和知识，多少覆盖一些黯淡的离思，在给家里寄去一卷自撰的《扶桑纪行》之后，6月，周树人又寄出一张照片。在背面，他用了不无快意的谐谑的调子写道：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

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

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

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开始不久的留学日子，在他的眼中熠现着理想的光彩。恍如严冬过后，乍见初绽的花枝，虽是一枝独秀，却有着拥抱整个春天的温暖而清新的感觉。

神田区骏河台有一座别墅式的两层楼房——清国留学生会馆。

这个策划留学生全体活动的机关，从蔡钧率先发起成立的那天开始，就置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可是，被招致的留学青年，却把它称作美国费城的独立厅。正是在这里，他们举起革命的巨锤，给清政府敲响了第一声丧钟。

会馆大楼底层设有多种房间，像接待室、会议室、事务室等等，楼上是教室；楼房之外还有一间单独的小房，主管传达、收发，兼售会馆出版的书刊。这些书刊惹起周树人浓厚的兴趣，常常跑来翻阅，从中捕获国内的最新信息，追索革命的态势，倾听青年爱国者的心声。还有会议场上盛大的集会，演说场中激烈的演说，都是他所乐于接触的。他是火，是火就得找燥热的地方支持自己的燃烧。

记得首次参加集会是在锦辉馆。演说的是一位头扎白纱布的操着无锡腔的英俊青年，那话题，自然是最时髦的排满。他滔滔不绝的慷慨的言辞，使周树人和所有的听讲者充满了敬意。

“……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

周围顿然腾起一阵哄笑。

“老太婆”者，当是指西太后了。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无疑这是事实，但凭什么便断定西太后也在北京骂他呢？周树人不免感到扫兴，心想：演讲固然不妨夹着些笑骂，但类似这般无聊的打诨，却是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的。

正是这个吴稚晖，作为主角，演出有名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

6月间，自费生钮瑗等九人申请进入成城学校学陆军，遭到蔡钧的拒绝。清政府十分害怕革命者掌握军事知识，对从中毕业的学生将任军队要职的前景，尤其感到恐怖，因此严格规定：除了政府保送的官费生，所有自费生一律不准进入成城学校。当时，吴稚晖作为广东大学堂教师，刚好带领着广东籍留学生住在东京。他对钮瑗等人的境遇非常同情，为此，结同孙揆均等二十六人到使馆静坐请愿。蔡钧勾通日本警方，把他们拘留起来；接着，东京警视厅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宣布将二人驱逐出境。在押送途中，吴稚晖乘机跳落城河，旋即被救。有名的《新民丛报》披露了这个自杀未遂的消息。江苏籍学生秦毓鎏等几次前

往公使馆诘问，蔡钧不但拒不接见，而且照样拘留了他们。这样一来，便引动了久积的公愤，全体学生马上集会抗议，从此，反对清政府的斗争再度进入高潮。

斗争结果，蔡钧被调走了，九名自费生于翌年获得正式保证，允许进入成城学校；第一个明确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留学生团体——青年会，在热潮中应运而生。

时势造英雄。群众性的斗争造就了不少名噪一时的领袖人物，但是，周树人对他们往往不抱好感。他重视人格，当他凭自己的敏感，辨识到了盛名之下的私心，那最不可容忍的浮躁，伪诈与专断时，就会立即远离他们。在留学生中间，能被他引为同类者并不多，过分的自爱使他显得有点儿孤僻。

他常常一个人走进大丛林里去。

在丛林里，他会很快地忘却自身的孤独，仿佛自身也化作其中的一片绿叶了。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然而又各各长得多么强劲，多么丰腴，多么美丽呵！他畅意地采撷着、呼吸着，每每惊异于充盈其间的空气，何以会变得那般地富于生机。它形而上，既来自林木又不黏着于林木，完完全全是一片浑然的绿意，不见形影，却无所不在。

那是书籍的丛林。为他所时时感触到的周围的绿意，便是流泛于由众多元素、细胞、动植、人物、机械、事件等构成的枝叶婆娑的世界中的一种精神。在他的抽屉里，有古希腊、罗马神话，拜伦的诗，还有尼采的传。试看异国神话，那神秘而大胆的想像，不正是人间的正义与邪恶之争的虚幻的折光吗？说到拜伦的诗，文字其实是算不了什么的，要是比起他的独立不羁的人格。至于尼采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个人主义的至为雄桀的人物，其“超人”学说实在是人类的自觉精神和进取意志的鼓吹。从前读《天演论》，常为严又陵再三致意的“自强”精神所激动，想不到就在尼采的身上和书中找到了这种精神的具形。难怪日本思想界对他那么感兴趣，要腾出那么多的地方去介绍他，甚至为了他而无止无休地争辩！……

精神追求几乎成了周树人生命中的全部。怎样才能使一个人的灵魂健全起来？怎样使一个民族的实力壮大起来？中国的出路问题渐渐成了无数次思考的交叉点。他不仅自己阅读，还把那些具有启发性的书刊，如《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译书汇编》、《浙江

潮》、《西力东侵史》、《朝鲜名家小说集》等，从书店陆续买下，寄给国内一样焦渴的二弟。

东京的风景是迷人的。富士山麓，春雪融融，江户川畔，樱花如织。无论是夕照的猩红，或是月夜的皎白，都令人感到这地方的天空是分外的澄明。凡爱美的人都不会不爱风景，只是对于周树人来说，少年时代的折磨已经多少擦掉了一些对那遗世而独立的山水的敏感。况且，他一直耽于人世问题的思索，背负着人类创造的责任，总是不肯放下。在他的视界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远比它所拥有的风景更美丽的。在阅读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文学书籍以外，他还披览了不少日文的美学书，留意日本的画谱，从浮世绘木刻中间发现现代美术的风格。即使逍遥于美学境界，那些由美感传达的亲密的私语，最后还是告诉了他：日本民族怎样的执著不深，容易蜕变，适于生存，它怎样的不像幸存的古国，自恃陈旧的文明，一切僵化，往灭亡的路上走……灌注在大脑中的还是民族，还是变革，还是《天演论》那一套。真没有法子！从小开始，他就注定了不能超脱，注定了要隐忍着摸索着挣扎着奋斗着度过此后的艰难的一生。

不久，周树人认识了一位同乡青年，有幸终于找到了精神上的最可靠的友伴。

这位友人叫许寿裳，字季荪，杭州求是书院的学生。他是由官费派来的，同样进的弘文学院，只是被编入浙江班里。比起周树人，他要高出半个头；而满头短发，剽悍而洒脱，使一直拖着辫子的周树人非常爱慕。他常常把上衣敞开，有意无意间显示出一种阔大的气魄。虽然，他不喜欢夸夸其谈，但是一旦议论开来，也会异常激烈。只有微垂的眼睑透露了他的多思，宽大的鼻子和微厚的嘴唇，刻画着天生的仁爱。

具有共同素质而且作着共同追求的人，容易增进相互的了解。当初两个人的交往并不多，虽然每次见面，都感觉彼此间有着新的接近。

有一次，当聚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两个人一同沉默起来，谁也没有话说。语言这东西，有时候显得最没有力量，甚至完全是多余的。好像这段悲哀的沉默，就远胜于万千般言语，一时间把心灵之间仅存的一层障壁给打通了。从此，他们的来往突然变得频繁了起来。

## 17. 弘文风潮与辫子问题

春天。

春天是一个启示，一次展示。为了创造一个蓬勃的起始，当1903年的春天尚未萌动之前，革命派就开始加紧活动了。

每年，留学生会馆都有例行的新年团拜会。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他把留学生马君武、刘成禺召到横滨，布置任务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宣传机会，因为要欢迎振贝子，公使、监督都将出席团拜会。如果有人在会上倡言“排满”，发表演说，必将轰动全国。

两位青年接受了这项庄严的使命。

这一年的团拜会的确是空前的盛会。官袍、洋服、长辫、高髻，熙熙攘攘地混杂到一块。大会开始后，马君武、刘成禺先后登台演说，面对贵族公使，历数清廷的罪恶，并且提出：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挽救中国。两人言辞慷慨，声泪俱下，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有清宗室站起来辩论，被会场中的革命学生厉声制止了。革命，以有声有色的实体呈现在会场中间，构成为一种现行的威慑力量。

会后，贵族学生良弼、长福等人，一连绝食三天，迫使监督汪大燮，将刘成禺开除出成城学校。但不管结局如何，事实证明保皇思想已经没有能力单独应战，哪怕小小的一次狙击，都必须借助皇权。团拜会大大鼓舞着东京的留学生群。因为革命已经不复是几个流亡者的幕后策动，也不是几个演说家的空头呐喊，它已经壮大到可以明火执仗地向满清官员示威了。

周树人深深感到：日本这地方，不但是西方科学文化的输送站，而且是革命的冶炼场，解救整个民族的人才和武器都必然在这里锻炼产生。科学的影响是长远的、沉潜的，惟有革命的手段高扬而且切近。对于一个专制腐败的异族政府，看来十分需要强有力的颠覆手段，整个的颠覆！

在清风亭召开的恳亲会上，他同陶成章、许寿裳等二十九名绍兴籍学生一起，联名发出致绍兴同乡的公开信。

信中这样写道：“遭世多变，别心怵目于危亡之将及，而我五岳，灏灏江河，东南带海，西北控山之大陆一片土，将沦陷于异族。即我稽山镜水金宝玉堂，亦将销沉霸气，暗郁无色。呜呼，岂不痛哉！”他们向对岸发出热切的呼唤，希望乡亲勇敢打破政府的封锁政策，力争东渡留学，“求智识于宇内，搜学问于世界”，从而率先“惊醒我国人之鼾梦，唤起我国人之精神”。

周树人自己，的确以能置身于日本而感到庆幸，在“排满兴汉”的热潮里，他时刻盼望着作人快点毕业，找机会像自己一样前来。

整个日本留学界，革命形势的发展非常迅速。继《国民报》之后，一批留学生创办的报刊纷纷破土而出：《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四川》、《河南》、《直说》、《游学译编》、《女子魂》等等。同时宣扬民族主义，传播民权学说，煽动种族革命，鼓吹献身精神。《浙江潮》发刊词说：“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每一个刊物都是一个地方团体。对于政府来说，团体的力量无疑是最可怕的。像这样雄厉的集体的呼号，当时就很有代表性。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除了办报，就是抄书。有些激进的学生锐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实录，钻进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然后设法印刷和输入国内。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以及其他单篇的汇编。他们希望国民将忘却的旧恨复活，促进革命的成功。

在东京，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争取独立自由的第一个波浪，他们是喧腾起来了。

初到弘文学院，周树人有过短暂的满足，但是，很快就发觉自己对于学院的期待未免过于乐观。经过3月的一次大风潮，他几乎彻底地陷于失望。

一天，学监大久保把学生召集起来，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吧！”

周树人听罢，着实大吃了一惊。他想，正因为不满于孔夫子的一套，才千里迢迢跑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吗？心里感到十分困惑。

其实，学院早就立下这样的规定：“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

酒。”直到前不久，嘉纳还在学生面前强调说，中国要振兴教育，不但要“求之孔子之道”，而且要“深明中国旧学”，至于泰西伦理道德学说，又不过是掺合的佐料罢了。很明显，一个明确规定尊重清国国体的学校，其宗旨是绝对不会离开孔夫子的。

与政治上的保守倾向相适应，便是整个学校的管理腐败，课程不全。学生们虽然多次要求改革，并且争得嘉纳的承诺，从来未曾有过任何实施。在教育的地带，赚钱居然成了第一需要。今天办一个“速成师范”，明天办一个“速成本科”，名目倒是不少，大抵是商业性的招徕。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师资，具有真才实学者并不多，最可讨厌的是也学会了挂招牌，在教育上头，加上各种主义：军国主义、尊王攘夷主义、贤妻良母主义之类，颞颥之态可掬。

这样的教学制度，自然要引起革命思想日趋激烈的学生的不满。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独立的反抗。周树人班上，就有一个黄兴，十足地表现了楚人的蛮性。他从来未曾大叫革命，也始终没有断发，只是由于学监严诫学生不可赤膊，他便偏要光着上身，常常这样捧着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然后摇摇摆摆地走进自修室。散置的干柴终于有一天集中起来，升起熊熊烈焰，仅凭权力者的几星唾沫已经不再可能把它泼灭了。

26日，学监大久保、教务干事三矢、会计关等，突然召集学生部长开会，出示新定规则十二条。学生们满以为是改良课程的方案，接过来一看，才知道是一些旨在增加校方收益的规定。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认为多属琐碎之事，不屑与之争议；但是其中有三条实在过于苛刻，因此有必要加以修改。这三条规定是：一、除告退外，无论临时告假归国及夏假中归国者，每月须纳金六元半。

二、洗濯一月三次，每次一套自备之物，宜由学生自理。

三、患病者两周之内医药全皆由学院支出，逾则学生自理。规则经过修改，由学生部长找会计关交涉。关借口要过问院长，丝毫没有听取意见的表示。部长迫于规则将在三天之内实行，便提出说第二天要听答复。结果，到了次日晚上十时许，仍然没有回音。学生再度推举部长前往究问，并且声明：如果再不答理，将于明日全体罢课。

学校当局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三矢集合了十多名学生代表训话，宣布对规定不做任何修改。“你们不应当这么胡闹，”他傲然说道，“如果

有谁执意要退学，我们决不强留！”代表们听了十分愤慨，于是议论说：“他胆敢借题威胁，那么就试试看吧！”

学生当即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群情激愤，一致决定退学。

住在东樱馆的周树人，是退学风潮中的激进派分子。28日，他同弘文学院的五十余名留学生一起，坚决告离了学校。

嘉纳慌了。他知道，倘听任事态的发展，于自己是十分不利的。于是，一面写信给各监督，一面派人到总监督处，要求代为安抚，并且表示了厉行改革的诚意，以图挽回残局。

总监督传达了嘉纳的意思，为此，学生们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讨论。在会上，他们进一步提出开办走读等七项要求，作为复校的先决条件。嘉纳看到没有回旋的余地，经过几次谈判，只好撤去教务干事及会计人员，但仍然坚持要学生检查“措置冒昧之失”。学生一致认为没有错失可言，于是严词加以拒绝。最后，嘉纳不得不承认职员的不善之过”。

二十余天的僵持局面终于结束，中国留学生胜利返回了学院。

周树人十分重视这次退学斗争，当序幕刚刚拉开，就把事情告诉了作人。首次加入一个战斗性集体，直接感受诸方面矛盾的冲击，使他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次斗争，面对的已不复是满清的官员，而是日本的学府；而且，斗争也不只限于一次演说，一个宣言，而是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几经反复的紧张的角逐。他感到，仅仅排满是不够的，满清政府就总是同外国人勾结在一起。作为炎黄子孙，他时时感受到作为亡国奴的双重的屈辱。

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滋养一个民族的文明，也可以培植一个民族的兽性。祖国的疆土，就有发达的日本的爪痕。在东京，一些日本人骄蛮得很，动辄侮辱自己的同胞。触目的事实，使周树人的头脑日渐变得复杂起来；他虽然倾心于日本的科学文化，由于过分的自尊和敏感，却也不能不常常以多疑的目光打量周围的日本人。

如果有日本人看出他是中国人，便凑过来用中国话问话，他总是假装不懂。上街时，常常要遭到日本少年的嘲骂，同学们听了都感到气愤，他会说：“光是气愤没有用。这些辱骂的话，倒值得编入我们的国

歌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最近，一个姓坪井的日本人，把中国人看做同朝鲜、日本北海道、台湾土人一样，都属尚未开化的野蛮人种；于是建议招聘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野蛮人”，作为标本运到大阪博览会上去陈列。对留学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最富有刺激性的一件事情。当时就有人呼号道：“吾言及此，吾抚此发辫，不禁泪涔涔下，哀吾同胞祖先之惨状，而吾辈子孙今日之苦，尚未有穷期也。”

除非不革命，要革命，就必须除掉辫子！

周树人记得，幼小时，曾听老人说过：“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自从清兵入关，不痛不痒的头发就同政治联系起来。按照满人的风俗，男人是要蓄发留辫的，一旦成为统治者以后，自然强令汉人也得如此，以示统一，有谁敢于抗拒，就把头砍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这辫子，是砍了无数人头，这才种定了的。时间长了，人们也就渐渐忘却了这段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这样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

在留学界，一些学生居然把辫子当宝贝一样盘护起来，用制帽盖住。特别是速成班的，像道士似的梳上一个髻，顶得制帽高高耸起，形同一座富士山。如果完全暴露出来，拖在脑后，被市中的行人看见了，就会直呼为“跬跬子”，意思是拖尾巴奴才。自己来到日本，日本人议论自己的头一句话，也就是“半边和尚”。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平的，但从帽沿拖下些发缕来，那样子就更难看了。辫子这东西实在可恨，然而无法可想，只得把“顶塔”留得很小，让不多的辫发盘在帽子里，不露一点痕迹。但是，每当脱帽，体操，穿起白衣服练习日本传统的柔道，都会感到极其不便。有时候，目睹辫子平空甩了下来，心里就更憋得厉害。

大风潮过后，他对自己过分的沉静突然不满起来。这辫子，为什么别人可以剪掉，自己却偏要留着作为奴隶身份的见证呢？人家革命、割头尚且不怕，还怕一根辫子吗？……除掉它！坚决除掉！

异国的天空变得有多高呵！大街也变得这么宽阔！周树人太兴奋了，从理发铺里走出，不自觉地竟小跑起来，一直跑到许寿裳的自修室，这才在门口站定了。

许寿裳见到他，立即推桌站了起身，大笑着叫道：“呵，壁垒一新！”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也不禁笑了。

此后，每当遇着惊喜或感动的时候，他都会本能地摸一下头顶，乃至“定格”成为一个固定的手势。

失去辫子是一件大事情。由于在江南班里是第一个，周树人的光头便特别的惹人注意，很快遭到几个盘辫子的同学的耻笑，甚至是敌视。最严重的问题是实际解决。监督姚文甫出面干预了。这个顽固的家伙，当众把周树人狠狠斥责了一通，扬言要停止他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开始，他感到有点可虑，因为他实在舍不得离开这块地方。一切准备都是这么的不充分。他非常需要日本。但是，既然权力降罚于自己，又有什么可卑怯的？本来就是意在造反的嘛！他变得不在乎了。

过了几天，姚文甫的辫子也丢了！

原来，姚文甫是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好些留学生都知道他的隐私。一天夜里，同文学院的邹容乘他私通的时机，伙同另外四位同学，一道闯进了他的寓所。他们将姚文甫痛殴了一顿，声称要砍头示众，吓得他连连磕头求饶。

邹容喝道：“即使饶了你的头，也不饶你的辫子！”说罢拿出剪刀，“咔嚓”一声，果然截了下来。

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于是有了一条高悬的辫子，旁边有大字注道：“禽兽姚文甫之辫。”

闻讯以后，同学们都纷纷跑过去看，以轰动的笑声，庆祝辫子革命的又一次凯旋。

## 18. 哲学和文学成了异国游子的精神家园

两个人和两个影子。

谈话持续了好一会儿，周树人打开书册，取出一张照片递过来，说是给许寿裳做个纪念。

一个青年从掌上凝视自己，那目光像在探问，明澈中显得有点儿沉

郁。头发留的很短，几乎整个开阔的前额都暴露了出来。圆圆的脸廓，似乎着意保留童稚的纯真；正直的鼻梁底下，微张的鼻孔和紧闭的嘴唇，却又分明表现着成人的执拗。深色的学生制服，领子关得很严，两个耀眼的铜钮端端正正地钉在制服上，把整个人衬托得格外深沉和稳重。

翻过背面，是一首题照的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神矢的情爱，故园的黑暗，迷茫的星光，祭坛的热血，一个异乡游子所身受的八方刺激，都通过这几行小字显露出来了。

没有谁比许寿裳更能理解这位青年人。平时，他们像兄弟一样亲爱相处，一起读《天演论》，读张苍水，读各种各样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每到书店，两个人就划分范围，锐意穷搜，得到名著立刻欣然相告。坐在一起的时候，就评述会上或书里的各种观点的优劣得失，自然也会激烈地争论起来。这是一位“畏友”。许寿裳知道，他富于热情，极易冲动，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无怪王立才送了他一个“富士山”的诨名；但他也极爱沉静，善于观察，见解深刻，一针见血，为此，邵明之还给了他一个绰号叫“毒奇”。动和静，在他的身上形成奇妙的两极，有如正负电荷，不时碰出炫目的火光。

最近，周树人明显地有了改变，昂奋的时候少了，沉淀多于沸腾。他感觉到了无边的寂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寂寞。而周树人的是大寂寞，因为他拥有一个更为辽阔的时空。时空的伸延使目标变得那么遥远，甚至看不到通往它的确切的道路；这样，就与他对社会责任的强烈意识和实行干预的紧迫感构成为巨大的根本性矛盾，使他怎样也无法逃避这种张力的撕扯。这时候，在生理上他才刚刚走向成熟，刚刚进入青春期。这是一生中的分裂时期，危机时期，冲突时期。为心理学家所称的“角色延缓”，多少带有类似的悲剧性质。他远离故国，不时想念家人，但显然不再全心全意地属于他的家庭了；他的周围有不少中国同学，虽然缺少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朋友，然而，他又必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受着各种关系的制约，却又具备某种超越性。思索本身是一种超越，思索的对象——精神也是一种超越。在东京，他是一个“孤独的旅客”。

当时，日本思想界流行着黑格尔和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梁启超也

开始在《新民丛报》谈起“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来了。周树人虽然并不欣赏这位“报纸派”领袖人物提倡的所谓“公德”，但如何认识和改造国民性，开发其中积极的方面，却不能不成为他思索的全部问题的核心。

留学一年来，他就认识到日本的崛起，跟整个大和民族的性格有关。它那积极进取的精神，又恰恰是中国国民所缺乏的。按照“天演”公例，中国的希望理应属于青年，但是周围的青年是怎样的一群呢？只要想起经常出入于会馆，夸夸其谈，扭屁股跳舞，关起门来大炖其牛肉的新式人物，他就感到恶心。那些志为人臣者固不待言，连一些颇具民族意识的学生，也大抵以早经褪色的先民的历史自炫。例如说日本“无一非我皇汉二百六十年前国有之习尚风俗”，见到店铺的一些招牌，也常常指点赞叹说是大唐遗风，并以在中国失传为憾，还有的说汉人死后入殓，将辫子盘上头顶，仍然不忘恢复大明，是谓“生降死不降”；另有一部分人，则改名为“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就拿有名的吴稚晖来说，姑不论在成城事件中是否有过在清朝公使面前下跪的事实，后来的跳水便很可怀疑是不是一种姿态，因为那城河水浅他不会不知道的。这样一些国民，难道是可信赖的么？如果说革命志在光复，那么，光复以后又将是怎样的一番局面？他有点茫然。

只要有空，周树人就跑到许寿裳的自修室里去，同他一起探讨这样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两人的聚谈每每忘了时刻，最后，还是没有满意的结果。

在周树人的抽屉里，珍藏着他心爱的书籍，除了惟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全都是洋书。这个发现，不能不使他的挚友感到诧异。前些天，许寿裳曾经问他：你最喜欢《离骚》的哪些句子？他不假思索，随口背了四句：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种登高怀远、不胜寂寞的心情，许寿裳是理解的。当照片递交到他手中，也只是默默地看，默默地放好，默默地陪对友人。他没有话说。

5月，许寿裳开始接编《浙江潮》。

他平素就佩服周树人的见识与文才，及至亲自编辑一个刊物，自然找上门来商量。对于《浙江潮》，周树人是非常关切，每期必读的。当他听到要由好友主办的消息，兴致很高，当即答允帮忙看稿子，并且表

示，设计封面或者撰文，也都可以的。

隔了一天，稿子便交来了：《斯巴达之魂》。

这是一篇从日文重译，然后再行改写的小说。公元前480年，古希腊的斯巴达三百勇士坚守要隘温泉门，抗击波斯数万侵略军，终因众寡悬殊，全部壮烈牺牲。只有一人因患目疾未曾参加战斗，得以幸免归来。回家后，妻子烈娜引为奇耻，乃至以死谏。将军柏撒纽闻悉死讯，大为感动，于是特建了纪念碑，作为斯巴达国魂的象征。

早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际，沙俄政府便借口“保护中东铁路”，调集了十六万军队，占领了东北三省。经过清政府出面交涉，仍一直拒不撤出。4月，进而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将中国领土长期置于铁爪之下。上海爱国人士于是发起“拒俄运动”，坚不承认沙俄政府的条件。月底，消息传到日本，东京留学生立即召开全体大会表示声援。会上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抗击沙俄。这次运动声势浩大，致使几个月后，弘文学院还因为它的影响而几乎停课。

由于客观方面的原因，周树人与矿路学堂毕业前来的几位同学都没有参加，也没有捐款。从个人意愿来说，他也未必会主动担任其中的一个角色。首先，义勇队不可能独立行动，不可能充分履行自己的爱国职责。大会曾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将义勇队编归他的部属，这种把爱国者的命运交由一个本来早就应当被颠覆的腐败政府去掌握的做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这时候，他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有准备的反抗和长时间的韧战。他不是缺少热血，但并不愿意作如此轻贱的倾洒。他愿意留下来，慢慢地磨自己的锋刃，从而等待一个必要的出击机会。

即使这样，他对许寿裳、苏曼殊等朋友加入义勇队的爱国热情，仍然十分感佩。这时，正好赶上许寿裳拉稿，便借了流行的斯巴达的故事，讴歌一种超乎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

周树人同东渡的同学，包括自费生陈师曾等一共八个人，住在楼上的一个狭陋的房间里。楼下是自修室，也不见得宽大，供他们集体使用。这群二十余岁的青年，终日挤在一起，有时商量大事，推敲文字，研讨新知；有时共抒雄图，计在光复；有时痛饮浊醪，狂论高歌，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斯巴达之魂》完稿以后，大家都围拢来看。有的手执日文书，一边说，一边补充；有的抢先高声朗诵。当读到“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飘飘大旗，荣光

闪烁，于铄豪杰，鼓铸全身，诸君诸君，男儿死耳”等句，就有人用笔加上密圈，传诵一时。这篇译作充满着政治激情，在译笔方面，既有点梁启超的淋漓酣畅，也有点严复的古朴凝炼，还带点林纾的典雅清丽，因此留给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此后，只要在杂志中发现斗争性较强的短论，大家一定说：“恐怕又是豫才的手笔罢！”

在《浙江潮》同期发表的，还有另一篇译作，那是从雨果《随见录》中节选的《哀尘》。

还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周树人就读过雨果的小说；及至日本，这位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领袖的名字，已经随着“政治小说”的流行而风靡岛国了。《新小说》登载过他的照片，名著《悲惨世界》及其他一些作品也都先后有了日译和汉译。雨果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对封建王朝、教会和上流社会的揭露，以及对底层人物的同情，自然赢得周树人对他的倾慕。

与《斯巴达之魂》一样，饶有意味的是，《哀尘》的主角也是一位女性。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深明大义的女丈夫，后者是无心薄命的贱女子。她们分别作为社会上的强者和弱者的代表人物，而呈现在读者之前。

《哀尘》叙述芳娣惨遭恶少诬辱陷害，辗转无依的经历；在她的身上，第一次体现了未来的天才作家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伟大的同情心，不仅来自先天的人性遗传，或后天的文化修养，重要的是植根于早期的“乞食”生活，与曾经身受的屈辱血脉相连。因此，周树人绝对没有出身优裕的人道主义者那般从容不迫，他对压迫者的憎恨已经深入骨髓，乃至在译述这个异国故事时，特意选择了“频那夜迦”作为恶少的名字，借诅咒印度神话中的恶神进行发泄。在这个短篇中，首次表现了译者对他所向往的西方文明的怀疑。然而，既找不到前途，又不甘退转，他便只好在时代给予的局限里继续忍受痛苦的熬煎。在《译后记》中，他慨然写道：“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器俄（雨果）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而《哀尘》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发表时虽然用了传说中降伏妖魔的神人“庚辰”作笔名，表示抗暴的决心，而笔端所及，毕竟流露了深沉的寂寞。

邹容在惩罚姚文甫以后不久，被迫离开了日本。4月，他回到上海，住进“爱国学社”，认识了有名的革命家和国学家章太炎，从此结为亲密

的“双子星座”。

正当周树人编译《斯巴达之魂》时，邹容完成了一个宣传民主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这个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以浅近直截的语言，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主张“天赋人权”，提出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共和国”的革命纲领。它在上海秘密出版，接着公开印行，销售达数十万，堪称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当时，《苏报》的笔政大权已经转移到章太炎、蔡元培、章行严等革命派的手中。为了配合《革命军》的出版，报上连续发表《〈革命军〉自序》、《介绍〈革命军〉》、《序〈革命军〉》、《读〈革命军〉》等系列文章，“排满”、“仇满”、“革命”、“民主”一类字眼，一时挤满版面。6月底，摘要发表章太炎有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就给已经燃起的烈火投进了又一束柴薪。

7月，清政府突然查封了《苏报》馆，章太炎和邹容一起被捕入狱。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发生了。

在这期间，周树人和许寿裳相约拜访了蒋观云。这是一位极负盛名的人物。他不但诗文做得好，难得的是能够摆脱君主立宪派的宠幸，从一个《新民丛报》的主要撰稿者，变为《浙江潮》的主笔。由于手编的刊物，可以给青年以焦渴的真理、知识和热血，因此，他们都乐于登门请教。

头戴绅士帽的蒋观云，今天的言谈特别激烈。针对“《苏报》案”，他发表一通观感之后，接着出示了章太炎写在狱中的几首诗。诗人一生作诗，诗在华采；革命家余事作诗，诗在精神。章太炎的诗实在做的好极了。“虺彪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像这样的诗句，是何等识见，又何等气派！两位青年吟诵过后，都非常感动。不久，许寿裳把这些诗都拿到《浙江潮》上发表了。

章太炎成了新的崇拜对象。

首先，不是因为他的理论，而是作为革命家的风范吸引了年轻的思想者。在具体行动方面，周树人已经越过政治的峰峦，而沉潜到了更深邃的思想领域。不过，两个人都意识到了西方社会的矛盾性，都同样偏重于思想方面的探索，都在同时摸索着中国走向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独

特的道路。然而，他们毕竟是两代人。周树人并没有章太炎同传统文化的那种强固的联系，他年轻得多也便激进得多，“西化”的倾向明显得多。“国民性”的改造，在他看来，除了革命，必须借助西方科学的力量。所谓科学，既是物质，也是精神。当他沉浸于精神的追索时，也并没有忽略世界的物质性。一个同世俗世界联系那么紧密的人，即使苦难熬炼出了一种哲学气质，也不可能把他变为纯粹思辨的哲人。他没有来得及，或者说根本不可能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实际斗争中，对民族出路问题作全方位的考察。当革命以具体的形式继续进行，他的激进的同志使用了暗杀、内战，和最猛烈的政治性文字进行搏斗的时候，他仍然执著地把科学知识压进炮膛，作远距离射击。

航标灯在哪里？革命的浪潮汹涌而来，他最终会发现光在自己身上。

## 19. 科学救国的前沿

自从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中国领土之后，它所掠夺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广大的市场。19世纪末，一批外国人开始钻进中国内地进行各种“探险”和“考察”，为他们的主子进一步掠夺这里的矿产资源廓清道路。

1896年，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侵略机构成立，聘刘铁云为经理。经由他为中介，先后把山西、河南等地的矿产开采权出卖给了外国人。1898年开始，刘铁云又与浙江候补道高尔伊相勾结，向外国贷款五百万两，成立宝昌公司，企图把铺设铁路和矿权卖给意大利人。《浙江潮》第六期援引《海上日报》的消息，揭露了刘铁云盗卖矿权的阴谋活动，引起浙籍留学生的严重关注。

随着事态的发展，10月，浙江同乡会在上野三宜亭召开了特别会议，愤怒声讨高尔伊的罪行，并且通过决议，吁请浙江乡绅起来加以制止，从中收回利权。

周树人同许寿裳一起参加了这次同乡会。

大会的壮烈气氛，深深地感染了周树人。遥思故乡，使他忆起乡人当年反洋教斗争的情景；于是，未来的护矿斗争中可能出现的那样一幅梟颅成束、流血遍地的惨象，也便随着健旺的想像力，一同在脑际叠印出来……

前两天，他在《朝日新闻》看到一则消息，说是俄国人先则利诱清商，继则胁迫官方，强行索夺金州、复州、盖平、海龙诸矿地。南北同时发生的事件，使他深深感到，领土主权的丧失，必定要导致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因此，任何地方的护矿斗争，也都不应视作孤立的现象。但是大会决议寄希望于贪婪、畏葸的绅士，其实如同寄希望于昏聩无能的政府一样，完全是不现实的。希望在于民间。只是再也不能像反洋教一样满足于一时的哄闹；对于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事实，必须做出科学的判断。他认为，中国的积弱，不只是历代统治者施行愚民政策的结果，地质学和其他科学的不发达，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斗争的召唤下，周树人动员了有关矿物学、生物学以及人文科学的全部的知识积累，夜以继日，赶写完成了《中国地质略论》。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凡诸科学，发达已昔，况测地造图之末技哉。而胡为图绘地形者，分图虽多，集之则界线不合；河流俯视，山岳则恒作旁形。乖谬昏蒙，茫不思起……呜呼，现象如是，虽弱水四环，锁户孤立，犹将汰于天行，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况当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论文一开始，就充满了危机感。但是，对祖国的热爱与主权的维护，并没有导致盲目的排外倾向。面对狼顾鹰睨的侵略者和引盗入室的清政府，他以当然主人的态度，坚定地指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觐者也。文章详密地列举了帝国列强深入我国内地进行勘探的情况，进而介绍康德的星云说和拉布拉的学说；从地球的形成，地质的分布和发育，一直到我国的矿产资源，作了概括性的叙说。周树人利用自然科学知识，在批判迷信思想的同时，痛切地批判了国民“慑伏谄媚”的奴性心理。他把地层的演变同进化论联系起来，对康梁等人的改良派理论提出质疑，表达了极其激烈的共和革命的主张：盖以荒古气候水陆之不齐，而地层遂难一致。犹谭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地层变例，亦如是耳。没有透彻的了解，就不可能爱得深沉。为了使读者同胞更加了解和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且为将来开发祖国的资源掌握充足的依据，周树人决定在《略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成为一部论述祖国矿产状貌的专著。年底，当护矿斗争开始进入高潮，他邀来同学顾琅，一起动手编写《中国矿产志》。

物质无限可分，人类不断进步，任何一种所谓“统一”、“彻底”的理论都是没有根据的。（后通译为镭）被发现一年以后，周树人以高度的科

学敏感性，及时把握了它所蕴藏的意义，从中受到巨大的鼓舞。

居里夫人对放射性元素的发现，打破了关于组成物质的原子是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这一传统说法，在西方科学界和哲学界掀起了一场大风暴。物质的意义不在物质本身。任何一种物质形态的发现，只要有助于改变陈旧的观念，无不引起周树人的关注。当康有为撰写《中庸注》和《论语注》，宣传天命的时候，当整个中国思想界在科学视界上仍处于一片混沌的时候，他写了《说》一文，向国人介绍的发现过程，称颂新的元素将“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礴，未可知也”。在强调重视科学研究的同时，极力谋求科学精神的发扬。

《浙江潮》同期刊登的这两篇科学论文，一篇署名“自树”，一篇署名“索子”，表明他所崇尚的独立精神。在严复的《天演论》出版之后，批判懦怯的国民性格，倡言革命，倡言武力，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周树人的文章，多少要受到整个时代气氛和写作环境的支配，但是在共同的倾向中间，也确实有着个人的选择和发现。这位素来自爱的青年，对这点是非常了解的，他的特别的署名便充满着一种自信。

近代思想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自然科学的接近。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等，没有一个不是热心钻研过其中的某些学科的。惟有科学使人变得真正的勇敢。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主义运动在东方国家的传播，除了具体的科学成果，更重要的是产生这种成果的精神。于是，中国乃有“《天演论》热”，日本乃有科学幻想小说的流行。比较《天演论》之类的思想著作，科幻小说更加注重知识性和文学性，对于科学启蒙无疑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法国的凡尔纳，以及日本的德富芦花和押川春浪的作品，每种得以重版十余次，创造了读书出版界的奇迹。

科幻小说的热潮，对从小就受到古典小说的浸淫，而又对科学抱有不衰的兴趣的周树人来说，不能不产生巨大的诱惑力。在撰写科学论文之余，他选译了凡尔纳的两部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小说依照梁启超的“角书”形式，把“科学小说”的字样冠在题目上面，取法章回体，文白夹杂，间或缀饰一些古代的格言诗句。就这样，他尝试着把西方的科学内容和东方的文学样式结合在一起。在《〈月界旅行〉弁言》中，他写道：“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像梁启超鼓吹政治小说

一样，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旨在宣传科学的尝试性工作，也未免鼓吹得太过分了。

其实，按照他后来的“硬译”主张来看，《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都算不得真正的翻译，顶多是改译罢了。从严复、林纾直到梁启超，都采取这种非常态的翻译办法。由于这种办法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观感，加上他当时重视的是思想意识，而不是文字实体，故也乐于沿袭这样的传统形式。

在翻译时，他删去原文中一些与自己的观点不大相干的纯文学部分，为了加强进化论理论和尚武精神的宣传色彩，平添了不少说话。在《地底旅行》中，便不惜借了外国人的口，痛斥国民的奴隶性格：“你如此懦弱，是个支那学校请安装烟科学学生的胚子，能旅行地底的？”这种主观随意性，实在可以算作《故事新编》的滥觞。在《月界旅行》中，他议论说：“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又说：“天人决战，人定胜天，人鉴不远，天将何言！”幻想的故事，直抒的语言，渗透了一个东方青年的浪漫主义热情和感伤的气息。

1903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革命派的势力迅速发展，君主立宪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大片阵地陆续丧失，《清议报》的火舌喑哑了。但是，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在广大学界仍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革命派忙于革命宣传，顾不上文学的侧翼地带；而且，其代表人物的文学观，相反显得比较保守，拿不出有分量的作品进行拮抗。周树人是突出的一位。他的热梦，过早地被时代卷进政治漩涡之中，因此，即使具有非凡的文学天赋，也来不及进行美学方面的开拓。他接受了梁启超的“文学工具说”而摈弃其改良主义，以自己的充满文学色彩的论著，进行革命和科学思想的启蒙。在民族命运问题上，他不再满足于“排满”、“光复”之类的现成的回答；而在献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方面，也不再满足于把个性消溶在集体里面。他开始寻求自己的独立的道路。

寻求是寂寞的。他越往前走，越是感觉孤独。第二年，竟连耽爱的文字也离开他了。

## 20. 需要独立行动

独立行动需要勇气。所谓勇气，未必只是敢于作流血牺牲；忍受屈

辱，也许要比流血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是1903年秋天。

日俄战争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如果战争爆发，中国的国内矛盾势必进一步尖锐化，从而形成推翻满清政府的有利时机。对于战争，革命派普遍持有一种乐观的看法。

东京的浙学会会员王嘉祎、蒋尊簋、许寿裳、沈颀民等，一共十几个青年人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举行会议。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确认革命不应仅仅停留在宣传鼓动阶段，有必要另外成立一个秘密团体，回国组织武装起义工作。他们计划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根据地，然后逐步向全国扩展。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发动留在东京的浙江志士，如陶成章、魏兰、龚宝铨、蒋观云、周树人等，加入革命组织。于是，决定在会后分头负责联系。

浙学会最初在杭州成立，鼓吹反清革命，骨干和大多数成员都出身于求是书院。成立后不久，引起清政府的警戒，于是改名“哲学会”作为掩护，继续进行工作。在东京，这些会员仍然密切来往，并且通过《浙江潮》，积极宣传他们的宗旨。王嘉祎曾经担任过《浙江潮》的主编，自许寿裳接手以后，他还是该刊的对外主要负责人，编辑部实际上等于设在他的寓所里。

由于许寿裳的介绍，周树人认识不少浙学会的成员；对于王嘉祎寓所，也不会感觉陌生，确切点说，还带有一种亲切的况味。当许寿裳和沈颀民向他发出入会邀请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会议如期召开。

不大的房间，烟雾迷离，异国的烟草散发着呛人的气息。

暗杀成了第一主题。会议对此表现出来的狂热，使周树人感到震惊。大半年来，虽然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国民性的探索方面，寄希望于民族的根本性改造，但是，武装推翻清政府，仍然是他渴待的目标。在他看来，武装暴动是群体性的行动，因此必须唤起民众。如果没有国民的普遍觉悟作为基础，任何军事行动都只能充作失败的试验。恰恰相反，龚宝铨等人提出要开展军事行动，必先狙击几个重要的满清大臣，以便造成一种有利于革命的气势。周树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大规模的军

事行动要依靠暗杀来声援。思想过于深远，往往显得抽象空洞，不易为群众所了解；而权宜的做法，由于同具体的事实相联系，反而变得易于把握。因此，龚宝铨的冒险计划，很快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响应。

周树人沉默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大会决定派遣陶成章和魏兰分别往浙江、安徽联络会党；龚宝铨往上海组织暗杀；沈颀民往湖南，与华兴会的黄兴建立联系。眼看这些同志返回祖国，偕将更多一批年轻有为的志士闯入死地，周树人心里十分焦苦。这时，他的耳畔仿佛有炸弹的轰鸣，眼前则是倒毙的尸体和纷飞的血肉……他没有说话。真理和辩论，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战胜的。在会议进行的不太长的时间内，靠近他的桌面，插满了一个又一个被强行按灭的烟头……

会后，他突然接到充当刺客的任务。

他不会想到，刚刚参加组织，就一头撞进一个巨大的冒险主义的计划之内。他知道，这个计划所以能够产生权威性的力量，显然受到社会上的某种思潮的支配。当一种思潮已经形成具体的物质环境，单靠个人的能量是万难改变的，当然这也并不妨碍自己作内在精神上的坚持与对抗。但是，现在是不可能了。为了使整个组织不致蒙受革命意识的损害，只有牺牲自己，从生命直到真理的秘密。彼岸是可系念的，而此刻行进在混茫之中，周围已是礁区。既然航船选定了这样的航路，不能倒退，也不能停泊，作为一名水手，那么就坚守被指定的位置，慷慨奔赴死亡吧！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相信那些同样为彼岸所招引的人们，将会严峻对待沉沦的事实，从回避中找到一次正确的航行。

如果生命仅仅属于自己，即使作无谓的牺牲，他也会毫无顾惜，可是，一旦想及同自己的生命密切关联的几个人，尤其是母亲的那种失去亲人以后的惨苦无告的目光时，却未免踌躇起来。

“我可以立即动身的，”周树人对组织说，“现在只想了解一下，如果自己死了，剩下老母，那时候该如何替我照料呢？”

对于一个革命者，领导命令去做的事情是只能遵命的，想不到执行之际，他竟还会这样提问题。既然是铤而走险，还有这些后虑怎么行呢？于是，组织上回复说：“不用去了，你算了吧。”

事情这样过去了。

谁也未曾怀疑他对革命的忠诚，可是，他的心中却从此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擦痕，一种不被理解的屈辱在啃啮着他。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同志之间在观点上所存在的距离。如果因此而竟不能获得同志的信任，那么，获得真理的信任也当足以自慰吧？

他不能回答。

## 21. 离离草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终于爆发了。

东京日比谷公园。周树人和陈师曾设了茗点，为即将动身归国的沈颀民叙别。

树木不染一点初春的颜色，孤零零地，把园子烘托得相当阴冷。三人围坐在一个小角落，开始很少说话，仿佛大家都在借了最后一点聚首的时光，默默呷饮友情的温暖。

沈颀民的话逐渐多了起来，从此行的使命，说到湖南，说到旅顺，说到报纸上的“天授日本”之类。周树人慢慢吃着点心，当他听说到关于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设想时，才含蓄地表示了一点自己的隐忧。他不愿过多地表白自己，更不愿意以自己的情绪传染友人。他知道，饱满的热情对革命者来说有多么宝贵。当谈说到一些留学生至今仍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的时候，沈颀民和陈师曾才吃惊地发现，周树人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周树人特别指出，蔡元培和何阎仙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竟也在日俄对立中偏袒日本，实在没有远见。他认为，必须充分估计日本军阀的野心。日本和俄国邻接，如果沙俄失败，日本必将独霸东亚，那时中国所遭受的茶毒就更深了。接着，他提出三条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护日本；二、不要以“同文同种”等欺骗性论调向国人宣传；三、引导国人认真研究国际时事。

沈颀民认为很有见地，当即劝他把意见写成书面文字，由自己转交给上海。陈师曾也十分佩服他的卓见，返回住地后，按照他的观点，即

刻写了六封信，由沈颀民分投给家父和其他几位友人。

过了不久，周树人接到沈颀民寄来的一首诗：

東豫才兼示师曾

东亚风云起，吾曹效力时。

救亡纾上策，游说竭微辞。

难醒人间醉，空劳别后思。

栽培芳草绿，原上看离离。“难醒人间醉”。启发国民的革命意识，的确是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工作。可是，能够像这样思考问题的同志，屈指数来又有多少？革命，除了枪炮，就没有别样的手段了吗？如果只有枪炮，会不会继续为民贼所利用，作历代王朝更迭的又一次循环？新世纪的科学，对于新世纪的革命具有何种意义？难道就不能够把近代科学的启蒙宣传同民族革命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吗？“栽培芳草绿，原上看离离。”草字头，革命党，要经怎样的“栽培”，才能有一派蓬勃的生机啊！……

时间来到了结业时刻。

自从沈颀民走后，许寿裳、韩永康移居高师，厉家福独处神田，刘迺弼也即将离院就学速成政法科，往日的朋友都陆续星散了。周树人怀着无比寂寞的心情，开始重新选择道路。按照最初派遣留学的规划，周树人和另外的南京组同学，毕业后理应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东京帝大是日本最著名的学校，一些日本学生惟恐中国留学生占去他们的名额，暗中极力加以阻挠。一天，由于颁发的毕业证书印有“清国人”三个字，周树人同一群留学生气愤地议论开来。事情让日语教师江口知道了，出来劝说道：“大家要有远见，不要为几个字发脾气，要懂得控制自己。”为了免使竞争失败，他劝周树人等人改入医校，并作了这样的介绍：当时，日本的医学已经赶上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水平；而且，医校发展状况良好，可以在各个方面给留学生做出较好的安排。

江口说：“贵国科技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你们学成归国，将大大的有销路。”

周树人笑道：“先生在教我们做生意呢！”

江口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日后会明白，我江口不会叫你们上当的。”

周树人果然报名学医了。

对于南京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因为清公使监督的意旨究竟可以违抗。于是，续习路矿的风气为之一变，大家纷纷按照自己的志愿改选他科。

但是，周树人的决定，并不像江口所说那样是为了避免竞争，虽然人与人之间的挤轧使他感到厌倦。至于学成以后，可以待价而沽，这种市侩式的态度同样为他所不齿。是从翻译的历史书上，知道了日本明治维新大半发端于现代医学的事实，才激起一个崇尚科学的青年的热忱。他认为，最崇高的职业，就是最有效地驱使自己进入民族的事业。他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欣慰，因为他确信，通过医学的道路，可以打破国民的迷信思想，增进他们对于科学的信仰。每当想起父亲，他都会有一种负疚的心情。当初跑药店，寻药引，实际上是充当了庸医的助手，他希望能够有一天偿还这笔精神上的债务。而且中医，是怎样随意地拿生命开玩笑呵！仅仅为了自己的一副坏牙齿，试“验方”，看中医，始终无法收拾。记得去年拖一条假辫返国，在杭州特意看了一回，结果还得把病苦带到长崎。想不到的是，在长崎花了两元医费和一个小时，让牙医给刮去“齿垢”，便顿告痊愈了。还有像母亲一样的缠足妇女，恐怕除了西医的外科手术，再也无法免除那畸形的痛苦。当战争呼啸而来，或许自己还可以当军医，亲手把各种残损的肢体重组合为活跃的生命，让他们奇迹般地一次又一次奔向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疆场。在一生中间，要是帮助过许许多多不幸的和勇敢的人们战胜困苦和死亡，这也就够了……

日本的等级制度很严。它规定，大学的医学部要官立高等学校毕业的人才许入学，中学毕业程度的，则只许进入专门学校。本来，离东京不远的千叶市，有一所规模不小的医专，设备相当完善，只是已经有了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便决意回避了。不知为什么，每想到周围那些留学的同胞，就感到讨厌。那么，还是到偏僻的仙台去吧！

是出于命运的强制呢？还是出于性格的抗拒？如果没有记错，这该是第二次逃避同类了。

临行时，他把珍藏的《离骚》作为纪念礼物，赠与许寿裳。这赠品，颇使许寿裳感到困惑：什么意思呢？

《离骚》……

## 22. 仙台·现代医学·从灵魂到躯壳

日本北方的森林城镇——仙台，以不寻常的热情，迎接了这位远客。

地方报纸从7月份开始，几个月内陆续报道有关周树人入学的消息。为了造成明朗的印象，有时候还添上一点虚拟性的描写，比如说“因找不到做中国菜的公寓而大感困惑”，或者说“是个操着流畅的日语而异常活泼的人物”，等等。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于5月下旬接到清国公使杨枢关于周树人希望入学的照会，几天以后，便做出准许免试入学的答复；9月1日，正式向个人发出有关批准入学和免除学费的“指令”。对于接受这样一名没有先例的志愿者，学校的应对是十分敏捷的。

可是，周树人的反应却是相当的淡漠。

占据他的深情的，仍然是迢迢的故国，和个人通往故国的未来的进程。他知道，自己不是旅行者，离开东京并非为了作一次轻松愉快的郊游；但也不是交际家，无须乎关心异乡人的脸色和内心气候。作为科学道路上的探索者，而今，他要像熟悉地质和矿产一样重新熟悉人：具体的人，物质的人，那各式各样的灵魂所赖以寄存的躯壳。探索是寂寞的。他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在缴纳学费的当晚，他把免收的钱买了一只怀表。从此，除了香烟，又多了一个友伴。寂寞时就掏将出来，看看指针无休止的跋行，或者贴近耳边，听听那亲切如叮咛般的滴答声……

9月30日早晨，由庶务科文书田总助次郎陪同着走进教室，说一声：“这是从中国来的学生！”新的学习生活就算开始了。

四号教室。第六课时。随着上课的铃声，进来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厚嘴唇，戴着眼镜，挟一叠大大小小的书放在讲台上。开始，他使用了缓慢而抑扬的声调自我介绍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排座位有几个人嗤嗤笑起来了。他接着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展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关于这门学问的著作，在强调解剖学作为医科基础学的重要性时，他模拟汉语的文言句法，照样用那般独特的腔调说：“解剖分脏之事，为初学者进入医学之门户，乃须臾不可分离者也……”于是，嗤嗤的笑声又从后面响了起来。

发笑的原来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因此熟知校内的掌故；课后，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关于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马虎了，有时竟会忘记打领结，冬天则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地，致使有一回在火车上被疑心是扒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藤野的名字便已不被正式地称为“严九郎”；在学生中间，流传着音近“权九郎”的叫法，或者叫“权先生”。“权”者，假也。有时候就干脆叫他“老权”。他们取笑他，却又怕他。正如名字严九郎一样，无论教学和办事，他都是少有的严格。首先，他打分就很严，一年级留级的大半是因为解剖学不及格。对于留级生和不够认真的学生尤其严厉，他屡次恶作剧似的提出问题，搞得他们十分窘迫。上课的时候，他会马上把门关闭，使迟到的学生再也进不来。

刚刚升作教授的藤野，显得那么自负。奇怪的是，眼前的这位中国学生，竟使他莫名其妙地敬重起来。或许，他小时候跟野坂先生学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非常崇敬，随后也就把这种敬意推而广之地移到每个中国人的身上。他的目光那么敏锐，从周树人苍白的脸色和沉稳的举止中，早已觉察出了那内心的寂寞。他发现周树人听课非常吃力，便想：课上的笔记该也不会做得好的……

一个星期过后。

周末。藤野的助手叫走了周树人。

在研究室里，藤野正低头查抄着什么。听到进来的声音，他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抬头问道：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

“可以抄一点。”

“拿给我看！”

墙壁四周放置着各种人骨，还有独立的头骨；中央是达摩式火炉，无声的，于冷肃中生着温暖。

周树人不晓得先生的用意，心里想：该不会是找什么岔子吧？但也无法，只好迟疑着把所抄的讲义交了出去。

才过了两天，讲义便发还了。先生说，此后每个星期，都要送给他看一回。周树人接过手里，连忙打开来看：讲义从头到尾，都已经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加以订正——呵，原来如此！他伸出指头，摩挲着红笔画过的地方，心里同时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不久，藤野又把他叫到研究室里去，从他的笔记本上翻出一个图来，和蔼地指示说：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个位置了。自然，这么一移，的确比较好看了一点，但是你要明白：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怎样的形状就怎样画，我们根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改正过来了，以后，你要完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周树人口头答应着，心里却说：“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

但是，无论如何，藤野先生的特殊好感是无可怀疑的。他关心着中国学生的各个方面，从住宿、饮食、会话，直到笔记。笔记，尤其是重要的东西。此时的仙台医专，仍然没有教科书，参考书很难弄到，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是轻易可以借阅的。学生要完整地掌握老师讲授的内容，必须倚赖笔记。在同学中间，就常常有求让和出售笔记的事情。因此，藤野在这方面给予一个闯入者的关照，引起日本学生的普遍嫉妒也是必然的。

对周树人个人来说，这种难得的关怀，反倒成了沉重的负担。在日本，不管是东京的樱花还是松岛的风景，都未曾构成春天的印象；惟有接触了藤野，才真正领受到异地的温暖。也许，在先生看来，自己该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学生，而是整个的中国，整个的科学事业而寄予期望的深情的。要是这样，自己承受得起吗？每当翻看到笔记本中那

血一般殷红的笔迹时，他都会立刻感到这种精神的重压。对于伟大无私的奉献，感激之情是何等浅薄！他甚至觉得，在学习中，哪怕产生任何一种停顿的意识都是不可原宥的。

一年级的主要课程，是由藤野和敷波两名教授担任的解剖学理论，每周八至九小时，占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一；其他副科：组织学理论、化学、物理、德语、伦理学及体操等，占全课时的三分之二。除了伦理学和体操，其他各科都需要机械的记忆；特别是敷波教授，经常用拉丁文和德文讲骨骼名称，背记起来就更感困难了。人不是机器，可是从早上7时开始，就必须按照学校规定的课程进行运转，直到午后2时。阅读政治、哲学和文学书籍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几乎没有思索的机会，连早经动手的《世界史》和《物理新铨》的翻译工作也不得不终止下来。

探索者/岛国的热血与星光人间鲁迅（上）周树人开始感到，整个学校的体制都像是专意敌视自己似的。然而，当他意识到这种厌恶心理时，却不禁惶惑起来：为什么总是跟自己作对呢？这不正是对自己选定的理想道路的背叛吗？……

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同学们常常同军人混杂在一起，在东一番丁，尤其是艺妓街一带游逛。周树人没有这份心绪，只有借课间的闲暇，到医专的樱小路校门对面的一个叫“晚翠轩”的牛奶铺里去，一边喝牛奶，吃粗点心，一边看各种官报和报纸，算是最好的休息。如果说，这个憩园仍然通过报纸把他同现实结合起来的话，那么，另一个憩园就使他离得稍远一点，可以沐浴古风，沉浸于“社戏”的记忆和乡思的柔波里了。

原来在东一番丁的北口附近，有一个“森德座”大剧场。周树人是常常买了便宜的站座票，在这儿观看新派剧和传统的歌舞伎表演的。但不管在“晚翠轩”还是“森德座”，他都是只有影子为伴的。同学们朝他打招呼，他就点头，偶尔才递一个微笑；有时候，同学仿佛发现了他的颇自珍惜的寂寞，也便不加打破，只互相低语道：

“哦，周来了呀。”

人，总不堪寂寞。

周树人开始想念东京，想念东京不多的几位朋友，想念《浙江潮》。一个未曾忘怀于政治的人，一旦离开了一种关系，一种氛围，那

是多么悲惨！记得途经一个驿站，就怕见“日暮里”三字，当时想起《离骚》里的“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的句子，不知怎的，竟生起一种被放逐的感觉。而今，心中的郁闷是愈加浓郁了，即使遇到仁爱的先生，难道就是可以言说的吗？周围都是日本同学，虽然时有来访，无奈总是格格不入；探访的殷勤，有时甚至会被他目为无聊浅薄而感憎厌。同胞是有的，就是第二高等学校里的施霖。他学的工兵火药，好像从来没有过沉潜于读书和思索的欲望，总是幻想着立刻创造一个以血火涤荡世界的场面来。可以想见，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语言，即使两个人差不多同时到来，而且一直同住到现在。什么叫距离？当灵魂不相靠近，即使四周是密集的人群，也当如置身在一片荒寒的原野。

一天，周树人突然收到任克任从东京寄来的两本书：林纾与魏易合译的《黑奴吁天录》和手抄本《释天》。任克任经常为《浙江潮》撰稿，发表过《苦英雄逸史——普鲁士亚皇后路易设》和《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同是终日忧思的人物。朋友的盛意使他感激。早在来仙台之前，他就一直搜求《吁天录》，一旦到手，便一口气读完了黑人老仆的悲惨一生。

掩卷时，楼下的人声已歇，不绝于耳的是飧蚊的飞鸣，和广濑川从窗外传来的哗哗的喧响……

这是一家离监狱不远的公寓——佐藤宅。从田中宅搬过来已经大半个月了，今夜，是特别的惹人愁思。莫非是一代奴隶的命运搅得他无法安静？把灯灭了，躺下来，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起来很晚，他感到有点晕眩，便干脆不到学校去，往额间扎上条毛巾，盘膝坐下，给蒋抑之写起信来。

蒋抑之是一位结识不久的朋友，虽然出身商家，却很有头脑，而且慷慨仗义，大有古代侠士的遗风。记得来前，自己填写入学申请书和学业履历书，一时颇惶遽于“清国留学生周树人”这样几个字，被他看见了，立刻主动代章。其实，他又何尝没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呢？……

蘸了紫色墨水，树人援笔写道：拜启者：前尝由江户奉一书，想经察入。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二十天大雨，固然令人阴郁；而一朝放晴，又不免空虚而寂寥。

——好大的水呵！好深的天空！广濑川都快漫上崖岸了！他发呆似的望着格子窗：故乡不会有这样的雨，这样疯狂的雨，摧人心魄的雨。故乡的雨是霏霏的，温柔的，梦一般似的……

## 23. 悲壮的间奏曲

东京是可怀念的。

留学生潮水般涌向东京，到了1905年，已经激增到八千多人。自费生特别多，他们比官费生少受羁勒，因此具有更加强烈的反叛意识。虽然对具体的武器和道路的选择，会有不少人陷于迷误，但是，即使是一时的鼓噪，对于革命形势的形成还是有利的。

这是一群可怕的人物。先后成立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其领袖和中坚分子大都产生在留学生中间。8月，孙中山联合这三个团体，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他们创办机关刊物《民报》，积极宣传推翻满清，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的主张。像这样一个以西方的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要颠覆的不只是一个皇朝，而是整个盘根错节的古老制度。濒临覆灭的恐怖，使清朝统治者必须倾聚成倍的仇恨和力量，扼杀留学生运动。他们试图借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掌抵挡这股新生的造反势力。

在晚翠轩，周树人每天密切注视着日俄战争和共和革命的动向；以少许的通信，在仙台和东京之间作感情的洄游，保持着一个革命青年应有的恒温。每到假期，就回到东京来，同朋友一起畅快地呼吸；然后，带着最新的信息，再自个儿回到北地森林里慢慢地琢磨。

应了陈子英的邀约，他丢下功课，一同前往横滨迎接徐锡麟、龚宝铨、范爱农等一行新来留学的同乡。来去匆匆。当他赶返仙台，一场更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已经在东京发生了。

11月1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一共十九条，从翌年开始实行。规程对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生的限制非常严格，其中有一些伸缩性很强的文字，比如第九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飭令退学之学生”，什么叫“性行不良”？是泛指堕落的学生，还是特指革命的学生呢？分明是设置陷阱，意在抓捕留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和危险分子。这是不能接受的。任何旨在阻遏中

国革命的企图，都必须加以痛击，不管它是来自日本政府，本国政府，抑或来自它们共同缔结的神圣同盟。

自费生率先发起反对运动，他们串联了各校的留学生，分别召开大会，发表抗议演说。12月4日，弘文学院学生向各校发出关于集体罢课的公开信，八所学校立即起来响应。次日，三百名留学生聚集在富士见楼，开会商议具体的行动计划。会议发表严正声明，坚决反对文部省的命令，并制订了《学生自治规则》。规则呼吁各学校一齐罢课，针锋相对提出，以铁腕对付敢于破坏罢课的学生。6日清早，各校门前随即出现了纠察员，他们身佩左轮手枪和短刀，执行集体的使命。为爱国心所感召，7日，京都的留学生开赴东京，汇合到斗争的大波中去。

周树人接到弘文学院的罢课通知，但是，他没有做出响应的表示。

对于日本方面的态度，他并不缺少愤慨。重要的是，在他那奔涌的热血中，渗透着一种具有强大聚合力的物质——思想。他觉得，作为抗议，集体罢课不失为临时性的措施；但是，罢课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因被逼迫而主动放弃的是一个机会，一个吸收科学文化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并不是祖国的广大同胞可以轻易获得的。如果仅凭一时的冲动，那么，将可能失去一切。他仿佛有点悲哀地意识到，在同学的积极活动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广的消极的文化背景。在此以前，虽然他不时地为功课的挤压而苦恼，今天，却毕竟坚持着赶完最后一门课程。

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不断高涨。一天早晨，在大森海湾的波涛里，突然浮起一具三十岁左右的男尸。

这是湖南学生陈天华。他曾经以雄文《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激动过千万国人的心；在斗争中，同秋瑾、宋教仁等激进派人物站到一起，力主留学生集体归国。但是，意见并没有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也不肯出面负责组织。这个热血男儿，固然不能忍受日本报纸对于同胞的所谓“放纵卑劣”的污蔑，更不能容忍大家的软弱与涣散，便决心拿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撞响警世的洪钟。7日夜间，他写好长达三千余言的绝命书，于凌晨投入邮箱；然后，带着一纸挂号收条，几枚铜币，一个悲壮而茫漠的希望，就这样自杀了。

几乎所有的日本报纸，都刊载了这个消息。

——死亡！又一种方式的死亡！这种死亡并非来自躯体内部组织的衰败，而是来自外部的无形的暴杀。周树人，一个医专的二年级学生在苦苦思索：这个无形的东西到底属于什么？灵魂？个人的灵魂还是国民的灵魂？社会？来自哪一个国度？日本还是中国？这仅仅是现实中的偶然呢，还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种方式实行自我完结？这是生命的一次勇敢的呈示，还是懦弱根性的暴露？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如果说这是无谓的牺牲，那么，留学生运动的真正出路在哪里？民族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激烈得快也消沉得快，坚实的人往往属于沉默者。正当东京留学生发扬踔厉的时刻，周树人仍然辗转思索在痛苦之中。

12月下旬，他趁假期回到了东京。

生命与血，显然比文字更逼真，更生动，更富于鼓动力。陈天华之死把留学生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这时候，归国人数激增，连盛极一时的弘文学院，也不得不关闭麹町、真岛、猿乐町的分校了。

在第一艘归国船刚刚开行之后，许寿裳等群起组织了“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主张忍辱负重，反对放弃学业。从此，留学生分成归国和复课两派，展开了日趋激烈的笔战。每天，留学生会馆都有纠集在一起的人群，张贴海报，甚至互相辩论。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斗争，开始转化为内部的大纷争。

在浙江同乡会的一次集会上，同样发生了两派的争执。

身穿男服的女校学生秋瑾率先发表演说，敦促同胞归国。胡道南等她说完，站起来表示异议。她便从靴筒里拔出倭刀，往讲台“咚”地一插，喝道：

“如果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周树人始终没有说话。

对于秋瑾，作为一个年轻母亲，能够冲破家庭的束缚而远游求学，无论如何是可佩服的；而且，在留学生运动中，她确实体现了为传统的中国妇女所缺乏的勇气。但是，为什么一定得放弃官费条件而贸然归

国？归国以后又将怎样行动？依靠谁来组织这样的行动？中国中国，中国一片荒寒，期待的只是饱满的种子。如果未及成熟便急于播种，谁能预料，到底会生长些什么？……

会后，他掏出一元钱，作为捐款交给了“维持会”。他知道，奉献非常菲薄，但也总算是反对冒进的一点象征性表示吧。

## 24. 幻灯事件

在东京的同学胜利复课的时候，周树人已经回到了仙台。

令人不解的是，这位主张复课的学生，竟常常无端地旷课，甚至连每天做笔记的那份热情也渐渐淡薄了。可以肯定，有一样什么东西在暗中骚扰着他。

开始的第二学年，课程作了调整。一些副科没有了，增加了解剖学和组织学的实习课，还有细菌学等与医学密切相关的新科目。担任细菌学的中川教授，是个喜爱时髦的有产者。他买了一部十分珍贵的德国生产的幻灯器，进行视觉教育。当时，市内各处，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纷纷上映，幻灯器和玻璃画已经广泛流行。学校放映时事幻灯是受到文部省奖励的，因此，在以幻灯授课，显示细菌形态的同时，也会放映一些风景或是战争的片子。

三号阶梯教室。遮光幕低垂着。

当有关细菌的显像告一段落，中川便放新到的战争片，而且亲自担任解说。燃烧的战地，城门，马匹，敢死队，纵横的尸体，一一从暗中摇过去。接着是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中国人对上着刺刀的枪口，据说他做了俄国的侦探，结果被日本军队捕获，要枪毙了。站在周围观赏的是一大群中国同胞，没有愤怒，也没有哀伤，一个个木然无所表示。

正在这时候，周树人的耳边轰然响起一阵掌声和欢呼：

“万岁！”……

静静的青叶山。

没有人迹，没有鸟喧，只有寒风不安的迫促的呼吸。积叶塞满道

路。众多的树木惟留灰褐的颜色，向天空，纵横写着一月，写着季节的交替，那可能的结局或起始。

周树人满山乱闯，放声悲歌……

他从来没有这样歌唱过。胸口实在太难受了。除了歌声，还有什么可以消释，可以让自己遁失于一片混茫之中呢？最后，他终于靠着一棵杉树半躺了下来。当他把菱形制帽摘下，无意间看见镶嵌着一个“医”字的帽徽时，才仿佛顿然发现了自己，发现了深山密林中一头受伤的野兽。

——中国人呵！你作为人类的价值何在？难道只是为了充当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吗？一个小小的仙台，备受战争、贫困、饥饿、失业、税收和各种不幸的折磨，已经是千疮百孔、奄奄待毙，可是，只要从中国战场上传来了捷报，就会由于胜利的刺激而立刻变得亢奋、强健、充满生气！这里的报纸，甚至广告，都在嘲笑中国人，称作“愚昧之民”，甚至“动物”，认为“只有日本才能教育这些愚蠢的人，使其成为优良的人类”。有一回上街，就有日本人拦住自己问：“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读书做什么？”一年多以来，不可逃避地，遭遇过仙台市民多少回庆祝战争的活动，看过多少回彩旗和烟花，听过多少回鞭炮、钟鼓和狂热的喧嚣呵……

有一件特别令他愤懑的事情，创痛真太深了，至今想起来也要全身发抖。

那是去年秋天，第二学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天，年级里的学生会干事来到他的公寓，说是借他的笔记看看。哪里知道，将笔记找了出来，这位干事只是翻检了一下就还给他了，并没有带走。他感到非常纳闷。

不久，邮差送来一封厚厚的匿名信，拆开一看，第一句话就是：“你改悔吧！”

这是《圣经·新约》里的句子。前些时，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反对日俄战争，曾经在分别写给日本天皇和俄国沙皇的信中使用过的。匿名信的内容是说：上学年解剖学的试题，一定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让他预先知道了，所以能有那样的成绩。中国是弱国，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永远只能是低能儿，分数在中等以上，当然不是自己的能力

所能企及的了！……

读了这封信，他才想起发生在几天以前的另一件事情。因为要召开全年级学生会议，又是那个学生干事，在黑板上出示通知，最后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在“漏”字下面特地加了一个表示着重的圆圈。那时候看了只觉得好笑；现在才明白，原来是影射藤野先生给自己“漏”了试题的。

紧接着，流言也起来了。这流言自然要比衍太太当年散播的更难忍受。可是，而今还能逃走吗？到处是异国的土地。他隐忍着，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还是那副沉静的样子。虽然有几个熟悉他的同学很不平，曾经一同诘责过干事借故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将检查结果公布出来。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浑浊与澄清都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流言是慢慢地平复了，痂痕却不易脱落，每碰到轻微的摩擦都要暗暗地流血，更何况这般沉重的打击呢！……

正直的杉，虬屈的松，低低地悬浮着的天空……

——中国人！呵，怎样的中国人呢？为了对“国民性”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他曾经追索过人的灵魂的有无。在实验室，亲自解剖了好几具尸体：矽肺的矿工、花柳病患者、痲妇、婴孩……那女人和孩子曾经使自己何等地惶栗不安呵！结果，灵魂的存在与否还是一个疑案。读达尔文、海克尔，探究人类发生学；读爱智之士的著作，设法进入其杳杳冥冥的抽象空间，结果还是疑案。可笑。灵魂是什么呢？就是那么一点精神吗？如果没有灵魂，只是一具活动的躯壳，还算什么人类的生命？去年翻译《造人术》，自己还颇为那寂寞的教授人工地制造出生命而感到鼓舞，其实那生命，不就是一具躯壳吗？当时，是那般地醉心于医学，仿佛携一把手术刀返国，就可以拯救同胞，拯救人类。多么可笑呵。国民是如此昏醉，不懂得反省，更不懂得反抗。一部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就酷肖地画出了中国人的灵魂。刺刀。枪口。侦探。看客看客看客。噢，让茁壮的躯壳配一具孱弱的灵魂，这就是医学的用途！……

他长呼了一口气，抓过帽，把它按到一旁，然后略微欹侧着身子，背风划亮洋火，点燃一根百合牌香烟。烟缕被风吹得纷乱，火星一闪一闪，就像一个隐约的启示。

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情，他想，灵魂毕竟重于躯壳。这时候，父亲鼓胀的腹部，母亲的小脚，小妹，小弟，红蝙蝠与小姑母，蟋蟀，药

店与当铺，担架，绷带与血……在眼前迅忽出现又迅忽消失；另外一队人群，开始进入他的视野：斯巴达人，芳娣，茶花女，撒克逊遗民，吁天黑奴……生活在文学世界中的人物的命运，那淌流的泪水和激溅的鲜血，再一次猛烈地袭击着他的心！

当文字以一种征服的力量重新召唤着他的时候，他突然在叠印的书报中间发现了自己的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他梦一般凝视着那上面熟悉的殷红的笔迹，痛苦地慢慢闭上了眼睛……

一周，一周，时间在骚乱中过去了。

是深沉的夜。

客舍的人们都已经睡去，只有周树人和月亮在悄悄徘徊。池水幽幽地，不显一点波纹，庭院中的杉木和青冈栎发出细碎的萧飒的声响。

一个思想成熟了。到了告别解剖刀的时刻。既然改造国民性是整个民族事业的根本，为什么不可以有别种的解剖刀，痛切中国的社会和病态的灵魂呢？火与剑，能够荡涤所有的官邸、街道和乡村，但是能够延及看不见的荒野吗？而且，已经有那么多的志士仁人从事着流血的革命，就让自己进入国民精神深处，去进行一场不流血却也一样持久而艰难的抗争吧！……

当他停驻脚步，池塘中的月亮，也就沉静得如同一个等待了。

没有什么会比文学更富于魅力。但是，重要的还不只是找到了把握世界的新的方式。随着思考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的位移，他的文学观也便相应地从梁启超的影响中剥离开来，而同时表现出对某种独特的审美理想的追求。从头选择的个人道路的起点，已经决定了他未来的文学事业是这样一场定向爆破：他主要是一个进攻型的作家。爱隐于憎，热藏于冷，他的文学的良心，搏跳于凌厉的枪刺背后；他必须正对叫啸的子弹、暗堡和熊熊的火光……

多么好的月光呵。没有国界的月光。总是喜欢做梦，抱着梦幻而来，而今又要抱着梦幻归去了。

仙台，一个由官厅、学校和军队构成的城镇，的确给过他许多创痛，遽然离去，却未免有点怅然。依恋不仅仅是月光的。由于藤野先生

几次三番地劝阻，从佐藤屋搬来不觉又一年了。这中间，难得领受过主人宫川夫妇的温情，还有这池子，这树，这小井，甚至是平时难以下咽的芋梗汤。结束了。走了。怎样对藤野先生说呢？要是让他知道，该会多么失望呵！藤野成了他告别仙台的惟一的一个感情的死结。但是，先生的寄托，不是都可以包容在未来的事业里吗？方位虽然不同，目标还是一个：为了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进步，自己并没有背叛先生呵。当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解脱的理由，全身不禁顿时轻松多了。

第二天，他便去找藤野。

来到研究室的门前，他踌躇了好一会，到底敲响了堇色的小门。

“有什么事情么？”让进屋内，藤野发现他的学生并没有携带笔记本。

“先生，我不再学医了，”周树人低低地说，“我想离开仙台。”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先生的脸色变得很有点悲哀，嘴唇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话，但什么也没有说。

周树人见了，心里非常难受。为了忠实于一种感情，必须学会说谎。他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恐怕对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藤野叹息道。

还能说什么呢？

难堪的沉默。周树人赶紧告辞了。

周树人要离开仙台的信息，不知怎的，被经常同他接触的几位同学知道了。于是，铃木、杉村、山崎，再叫了青木，一同找到了他。当消息获得证实以后，四个人便邀同他一起，到米团店里吃了甜食，然后到照相馆里去。拍照的时候，同学们都把周树人推到前排，他却执意要站到后排的边上。他不想做中心人物。大家以为，反正他没有确定行期，

总还有开送别会的时候；而且都知道他素性执拗，也就依了他。

过了几天，藤野把他叫到家里去，交给他一张照片，后面写着两个字：“惜别。”并且说，希望也能得到他的一张照片。

周树人很歉疚。除了东京那一回，平时并不喜欢单独上相馆，因此也就无法奉赠了。

“那么，将来照了再寄吧，”藤野叮嘱道，“只是不要忘了写信，我很想知道你以后的情况呢。”

就这样分别了。永恒的分别。

此后，周树人并没有承诺给藤野寄照片，也没有去过一封信。他想，在先生的千百学生中间，自己不过是因国籍不同而显得特别一点罢了。其实，就医学的功课来说，自己的成绩并不算怎么优异的。他认为，先生应该完全地忘掉他。由于照片和信件的提示，而得时时干扰先生，伤及先生的情绪，又何必呢？要说报答，在自己，默默地奋斗去，倒是实在的。

周树人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历来重视文字，间又轻蔑若此。不过，感情这东西似乎也怪，形诸文字就是没有诉诸心灵那般长久而美丽。

3月底，同学们发觉周树人一连几天没有上课，这才明白，他已经走了。至于什么时候走了，谁也不知道。

## 25. 婚姻：第二次妥协

从医学到文学，由于迅速填补了理想事业的真空，所以离开仙台未曾给周树人带来更多的精神上的创伤。

回到东京以后，他的情绪已经变得相当饱满。在汤岛的“伏见馆”公寓找了一个房间住下，便马上投入了庞大的文学计划的开发工作。房间只有四席半大小，点的油灯，气闷而阴暗。可新来的主人似乎并不介意，那具干燥的灵魂，也许早已习惯于贫乏的物质环境了。学校是不进的，没有哪一所学校可以安顿酷爱自由的文学；而且，他再也不愿意有任何的规则来束缚自己。为了继续取得官费，他把学籍挂在东京独逸语学会所设立的德语学校里，无论白天晚上，都一例独自沉湎于文学世界

当中。那时候，他同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刚刚出版，虽然是科学著作，而文字的墨香毕竟新鲜得诱人。正是一个试翼奋飞的时刻，突然，他又一次陷落到人生的大网里了。

6月。他接连收到母亲的来信，说是病重，催促他立即返国。什么病呢？一个字也没说。他把信揉了又扯开，扯开又揉了，生气，烦躁，夹杂着隐隐的不安。接着是失眠。不到一个月，家里又打来了电报。他不得不动身回国了。

——挂红结彩！

一进家门，他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发际，沉重得有如一击，不禁立刻感觉到一阵晕眩……果然……不可能……果然……面前站着两个人：一个自己，一个陌生的女人……女人……女人……

从仙台返回不久，有一次，周树人同许寿裳一起去逛公园，途中碰到一个日本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背着一个小孩，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孩，拖泥带水地走着。周树人马上跑过去，替那妇女把手中的小孩抱了过来。也许被哪一位同乡的留学生看见了，事情便演变成了这样一种流言：周树人同日本女人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他常常携带儿子在东京街头散步呢。

消息很快传到新台门，鲁瑞非常惊骇。她不能不考虑：儿子已经是订了婚的人，人家老大姑娘也等得苦了，况且这门婚事是本家亲戚介绍来的，怎么好负心呢？于是只得称病，一边准备笼头，一边等儿子归来。

新娘姓朱名安，母家长辈常常称她“安姑”或是“安姑娘”。她出生在绍兴城内丁家弄里，是周树人的叔祖母蓝太太的一位内侄孙女。朱宅当时有两幢三进屋宇，除了书房以外，还有池子和花园，有的房舍还是用三道石销墙筑成的，这在当时的绍兴城里也算得上是殷富之家了。

最先提起这门亲事的，是蓝太太的大儿媳谦少奶奶。她善于言辞，又能干，在新台门里颇有点《红楼梦》里的“凤辣子”之风；只是治家没有什么方法，得经常借债度日，因此对不幸的鲁瑞相当同情。周树人的四弟死后，为了慰藉鲁瑞，谦少奶奶不时地隔墙呼话，问长问短，或者帮忙做些杂事。时间稍长，远房妯娌之间也便变得亲密起来，以致终于有了议亲的机会。

朱安并不漂亮，额头分明地凸出，狭长的脸上，长着一个略显肥硕的鼻子。短小身材，配一套宽大的衣服，加上一双被缠裹得很尖的小脚，看上去的确缺乏一种匀称协调的感觉。但是，即使漂亮又如何呢？一个陌生的女人。周树人是研究过灵魂和躯壳的。

一切都按照古老的婚仪进行。

结婚的当天，周树人默默地不说一句话，顺从地按照司仪的说话做去，没有半点反抗的表示。这是所有的长辈始料不及的。

他装着假辫，头戴红缨大帽，身穿着纱套的长袍，脚登高底靴子；朱安穿的红纱单衫，下着黑色绸裙，都是一副古装打扮。在新台门的神堂上，他们双双拜了堂，然后像木偶人一样被人扶着，簇拥着，踏着地上铺着象征传宗接代的袋皮上了楼。

一群看热闹的妇女悄悄议论开来：拜堂的时候，男的掉了靴子，女的掉了花鞋；这样的坏兆头，很难保他们将来能凑合着过日子……

楼上，陪人已经走了。树人仍旧一声不响，端坐在床沿，脸上异常阴郁。

灯灭了。身边多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将要陪伴自己走尽一生的女人……幽暗中，他极力睁大眼睛；不知怎的，泪水竟沿着鬓角，不断地爬将下来……

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呢？谁叫你这般的优柔寡断？平时，总是诅咒中国人的忍耐与顺从，而你自己呢？分明知道婚姻问题远在你所要考虑的范围之外，上次探家时，当母亲提起这亲事，你为什么不加反对？母亲说：“那姑娘性情好，懂规矩，我见过的，相信我的眼力不会错。”这样，你便以为她真的喜欢吗？还是仅仅为了完成作为父母必得完成的大事情呢？她会不会为此感到满足？是啊，母亲太不幸了。母亲的眼睛永远是那么慈爱而忧郁。她可以为她的孩子们牺牲一切，而你，就不能为母亲做出必要的牺牲吗？为了掩盖内心的痛苦和不安的预感，你开始用新法子麻痹自己，把关于个人的考虑看得那么卑琐，而尽可能地回到那些似乎与己无关的漫无边际的理念世界里去。可是，人毕竟是具体的人。你不但属于民族和时代，而且属于自己，至少属于母亲，你能够逃避纯个人的现实问题的追逐吗？结果当假满来到东京，母亲的信也就同时追过来了，她要立刻把订婚的事情决定下来。那时候，你清楚

地看到，事实已经逼近。作为最后的挣扎，你只好向女方提出两个条件：一、必须进学堂；二、必须放脚。后来呢？什么也没有实行。你也便不再过问了，不敢过问了，不愿过问了。其实，你是一个十分脆弱的人！自我麻痹，也未始没有一点效用，那时候你想：时间还远着呢，何必自寻烦恼？况且，处此动荡的时代，既然以身许国，就说不定哪一天把躯壳也扔掉，何须计较那些附加的偶然物呢？如果母亲真的愿意，你也就由她去吧.....

时候到了。一点也没有准备。双人床成了现实。周树人不时地辗转反侧，仿佛要极力挣脱身边那线陌生而柔韧的呼吸的绞缠.....

都是悲剧里的角色！也许早在订婚的那天开始，她就忠实地，把意识到的生命全部付与未来的男人了。可她根本不知道，她的男人自始至终都在抗拒她。呵，此刻她也该知道了吧？她一定也很痛苦的，不，无尽的守望将会比绝望更痛苦。你以为既是母亲的礼物，就可以照样把她还给母亲，可问题是，她也是人，她不仅仅属于母亲.....难道你也要别人陪着你作一世的牺牲吗？那么，你又陪着哪个作牺牲呢？.....他用手捂住脸，黑幽幽的，指缝和手掌一样的黑幽幽.....

黑夜在窗外奔驰。心在窗内奔驰。百草园，三味书屋，南京，仙台，东京。无羁勒的生活是远了！.....

.....丘比特是何其荒唐呵！脱手一箭，就给人带来了一生长长的酷刑！可是，是谁布下了这场酷刑的？母亲？亲人？还是中国人说的命运？你至今也是一个参与者！不容得你否认！许久以来，你就一直站在此岸，浪潮滚滚，你不敢泅渡！在你的身上，淤积了太多的传统意识，既清醒又麻痹，既不满又顺从，既进取又停顿，你矛盾重重！你无法摆脱！要改造国民性，首先从你开始！.....

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那是何等重要又何等艰难的工作呵！他突然想到要返回东京了。家，无数次归梦萦回的家，已经不复是自己的归宿地。没有了退路，就让你一直向前走吧！走得更决绝一些！更勇猛一些！丧失了家庭幸福，而今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但可不要把正待开拓的事业一同葬送掉！.....

走吧！

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二弟作人。对了，必须把他带走！现在需要

的只能是事业上的伴侣。他决定了。不必留恋，也不必悔恨，既然我已不属于自己，不属于她，也一样不完全地属于母亲……

头额那么沉重。楼顶好像有点微微发白。天要亮了。他突然害怕起白昼来，那裸露的光，将会再次向他证实为他所不愿意接触的一切。

下得楼来，鲁瑞和工人都惊异地发现他眼泡浮肿，脸色靛青。从那被泪湿的枕巾染过的脸色推断，他该是哭了整整一个夜晚。

母亲的心，跟着沉重起来了。

远在孩子学开矿的时候，就曾经提过一次亲。那是自家小兄弟的长女阿琴，人很聪慧，认字不少，能看深奥的医书。只是听阿长她们说成亲要“犯冲”的，便不再提起了。阿琴出嫁后不久染病死去，临终时，对服侍她的母亲说：“我有一桩心事，在我临死前非说出来不可。从前周家提过亲，不知为什么后来忽然不提了？只这一件事是我的终身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听到这个消息，自己只觉得负罪一样难受。可是怎么会想到，这一回，竟也麻麻糊糊地给孩子添了这样的大烦恼呢？……

当天，周树人就把假辫给扯了，只留光头配一件大衫。按照老例，结婚的次日是要拜祠堂的，而他哪里也没去，只在已经修葺和未曾修葺过的屋子里来回走动，偶尔想一点祖父和父亲犹在时的往事。晚上独自睡进书房，任谁也无法劝转。

他是一匹野马，套上笼头，仍然向往于奔驰。待作人从南京回来，便相偕着一起往日本去了。

在家的时间只有四天。

返回东京，许寿裳非常惊讶，问：“豫才，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母亲娶媳妇。”

“哦，不是来信说病了吗？”

树人无语。

许寿裳听懂了那沉默中的一切。他望着面前的这位目光幽郁的神经质的朋友，不禁深深地怜悯起来。记得周树人平时赤足，老爱盯住自己

的脚背，自语道：“我的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

## 26. 后死者的先驱道路

世界未曾注意到他们，而他们却在注视着世界。

周树人除了一段短时间去学校学德语外，仍旧躲起来自修。作人也懒得上学，于是兄弟俩便有了足够的时间，在一间孤悬的小屋里，阅读和纵谈地带开阔的世界文学。

这时候，周树人特别喜欢买德文书。专卖德文书的书店只有南江堂一家；郁文堂和南阳堂都是卖英文的；至于要买日文书，则有相模书屋，不过他同该书屋的主人很熟，可以凭借在旧书摊里买的文学杂志的出版消息，一本一本的开了账，托他向丸善书店订购，然后从欧洲远远地寄来。当时，树人拟购的德文书目就有一百二十七种。开发计划确实庞大得惊人。

在广泛的浏览中间，他侧重于文学史知识的积累，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的吸收。为了买一套德文本的《世界文学史》，他花了十元的大价钱；此外，还函购了英文本的《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等。对于德国古典文学，他几乎完全没有兴趣，歌德的著作一本也不买，海涅倒是他所热爱的，集子便有四册。即使是作为“敲门砖”也罢，他也并不想通过德国的语言去叩缪斯的大门，而是要打开地狱，试图结识那许许多多匍匐和挣扎在黑暗之中的异族的同类。匈牙利、芬兰、保加利亚、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这些置身于殖民主义的铁掌之下的各民族文学，都是他所关心的。还有俄国，虽然是独立强国，由于政治专制，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也便成了阅读的重点对象，并且准备下一步着力介绍。他珍爱这些书籍。有一次在书摊上用一角钱买到裴多菲的惟一的小说《绞吏之绳》，高兴得就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尽管这个薄薄的小册子铁丝锈烂，书页已散。还有菲律宾革命家列扎尔的日译本小说《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总想找一个英译本对照译出。

战时流行起来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树人的心灵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当他刚刚做出弃医从文的决定，这位以文学理想闻名于世的俄国作家，其对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的评价，便使他抱有一种知己之

感。托尔斯泰伯爵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抨击专制的沙皇政权，揭露贵族社会的腐化堕落，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反对以人类为敌的一切战争。他认为，专制、奴役和歧视，乃是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罪恶，是对人类之爱的最大的亵渎。他怀着人道主义的伟大的同情心，成了农民的保护人。他不但表达了农民对于土地，对于人类的基本权利的要求，而且直接反映了农民的淳朴、善良、热情和无畏的精神，而这卑贱的一群正是为高贵的沙龙作家不屑一顾的。周树人几乎读过托尔斯泰所有的日译本，他从那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中吸取有益的材料，构筑自己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观和文学观。他只是不满于“勿抗恶”的道德说教，那种只知爱人而不知自爱的过分的宽容与卑顺；虽然，作为一个思想者，他也一样倾向于精神力量的崇拜，但始终不能接受伯爵对宗教的无条件的皈依。

托尔斯泰的思想缺陷，恰恰可以从尼采那儿得到弥补。直到这时候，周树人仍然喜欢尼采，喜欢他的传记，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达尔文强调的是客观环境对生物进化的影响，而尼采则把人的主观因素同客观世界对立起来，以为正是人类的生命意志的扩张，才获得了不同于自然界生物的发展。他的“超人”学说，尤其为周树人所倾倒。什么是“超人”？在查拉图斯特拉口中，就是道德的破坏者，偶像的破坏者，一切传统价值的破坏者。“超人”学说充满着一种反叛、独立、进取的精神，对于一个立志于思想批判的中国青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个“超人”，在他看来，人是尚未成熟的东西，是原料，是需要琢磨的难看的石头。“但是，”他说，“我热烈的创造意志永远驱使我重新做人；它这样的驱使锤子敲打石块”；“现在，我向着它的囚徒，无情地舞动我的锤子！”说得多么好啊！多么精警，多么有力量呵！中国国民不就像尼采笔下那沉睡的顽石吗？让你也以决斗的方式进入社会，挥动铁锤，猛力砸碎它的牢笼吧！整个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这样一首孤独的赞歌，它不但带着德国哲学的思辨色彩，而且带着作家个人的浓烈的感情色彩和魅人的诗性色彩。周树人真的被它迷住了，甚至因为它而引起对德国文化的兴趣，以致一度产生过留学德国的念头。

不久，兄弟俩搬出了伏见馆。

这次迁居，是由“法豪事件”引起的。周围下宿的多半是岩仓铁道学校的学生，虽然树人鄙视他们志趣低下，但因为他们整天上学，归来也还用功，所以一时也还能够和平共处。自从第五、六号房间来了几个江西汉子，平静的局面便被打破了。他们大抵不去上课，留在家里却是经

常地高谈阔论，放声狂笑。一位绰号“法豪”的尤其放肆，醒时固然大叫大嚷，睡时也是鼾声大作，如同猪叫。他的记性特别坏，房门分明写着号数，也经常走错；冲进别人的房里去，愕然退出，也从来不打一个招呼。这群汉子似乎对洗澡特别感兴趣，每逢澡堂烧了热水，“法豪”便不等下女的通知，径自先钻进去。树人平常并不怎么热心于理发和沐浴，平常住在没有洗澡设备的下宿处，往往三四个月也难得洗浴一次，但是这回却因为“法豪”的缘故，浴室竟成了足以影响他的注意力的地方。他本来就受不了别人的刺激，但是又无力改变环境，只好在踌躇一番之后悄悄撤退了。

新居是在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

中越馆坐北朝南，一共两层楼房。房东老太婆同她的小女儿住在门口，两边的两大间包给周氏兄弟，住在楼上的，是有名的《汉声》杂志的编辑但焘。

这地方左右没有邻居，倒是相当清静。不过，房饭钱却很贵，而吃食又极坏。有一种叫“素天鹅肉”的圆豆腐，要是中间加点素菜也还可口的，老太婆只用盐水煮熟，简直如嚼枯柴；而且三日两天地给吃，弄得这对穷兄弟实在没有法子，不得不花钱买一点罐头咸牛肉来补充。

老太婆贪钱，却又很守旧礼，每当走进房里拿水壶、洋灯之类，总是屈着身子，爬也似的走路。那小女儿富子，是一个很懂事很勤快的小学生，放学回来常常帮忙着干活。她晚上睡得早，到了10点钟左右，老太婆总是硬要把她叫醒，例行教训一通：“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本来，小姑娘是已经睡熟了的。这使兄弟俩都感到十分憎厌。

树人没有什么日本朋友，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才结识了宫崎寅藏和堺利彦。

这次来日，途经南京的时候，作人的朋友孙竹丹，托他给留日的一位亲戚带去一件羊皮背心、一个紫砂茶壶，交宫崎收转。作人初到日本，地理不熟，语言不通，只得由树人代送。

宫崎原名虎藏，自号“白浪庵滔天”，是日本著名的“大陆浪人”。他一向同情中国的反清革命，曾经加入兴中会，1900年帮助孙中山革命失败回国。两年后出版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不久译成中文，在反清革命

派中很有影响。周树人对这位革命志士是敬仰的，加上他为人坦率，豪放不羁，因此，两人初次见面便谈得相当投契。

过了两天，宫崎又约了周树人在麴町区的“平民新闻社”会面，并且把当时号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三巨头之一，《平民新闻》的主笔堺利彦介绍给他相识。

那时候，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只是一群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青年中影响较大的幸德秋水、大杉荣等人致力于无政府主义的“直接行动”，而堺利彦则比较侧重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思想体系的宣传。周树人同他们便谈得很好，但由于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文学方面，因此谈话不可能深入下去。他买过一套他们出版的刊物《社会主义研究》，一共六册，其中有一册是《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不过，他也只不过把这类书刊当作西方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而加以浏览，并未曾给予特别的注意。此后，他同日本的这两位革命家再没有什么往来了。

比起伏见馆，这里的交通比较方便，于是，来访的同学朋友渐渐多了起来。

周树人是不去访友的，只等着他们来谈。这段时间，或许是他最自由散漫的日子了。早上起得很迟，大约在十点以后，醒来伏在枕上先吸上一两支“敷岛”牌香烟。盥洗完毕，不再吃点心，看一会儿新闻，便用午饭。不管饭菜怎么坏，至今全不计较，吃完拉倒。朋友们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大抵下午来谈。假如没有客人，等到差不多的时候，穿上和服，或随便蹩了双木屐，就到“书店街”里去看旧书，不管有钱没钱，总买上一二册德文的旧杂志挟着归来。

夜晚是完整的。矮桌上的洋油灯，同静静地站在角落里的景泰蓝花瓶看得最清楚：这位穿和服、长须发的青年表现出了怎样的一副拼搏状态。四周都已沉沉睡去，惟有他和书醒着，只是疾驰的精神没有响声。他要到什么时候睡觉，谁也不大晓得。到了第二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才会发现盆内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

过多的客人是一种负担。无论是散漫的闲聊，或是空洞的宏论，都是周树人所要回避却又无法回避的。往日的政治热情，此刻都交付给了文学事业。搞文学，从来就不是群体性行动，而是中世纪作坊式的独立操作。因此，他愿意把自己关进夜晚，关进房间。寂寞总比热闹好。可

是，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很难有人可以拒绝政治的单独访问，何况他本来就没有背对政治，只不过埋首于一个在他看来比政治更为切实的目标而已。

一天，政治敲门了。

早上起来，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发自中国的电讯：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学生们震惊了好一阵，随即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该是怎样的三个字；接着纷纷预测他将怎样地被处以极刑，家族又将怎样地株连受罪.....

树人心情十分沉重。他早已明白，这人就是徐锡麟。

一个精悍的青年就这样突然完结了！头戴一个小顶子，留一条细辫子，完全是一副遗少打扮，谁想得到，他会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呢？因为进不了日本的陆军学校，他听了陶成章的话，回国后，出钱找人替自己在安徽捐了个候补道。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便同陈浚一起合谋刺杀恩铭。他死时，是在安庆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的。

隔了几天，女侠秋瑾在绍兴遇害的消息也传过来了。她死的地方，是树人最熟悉的轩亭口。

皖案和浙案相继发生，再度点燃了日本留学生运动的引信。有几个人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筹集川资，把日本浪人请来。那浪人撕乌贼下酒，喝个半醉之后，便领命前往中国接徐锡麟的家属。接着，绍兴同乡会召开追悼大会，并且就善后事宜进行了讨论。

仇恨笼罩了整个会场。

当讨论到发电报的时候，会议分成两派。以蒋观云为首的一派，极力主张同清朝政府接触。要求文明处理，保证以后不再随使用刑。主张“排满”的反对派认为，既然革命，必得双方开火，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争论到激烈处，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蹲在席子上，仰起脑壳，拖长了声调说：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周树人觉得有点面熟，一打听，原来是徐锡麟的学生，自己曾到横

滨迎接过的同乡范爱农。本来，自己也都并不主张发电的，可是，对于范爱农的这种漠然超然的态度，不免有点反感，心里想：究竟是先生，怎么连这么一点感情也没有？……

蒋观云站起来说：“我看电报非发不可——猪被杀也要叫几声，何况人呢！？”

话说得慷慨而得体。其实，他这时已经掉头倒向立宪派一边，正在同康梁诸人组织“政闻社”，预备妥协了。所以，他才竭力主张发电报，以争取一个同政府对话的机会。

幕后的一切，都未必是周树人所知道的，但是他早已发觉这位长辈蜕变的端倪。

前不久，他同许寿裳再度拜访蒋观云。谈到服装问题时，蒋观云认为，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接着指着自己头上的西式礼帽说：“这倒是无甚威仪的。”辞出以后，周树人就说：“观云的思想变了。”日后，他给蒋观云起了一个绰号——“无威仪”，便也不再登门造访了。

听了蒋观云的“猪叫论”，周树人随即反驳道：“猪才只好叫叫，人可不能这样就算了的！”

争论结果，主张发电的到底占了大多数。

中国的有为之士，往往越到后来，越是趋向保守和消极。像蒋观云，以前写的不少诗文都很富于革命热情的，那首送陶成章归国的著名的五律，周树人至今犹能成诵：“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今天的表演就未免太拙劣了，于是一种滑稽之感油然而生。周树人据此仿作了打油诗一首，把蒋作的颈联翻成这样两句：“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日本浪人找不到联系人，在一个鸦片馆里混了两晚就回到东京来了。吊烈士，骂满洲之类的会议的余烈，也都日复一日地平淡下去。

徐锡麟和秋瑾，都是周树人所熟悉的；当他们成为新闻的中心人物而重新引起他的注意时，早已电光石火般迅速消失了。从“安庆事件”开始，他就每天翻查报纸，追索着时态的发展，结果希望成为了泡影。他

们的生命和事业，与其说结束于清政府的屠刀之下，毋宁说是结束于国民的一片淡漠之中。归国后，他们致力于培训干部，组织军队，筹备起义，无疑要比陈天华的行动更为积极，可是，事情一定要这般进行吗？国民沉醉若此，作为少数的先觉者，为什么要这般浪掷生命呢？……

他感到深深的寂寞。

但是，寂寞者也未尝不可以战斗的，只是战斗被改换为别种方式而已。周树人就是这样的寂寞者，作为后死者，他愿意把自己消磨在思想启蒙的漫长而无止境的工作之中。这时候，除了阅读，就是加紧进行着早已开始了的译述工作——有一个秘密计划在暗暗催促着他。

于极度紧张之中，他仿佛尝试到了一种复仇的快意。

## 27. 《新生》运动,杂志的流产与实力的转移

早在回国完婚之前，周树人就有了一个创办文学刊物的计划。要搞文学运动，必须拥有自己的杂志，这样才能获得一种号召力，把目标较为切近的人们纠集在一起，组成一支改造世界的联军。至于自己是否具备那种领袖资格，却从来未曾考虑过。他注重的只是实绩。原来拟定的首批撰稿人，除了自己，还有许寿裳、袁文蕤、陈师曾、苏曼殊几位；现在，加进二弟作人，战斗力显然将更加强旺。令人头痛的是资本问题。恰好袁文蕤答应垫付，这样，杂志的组织工作便相当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关于刊名，周树人原想从他所喜欢的《离骚》里摘取个别词句，叫做《赫戏》或者《上征》，因为不通俗，后来才改作但丁《神曲》中的篇名：《新生》；并且全盘西化，在封面上用了拉丁文拼写出来。“文艺复兴”的英译，也正好是“新生”的意思。对于发端于意大利的产生了系列巨人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他的确是无限神往的，于是也就希冀着，能够通过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在东方掀起一个同样性质的文化运动，把人性解放的口号写进战斗的旗帜。

筹办《新生》的消息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大家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有人嘲笑说：“莫不是县试录取的新生吧？！”亏得周树人生性孤傲，善于缄守。有一次胡仁源来访，谈起来也说：“你弄文学做什么呢，文学有什么用处？”他只冷冷回答了一句：“学文科的人懂得学理工

科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

他知道，对于志趣不同的人，是完全用不着解释的。

正当他躲在房间里，暗暗地为刊物催生的时候，又有一群豪勇之士闯进他的世界。

徐锡麟和秋瑾先后蒙难以后，陶成章、龚宝铨、陈子英、陶望潮一行随即流亡日本。这时，光复会的总部也从国内迁到了东京，并改选了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陶成章一到日本，马上到中越馆里来看望周树人。

流亡者朋友的到来不是没有益处的，至少能使他更加逼近革命的氛围，而保持血流的灼热。他特别敬重陶成章。这位革命的实干家，脚穿草鞋，腰系草绳，深入浙东一带乡村，往往一天跑上八九十里的路程；吃食也不讲究，给他一碗咸菜，也会当作粉条般喝下去。龚宝铨那种义无反顾的气概，也是周树人所敬重的。他们来了总是坐在大间里，那儿放着炭盆，盆上搁一把茶壶，一边喝茶一边高声说话。说话最多要数陶成章。他开口就大谈其中国的革命形势，说某地不久就可以“动”起来了；否则便讲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情况，口说指画，历历如在目前。但是，周树人同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因此，在谈心或是讨论时，常常争辩起来，有时候还十分激烈，要许寿裳站出来从中调解。

但是，这种激烈的论辩，丝毫没有损害他们之间的友情。每每风暴才过，周树人又给他们倒水沏茶了；天色晚了就留他们吃饭，只要抽斗里有钱，还得特意买上罐头牛肉之类来添菜。

树人笃实的性格和镇定的态度，博得了他们的信赖。陶成章为了躲避日本警察的注意，曾把光复会的会章、票布等机密文件，临时委托树人兄弟保存，直到险期过后一段时间才拿走。

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意见往往很难统一。既然各执己见，那么也就尽管让各人驱驰于自己所选定的道路罢。

早在作人留日之前，袁文蕤就转往英国留学去了，原说去后仍然寄稿来的，结果杳如黄鹤，连个讯息也没有。苏曼殊颓废得可以，一旦有钱马上喝酒花光，没了就到寺庙里去老老实实地呆着，根本生不出心思

弄文艺。接着，资本也逃光了，剩下的只有不名一文的三个人。梦是好的，而幻灭之来，又是何其迅忽呵！

一切都准备好了。封面准备好了，插图准备好了，作人的文稿也先自送来并且由自己给誉清了。稿纸也定印好了的，而且足够使用相当长的日子。那从英国出版的《瓦支画集》中几番挑选出来做插图的《希望》，寓意是那么深刻：一个诗人，包了眼睛，抱着竖琴跪在地球上。呵，希望是什么？难道希望的只是黑暗，只是黑暗中那不复鸣厄的弦歌吗？还选了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画的骷髅塔和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处决的画，准备留作后几期杂志的封面。但是，如今统统都成了废纸，一切都完了！

一个人的主张，得到赞和，是促其前进的；遭到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世人中间，而四围并无反响，那才真的是一种无从措手的悲哀……

《新生》计划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的悲剧。现在，已经不复是严复的时代了。对于一个愚昧落后的民族，本来是需要一段相当时间的思想启蒙的，但是，大量的矛盾和深刻的危机已经不容许太久的等待，革命未经充分酝酿就顷刻间燃烧了起来。人们迫切期待的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因此，一切停留在意识形态的东西，势必要被革命潮流的哗声所淹没。

作为少数的先觉者被误会被冷落的悲剧，其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并没有能够为周树人所体认。直到革命的高潮过去以后若干年，他才知道在革命高扬的时候是没有文学的。这时，他只能从自己的身上寻找失败的因由，确认自己决非什么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那类英雄。正因为世界未曾令他失望，于是，他也就一面积聚力量一面等待时机，决心以更加扎实的努力去进行补偿。失败是必然的，可是，失败未必是永远的。

事情有了意外的转机。

一天，周作人的安徽朋友孙竹丹来访。他是特意为《河南》杂志拉稿子的。那时候，《浙江潮》等一批鼓吹革命的杂志已经相继停刊，《河南》的出现特别引人注目。它是最近由河南留学同乡会创办的，总编辑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

刘师培的名字是树人所熟知的。他那时在东京专替夫人何震出名，

创办破天荒的女性无政府主义杂志《天义报》。树人就曾嘱咐过二弟，把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中有关虚无主义部分节译出来，登在杂志上。

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东方国家产生相当巨大的影响。在日本，结合着日俄战争，形成一种特殊的国民心态，致使俄国的著作空前流行起来。此间，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不断乘虚而入。中国不少革命派领袖接受了这股思潮的影响，他们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一致主张武装暴动，大力鼓吹个人暗杀的恐怖手段。

从来敌视权力者，主张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周树人，自然要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他崇拜最早提倡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德国的施蒂纳，把这个宣称“我是国家的死敌”，高呼“夺取权力，自由就会到来”的人，看做同尼采一样的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他固然反对寡头政治，但也反对假借民族和人民名义实行专制独裁的“众治”形式，他不能容忍任何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权力意志。然而，他又反对暗杀行为。在他看来，不只因个别消灭无补于大局，徒然导致革命干部的无谓牺牲和损失，而且，暗杀本身就是有悖于人道的，它将促使国民劣根性得以恶劣发展。他自己就不肯参加这类恐怖行动。只要听到炸弹的轰响，并连带想及那些实际工作者可能惨死的境遇，就焦躁不堪。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无政府主义同恐怖行为区别开来，才做了翻译克鲁泡特金的建议。由于他认为思想的价值大于政治手段的作用，以及人道主义对他的整个灵魂的支配，使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极端分子，但是，无政府主义显然蛊惑过他的情绪，而且，还渗透到他的文字之中。

接到约稿的消息，周树人彻夜难眠。关于《河南》、《豫报》的出版预告介绍说，它的主旨在于：“排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情况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一支新的火炬。他想像着丢失了的阵地再度从眼前展开，虽然没有整个地为自己所把握，但毕竟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作战的位置。于是，一种报复的情绪牢牢地抓住了他。他决意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扔出自己的思想，那全部的仇恨、愤怒与悲哀。

——时候到了！应该到了！让所有沉睡的人们都在先觉者的叫喊声中醒来，在梦魇中醒来！把全新的观念，科学的观念，自由民主的观念交给他们，让他们正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那些闻新声而疾走的顽固派，那些钩爪锯牙，竞言武事的兽性“爱国者”，那些倡言制造商估的实业救国分子，那些主张立宪国会的奔走干进之徒，把他们暴露出来！把

历久的弊病和偏枯的危险都暴露出来！把所有这一切都交给20世纪的新精神去涤荡！今日中国，可怕的未必尽是来自正统的力量，习惯的力量，虽然我们还要为此承担足够的牺牲；更可怕的是随着海禁的开放，诸种事物无不物质化的趋向。古老的东西，混杂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大潮中间，而可能淹没了新党！……

的确，科学是彻照世界的神圣之光。但是它决不囿于物质，机械，任何外部的技术手段；它是一种背景，一种氛围，一种无所不包的精神现象。在反对蒙昧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虚科学！科学是人的科学，决不能让人所创造的科学反过来支配人和奴役人。人是根本，人是中心，人是目的。是人的行为构成了社会现实，因此救国必先救人，立国必先立人。人的命运是不能随意摆布的。人的思想，人的言论行动，应当享有至高无上的自由。要使国人的内心都有着理想之光，要使整个社会提供充分的条件解放和发展人的个性。如果遭到拒绝，就实行个人精神的反叛，不但反叛强权者，而且反叛多数和一致！其实，所有的旧俗弊习，民贼独夫，都往往把众数当做自身的屏障。中国，从来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看的国家。不是奴隶，就是奴才。我们应当建设一个理想的“人国”！

可是，在古文明的重压之下，同胞精神沦丧，茫不思起，即使“维新”二十年，而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何在？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国外，向那儿寻求人类之骄子；援进他们的雄声，作为民族的先导……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以他们的“天赋人权”论，成为大革命风暴的旗帜。同中国最早一批激进的革命家一样，周树人，正是从它的辉煌之下取得较为完整的民主思想的。他把这一思想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奠定了世界观的基础。从改造国民性出发，他一面扬弃，一面吸收着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一代先驱者如谭嗣同、严复、邹容等宣传的仁爱、自由、平等的思想，还有当时《民报》，特别是章太炎的具有民粹色彩的理论，乃至政治上的反对派梁启超的文学观，从而熔铸为具有自己特色的反对强权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战斗武器。

1907年，他以“令飞”、“迅行”为笔名，写下系列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

与1903年相比，这个时期的论文已经大大超出爱国反帝和进化论的范围，不但表现出“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的更为激进的色彩，

而且显示了对政治、哲学、美学各个方面在更高层次上所作的理论探索的重大成就。其中，关于人的哲学阐述，关于现代文明的价值判断，关于科学与美育并重的思想，以及关于文艺以“不用之用”干预政治的观点，应当视作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

《摩罗诗力说》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的专论，其着重论列的八位反抗和行动的“恶魔派”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等，乃是作者向“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国民提供的理想人类的实例。全文纵观古今，环视中外，充满着作为启蒙战士的明澈的理性与号召的激情，不但是一个文学运动的纲领，而且是一篇人性解放的宣言。

重视人的自身建构问题，成了这个时期系列论文的基本主题。在《摩罗诗力说》中，周树人正是从文学可以“撷人心”、“移神质”这一与人的本质相关联的意义出发，重视和提倡文艺运动的。

稍后，他发表的又一篇论文《文化偏至论》，则从比文艺更为开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论述了一切为了人的解放这个根本原则。他回顾了西欧19世纪至20世纪的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评价路德宗教改革，以及首见于英，继起于美，复则大起于法兰西的资产阶级革命，把其中对于近代文明的积极性影响归结为“非物质”和“重个人”两个方面，从而进一步提出建立“人国”的主张：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术既往，相度方来，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对于“人国”的构想，是周树人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长期思考的结果。由于他把从根本上变革现实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因此，有关“人国”的阐述就不仅仅属于理念世界，而是包含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重要经验教训，同样属于实践中的问题。正是这个时候，他才开始从几年前对于祖国的热烈的讴歌，而转为民族的严肃的自我批判。他不能不以批判的形式担负起思想启蒙的任务。凡启蒙主义者，都重视科学的宣传，都把人性解放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比起西欧的思想家，他的锋芒所向，主要不在神权而在政权，是愚民专制。他们都注重“人”本体，但西欧的思想家主要宣扬的是个人主义、爱情至上、享乐主义的“自爱”原则，而他则主要强调思想自由，一个个人与社会解放的相切点。在战斗

中，西欧的思想家体现着“自我”扩张的精神与乐观向上的态度，而他则表现为个人的积极反抗，常常流露出他的孤傲气质，内心广漠的沉郁与悲哀。

《摩罗诗力说》的最后一段是：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文化偏至论》则是这样结束的：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沈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在对于“人”的抽象的议论之后，一样回归到中国的现实；在对于“人”的热情的呼唤之后，一样回归到“吾人”的内省。这两段话在结构上的雷同是很有意味的，它以“复调”显示了作者在这一时期内的思想定向。

在人类认识史上，人的解放问题，还是一个很年轻的课题。它最先以人本主义的方式，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提出来，但是，他们心目中的“人”不过是“自然的人”而已。此后，经由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德国的“哲学同时代人”的努力探求，“人”便明显地带上了理性的色彩，然而逻辑的论证本来就并不可靠，况且人在现实中还要受到异己力量的强大的阻挠。而周树人的“人论”，其指向明显带有主观批判性质；但当历史条件远远没有成熟的时候，最富于人性的理想也只能流于空想。周树人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性的，因此，他在批判中构筑自己的“太阳城”的同时，也就不能不以所感到者为寂寞。

在人们中间，只有周作人和许寿裳能够理解他的寂寞。

那时候，作人曾同他一起翻译过《裴彖飞诗论》，还用“独应”的笔名，在《河南》发表了两篇文章：《论文学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以及《哀弦篇》。“独应”，就是单独响应，表示着对长兄的声援。接受周树人的命意与催促，许寿裳也写了长文《兴国精神之史曜》，以欧洲各国复兴的史实，说明国民精神改造的重要性。笔名“旒其”，取俄文“民众”的译音，是树人给起的。他们的论文与树人的论文构成的一个火力网，从不同的方面系统评介西方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共同发挥着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作用。

使树人感到自慰的也正是这一点：在精神界的荒漠上，毕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战斗者同盟。

## 28. “伍舍”时代

天色晦暗，大雪纷飞。

1908年4月8日，周树人兄弟按照事先约定的日期，同许寿裳、钱钧甫、朱谋宣五个人一起，搬进了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7号新居。人数凑齐以后，便在靠近铁门的电灯上高悬了一块牌子，署名“伍舍”。

当时，许寿裳已经从东京高师毕业，计划一面跟从章太炎学习国文，一面进修德文，预备再往欧洲留学，结果选择这样一个雅静的环境。为了一统天下，临时去拉朋友。本来，树人在中越馆算是住得舒服的，只是被那老太婆作弄得苦，于是也就应允搬家了。

西片町是有名的学者住宅区，拐弯出去，便可以看见东京帝大的红色大门，有成群的方帽子进进出出。周围一带的商店和电车，几乎为这些方帽子而设。方帽子越是破旧，年级越高，越是能显示他们的资格。出身于名牌大学，动辄以资格示人，这等人物是周树人历来讨厌的。幸好有庭园，有花草，有使心灵摆脱俗物羁绊的地方。他发动其余的几位，一同开辟隙地，种植绿色的生命。在众多花草中，最可爱的要数名叫朝颜的牵牛花，变种很多，能够奇迹般呈现它的色彩和形状。每近黄昏，浇罢水，朦胧中便有多思的丝缕缭绕着上升，使他回复到迷于花草的单纯的少年时代，在寂寞与惆怅中间品尝出一种淡淡的甜蜜来。

赏花的闲情不多，多的是紧张的工作。“伍舍”原是夏目漱石的旧居。对于当时为自然主义所充斥的日本文坛，周树人毫无兴趣，但却喜欢夏目漱石，读过他的名作《我是猫》。当《虞美人草》在报上连载后，也都认真地找来分章读完。夏目漱石，本名金之助，改名漱石，乃取中国小说《世说新语》中“枕流以洗耳，漱石以磨牙”的意思，表示自己的节操。他生在古名江户的东京，故被人称为“江户佬”，在日语中有性格顽强的意思。由于他从小接触不少汉文典籍，对中国人一直抱有好感，这在日本人中是并不多见的。留学英国期间，他对欧洲社会作过深刻的观察，因此并不满足于当时举国上下崇拜西方的空气。为了批判日本的国民精神，批判文学界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他致力于介绍和翻译尼采及其作品，试图以尼采式的进取精神，改造大和民族的灵魂。夏目的著作想像丰富，机智幽默，轻快洒脱，文笔精美。他以喜剧的手法描写社会和人生的悲剧，这特有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色彩，尤其博得周树人的好感。如今生活在这位被日本人尊为“伟大的人生教师”所生活过的地方，

不免经常悬想着他那奋笔疾书的情景。这种历史性的巧合，加强了周树人的文学意识，而使理想中的事业更加逼近。

在南向的六席小间里，并排立着两张矮桌，有如两匹并辔的战马，载负着兄弟俩在纸面上日夜奔驰。树人除了译述，还为许寿裳主编的一套《支那经济全书》做校对工作，以此赚取部分费用。官费本来有限，“伍舍”时期自然更加拮据。这座日本绅士的私邸，租金实在太贵了。

陶成章和龚宝铨一样是“伍舍”的常客。一天，龚宝铨来访，手里拿着两本书，一本是德国德意生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卷首有他的岳父章太炎手书的“邬波尼沙陀”五个字；一本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宝铨对树人说，太炎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问他们兄弟俩是否乐意承担。树人表示没有兴趣。他认为，这些宗教典籍虽然有助于对人类思想历史的了解，但于国民性的改造却未必是有所裨益的。

相反，作人觉得很有意思，只是译事太难，便回答说待看了再定。事后，他跑到丸善书店，买了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子参照阅读，最后告诉章太炎说，可以翻译这部奥义书。

不知为什么，到了后来，作人变得相当懒散：既不译文学，也不译吠檀多。这使树人非常焦急，可是一再催促，仍然没有结果。

一天，树人突然暴怒起来，半句话也不说，挥起拳头就打。袭击太突然了，甚至连树人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作人头部一连“咚咚”地被猛击了几下，刚待举手回击，许寿裳赶来了。

作人把头垂下，几乎没有什么抗辩。树人转身退向窗沿，也没有更多的言词可以表示不满或懊悔；兀立的背影，只有肩膀作着不易觉察的微微的震颤……

雷阵雨顷刻成为过去。不久，兄弟俩同时成了章太炎的私淑弟子。

对于章太炎，周树人仰慕已久。特别是几年前，他主持《民报》期间所写的与康梁派论战的文字，就以其压倒的革命气概及博大精深的学识征服过自己。作为革命家，孙中山的声望并不下于章太炎，且因为善于宣传，当时就有“孙大炮”之称。但是，周树人对轰轰烈烈的实行家历来不甚佩服，倒是敬重那些既具有献身精神又深于学问和长于思考的

人。而在革命派中，像章太炎这样的学问家是罕有其匹的。虽然他热心宗教，过于泥古，征引和考证的繁琐都多少显露了思想的混杂与迂执，然而，对于精神因素的高度重视，提倡依靠“自心”，增进道德，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批判，都因为与自己的探索处于同一方向，故一直为周树人所推崇。

自从在神田的古成中学听过章太炎的课，周树人便冀望着能有继续听讲的机会。论动机，实在不止在于文字学本身。就像在中越馆时，响应了陶望潮的建议，和同许寿裳、陈子英等六人，一度向亡命日本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玛利亚·孔特学习俄文一样，本意仍是出于对俄国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的向往。无论如何，精神自由的需求是第一位的。

由于太炎先生在国学讲习会的上课时间与正常的学科时间相冲突，周树人和许寿裳便托请龚宝铨转达这样的意愿：希望太炎先生在《民报》社旧址另外开设一班，于每星期日的上午，专门为他们讲授《说文》和《尔雅》。

意想不到的，太炎先生竟立即答允了。

讲授是在一所极其简陋的房间里进行的。师生环绕着一张矮小的桌子，席地而坐。据说先生是一个性情暴烈的人，可是在学生面前，却是极其和善而随便。他留着一撮鲶鱼胡子，笑嘻嘻地说话，活像庙里的哈喇菩萨。要是鼻涕流了下来，他就用袖角擦抹，一点也不在意；讲课讲得热了，干脆脱去外衣，光着膀子，只留一件长背心。他讲的课，也像平日穿着举止一样洒脱而风趣。按照中国文字的结构特点，他逐字往下讲解，或沿用旧说，或发挥新义，任何材料被他运用起来都不会显得枯燥。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风土人情，传闻轶事，几乎都涉猎到了。特别是一些借训诂引来的妙语，间发如珠，常常引起一阵又一阵哄笑……

讲课从清早8时开始，一直到正午，四个钟头内没有休息。可是，不管是主讲的，还是听讲的，一点倦意也没有。

同班一共八个人，“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是周氏兄弟，还有许寿裳和钱家治，其余四位：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是从大成转来听讲的。在他们中间，钱玄同说话最多，而且经常在席上爬来爬去。周树人即兴给他一个诨名，就叫“爬来爬去”。而他自己是极少发言的，为此，钱玄同便回赠了一个颇为传神的绰号曰：“猫头鹰。”

在《说文》之后，又听讲《庄子》和《楚辞》。周树人听课极其认真，课后，总是从龚宝铨那里借来笔记，详细核对和补充自己记下的内容。正当他倾心于西方文学的时候，由于太炎先生的指导，才在偶然的回顾中，发现了祖国文化的某种魅力。魅力的诱惑，竟至于从此形成一种癖好：行文时，往往投进一些古僻的字眼；恍如流水，因顽石的阻碍，于平静中不时激起漂亮的漩涡。

开班不满一年，章太炎同周树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听讲期间，《民报》被日本政府禁止了。背景自然出于清政府的要求，而借口则是违反出版法，因为出版人由章太炎改换为陶成章，没有向警厅报告，结果不但勒令停刊，而且还要征收一百五十元的罚金。

《民报》虽然是同盟会的机关报，这回罚金却要章太炎个人垫付。他向孙中山索款，却没有一点回音。按照日本法律，被告如逾期不交罚金，便要按一元一天折算，改服劳役。自从刊登了《大乘佛教缘起论》，《民报》销量锐减，报社经济窘迫得不行，根本无法应付罚款。事情只好无望地拖延下去。

到了最后一天，龚宝铨来找周树人商量。想不到树人会那么果断，立刻想出了一个法子，让许寿裳挪用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的部分经费，轻易地解脱了一场危难。

为了这件《民报》案，周树人对同盟会的头面人物增加了不少猜疑与不满。他的确是深爱着他的先生的，无论是在公开或是私下的场合，他都谦恭地表明自己是章氏门下的弟子。此后，当先生日渐颓唐，甚至拉车屁股向后时，他只有感到惋惜；而一旦遭到攻讦，必定挺身而出，为之辩诬，决不让先生蒙受半点污垢。

成熟的人是不需要偶像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周树人一旦发现了先生和真理之间的距离，就会固执地站到真理的一边，从心底里坚持自己。

有一次，太炎先生提问说：“文学的定义怎样？”树人回答道：“文学和科学不同，科学重在启发理性，文学重在增进感情。”先生听了，随即纠正道：“这样的划分办法虽然比前人较胜一筹，可是仍然有失当的地方。比如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又何尝能动人哀乐呢？”

周树人不以为然，但没有反驳，课后对许寿裳说：“我以为先生诠释文学，把范围弄得太宽泛了。其实，文字与文学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江赋》、《海赋》之类，文辞虽然奥博，而它们的文学价值就很难说。”

龚宝铨有一天带来太炎先生的一封信，信中用篆文向周氏兄弟发出热情的邀约：“豫才，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社。麟顿首。十四。”

作人是如约到智度寺里去了，树人却没有去。

对于佛学，包括其他宗教，树人从来没有涉足的欲望。虽然他在年内撰写的《破恶声论》中也曾给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以好评，但也只是把它们看做先民的自由精神而加以肯定。当他一旦认真研读佛经的时候，那已经是陷入另一张苦闷到近乎绝望的大网里了。

冬天，“伍舍”开始解体。

钱钧甫早已对群居感到厌倦，于是同亲戚朱谋宣先后搬走了。余下的三个人，由于无法应付昂贵的租金，只好一同搬出。

那时节，荷池枯干了，菊畦残败了，热闹的蝉声也早已消歇。离别总是教人惆怅的。许寿裳套用了东坡的句子成诗一首，表达一时的眷恋之情：“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壶中好景长追忆，最是朝颜裊露时。”

周树人倒没有什么伤感。因为人首先要能生活，而这段时间，由于经济的压力，他不但要忍痛分割用于文学的精力，而且，连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 29. 盗火者兄弟

波字19号，成了年轻的精神界战士周树人在日本的最后一个据点。

这是顺天堂医院院长的房子。东边一间十席由许寿裳、周作人同住，树人就住进西边六席的小房间。周围很安静，客人也甚少来往，实在是最适宜做事的地方。

年来，树人的工作主要放在翻译方面。早在弘文时代，他就已经着手翻译了，至于文学的译介，严格地说还是始于伏见馆的。不过，开始以后，很快就进入了盛期。这时候，作人已经成了身边的得力的伙伴。由共同的血缘与意向结合起来的人，在同一时空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们酝酿了一个大体的计划，就是着重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支点在北欧和东欧。还有俄国，也在介绍之列，但首先选择的仍是那些与中国现实相切近的作家和作品。像屠格涅夫，虽然为他们所佩服，却没有翻译。至于译法，由于不满于林纾的误译，就都统一为直译。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忠实，决不能丧失原著的文情。翻译，是一场艰难而愉快的历险。他们兄弟俩选定了目标，便分头前进，互相照应，然后胜利地会合。像《红星佚史》，其中的诗，就由作人口译，再由树人笔述下来；树人撰写的《摩罗诗力说》，所引述的波兰诗人的资料，都是由作人据《波兰印象记》口译转述的。从伏见馆，到“伍舍”，到波字19号，作人起草翻译的作品，都经过树人修改誊正。翻译期间，不时地说说笑笑，谈论着作品中的故事，春暖冬寒也就在一种恒温的感觉中过去了。

整个翻译计划与《新生》联系在一起，《新生》夭亡了，陆续翻译出来的东西也便很难找到出路。自然也有成功的，《红星佚史》的出版就很值得欣幸。但是，更多的仍是期待的焦灼和失败的烦恼。

树人是重视翻译的。当二弟翻译，自己作序并且誊抄的厚厚三百张日本皮纸的《劲草》译稿被书店退了回来，恰如一个新兵，初临战阵就被担架送回后方医院，静静卧待黑色的死亡，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遇事每每容易激动，容易焦躁，树人自知这是很不好的，可是没有办法。

凑巧得很，波字19号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他们是蒋抑卮夫妇。

蒋的上代是绍兴人，父亲是开绸缎庄的。本人是个秀才，读过不少古书和讲时务的新书，思想相当开放，为人也仗义慷慨，很有点古代的豪侠之风。1902年自费留学，从此结识周树人和许寿裳，彼此十分投契。可惜耳朵出了什么毛病，不久就回国去了。回国后，除了继承父亲的产业，兼做银行生意，成为浙江兴业银行的一个股东。因为耳疾未除，这回是专程来日本治疗的。

故人重见，是分外的亲切。蒋抑卮夫妇一时找不到房子，树人立即将房间让了出来，请他们暂住；过了好些日子，再托商人在相去不远的

地方找到了住处，这才迁移过去。

蒋抑卮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白天由他的夫人同下女看家，自己便跑到周树人这边来谈天。他们一谈起话来就没完没了。作人在一边旁听，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说话间，蒋抑卮听到译印小说的设想，大为赞同，当即答应垫出资本，促成这件事。他平常有一句口头禅，凡遇到稍有障碍的事，总是说：“只要拨伊铜钱，就行了吧？”因此，树人曾给他起了“拨伊铜钱”的绰号。世界上的事情真不可预料。想不到一个富有头脑的人朝夕思虑而茫无头绪的事情，顷刻间，就叫一个商人给解决了。

几曾幻灭的《新生》的梦想，很快就可以全部地付诸实现。周氏兄弟以惊人的速度工作着。2月，《域外小说集》出版了。

四个月后，续集也已经印竣。在续集的末页，登出陆续出版的篇目预告。信息表明，这对从域外偷盗天火的兄弟，将决心把他们的翻译事业持续下去。

《域外小说集》两册共收作品十六篇，计英、美、法作家各一人一篇，俄国作家四人七篇，波兰作家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两篇，芬兰作家一人一篇。其中大多数是反侵略反压迫反奴役的作品，与日本大量翻译欧美大作家的情况绝不相同。这种选择，体现了周氏兄弟在战略上的一致性的追求。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译笔，使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联系。

周树人的翻译有三篇：安特莱夫的《谩》和《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

《谩》描写一个钟情男子，在发现自己蒙受爱人的欺骗以后，悲痛欲绝，终至疯狂。《默》同样是关于疯人的故事：牧师目睹爱女默然死去，妻子悲恸到哑默，世人冷漠到沉默，以致自己最后也为无声的世界所压倒。人类之爱是高尚的，但也是荏弱的。虚伪、麻木与残忍，千百倍强固于真诚，这的确是国民和人类的不幸。《四日》写的还是疯人，可见出于译者特意的选择，去作主题的反复的奏鸣。它叙述一个身负重伤的士兵，在战地四天的真实见闻和个人感受。因为战争恐怖的刺激，既忧且愤，神守昏乱。原来，树人还打算把安特莱夫的反战小说《红笑》翻译出来编入集内的，这样就可以与《四日》一同构成某种穿刺力，暴露“兽性的爱国心”。

在俄国作家中，周树人特别喜欢安特莱夫和迦尔洵。他喜欢他们作品中的深刻的社会性，对社会病态的揭露，是他们的一贯主题；喜欢他们浸润在文字中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喜欢他们习惯使用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象征手法，他们擅长于心理描写。当人物的灵魂在痛苦地呼号时，他们的心一样在疯狂地战栗；他还喜欢他们作品中的沉郁的格调与幽冷的气氛。他们都是病态的天才，当时的作品，已经透露出了现代主义的气息。

周树人一度倾心于浪漫主义文学，其实，使他感兴趣的，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技法，而是浪漫主义作家们那种旨在把人从政治专制和社会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这一精神首先要求创作主体最大限度地解放自己，从而使作品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独立的思想倾向和独特的感情色彩。因此，他不大喜欢经典的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如果笔下没有那么多不幸的小人物，没有讽刺的热情，没有夸张，没有冷峻的笔触，他连果戈理和契诃夫也要丢开的。

比较起来，他更加靠近现代主义是可能的。现代主义正是从后浪漫主义发展而来，它从一个极端扩大了浪漫主义的主观性，结合病态社会的客观性，从而产生了系列充满怀疑与否定的变形的世界肖像。基于“尊个性而张精神”的要求，作为现代主义的直接的文化渊源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们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都先后为周树人所欣赏。这样，当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刚刚兴起，他就已经在精神上与之相衔接，并且成为它的传播者；像他喜爱而且多次提到的易卜生，勃兰兑斯就称之为80年代的现代派。从周树人的哲学美学倾向，以及个人气质来看，此后创作的第一个小说乃是象征主义小说就不是偶然的了。作为一个文体家，无论是现代题材还是古代题材，他都采用了不少诸如意识流、象征和荒诞手法进行处理；散文诗《野草》更大胆地窥探了潜意识世界，充满着一种阴郁感伤的情调。他博采众家，熔铸自己，凡切合中国国情而又具有批判性质的学说或著作，都能为他所利用。专以文学而言，始而浪漫主义，进而现代主义，而统一于现实主义精神。但也并非直线发展，而是在大体显示出主导倾向的情况下，呈现为一种统一的杂多状态。

周树人对劳动者的热爱和对权力者的仇恨，长期形成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不可能混同于一般的现代主义作家，不可能因为强调“内曜”而反对理性，不可能因为有感于人们的隔膜而仇视人类，不可能因为目睹社会的痼疾而陷于颓废，反对改造和进取。他是一个有为而执著

的追求者，虽或时时分析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却都不会溶化自己的。

两册翻译小说集的装帧非常讲究。封面用的是蓝色的罗纱纸，上方印着长方形图案，绘的是一个弹奏竖琴的古希腊少女，也许是司文艺的女神缪斯吧？下面是请陈师曾书写的“域外小说集”五个篆字，在异国情调中，混合着民族的古朴。版权页不记公历，也不用宣统年号，而以别一种符号标明出版时间：己酉。树人喜欢毛边书，因此，三面保留原貌，不加切削；书页天地留得很宽，没有那种压迫感。书中除了对作者作小传介绍外，对各国人名通例，详加解释，连标点符号的用法，也都一一做出说明。

周树人在序言中写道：异域文求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以，则此虽大涛之微沓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短短一小篇序言，气派多么阔大！对于能够以忠实而古雅的文笔，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弱小民族的现代文学，周树人是相当自负的。他们是第一个。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于5月1日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作了报道。“中国人兄弟俩”，作为青年翻译家的形象，迅速引起国外人士的注意。

书是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寄售的。半年过后，先在东京寄售处结账，总计第一册卖去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再也没有人买了。第一册为什么多卖了一本呢？原来滞销的情况使他们颇感意外，许寿裳怕寄售处不按定价，额外需索，计议之下，便亲自去多买了一本。经过这一回试验，他们已经确知本书的命运了。果然，上海的广兴隆绸庄里，也只卖出二十册左右。更悲惨的是，后来寄售处着了火，存书和纸版也都一同化成灰烬了……

时代需要火光，需要声音，但因此也就需要眼睛，需要耳朵。如果失去了读者，艺术家算什么呢？文学固然可以创造它的读者，但是一代的读者群是可以凭借个人的力量所可创造的吗？女娲抟泥做人尚且容易一点，而读者的创造需要何等漫长的时间！开拓者的命运总是悲惨的，他们的事业开始得太早了！

——二十个！二十个！这个数字是多么的令人寒心呵！

当周树人感觉着寂寞来归的时候，明澈的理性又一次照耀着他：既然允许译者是少数，为什么不允许读者也是少数呢？在这世界上有一个知音就不错了，况且你本来就不是那种天下景从的英雄！……

——二十个！二十个！他不禁深深地感激起那在孤寂的状态下默默支持自己的读者了。这时候，柯罗连科一篇记不清名目的小说，有一段话迷迷糊糊地漂上心头：“……生活依然在那阴沉的两岸之间奔流，可是火光还很遥远。于是还得再使劲划那双桨……可是究竟……究竟前面是——火光！……”

正当他准备奋力向前划行的时候，却不得不放下了双桨。他回国了。

那时候，他二十九岁。

日本是使自己迅速成长起来的地方。惟其已经成长起来，才觉得自己的积累太浅薄了。理想那么宏大，他不能不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于是也就一度产生过转往尼采和海涅的故乡——德国留学的计划。这时，作人同公寓里的姑娘羽太信子恋爱已久，为了帮助还在立教大学读书的二弟结婚，并且也为了对母亲尽到自己作为长子的责任，便打消了留学的念头。他必须做出进一步的牺牲。

七年，从彼岸到此岸，复从此岸到彼岸，往来之间做了些什么？自己的力量还能继续做些什么呢？他坐在客轮上，看浪潮滚滚，遐思无已。在过去和未来的无数镜头的接续与重叠之间，蓦地生出一种身不由己的意念——他的心不禁沉下去了……人间鲁迅（上）

## 四、暴风雨前后

暴风雨很快地到来了又过去了。

作为革命的热情的宣传家，他根本不敢逆料，自己会在革命的凯歌声中被迫溃退。失败使人深刻。从此，辛亥革命以大量的感性材料，进入他的视野，构成为未来的文学创作的反思主题。

### 30. 灰色的教师生涯

现实比预感更可怕。

远离日本就像远离了故土。祖国反而成了陌生的异邦——真是悲剧！理想早已爆出芽冠，而且绽开嫩叶，如今向哪里寻找一片植根的土壤？虽然说道路可以选择，但是当环境变得不可选择的时候，道路已不复是原来的道路了。

4月，许寿裳提前归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教务长。由于他的引荐，周树人便也很快到校。一门生理卫生课，半门植物课，从此开始灰色的教师生涯。

文学成了遥遥的记记。其实，即使写，即使译，又将发表到什么地方？信仰碰在铁壁上，撕裂声响在心里。他根本不相信凭一根教鞭就可以影响国民。但是无路可走。几年前，好不容易从生理科学的茧壳里爬出来，今天是主动寻找洞口，乖乖地爬将进去——这是怎样的一种幽默！？

探索者/暴风雨前后人间鲁迅（上）一个倡导个性解放的人，终于被职业封闭起来。面对着几十双闪闪熠熠的眼睛，周树人心里感到深深的愧疚。

青春！青春！属于自己的已经收束，而属于他们的才不过刚刚开头！他从这样的年岁里过来，知道知识的渴求是怎样的一种况味；更重要的是，不能把身上过早笼罩的暮气传染给他们。就这样，他不得不把思虑集中到自己担负的工作上来了。

上课时，他从来不翻书，说话也不多，只是扼要地讲述重点的部分，或是补充一些讲义里没有的知识，尽可能把更多思考的余地留给学生。学生首先是人，不是被动的机器。他认为，作为教师，应当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和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既然教师有输出的自由，学生也就有了接受或拒绝接受自由。

数学科有一个学生，在日本教员上课时打了个呵欠，日本教员认为是对他不尊敬，要记过处分。学生群起反对，一下子便把事情闹僵了。周树人觉得，这样闹下去，可能会给学生造成损失，只好主动站出来调解。他说：“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在教师方面，学生打呵欠，自然是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在同学方面，则是教师教得不好，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既然不同意给一个人记过，为了使全班安心上课，大家都记过好了。”貌似中庸，实则偏袒。妙极了。全班一律记过，自然等于不记，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每隔一个星期，他都同担任植物学的日本教员一起，带领全班学生到钱塘门外的孤山、葛岭、岳坟、北高峰一带实习，采集和制作植物标本。

他背着一只自制的马口铁采集箱，携着剪刀和铁锤，短小精悍，动作敏捷，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采集时，他并不特别的做示范，只是预定了地点，让学生们按照课堂上的理论，各自独立行动。结队归来，日本教员坐轿子，他则一直陪着学生们步行。

除了已逝的少年时代，周树人从来未曾如此亲近大自然。有时候，他就约了动物学教师杨乃康一起到西湖去，各采各的标本。由于与这一带植物的广泛接触，他甚至起了编一部《西湖植物志》的动念。不知为什么，他总是这般喜欢植物，喜欢野草，也许是出于对童年的梦幻般的依恋？或纯粹是一种精神寄托？还是在宁静的绿色中，潜意识地发现了为他所热爱的和平、善良而又卑微、平易的同类？不管怎样，总算是个人在消极环境中的积极行动。植物学也是科学。

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他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便嘱咐学生不要移动盖好的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说完便开门出去。当他回来，一点火，却立刻爆炸了。

手里的血，斑斑点点地溅满了白色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他发现前面的座位空出两行，想必是这里的学生趁他出去时移动了瓶子，放进空

气，然后一齐避到后面去的。他爱学生，得到的是恶作剧的报复。

——但是，他们也是在试验呀！

出格的是性教育。这是一个绝对禁区。在课堂上，有学生提出加讲生殖系统的要求，他坦然答应了。没有别的条件，只是听讲的时候，不许发笑。整个学校为之轰动，而课堂的空气却是严静的。别班的学生，因为无从听讲，纷纷向他讨油印讲义。他指着剩余的讲义，对他们说：“恐怕你们看不懂，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单，而且使用了许多古字，如用“也”字表示女性生殖器，用“了”字表示男性生殖器，用“”字表示精子，等等。在未曾听讲而又缺乏文字学素养的人看来，无异于一部天书。他早已考虑到，讲义一旦传布出去，很可能引起不良的后果，这才采取了一种节制性的进攻方式。

周树人仿佛时时感觉着青春的流逝，于是也就时时感觉到气闷难耐。年龄是可以造成隔阂的。他毕竟不能像在南京或在日本时那样，可以混身于同学少年中间；同自己的学生一道，又怎能无顾忌地纵谈梦与现实呢？而在学生的眼中，他始终是那么一个几乎终年穿着一件白色羽纱长衫的，可尊敬然而严肃的“周先生”。在同事的眼中，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憎恶官吏，常常模拟像“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官腔，惹人发笑；除了少数诙谐的场合，平时是不多说话，不大露笑容的。他是一个幽默者，也是一个孤独者。的确，在他，最亲近的就是强盗牌香烟、条头糕、夜和月亮了。

可他又是一个“好事之徒”，只要遇到刺激，就会像一头野牛那样马上亢奋起来。

### 31. “木瓜之役”

作为新兴的学校，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从建立的那天起，就被巡抚增韞视作眼中的一枚钉子。一年多以来，学校换了五个监督。沈钧儒接任后不久，反对党便在暗中活动，企图借故撤换他。正好他当选为咨议局副议长，被命为教育总会会长的夏震武，自然成了填补空缺的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夏震武是一个以道学自炫的极端顽固保守的人物。他宣传说清朝天下是“取之于李自成，非取之于明”。早在八年前，当八国联军仍然占领

北京的时候，身为工部学习主事的夏震武，自荐为专使与八国交涉议和条款，声称纾“主上”之忧。由于他太不自量，遭到清廷的一番申斥。如此顽愚的人物，就以尊王、尊孔，提倡“廉耻教育”而负盛名。周树人在南京读书时，就已经听说过关于他的传闻了。

上任前一天，他给许寿裳下了一道手谕，说是明天到校接任，命全体教师穿礼服集齐在礼堂，听候他率领拜敬孔夫子。

校内大部分教员是留日学生，经过大洋风的熏沐，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提起皇帝和政府就感头疼的。他们把监督视同一般官僚，往往不加理会，尖刻点的甚至当面挖苦。历来新监督到任，必定先拜见诸位教员，没有教员拜候监督的，而今一反旧例，这不就等于官场里的“庭参”吗？而且，不少人已经剪了辫子，更无袍挂、大帽之类。大家听到传达，不免一阵哄堂大笑。

第二天早上，夏震武带了十六个随员，穿戴着官阶衣帽，然地来了。

他看见迎候的一群短发蓬松，衣冠不整，又没设孔子牌位，心里十分生气；在高椅上坐定以后，便向许寿裳发话道：

“你们这师范学堂腐败已极，必须整顿！”

大家听了勃然大怒，纷纷围了过来，责问道：“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

“你侮辱我们！”

“你这个假孝子！”

“你这个假道学！”

“你这个老顽固，还配来做我们的监督！”

.....

夏震武看形势不对，便想脱身溜走。怎知道几条通道都已经被人截住，几经周折，才在随从的掩护之下夺门而出。

为人师表，怎么能这般啸聚闹事呢？理学家最难堪是失了自家的体面。于是，夏震武在赴府院稟诉以后，立即给许寿裳写了一封信，责备说“非圣无法”、“蔑礼”、“侵权”、“顽悖无耻”，故决定予以开除，“不容一日立于学堂之上”。

权力这东西，本来威焰无比，但有时却连一点装饰性的价值也没有。夏震武想不到，全体教员竟视“廉耻”为无物，都站到许寿裳一边，相率辞职离校，搬到湖州会馆去。

事情闹大了。提学使袁嘉谷非常紧张，写信给夏震武，认为辞退许寿裳的措施是失当的。

夏震武用了十分强硬的口气，复信说：“万无再留之理，听其辞去。”当晚，他委派教育总会会员夏超为斋务长，到校召集各室长开会。自许寿裳、周树人等教员离校后，嘉兴籍学生宋文保曾摇铃通知同学开会，商讨挽留教员诸事，遭到保夏派学生的殴打。事后，夏震武没有做出任何处理，于是公愤更大。当夏超在会上宣布由日本教员先行上课时，学生代表一致拒绝了。

夏震武不死心，再度派出新委任的第一斋管理员到校，请室长们开会。会上使用软刀子，拿了香烟笼络代表，但也只见一片烟腾雾罩，听不到片言只语。

简直没有调和的余地。夏震武只好指使几位随着进校的人和几个同乡学生，为他出力奔走，以图分化瓦解教师队伍。有些心气平和、优柔寡断的教师，也曾表示只要大家上课，个人没有意见。但是，碰到周树人和张宗祥，就少不了一场嘲讽和抨击。夏的死党于是借用梁山泊的诨名，编排了这样几个人：“白衣秀士”许季葑、“拼命三郎”周豫才、“霹雳火”张冷僧，还有“神机军师”许緘甫，准备伺机报复。

图穷而匕首见。夏震武一面写信给巡抚，呈请支持他的“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的强硬政策，一边采取提前放假的办法，以便遣散学生，使教员们屈服。

这样一来，数百名学生列队开往提学使署请愿，要求上课；事后发表宣言，声讨夏震武九大罪状。他们的斗争得到全省学界的声援。省城十三所学校联名向巡抚控告夏震武滥用威权，摧残教育。嘉兴、湖州两府教育会发起召开全省十一府教育代表会，讨论驱夏计划，接着六府代

表相继来杭。杭府各校代表开会议决：如果官方在两天之内无法解决师校问题，将实行全体罢教。

袁嘉谷无计可施，便动员夏震武辞职。夏震武坚决不肯退让，说：“兄弟不敢放松，兄弟坚持到底！”眼看局面实在撑持不下去了，袁嘉谷只好单方面做出决定，让一位比较年轻开明的杭州人孙智敏来取代他，并且亲自前往湖州会馆拜会各教员，送还缴存的聘书。

这的确是了不起的胜利。经过二十余天的集体斗争，终于打倒了一座威镇教育界的巨大的泥塑。

二十多个教员在湖州会馆拍了一张集体照，作为胜利的纪念。张宗祥题字道：“木瓜之役。”因为夏震武顽固自用，以其木强，周树人等取杭州俗语的意义，称他为“木瓜”。此后，凡同在这张照片上的人，相遇时都互相戏呼为：“某木瓜。”

周树人还邀了几个人，在大井巷一家饭馆里会餐，以示庆祝，称“吃木瓜酒”。他特别兴奋，夹了一块肥肉，仿照夏震武的腔调，举箸道：“唔，唔，兄弟决不放松……”惹得桌间的同事捧腹大笑……

斗争的风潮渐归平息，周树人又恢复了孤寂的恒态。

风景佳丽的西湖，饭馆，拱宸桥租界里的妓院，都是教师消闲的好去处。只是，闲适与淫乐与他无缘。人们看见他开始进出于浙江图书馆，从那儿借走大批线装书。只要没有个别同事的打扰，就一个人关起门来默默地阅读、抄录和校勘。一头长发，冷然独坐，恰像那绰号里的形象：猫头鹰。

悲剧未必就是猝不及防的中断与牺牲，它往往出于一种无声消磨状态。

## 32. 葬礼

5月。周树人突然接到家里的一封电报：祖母病故了。

死亡打破了隔阂，把众多长期以来漠不闻问的生人联系在一起。周家新台门变得空前的热闹。

族长，近房，老人母家的亲丁，邻居，闲人，在小堂前聚了满满的一屋子。预计树人回来，应该是入殓的时候了，因此必须事先筹划必要的仪式。第一个大问题是怎样对付这个承重孙。他是一个“吃过洋教”的“新党”，脾气又古怪，预料他对于一切丧仪，是必定要改变新花样的。如果真的改变过来了，还像一个什么台门人家呢？大家聚议的结果，订下三大条件，等他回来实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之是全都照旧。

计议停当，便约定在树人到家的当天，大家一同到大厅里聚集，同他作一回最严厉的谈判。村人们都咽着唾沫听候消息，预料双方互不相让，必将出现一个根本无从想象的奇观。

隔了两天，树人果然回来了。

他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弯了一弯腰，算是鞠躬。完了，只听得衍太太说：“阿樟，跟我来。”

按照预定的计划，树人被带到大厅上。族长们先说了一大通冒头：作为子孙，心目中不能没有祖宗；你所以能够出洋留学赚大钱，全靠风水好，祖宗保佑的缘故。然后引入本题，像作八股文一样，于是乎大家七嘴八舌，此唱彼和，使得他没有一点插嘴的机会。当所有要说的话都终于说完了，人们便都悚然地紧紧盯住他的嘴唇。

沉默充满了整个大厅。

周树人只坐着，凝然不动。不知是哪一位忍耐不住，发问道：“你到底怎么个意思？说呀！”他极其简单地吐了几个字：“都可以的。”

顿时，大家心里的重担都放下来了，但接着，又好似分外加重了似的，因为事情太出人意表，太异样了。村人们也都觉得奇怪，决定还是要看，黄昏过后，便又欣然地挤满了大堂前。

老人的遗体就停放在这里。堂前燃着素烛，幽幽地照着树人瘦削的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胡子，两只眼睛在黑气中闪着光芒。

老人的头发早已梳理完毕，内衣裤也都穿好了。树人由人扶着领到张马河买水，回来向老人胸前揩了三揩，就把殓衣一件件套在竹竿里，然后给穿上。井井有条地，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使旁观的人无不暗

暗叹服。按老例，当这种时候，无论如何妥帖，母家的亲丁照例要挑剔的；他却只是默默地，任随怎么挑剔怎么改，一点也不觉得厌烦。站在前头的一个老太太，看了不禁连连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

其次是拜，是哭。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其次是入棺，再又是拜和哭，直到钉好了棺盖。在静默的瞬间，人们开始扰动，很有点惊异和不满的形势。可是，树人始终神色不动，坐在草垫上，只有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发光……

大殓便这样在惊异和不满的空气中完毕。大家怏怏地舍不得走散。残烛一面消着热泪，一面幽幽地燃烧……

孤独的老人，到死仍然孤独……

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仍是自己的祖母，敬爱的祖母。玩具，歌谣，雷峰塔的传说。那么好看的笑容，终见日渐减少乃至无有。姑母不在了，生存的依托便丧失了，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了。但她还是一样地做针线，管理和爱护着自己。而自己，却因命运的驱逐而早早地疏远她了……

孤独的老人。是这个家庭的人又不是这个家庭的人……

手中的针线，岂能缝缀昔日的好梦？祖母也有童年，可是没有青春。继室，祖父的詈骂，以后是潘姨。潘姨的命运又何尝好呢？一纸休书。房间里，除了空空荡荡的铁梨床，几件硬木家具，什么都没有了……

不相信神鬼，却也相信魂灵。每到姑母忌日，她就点燃香烛，像今夜一样的香烛。哭，哭，哭……魂灵呢？它在哪里？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所有该来的都来了。所有不该来的也都来了。他们规劝，规劝得这般热心。父亲死去以后，他们要夺屋子，要自己在笔据上画花押。当时大哭时，他们不也是这般的劝说吗？祖母生前不知受过他们多少凌侮，而今，他们都哭她来了，而且哭得那么凄惨……

树人不哭，也不说话，一动不动地坐在草垫上。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于是陆续走散……

他们看什么呢？你以为他们是为死者而来的吗？不，他们要看你这个异类.....

异类。当初不正是为了寻求异样的人们才离开这里的吗？四年，七年，绕了那么一个小圈子又飞回来了！你寻到了什么呢？不过是一个梦，终于破灭了的梦。改造国民性，何其痴妄？你只不过拿寻得的一点知识去换家食，这同祖母当日做针线有什么两样？同你当日典当衣物又有什么两样呢？你已经学得麻木，敷衍，甚至无聊起来了。在日本，你抨击“庸众”，到底你算什么？你已经混同于他们，只是他们仍然要把你当成异类而加以嫉妒和憎恶罢了，你觉得还有辩白的必要吗？幻灯片，幻灯片，周围都是看客，看客看客看客.....而你，实实在在已经变作示众的材料了！而且示众完后，还得在毫无意味的生活中充作一份佐料、一份谈资.....

素烛幽幽地燃烧.....

看客已经阑珊，只有周树人仍然坐在草垫上沉思.....

孤独的老人。在一个灵魂彼此隔绝的世界里，默默地生存，又默默地死灭.....

没有真诚，没有同情，没有援助。人呵！人呵！你以为自己真的已经认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了吗？

夜深了。人们已经走散。空虚如夜色沉重地压将下来.....

周树人仍然坐着不动，在残烛的阴影里，独自咀嚼惨淡的人生。谁也不曾知道：他有没有流泪，有没有失声痛哭过，如深林中的深深受创的野兽。

### 33. 两次风潮

在命运的重轭下，自由的心仍在跳动。

“木瓜之役”胜利结束以后，孙智敏作为一个缓冲人物被派进学校，待形势稍为安定，就又被权力者撤走了。接任的徐超，是一个出身御史、官气十足的人物。这是周树人特别憎恶的。甚至连多看一眼那鼻烟壶般的长相，也可以教他不舒服小半天。这时，许寿裳到了北京译学

馆，其他一些同学同事也都陆续离去，他于是决然回归故乡。

辞职是奔丧返杭不久的事情。

他自知故乡的刺激也不会少，但当举步维艰、莫知所之的时候，又该到哪儿寻找归宿呢？自经祖母亡故，他的心似乎隐隐地起了一种负罪感，惟愿从此不再远去，陪侍长久以来守着艰难和寂寞的母亲。

经济是一根绳索。返回绍兴不满一个月，周树人仍旧被拴进了教育界的食槽。

府中学堂缺乏博物学教员，监督杜海生聘他来校，他不得不答应了。回校的当天，他发现关于教务的文件一份不剩，连个时间表也没有。天下还有这样的学校吗？他揣度很有可能是前舍监范爱农给毁坏的，那么，为什么要毁坏呢？执教尚未开始，便使他感到非常困惑和厌倦。

没过几天，他把情况写信告诉了许寿裳，希望能为自己找到另一个立脚点。

就在这时候，风潮来了。

杜海生为了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并且乘机惩罚校中屡闹风潮的活跃分子，便借口学生在原来的考试中有舞弊的嫌疑，需要重新考试加以甄别，然后根据这次评定的成绩进行编级。学生们知道了十分愤慨，于是，在校友会的王文灏、金如鉴两人的带领下闹起来了。他们高喊着“砸掉监督室，驱逐杜海生”的口号，吓得杜海生连夜仓皇逃走。

第二天，学生拿着发布的告示，拥到府署去要求取消考试，但是遭到了拒绝。

随后，提学司派了两位大员来校查办组织风潮的校友会。他们命令交出校友会的印章；并且威胁说，如果违命，当即解散学堂。学生没有经验，又没有讨论和活动的余地，一下子拿不出主张。接着，大员最后通牒道：“限你们十五分钟之内答复！”说完，在衙役的保护下离开了会场。

对于学生，为什么要动辄使用政客手段呢？这种镇压方式，是周树

人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他走到学生群中，提醒他们说：“要知道，校友会的印子交出，就等于解散校友会了。”

经他一语道破，印章到底没有交出，两位大员只好悻悻然地走了。

9月，杜海生被迫离开独断的舞台。

接任监督的是陈子英，周树人则兼任监学。由两位共同留日的同学朋友，一起治理一所小小学校，按理说，前景应该是乐观的。

陈子英的确有一番雄图大略，认为只要充实师资，加强管理，就可以实现中兴。周树人没有这份信心，但作为监学，却是十分负责的。他经常把一些学生叫到房间里去，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在各级上课或是自修的时间里，也会不时地站到门外察听。为了扩大学生的眼界，还亲自率领了他们远足南京，参观爱国人士创办的南洋劝业会。所有一切努力，都无法挽回颓败的局面，一场新的风潮向他迎头扑来。

起因仍是考试。只是杜海生不复站在前台，而是退居幕后；学生哄闹过后，也不复保持着初生牛犊的蛮野，而是像一群驯顺的羔羊，为学宪的大棒所驱散。在“谋主”被开除以后，作为“胁从者”，全部乖乖地回到了原来的栅栏。

自己无力救援，反而得无条件地执行上面的指示，实际上充当一名屠伯——这是怎样的尴尬的位置！是的，学生未必会抱怨自己，可是，根究抱怨与否的态度有什么意义呢？可虑的是学生。经历过当年弘文学院群责三矢，进逼加纳的风涛，学生的反抗，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是设身处地念及已被开除和未被开除的一群，周树人心里总是有一种难以消释的伤感。

风潮过后，陈子英壮心未减，委托周树人函请在北京工作的许寿裳前来“开拓越学”。未逾半月，周树人自己就又写信向老友报告了自己归乡以后“防守攻战，心力颇瘁”的情况，表明“不可收拾”的预感，从中加以劝阻了。

这时候，对于教学，他已经非常绝望。不要说整个教育界必须接受政府的控制，即使在内部，也已经腐败不堪。教员庸俗无聊，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学生囿于地域观念，派性严重，因此时有纠纷。特别是近来，陈子英表现出来的专断作风，更是为他所不满。小小学堂，千奇百

怪，全部的国民劣根性都暴露出来。信末，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写道：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世界并不曾因他的咒诅而毁灭，甚至那么决绝地想离开这是非之地也不可能。他找不到替身。拖延真是一种无期的苦刑。或许人的意志，也就在压抑与忍耐中变坚韧起来的吧。但是，由于剪辫风潮的再一次冲击，他便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住了。

开学伊始，不知由谁发起，府中学生开始剪辫子。对此，有不少学生疑虑不决，于是凑齐了来请教周树人。因为他本人，恰是校中为数极少的无辫者。

“周先生，你说剪好呢，还是不剪好呢？”睁大的眼睛纯净得透明。

“不剪上算点……等一等吧。”

学生无法理解这种近于“骑墙”的态度，当即诘问道：“究竟是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的好？”

“没有辫子好，”树人沉吟了一下，决定回答，“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

学生们不说什么，一个个撅起嘴唇走出房去。不过，他们结果还是把辫子剪掉了。有几个剪了辫子，还特意在制服领口缀上两个圆形的篆体字，一面“府”字，一面“中”字，颇带有示威的性质，去快阁游玩。

周树人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不满足于自己的矛盾的说法，却又无可如何。自己由于缺少了一根辫子，回到故乡，就一直受到官方的警戒，诬为“里通外国”。知府每到学校，总要盯住自己，同自己多说话。至于同事，又避之惟恐不速。走出校外，路人多指为“革命党”，甚至骂作“假洋鬼子”，乃至“缺德鬼”。无辫之灾，自己独个承受也就罢了，何敢延及天真烂漫的少年？全凭一时冲动，却不知道为了一根辫子，其价值就可以集中在脑袋上。《绍兴日报》不久前不是公布了关于学生不得擅剪发辫的规定吗？轩亭口离府中不远，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尽管人言啧啧，周树人只是装作不知道，一任剪辫的学生光着头

皮，和许多辫子一同走进课堂。

剪辫传染得真快，过了几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地剪下了六条辫子。但当晚，果然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个早晨变成了流浪者。

周树人带头戴了一种遮阳的操帽，用意是做个样子。暗示剪辫的学生也跟着戴，以免增加意外的麻烦。当学生戴上以后，他又想：教会学生世故，作假，这样便对吗？你曾借屈赋的句子，以洁好的内质自慰；然而，酱在一个烂泥塘里，你难道真的可以像少年时写的莲蓬人那样，无愧于先贤所称的“净植”二字吗？这么一想，又不禁惘然茫然……

5月，他到了日本。

不是为看樱花，为寻樱花般斑斓的好梦；那个身穿和服的清苦而浪漫的青年身影，是永远也寻不到了！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以后，需要负担羽太家的生活。树人的薪俸不过三十多元，而接济兄弟就得用六十多元，每月入不敷出，弄得只好继续出卖家中剩余的田地。但不久，钱也就用完了。他深感力不能支，便写信催作人归国。无奈作人仍想学习法文，迟迟不肯动身，法文又怎么可能变米肉呢？不得已，他只好亲蹈东海，当面促成了。

居日的半个月内，不访故友，也不游览，一个人天天到丸善书店看书。上架的书全是新书，要购买的实在多得很。结果，除了为许寿裳代购一小筐杂志和“文明协会”出版的内部书籍以外，索性一本也不买。仅与书店的接触，便深感自己已成“村人”，完全与世界的新潮隔绝了！他想，即使购得几种新书，又何异于杯水车薪？处在一个闭塞的环境，恐怕是只配读线装书的。何况，至今连二弟的学业也给耽误了！……

府中学堂的情况越来越糟，后来连教学开支也成了问题。等到作人夫妇6月归国，他也就同陈子英一起，把担任的职务坚决给辞掉了。

还在学堂时，周树人一直被教务和琐事缠得好苦。要执笔弄点东西，也必得在半夜10时以后。友人张协和、许寿裳先后托译的《地质学》和《心理学》，也只得拖延着进行。与在师校时课外便无余事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令人费解的是，他好像有相当充裕的时间抄录和校辑古书。一页页落满蝇头小字的毛边纸，一张张夹在书里的小纸条，都

是证明。嗣后，在这个基础上，他辑录了《会稽郡故事杂集》和《古小说钩沉》。钻故纸堆，拓古碑，收藏古砖，居然成了一种嗜好，就像大量地吸烟一样。

从西洋文学向国学过渡，对于一个曾经大声疾呼“精神界战士”的人来说，说是进取呢？是倒退呢？还是以退为进？有谁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为他所愿意的？

周末，周树人就在家里过。夜晚，他会常常从葫芦形的玻璃灯罩下走出，到院子里听母亲和王鹤招唱山歌、讲故事和猜谜语。星期天，或同三弟建人一起，再叫上鹤招去爬山，游览，采标本。只有这时候，他才得以暂时摆脱那个古老的梦魇，而体味到一种“纯生活”的乐趣。

最使他感觉愉快的是跟范爱农一块喝酒，说疯话。自从在熟人的客座上重新会面以后，爱农每次进城，必定到东昌坊口来，在微醺的酒意里，他们一起追忆留日时候的往事，或是谈说新闻，讥评政治，常常无端地哈哈大笑。连鲁瑞偶然听到，也忍不住发笑，数说他们傻。

近冬，两个待业者的景况愈加拮据，然而还是照例地喝酒，讲笑话。幸好像庄子说的这种靠唾沫来彼此濡润的日子不是很长，社会的暴风雨骤然而至。从此，干涸的河滩应该有水了。

## 34. 革命·辫子·我们都是“草字头”

1911年10月10日。午夜。

严静的武昌城突然开始骚乱。接受过革命思想洗礼的新军士兵，当起义计划被人叛卖，组织遭到破坏，领袖被杀、被囚而星散四处的危急时刻，提前举行暴动。楚望台的炮声响了。督署附近，火光升了起来。在炮声与火光中，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逃遁。经过三次反复的争夺战，血红色的黎明，终于把整座城市移交到起义士兵的手上。

武昌的炮声迅速获得响应。全国各地，纷纷树起独立的旗帜。11月5日，杭州光复了。

消息传到绍兴，使周树人十分兴奋，立刻跑到堂叔凤藻的房里，告诉他说：“知道了吗？汉阳失守了。”

“轻声些。”堂叔慌了。

“汉阳失守了！”树人故意提高嗓门重复了一句，然后说：“怕什么呢？报纸上已经登载了这件大新闻，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出于武昌光复的震慑，数周以前，府中学堂监督辞职告退。在学生的坚决请求下，他同陈子英再度回到学校里来。

从这时候开始，他就渴待着故乡光复的日子。《浙江潮》的涛声已渺，秋瑾姑娘的名字也快要被人忘怀。辫子。知府的钉子似的目光。标本。线装书。豪绅的气焰与市民的驯良……只要革命真的起来，一切可憎、可鄙、可悲的事物，都将在扫荡之列！他不只一次这样狠狠地想。革命，曾经怎样地折磨过他呵！而他，一直感觉着光芒是那么遥远；胜利一旦在望，却又仿佛来得太快了……

当天下午，他到开元寺参加了越社主持的群众大会。

越社，是初夏时由府中教员陈去病和宋紫佩等人发起的一个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宋紫佩本是周树人在杭任教时的学生，在“木瓜之役”中，因为反对驱逐夏震武而一度发生过矛盾。不过，以为人的坦诚和办事的认真，事后仍然获得先生的信任。年初，周树人邀请他担任府中教务兼任庶务，对他组织的越社，自始至终给予很大的支持。

会上，一百多人一致推举周树人为主席。他说话了。

思想启蒙仍然是头等重要的课题。但他没有什么长篇大论，倒是很简捷地作了几项具体的提议。首先是组织讲演团，分赴各地去演说，向群众宣传革命的意义，鼓动大家的热情。此外，还特别提到了人民的武装问题。是的，现在已不复是暗杀季节，而是可以明火执仗地把革命请上街头了。他说，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是十分必要的。讲演团不但需要舌头，而且需要牙齿。只有这样，在紧急时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无论哪一项提议，当主席将要说完而尚未说完之际，坐在前排的一个头皮刮得精光的人，必定弯着腰，做出将要站起而尚未站起的姿势，说一句：“鄙人赞成！”

这个人是有名的乡绅孙德卿。对于排满，他从来是一个热心分子，曾经拿明太祖的像分送给农民，后来由于“秋案”的牵连还下过一回狱。

就在他站起来又坐下去的当儿，提议也便很快地通过了。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另一批“新派”人物也在开会商讨面临的光复问题。他们处在现成的政府和未来的革命之间的夹缝里，一个个面容愁戚，议论纷纷，但是没有结果。最后才决定由徐锡麟的胞弟徐叔荪出钱，带领陈燮枢、沈庆生两人，到杭州谒见刚上任的都督汤寿潜。

没有任何抗拒，绍兴突然宣告光复了。

消息比风传得还快。次日，范爱农就上城来了。他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豫才，我们今天不喝酒了。”他很认真地说：“我想周围走走，看看光复的绍兴，一同去吧。”

他们到街上随意地走，满眼是通告和白旗。原来，绍兴原知府程赞清获悉省城光复的消息，立即召集了一批官员谋士，策划成立了绍兴府军政分府。他自任府长，治安科长是章介眉；民团团长也是原任徐显民。章、徐二人都是当地著名的巨室，章介眉还是杀害秋瑾的谋主呢。

于是，他们开始感到失望。如果说原政府是一块破旧的招牌，那么革命，也不过是在这上面刷上一层新鲜的油漆而已……

人心浮动得厉害。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清兵残部要渡江打过来了。周家新台门内，人们惶惶然地预备逃难。有一位少奶奶，见她的丈夫呆在学校不回家，便着急地嚷道：“大家快要杀头了，为什么还死赖在外边？”在慌乱中，还有的将团扇一类东西也都塞进了箱子里。

周树人焦躁地走出门外，看见有些店铺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急急地从西往东跑，便拉住一个查问出了什么事，那人也全然不知，只道是“来了”！他没法，只好松开手，疾步走进校门。

操场上，一群学生聚在一起，好像正在议论着什么。他走近前去打听，才知道市民是受了谣言的干扰。不少学生主张到大街上去巡察和辟谣，他觉得意见很好，随即宣布组织武装演说队。

他吩咐学生尽快印好传单，接着撞响大钟，紧急集会行动。

刚刚接任的沈姓校长连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劝阻，但是没有用。这

时，一位学生队长站出来问：“万一有人拦阻怎么办？”

周树人正色回答道：“你手上的指挥刀做什么用的！？”

就这样，队伍出发了。

走在最前头的是周树人。他一手握着传单，一手握着钢刀，大有当年在南京时跑马旗营的气概。高年级学生由宋紫佩带领着，佩着旧式的前膛枪，还有木头做的假枪和不开口的指挥刀，精神非常饱满。低年级学生大抵赤手空拳，也有的拿着传单，紧紧跟在后面。最后压阵的是兵操教员，挂上一把阔厚的可以劈刺的长刀，尚未剪掉的发辫在头顶盘了个大结子。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临大街，温暖而明亮。

演说队一路敲打军乐，高呼口号，散发和张贴各种传单：“溥仪逃，突劬被逮！”“中国万岁！”

学生走过的地方，人心立刻安定下来，紧闭的店门也次第打开了……

周树人心里并不安定。他总感到自己同这份“革命”是很不协调的。过了几天，突然又有消息说：王金发的军队今晚要进城了！

王金发，出身于浙江嵊县一个与异族统治势不两立的世家大族，从小养成奔放不羁、桀骜难制的复仇性格。他酷好技击，且枪法绝精；二十一岁中秀才，也算通晓翰墨。自从结识了徐锡麟，他便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随后，曾同徐锡麟和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人东游日本，归国后任大通学堂的体育教员，成为徐锡麟和秋瑾的得力助手。及至两人蒙难，他潜身草泽，联络会党，举行过多次起义，是著名的“强盗头子”，此后浪迹都市，专事暗杀，击毙不少叛徒和密探。上海、杭州光复时，他都亲自参与战斗，并且作过敢死队的首领。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非凡的经历和才干，不但令官绅闻声色变，连在省的革命政权中的一些权要人物，也都不免要侧目而视。

王金发的到来，坚定了周树人对于革命的信仰。他在留学时，接待过这位“强盗”，以后也时有来往，其实称作朋友也未尝不可的。他们曾经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他了解“强盗”朋友的革命思想和豪侠性

格。虽然，他一直主张革命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而不赞成王金发一贯的恐怖政策，但是却赞成以公开的暴力对抗暴力。他想，王金发至少不是黑暗中的人物；不管将来如何，只要能够打破目前这种和平革命的沉闷空气，就是伟大的胜利了。

他听到消息，当即回到府中学堂，向学生布置晚饭后迎接王金发军队的任务。

月亮升起来了。

西门外，学生排成两行队伍，在静静等候。二更。三更。仍然没有军队的影子。

夜很冷。学生穿着单薄的操衣，实在有点支持不住，只得敲开育婴堂的门，到里面去歇息，叫起茶房烧点水喝。这时，大家才发觉自己饿了，于是商议着去敲店门买东西吃。头皮精光的孙德卿慷慨解囊，一下子叫人买了几百只鸡蛋，雀跃的气氛又恢复过来了。

接着，有人报信说：军队来不及开拔，大约要明天才能来。

第二天，周树人、陈子英、范爱农、孙德卿等领着学生队伍，提早出发开往城东的五云门。前来迎候的，还有另外的两批人：一批是以程光赞为首的满清官僚，一批是徐叔荪等“新派”人物。革命，就这样迫使所有愿意和不愿意的人们向它表示敬意。

一样明净的月光。正翘首间，远远地听到枪响。不多久，就有一串吃水很深的白篷大船摇了过来。每只船的篷扇都敞开着，不时有士兵站起来，向空中投放一枪。按照兵队的老例，这是带有警戒开仗的意味的。等第一只船靠岸，程知府便由两个差役扶着，飞奔地过去迎接。

铜号。大鼓。学生的军乐队使劲地吹打起来……

王金发和他的军队很快地上了岸。在人群中，他发现了周树人，握过手，愉快而简捷地交谈了几句，随即向城内进发。他提着指挥刀，刀锋闪着寒光，两支手枪插在腰际，把一个魁梧的汉子衬托得格外威武。带队的人骑着马，有的穿暗色军服，戴着帽子，有的穿淡黄色军服，光着头皮。士兵一律穿着蓝色，打着绑腿，穿着草鞋，雄赳赳地提枪走着，是一支崭新的军队。

市民极度兴奋，纷纷奔走相告，夹道迎接，比看赛会还热闹，没有街灯的地方，人们提着灯：桅杆灯，方镜灯，纸灯笼，还有火把。小孩也来了，和尚也来了，传道士走出教堂，一手拿灯，一手擎着白旗，上面写着“欢迎”的字样。军队简直是从狭窄的人缝里走向预定的驻扎地的，跟着，一群慰劳的人便把酒肉挑了进去……

“革命胜利万岁！”

“共和万岁！”

“中国万岁！”

迎接的人们有的站在屋里，有的站在门外，都高叫着口号，情绪紧张而热烈……

王金发连日改组了军政府，撤除章介眉等人的职务，自任都督，表现出一个革命军人的宏大胆魄和果决作风。一时间，他成了政府上下街头闾尾谈论的中心。

傍晚，周树人同范爱农一道前去拜访他。

王金发热诚地接待了他们。在大通学堂时，同是徐锡麟的学生，“徐案”发生后，又同是遭到通缉的要犯，而今重逢在光复的日子里，自然使范爱农非常兴奋。他用手摸着王金发的光头，笑着说：

“金发大哥，侬做都督哉！”

王金发被弄得很尴尬，但也并不见怪老朋友。说话间，他便做出决定，委派他们到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去：周树人做监督，范爱农做监学。

临走时，王金发特别嘱咐周树人，要他查究前任监督杜海生的错处，以便公开做出一个严重的处理。在王金发的心目中，杜海生与胡钟生一样，都是谋害秋瑾的人。为了给战友报仇，早在光复前，他就亲手把胡钟生结果了。对于杜海生，却一直找不到什么把柄，于是，就把这个任务交由周树人去完成。

## 35. 新校长

新校长到来了。

进校的当天，周树人戴上留学仙台时候的制服帽，帽檐下，眼睛很有神采，唇边留的一撮短髭，由于脸部的瘦削而显得特别的突出。他穿着一件灰色棉袍，一双黑皮鞋“橐橐”地响，显得有点威严。但是，见面会上的头一回讲话，却是非常的亲切、明快、有力，丝毫不像以往的监督那般的装腔作势。

他的丰采，立刻吸引住了周围的学生。他们欢迎新校长，那热烈的程度，完全不下于欢迎新国家的诞生。

紧张的是会计员。听得教员们传说，新校长上任以后要查办他。怎知道一来，不但不查账，还和气地教他留任。任用一個素不相识的人管理财务，这是没有先例的。于是，他不禁叹为奇迹，逢人便说。这样，原来一些惟恐被撤换的教员也便安定下来了，其实就周树人看来，比较整个的教育事业，一笔小小账目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况且，在一个黑暗污浊的环境里，作为小人物，沾染一点不良习气也不足为怪。随着新政权的确立，他相信，人们的劣根性总当慢慢地有所改变的。

关于杜海生。说他在秋案中向官府告密，也不过是一种嫌疑罢了。周树人想，既然拿不出证据，就不能随意借故报复。至于说他当时站在可以救援的地位而不设法援救，又怎能算是一种罪过呢。中国治人历来苛刻。置身于淫威之下，一个人，能不轻易诬人就已经不错了。对此，周树人坚持了个人看法，没有遵从王金发的意旨。

头一件大事是剪辫子。

革命以来，最令他愉快的，莫过于昂头露顶于大街，而无须招惹各式各样的嘲骂。记得几个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出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哈哈笑道：“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自然，小青年们对于辫子的憎恨，并不如自己这一代的深，因此他把剪辫当成最重要的内容在见面会上说了。但是，他说的也是把剪辫当作一种趋向加以强调，没有一点强迫的意思。他声明：“剪辫子，自由剪。”在他看来，革命本来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管理学校可不比剪辫的简捷。对于这，周树人十分清楚。

归国以后，他是一直不安于执教的，曾经几次写信给许寿裳，请求

另谋出路，只是没有结果罢了。为了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他还曾译了东西寄去，长时间不见下文。教职对于他，现在已不复是饭碗问题了。他清楚地看到，是革命，把一所学校，一代人，亲自移交到自己手上，因此不敢有任何推却。他要履行东京时代自许的诺言，且不说战士，至少要尽一个国民的职责。早在来校之前，针对全县小学教育荒落的现象，曾叫二弟草拟了一个意见书，上呈议会会长，以期引起重视和改革。他知道国民教育的分量。教育是全体的改造，一根教鞭，并不稍轻于一把指挥刀或是一支毛瑟枪的。

学风是学校的灵魂。对于学生，当局往往不是严加压制，就是放任自流，相应地，学生不是恭顺有礼，就是荒嬉度日。教育的现状，跟整个社会现状一样是令人悲哀的。有鉴于此，周树人决定从整顿学风入手。

但是，整顿不是惩罚。它需要某种表率，某种诱导的力量。任何纪律都不应构成笼子，关键的是让学生找到自己，建立读书学习的自觉性。从前担任监督的，大抵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轻易出来走走的。周树人却喜欢走动，课堂、操场经常有他的身影。教师缺席，他便亲自代理。他代国文课时，给出的国文题目都很新鲜，像《杨子为我，墨子兼爱，何者孰是？》就富于启发的意义，批改作文则不厌其详，而且写的大多是鼓励性的批语。

每天上夜自修，他总要看一下，做个检查。只要听到“橐橐”的皮鞋声，同学们就互相传语道：“噢，校长来了！”这时大家就屏气息声，毕恭毕敬地坐着。他以为这样子实在不好，便对大家说：“老虎吃人，是不管好人坏人都吃的。我又不是老虎，怕什么呢？只要你们遵守校规就行了。”更多的时候，是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外，他不愿意让学生发觉自己的存在。

他还常常到学生寝室里去查夜，挨间地查。有一次，熄灯鼓敲过许久了，他听到一个房间还不住地响着“锵咚锵！锵咚锵”的模拟打击乐。原来，有几个学生蒙着被单，正在边做边唱地调狮子。

看热闹的同学发现了校长，说笑声便戛然中止了。调狮子的同学掀开被单，不觉顿时面红耳赤，连忙低下头来。

意外的是，他们听到的不是呵叱，而是极其平静的两句话：

“可以睡了，明天到操场上去玩个痛快！”

还有一次，在检查的时候，他发现有几张床的床前整整齐齐地摆着鞋子，但是撩开帐子一看，里面却没有人。第二天检查的情况仍然一样。他接连查察了几天，就去找老工友，说：“该是你在卖面子，放学生在夜里出去的吧？”老工友说：“监督，时间一到，大门就上锁，哪里会呢！”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就到庶务处去，对庶务说：“明天你去买几船沙来修理一下操场。”谁也不会想到修操场会有什么用意，其实，这时他已经注意到操场围墙的一个倒塌的缺口了。

铺沙子的第二天，他到缺口看了看，果然上面留着鲜明的脚印。他再到寝室里那空铺前边看了看带泥沙的鞋子，于是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抄下，叫工友通知他们到教务处里来。

“你们夜里跑出去，是赌呢，还是干别的什么呢？你们说说。”是平静的声音。

学生们装出委屈的样子，说：“监督先生，我们夜里没有出去过。”

“没有出去过？校里这么多同学，为什么只叫你们这几个来呢？”校长严肃而诚恳地说，“不要学说假话。你们是师范生，要做学生的榜样。再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说实在话，我不想开除你们。只是，很替你们可惜。”

学生被感动了，有人讷讷地说：“监督先生，我们实在是到亲戚家里去打小牌的，请你原谅。下次不会再去了。”

校长说：“很好，只要能改，这回就不给处分了，你们回去以后，把这次错误认真写到日记本上吧。”

仅凭地位造成的威慑的力量是不可靠的。对于教育，前人有春风化雨的说法。的确，真正强劲的未必是朔风，东风乍吹，枯树就发芽了。

完全科一年级有一个学生，经常带头闹些恶作剧。学校当局把他当成害群之马，曾经一度要开除他，因为有人暗中庇护，才得以赦免。然而，他却因此被降到了预科。周树人进校后，偶然看到了这位学生的国文卷子，认为是可造之材，当众夸奖了他。但同时，又为他被打入预科感到诧异和惋惜。经过调查，学校决定如实公布这位学生的第一名的成

绩，并且仍旧提升到二年级。

他做泥土，而且希望有更多的人做泥土。

任职期间，他十分注重延揽人才，充实师资队伍。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教员材料放在身边，他却迟迟没有使用。这个人就是周作人。

自从偕同羽太信子回到绍兴，作人一直躲在家里抄线装书，虽然遇上了革命的大事件，也没有出门看过。树人是很想他能够与现实社会接触一下，利用他的专长，从事故乡的教育工作的。况且，他们夫妇俩很喜欢花钱，出门都要坐轿，家庭经济就愈加拮据了。当时，校中有一位英文教员被学生轰走了，他也没有聘用自己的兄弟。一来，他以为教员应当由学生自己挑选，即使作为校长，也不好越俎代庖；二来，出于一种近似的洁癖，他不愿沾惹徇私的嫌疑。后来，学生得知他有这样一个兄弟，便极力恳求他。但是，到底没有动摇他的想法，英文讲席一直虚悬着。直到临近年考，作人才来给学生出题，并且担任监试的工作。

为了治理好一个学校，周树人算是呕尽了心血。最初，王金发拨给学校的经费只有二百元，他很能理解军政府的困难，便对全校师生说：“钱只有这么一些，但山会两县难道办一个师范学校也办不好吗？一定要办下去！”范爱农也配合得很好，办事，教书，都非常勤快，虽然还是那件袍子，但已不大喝酒了，而且很少有工夫谈闲天。

虽然校务很忙，但是，在这段日子里，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范爱农还爱哼点歌子，有时候，简直快活得像一个小学生。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它使最爱耽于沉思的人也未免显得太肤浅、太轻率了！

## 36. 大胜利中的败退者

在中国，改革常常表现出这样两大特点：麇杂和反复。由于大力鼓吹民族主义，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倾心于枪炮的嘶鸣，民主的呼声于是几乎被淹没了。在思想战线上，封建主义没有受到更大的触动。东方的文化传统，培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格，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不可能成为他们手中的坚持到底的旗帜。武昌起义胜利以后，起义者把元首的宝座拱手让给遍身血污的屠夫黎元洪，就是对革命

的莫大讽刺。在理论上一败涂地的立宪派，开始反过来吃掉革命派。它一面使用祖传的捧的办法，个人崇拜的办法，使革命的领袖人物一一蜕化为王侯将相；另一面接过革命的口号，略施粉墨，便理所当然地跻身于革命派中间。尽管台上的角色走马灯般的变换，整个政治体制没有丝毫实质性的改变。少数真正的革命者，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了，人民却没有能够理解他们。革命精神，被窒息在仍然以权力为中心的上层社会里，而根本无法下达基层。越是底层，越是闭塞，蒙昧和阴暗。1912年元旦，以孙中山为临时总统的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在象征意义上，它结束了封建帝制对中国的统治，但是却无法改变数千年的传统力量沉积而成的现实状态。

王金发进城以后，随即杀掉一批一贯敌视革命的恶霸地主，逮捕了章介眉，即使他已经把小辫子盘到了头顶上；公祭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厚恤他们的家属，并没收了章介眉的部分沙田，拨作徐祠、秋社的祭产；此外，释放狱囚，平糶施赈，减免赋税，兴办教育，都充满着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

可惜不久，就被骄气和暮气所替代了。

都督府计分四部三局。四部是：司令部、军事部、政事部、经济部。头两部为王金发自己所掌握，政事部部长则是程赞清，可见政府大权仍然留在原知府手中。三局是：团防局、筹办局、盐茶局。其中最重要的团防局，由徐叔荪任局长。光复以后，绍兴当地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接连出现众多的“革命党”：社会党、统一国民党、自由党……它们把王金发团团包围起来，旗帜就是徐叔荪。

徐叔荪是有钱有势的乡绅，又掌握地方武装，特别有“烈属”的招牌可资利用，于是个人势力迅速膨胀，致使王金发后来也不不得不在他的意志面前步步退却。

王金发也不是没有安插亲信，像盐税局长是他的舅父，酒捐局长是他的表弟；禁烟局长，胥吏差役，也都大部分是他的同乡。被地方称为：“三黄”的黄介清、黄伯卿、黄竞白父子兄弟叔侄三人，由于与王金发私交极厚而担任了经济部长等要职。他们意在做官，大事搜括，严重地破坏了革命政府的威信。

随着地位的迁升，王金发已经渐渐忘却了过去的艰苦岁月。他经常挟俊婢、骑骏马，游冶郎一样驰骤郊外；或者寓居上海，奢靡淫逸，流

连忘返。在他看来，打江山，坐江山，大丈夫固当如是。从事革命时，他把家中的田产全部卖光；待做了都督，家中所有债务都还清了，还债时，特意命人用洋油箱挑着银元前去。乡下的亲戚到都督府里去看他，他总要送他们一些钱，表示为人的慷慨。有一次，他的夫人回乡省亲，也都带兵前去。在离娘家三里路以外的地方，夫人和侍女就从明瓦大船上岸了。她们骑着高头大马，一路上洋号洋鼓，吹吹打打，引动远近的人们赶来围观。他还派人从乡下把外祖父接到府城里享福，用四人大轿抬着，到绍兴时，派了队伍出城鸣炮迎接。把那老人吓得几乎从轿子里跌将出来。由于都督权位的荫庇，府中人物，连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都换上了皮袍子，虽然天气并不怎么冷。

革命，确实给周树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畅快，但是隐忧不是没有的。他总觉得革命来得太突然了。几乎要使所有的人们都来不及应付，无论是官绅，还是市民。年底，他曾写过小说《怀旧》叙述革命军入城的消息所引起的乡绅、塾师以及佣人的惶遽情景。投映在他们眼中的革命军，一例为“长毛”，为“山贼”，为生活中可怕的侵入者。小说虽然使用了幽默的笔调，却不掩对于革命和群众的哀矜。而今，“三黄造反”的说法出来了，“同胞同胞，何时吃饱？都督告示多，日子过不了”的民谣也出来了。周树人感到十分不安而且愤慨，亲自找到王金发，让他严加约束。但是，他的劝告没有被接受。

突然，宋紫佩派人找他来了。

绍兴府中学堂的青年学生，以他们的敏感，同样意识到了革命的危机。经过开会讨论，认为宣传革命，应当有比武装演说队更好的办法，于是有人提议办报，对王金发的军政分府实行抨击。议定之后，宋紫佩建议征求周先生的意见。

利用民间舆论对政府实行监督，这是极好的主意。树人当即表示了他的看法。他想：革命的政府是不会害怕舆论的。害怕，只能意味着虚弱。只要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宣传喉舌，就可以构成对政府的某种压力。承受一点压力是十分必要的。

“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派来的青年望着先生，讷讷地说，“为了社会，我们知道您决不会推却的。”

用报纸来监督政府，特别是自己人的政府，的确是破天荒的事情。不过，以笔杆对抗指挥刀，无论如何不是好玩的，何况在王金发的背

后，踞立着全城的恶势力。但是，他没有怎么想及个人的安危得失，倒是想，拯救革命，必先拯救革命党。对于革命党，也如对众国民一样，没有充分地暴露是不可能达到彻底救治的目的的。

他同意了。

周树人答应青年学生的要求以后，便积极地参加了报纸的筹备工作。

报纸的发起人有：周树人、陈子英、孙德卿。报馆设在大善塔下的一幢旧斋房里。总编辑是陈去病，经理是宋紫佩，周树人则被公推为名誉总编辑。

两天后，出报的传单印发出来了。五天后，即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正式创刊。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一种服之不孕的毒刺——“黄棘”作为笔名，为日报撰写了一篇措词激切的“出世辞”：……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继自今而天下兴亡，庶人有责……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冀治化。纾自由之言议，尽小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唯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况复神驰白水，孰眷旧乡，返顾高丘，正哀无女。呜呼，此《越铎》之所由作也！骂，成了报纸的最大特色。开首骂的是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以后便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自然，王金发有什么革命措施，报纸都会采取支持的态度，如逮捕章介眉，修复秋瑾墓，准备北伐，等等。但是，那主调仍然是骂。

根据周树人的建议，报上开辟了“稽山镜水”专栏，刊载杂感式的时评。他自己就为这个专栏撰写了不少思想犀利的短文，如《军界痛言》一类。作人起而响应，也参加了写作。兄弟俩还根据《大陆报》、《东亚报》等外文报纸，包写“译电”一栏的全部文字，报道重要的国内大事和国际新闻。

作为一份地方报纸，《越铎日报》真可算得别开生面，因此，它的销售量也就由原来的二百份迅速增加到一千七百多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最初，报纸是从陶成章经办的“北伐筹饷局”里领取九十二元余款当作开办费的，买一箱纸和付一个月的印刷费，便一下子用完了。几乎是

白手起家。于是，同人就计划招股筹款，招股简章还是由周树人校改后交付印刷的。在发行方面，他也想了些办法，像找人包销，便可借用商业性手段弥补书生的鲁钝。一切在于扩大舆论阵地。除了撰文，他还常常到报馆里来，指导青年的工作。时间和精力的大量消耗，成了他的日常需要。他一面感觉疲乏，一面仍感觉亢奋。那个诞生在遥远岛国里的信念原来并没有被完全埋没，在此期间，他已经能够利用自己的文字，为改造国民根性，促进民主共和，做一点切实的工作了。

报纸与军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终于，有消息传到周家说，都督因为你们榨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鲁瑞听了，十分着急，叮嘱树人再不要出外惹事。树人笑了笑，告诉他母亲说：“王金发虽然是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们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会明白的，恐吓的话，也只不过说说罢了。”

他仍然照常地走路。晚上，还打起写着“周”字的大灯笼。

一天，徐叔荪跑到报馆，见到宋紫佩，十分神秘地说：“王都督看了报纸，暴跳如雷，敲着桌子骂：‘豫才是什么东西，给他一个好看！’”停了停，又轻声地说：“王金发总是强盗出身，说不定真的要做出事来。依我看，你还是劝豫才先生避避风好。”

宋紫佩听后，赶紧备了一封信，叫他的族弟子俊送到新台门去。

傍晚，很好的夕阳。周树人同范爱农在小堂前喝酒谈天，正上兴头的时候，宋子俊赶来了。

周树人拆了信，眉头一皱，放在桌子上，厉声说道：“我料他不敢！”然后，转身对宋子俊说：“告诉紫佩，谢谢他，但是我不走！”

这时，范爱农取过信看了，认真地说：“王金发是武官，骂过也就算完了。可他手下的那批人，却靠不住。豫才，还是当心点好，先避上一二天再说吧。”

周树人沉吟了一下，苦笑道：“好，依你的话！”又对宋子俊说：“不过，译电稿还得照常拿。至于到哪里拿，明天问我母亲好了。”

在革命的形势底下，他头一回开始避难。

第二天，宋子俊根据鲁瑞的指点，雇来乌篷小船，找到皇甫庄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才找到周树人。

周树人如约把夜间写就的一封稿纸交给他，临走时，特意嘱咐说：“你让李宗裕胆子放大些，别的不管，只管将稿子发出去！”

事实上，王金发并没有要杀周树人的意思。根据范爱农得的新消息，倒是派人给报社送去了五百元，而青年们也都把钱收下了。周树人闻讯，即刻到报馆去查问究竟，略说了几句不该收钱之类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反问道：“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周树人说：“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对于心粗气浮的少年，他感到争辩是毫无用处的，甚至可能因此引起其他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便默然走了。

眼前的气候一天天变得阴惨起来。

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上头的精神据说是咸与维新，不修旧怨了，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近似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这时，混进革命政府内部的立宪分子和各式的反动物物，都在加紧进行活动。章介眉被释与陶成章遇刺几乎同时发生，作为连发的信号，告诉人们：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危重的关头。

王金发做了都督以后，没有能够满足孙德卿的私欲，他便拉拢徐叔荪，联合地方的一些旧乡绅，其中包括刚刚获释的章介眉，共同反对王金发。他们利用“三黄”的一些劣迹，攻击王金发为“民贼”，把绍兴军政分府说得比清政府还要黑暗，甚至连逮捕章介眉也成了一大罪状。

以章介眉作为关节点，《越铎日报》同人迅速分裂为两派。

2月3日，报纸的面貌突然起了变化。编辑陈瘦崖乘陈去病、宋紫佩不在报社，写了一篇抨击王金发的文章，与另一篇替章介眉开脱的文章一起刊登了出来。报纸过去重在揭露章介眉的罪恶，现在则为他呼冤叫屈，过去也骂都督府，却不失批评的善意，现在已经对王金发实行人身

攻击了。

陈去病和宋紫佩从乡下回来，得知转向的情况，严厉斥责了陈瘦崖。斗争的大幕于是拉开。春节期间，封建保守势力在徐叔荪的支持下，突然占领了报社，片面进行改组。改组后，由孙德卿任总经理，陈瘦崖任总编辑，王文灏任执事。《越铎日报》就这样被阴谋劫夺了。

教育界每况愈下。起初，绍兴军政分府有过整顿教育的计划，正是在那么一点改革的氛围里，很快成立了新教育会。但是，现在连这个教育机构也任由自由党一伙把持去了。师范学校的经济十分困难，上面一直拖欠着不肯支付教学经费，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被迫采取提前考试和放假的办法。没有钱，怎么好办学校呢？

“天下多秋气，一室难为春。”周树人觉得举步维艰了。

正在这时，他接连收到许寿裳的两封信，信中转达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延揽之意，催他尽早去南京教育部工作。

——走！早该走了！

故乡。母亲。……如果说，初离故土的时候，是出于激愤的支配，决绝之中也未销尽少年的单纯，总算有一个奇异的梦境在远方招引；而今梦已做过了，异样的地方和异样的人们，也都一一阅历过，那么还要寻找什么？革命？光复的绍兴不正经受了一场革命的洗礼？最时新的招牌和口号都有了，啸聚山林、浪迹江海的革命者来到了坐大轿的时代。抬轿子的那么多：从旧官僚，立宪党，一直到身份不明、临时入股的投机家……革命的元凶已经复活，知识者因清醒而受伤，惟有底层的人们依旧平安，平安而沉默。虽然光复时泛起过倾城的欢乐，但也如同看赛会一般的新奇罢了。他们不可能具有国家主人那样一种解放的愉快，因此也便不可能产生失却的警惕与悲哀。他们早已习惯各种压迫、摆弄，以及周而复始的变迁，从来就没有认真期待过……

十四年过去了，寻找的十四年。又是离家，又是南京。《天演论》、《浙江潮》、《民报》、《河南》……真可怀疑，中国，是否能够被革命所拯救？革命。如果陶焕卿健在，是不是还有必要再辩论一回呢？那时候，整天做着关于“动”的宣传，至今大“动”才过，是不是还需要再“动”下去？要是他健在，而且真的做起“焕皇帝”来，也许一点也不许“动”了，也许要比王金发更厉害些呢！……

文学，哲学，思想，教育，都太迂远了，现实的问题是：日益腐败的政府，分裂的报社，一文不名的学校……危机四伏……尼采说“超人”，大约因为他还不至于陷落到彻底的困境。其实，个人意志算得了什么呢？环境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作为革命的领导人，陶焕卿之死不是来自迎面的屠刀，而是背向的阴谋；作为革命的拥护者，自己也未始怯于群鬼的包围呵！但是，无论死亡或败退，都是当此革命胜利的时刻……

真正的痛苦属于思想者。在革命的旗帜下，周树人感觉到一种蒙受欺骗的屈辱了。

他把离绍的决定告诉了范爱农。这位亲密的合作者很表赞同，只是神色间颇为凄凉，怏怏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

2月19日，《越铎日报》发表了一则《周豫才告白》：仆已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校内诸事业于本月十三日由学务科派科员朱君溪至校交代清楚。凡关于该校事务，以后均希向民事署学务科接洽，仆不更负责任。此白。人间鲁迅（上）

## 五、夜茫茫

在古都北京，频繁的权力斗争与人事更迭，意味着封建政体的再生性与稳定性。当环境变得无可选择时，他便一面抵御无涯的黑暗与寂寞，一面利用可能的一切条件，默默地做着整理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工作。他始终把握住自觉意识，以不倦的探索，实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

### 37. 范爱农之死

仿佛一枚成熟的果实，被革命的硬喙那么一剥啄，便皮肉去尽，只余硬核，遗失在远方的角落。于阴暗之中，居然也慢慢地长出根来.....

那是风沙洞的北京。

在南京，只作两个多月的短暂的勾留，便到这里来了。初到教育部工作时，曾经复萌过对于民国的一点希望；北迁以后，就全部给黑暗吞噬了。毕竟是帝都。千百年的污浊，难道一场雷阵雨就可以洗刷干净么？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在存在的三个月期间，发布一系列命令，禁止刑讯体罚，禁止买卖人口，革除清朝官厅的称呼，宣布学校一律废除障碍“民国精神”的旧科目，小学废除读经；此外，大力宣传“非常之建设”，发布了一些有关“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实际上，保护“人权”的口号只是停留在纸片上，对于农村中盘根错节的封建关系并没有丝毫的触动。虽然，“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改革图景一度引起人们的兴致，“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工业建设会”、“西北实业协会”等经济团体纷纷成立，并且发行了《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等刊物，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其混乱和腐败的情况是同步的。由于整个政治结构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组织间的各种派别和势力明争暗斗，互相掣肘，孙中山等对于建设的倡议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当时，革命派并没有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临时政府内部，最初屈居于次要地位的立宪派实力迅速膨胀，足够可以摇撼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就这样，随着革命形势的倾斜，人们殷殷向往的建设机会也便完全丧失了。

中国历代的政治家精通权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取得帝国列强的支持下，纵横捭阖，先把朝廷的权力集于一身，然后收买、笼络和利用当时处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第三种势力”——立宪派的头子，从而，以手中北洋军队的强大兵力，对革命派一面作战，一面议和，一面麻痹，一面胁迫，终于致使南京的参议院以合法的形式，把他这样一个大野心家、大独裁者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两个月以后，接着迁都北京。

探索者/夜茫茫人间鲁迅（上）“惊人事业随流水”。一切努力，都变得无法挽回了。

周树人住在绍兴会馆里，这是他离开老家以后，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会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半截胡同出口处，是有名的菜市口——前清时代杀人的地方。戊戌政变时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就在于此。时间相去不远。当时有这样一条规定，凡馆内住户不得携带家眷，这样，自然可以把相当的清静剩给周树人了。

他最初住的“藤花馆”。据说东边有一个藤花池，但这时已经不生涟漪，也不见藤花的颜色了。入夜，邻居却吵得厉害，使他心里特别烦躁。不过，即使器声沉寂，他也未必安宁的。“心事如波涛，中夜时时惊。”几年来，他常常会想起李贺这些诗句。此际，便不得不惊异于这位早逝的鬼才，早在一千年前，即已如此熟悉类似自己的这般无路可走的苦情……

教育部在前清学部的大衙门里办公，离住地不算太远，不用车子，走一下也就到了。

袁世凯篡夺总统职务以后，仍继续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长，次长则由南京时代的景耀月，换成曾经担任过清末学部参事官的范源濂。旧学部人员留用的很多，他们的封建意识非常浓厚，这样自然形成一个顽固的壁垒，把南方来的部员一概视为革命新党而加以排斥。旧官僚出身的范源濂更是一个权欲熏心、可恶透顶的人物。他上台以后，立即把北方派系抓在手里，加以博得袁世凯的支持，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教育部的实权。为了进一步培养羽翼，他还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对抗蔡元培。在部员中间，新派人员本来很少，而且又有一些极易妥协的分子，于是，像周树人一样的坚定分子，不久便显得相当孤立。

官僚性的作风是与整体的机构和制度相适应的。5月15日，周树人到

部里正式上班。从头一天起，新的工作环境所给予他的印象十分恶劣。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枯坐终日，极无聊赖。”部里对等级差别、文牍程序之类，都有极其离奇而烦琐的规定，但是，真正的官僚是从来不受它的约束的。每天早上，只消在簿子上画上一个“到”就行了。不管案卷如何地积如山丘，部员们照例地混日子。办公的时候，有的下棋，有的品茶，有的念佛经，有的唱京戏，还有的则用尘拂啪啪有声地大掸其身上的灰尘……

比起在南京的时候，周树人的意气的确消沉多了。大家都无意办公，即使一个人孜孜地干公活，又于事何补呢？因此，每当上班，除了一些必办的公事需要办理之外，他便一头埋进古籍里。在书籍与书籍之间，只要情致接续不上，就又沉入到国民和历史中去，作冥冥漠漠的遐思。

南京远了。故乡更远。但有《越铎日报》、《民兴日报》以及家书，可以让他时常靠近他所熟悉的地方和人物。然而，由文字传递过来的信息，却是日渐增加着他的忧郁的色彩。7月19日，二弟的来信告诉了他一个极其意外的消息——

范爱农死了！

这是他归国以来所承受的一次最为惨重的打击！什么革命、民主、共和，一刹那间，全都被眼前的事实击得粉碎！

本来，爱农是浮水的好手，怎么可能被淹死呢？他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地又觉得极其可靠，虽然并无证据。这样，一连几天过去，他都无法消释心头的悲凉……

周树人离绍以后，继任的是孔教会会长傅励臣。他一面敷衍范爱农，留他作监学，一面同自由党头目何几仲串通一气，极力排挤他。不到一个月，他就被赶出了山会师范，连铺盖也被扔到门外去，处境十分狼狈。后来，他到岳父家里去寄食，无奈岳父只是城里的一个小学教员，生活也很清苦，于是又跑到杭州去，找一位姓沈的老同学谋事情做。但是，这位身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司长的同学并没有帮他的忙，无法可想，只得仍旧逃了回来，依靠陈子英接济过活。这时，在《越铎日报》内部，宋紫佩一派同孙德卿一派的分裂已经公开化了。这群热血少年，另外办了一家新的报纸——《民兴日报》，继续同危害地方革命的恶势力做斗争。范爱农就住在报馆里，有时也执笔写写社论。他很困

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其实，他已经很少同人们来往了，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年轻人。然而，渐渐地，他们也好像不大愿意听他的牢骚话，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豫才来叫我的。”或许是解嘲，或许是自慰，反正他时常这么说。

在他所有的朋友中，恐怕真也只有周树人一个人能够理解他，值得他信赖。分手以后，他经常写信给周树人，仅5月15日至6月4日，就写了四封，平均五天一封。被赶出学校不久，他在信中这样向朋友表白心迹：“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生活愈穷困，那言词也愈加凄苦。

周树人很想为他在北京寻一个位置，知道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一直没有机会。当他刚到杭州，知道周树人返回绍兴时，还特地写了信来，说：“相见不远，诸容面陈。”怎么知道，从此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呢！……

一个生来就跟世界互不协调的人，他以他的诚实，让人感觉怪僻；他以他的执著，让人感觉孤傲。拿早年留学日本来说，他就始终不愿进入官立学校，虽然进入官立学校的学生可以领到官费，而且毕业回国，面子和资格都有了，容易找到较好的职业。相反，他进了一所升级和毕业都很难的私立学校。以这样的性格，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势利社会里怎么能不碰壁呢？在绍兴，谁都知道他是一个老革命；可是谁都不承认他是一个老革命。“徐案”发生以后，他是遭通缉的一个，好在最后还能保留住一条萎顿的生命。革命一来，没快乐上几天，就又还原成革命前的范爱农了。平时，他每以白眼看人，却热心革命；他戴毡帽，穿蒲鞋，从来不修边幅，却认真办公；他喝酒，醉眼朦胧间也说些呆话，却是周围最清醒的人。革命军进城时，他是何等踊跃！送朋友离绍，又是何等悲哀！然而，所有这一切，都随故人的逝去而烟消云散了！他那么信任革命，而革命却不信任他！要是他还活着，他也还能像最初那样，伸手去摸王金发的光头皮吗？……

突如其来而又莫名其妙的死亡……

凡有个性的人，诚实的人，清醒的人，就注定要被这个世界抛弃。

罪恶的黑手……

22日，大雨滂沱。周树人没有上班。晚上，同许寿裳等几位朋友一起到陈公猛家，为被挤去职的蔡元培饯别。归来已值深夜，独坐备觉凄清。他再次想起了许铭伯讲述的谭嗣同雨天就义的情景，不禁默默暗诵严复的悼诗：“求治翻成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革命所需要交付的代价如此之大，其实又何止乎流血！如果说，谭嗣同是有声的牺牲，那么范爱农则是无声的亡逝了。有声之死，尚能使后人缅怀壮烈，可世间有谁注意到死于无声的爱农呢？有谁能为他写几句哪怕是多余的哀词？这时，杜甫的许多在飘泊支离间写成的苍凉的五律，都如奔矢般聚集心头……

凝听无边的夜静，哀思绵绵，他第一次以老人般的情怀，写下三首整齐而凝重的诗篇：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黑，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第二天，周树人把写就的悼诗取出来看，无意中发现“鸡虫”正是何几仲的“几仲”的谐音，真是奇绝妙绝！带着一种报复的快意，他随即在诗后附加了一段话，暗示这层意思。收束的两句是：“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其中“天下

仰望已久”一语，原出于接收山会师范的学务科科员之口，当时绍兴知道这句口头禅的人很多。这么一骂，那针对性就显露出来了。他正要告诉何几仲们：即使远在他乡，奈何你们不得，但是你们有办法堵住我的嘴吗？

写完，他具了姓名，接着又涂掉，换上“黄棘”两个字。必须使用为爱农所喜欢的笔名，他想。于是，便轻快地折好笺纸，套上信封，给《民兴日报》送去。

### 38. 官吏生涯：不满与无为

周树人获得了一个晋升的机会。8月，他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官职成了新的困扰。本来，从这个司所执掌的事务，诸如关于博物馆和图书馆，关于文学和美术，关于动植物园等事项看来，正好包括了他曾经为之追求不舍的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手段，可是他深知周围的环境，料想只身奋斗也不会创造什么奇迹。然而，与其让头脑冬烘的遗老或是不学无术的奴才把持，倒不如就由自己统管起来。他想，利用职权，独行其是，总可以在现代文化的空地上作一点开拓性的工作吧？

他决意充当这个在他看来还不至于十分可恶的官长角色。

但是，他太健忘了。

大凡富有理想的人都容易健忘。由于热情的驱使，他们往往向前看而忘却惨痛的教训，甚至是刚刚留下的巨创。

说远一点：在山会师范，作为监督苦苦撑持，最后结账时才剩下一角又两个铜板；说近一点：初来北京，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从事美育普及工作，其结果是一样悲惨。那时，教育部举办“暑期美术讲习会”，他担任题为《美术略论》的讲授。开头有人退席，中途出现空场，接续近两个月时间的冷落局面，丝毫没有使他感到气馁，意想不到的只是，讲习会还没有结束，“临时教育会议”就断然做出了“删除美育”的决定。为此，他在日记上写道：“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可是，除了腹诽，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表示自己的抗议呢？

不过，此人的确强韧得可以。按照原定的时间，跑到原定的地点，他又继续作他分内的讲演。最后一课，听众只剩下一个人，但这已经使他像遭逢知己般地感到满足了！他知道，在这个丑剧不断上演的世界上，毕竟还有爱美的人！

上任不久，教育部成立了一个美术调查处，目的是为了给建立美术馆和博物馆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材料。这个机构设在教育部内，不作行政编制，其中人员有不少是兼职的。周树人是其中的负责人之一，但是，他根本无法在一个松散的组织中调动力量，去做系列切实有效的工作。美术调查处成立后，除了派去齐寿山、许季上和戴芦三人前往沈阳考察清宫美术物品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项较为重要的调查活动。

周树人的个人计划倒是有的，从他次年2月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可以发现他对美学源流的深入了解，以及一个战略家和实践家的恢宏气派。文章上承东京时期系列论文的血脉，再度表示对于物质文明日益曼衍，而人情随之日趋肤浅的危机感，指出：“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多方面阐明播布美术的重要性。在批判“沾沾于用”的实用主义态度的同时，批判企图使美术神秘化和贵族化的做法，从而坚持了美育普及的平民化方向。虽然文章已经从原来的发扬“摩罗”精神以撻人心的叛逆立场，退回到了一个“起国人之美感”，“辅道德以为治”的温和位置，但是所有这些设想仍然不可能真正地付诸实施。在一些长官和同事看来，什么意见书，不过是书呆子的梦呓而已。

作为部内职员，周树人多次出席读音统一会的会议。在会上，新仓颉们并没有认真讨论问题，倒是借机尽量地标榜自己。在采定字母方案的议程中，便分成几派，互相攻击。会议的正、副主席吴稚晖和王照非但不加制止，为了入声存废问题，居然也彼此破口大骂，混战起来。周树人实在感到讨厌，希望能制订一个方案尽早结束这场战争，于是同朱希祖、许寿裳、马幼渔等几位旧友一起亲自动手，以章太炎早年拟定的一套标音符号为基础，用构造最简单的古字制定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在表决时，他们的建议获得多数通过。

轻易的胜利，却不曾使周树人感到乐观。他知道，这套字母根本不可能代替汉字，只能注在汉字的旁边，起到一种拐棍的作用。况且，有了拐棍，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可以蹒跚地走路呢！

身在官僚阶层，要想绝对抗拒官场习气的侵入，那是不可能的。为此，周树人深以为苦。

他明知伍博纯主持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不是好东西，一旦被拉，还是推却不得，敷衍加入了。后来经过改组，由教育部长汤化龙发布命令，指派他为小说股主任。很早以前，他就从林纾和梁启超那儿知道了小说的作用，不但阅读了不少中外小说，而且亲自翻译过和创作过，应该说，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开始，他确实表现得相当积极，频频召开工作会议，拟订“办事细则”，讨论“进行方法”，根据事先制订的章程，对来自不同单位的会员作了调查、审核、编译等几方面的分工，其中特别注重小说的分类以及审核标准问题，为此，还指定会员整理成草案，以便进一步深入研究。正在这时候，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麟变成了教育总长，次长兼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也由梁善济换成了袁希涛。

二人君临教育部以后，立即召开大会，重新确定工作方针。张一麟在会上说：“……宗法社会遂为中国社会之精神，一家人咸听命于其家长，孝悌贞节，皆为美德，著于人心，蒸为风俗……”还说：“而积极一方面，则编辑极有趣味之小说，寓忠孝节义之意，又必文词情节，在在能引人入胜，使社会上多读……”周树人开始感到危险的威逼；这种危险，并非来自对治者们的压力的恐惧，而是出于一个曾经战斗过来的精神战士的警觉与自责。最先，他是打算通过审核，在社会上清除一批淫猥与无聊的读物的；至今才知道，在那份关于审核标准的草案中，留有不少可以纳入专制思想的空洞地带。譬如规定小说必须“合于我国之国情”，“国情”者，可否就是总长的所谓“中国社会之精神”？说借小说“补助道德之不逮”，“道德”者，又是否系总长的所谓“孝悌贞节”一类“美德”？……他决定放慢脚步，拖延审核的时间。

但是，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于文艺和教育一窍不通的总长以及经理干事之流，却不容许他这样做。他们提出尽快编译“妇孺皆知”的小说“以期普及”，简直是推着他的脊背走。在第十二次会议上，次长袁希涛对从前的议案多所指责，无视大家的意见而中途退场。长官以及奴才的这种气焰，是可忍孰不可忍？周树人终以部务太繁，不能兼顾为由，稟请辞职。

在第十三次会议上，小说股主任的名字果然改变了。

稍有成效的，还是那些相对带点独立性的工作。从1913年起，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管京师图书馆。实际上，这位酒徒只是挂了个名字，真正的管理工作却是落在第一科的周树人和沈彭年的头上。改组，迁移，扩建，从选择馆址到计划预算，大小事务都得亲自过问，有时候

简直被弄得昏昏糊糊的。为了筹建历史博物馆，他也耗费了不少心力。当初视察国子监和学宫，见到被剝为白的古铜器，自己心里也曾有着被剝的痛苦。1913年，为筹备将于次年在莱比锡举办的以展出墨迹、书籍为主的“万国博览会”，德国派了会员米和伯博士来华，并在北京设立“筹办处”。由于中国在楮墨拓印方面历史悠久，所以被列为首位展出。这时，米和伯同教育部取得联系，要求向历史博物馆借取展品。周树人将十三种藏品送到部里，因为珍贵，当晚回寓所拿了两张毡子，就睡在藏品旁边，这样守护着直到天亮……

这位面向西方的爱国者，是如此热爱自己的国宝。他不止一次把自己买到的文物，如瓦当，如大镜，赠送给历史博物馆，作为小小的象征性的纪念。

周树人还参加了两个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一个是儿童艺术展览会，一个是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向世界展示纯净的灵魂和茁长的智慧，展示民族未来的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在展出前后，周树人都很忙乱，连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

他是重视儿童教育的，这种重视，多少包含着对于成年一代的失望吧？他重视儿童心理的研究，重视儿童读物的收集与流布。在充满压抑的空气中间，他尽力为作人翻译的《童话略论》找出路，自己也动手翻译了《儿童好奇心》、《儿童观念界之研究》等论文，还那么有兴致帮助作人收集儿歌。最令他反感的，是冒充儿童创作的赝品。他不容许大人们向孩子装正经，扮鬼脸。孩子应当有孩子的世界。

许寿裳为长子许世瑛挑选的启蒙老师正是周树人。在开蒙的上午，他给那小孩工工整整地写了两个大字：“天”、“人”。这是两个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的字眼呵！“天”在上面，“人”在下面，它们就这样长期对立着，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

其实，何止孩子难于索解此中的奥义呢？即使曾经沧海，在“天”与“人”之间，也难免要感到困惑与悲哀。

进京以来，所见官场的怪事不少：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升做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可以化为内务部长；司法官、海军总长，可以兼做教育总长。而且，总长们就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甚至几天就能换一次，几年间也在一打以上了，这群长官大抵是做“当局”的，升降浮沉，都有一定的背景。底下的小爬虫，其纷纷扰扰地争官做，便挤轧得更加厉害

了。为了赢得主子的赏识，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袁世凯要做皇帝了，先使爪牙在政府各部门活动，其中也暗暗通知了教育总长，让他上一份呈文，在自己的名字前头写一个“臣”字，这样便是表示拥护了。总长立刻照办，但是用什么为题呢？挖空心思，结果作了一篇呈大总统文，请提倡小学教育。呈文在报纸上发表了，有些教育界的热心家却忽略了那个重要的字眼，读后反而高兴得不行，互相告语道：“现在要振兴小学教育了！”

险恶的环境真使人逆料不得，防不胜防。就说夏司长夏曾佑，本已绝望于政治，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情是万不可办的，整天大喝其酒，敷衍度日，怎知道这位曾同严复一起办报，先后鼓吹过“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风云人物，竟是孔教会的发起人！孔子生日，总长汪大燮令部员前往国子监跪拜，据说还是他出的主意，何等的阴鸷可畏！

袁世凯是很少召集教育部同人讲话的。在总统府，他那冗长的训词都说了些什么？无非重复他从前在任北洋军阀期间，曾经编辑过多少种教科书之类的“史话”。对于目前民国新教育的宗旨和方针，简直毫无认识。装腔作势，空洞无物，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显示个人的政绩与才能。所谓大人物大抵如此……

这就是所谓环境了。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中，难道真的可以做事的吗？

### 39. 补树书屋·佛经·古籍·碑帖·沉默的深渊

袁世凯成了权力中心。他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帜，通过虚假的选举，做了正式的总统，接着向复辟帝制的目标过渡。革命党人始终是他的心腹之患，因此，他处心积虑极力设法捕杀。继陶成章之后，宋教仁被刺，王金发也被诱杀了，大批国民党人被送上断头台。在满洲，章太炎遭到软禁。孙中山以“武力讨袁”为号召，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发檄讨袁，发动“二次革命”。揭竿不久，即在镇压下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于是再度亡命日本……

这位大独裁者，在诉诸武力的同时，加强舆论钳制。他公布《报纸条例》，剥夺新闻自由，公开鼓吹“莫谈国事”，回避政治。作为屏风和装饰，宪法起草委员会秉承他的意旨，公然把孔子之道作为“修身大

本”写进宪法。儒家“忠、信、笃、敬”的绝对忠诚，正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因此，在就任总统的当天，被他定作“立国之大方针”而加以宣布。于是，尊孔、祭孔活动一时盛行国内，人物无论新旧，也不管愿意与否，一律在这个背时已久的思想偶像面前敛首低眉……

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的五色旗被扯得粉碎，袁世凯终于登基称帝了。31日接着下令，次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在洪宪帝制运动活跃的时候，袁世凯进一步完善他的特务系统。整个北京城，连饭店客栈，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因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就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大小文官受到更加严密的监视，凡反对帝制或表现不服者，都有人暗暗盯梢。在这样的空气里，他们只好想尽办法躲避注意。重的有人赌博，讨姨太太，轻的则玩弄书画和古董……

专制而恐怖！

周树人从偏远的绍兴来到京城，从基层来到上层社会，因此得以从一个较高的位置鸟瞰全国革命的形势。满清的时候，他还未曾如此地失望过；现在对中国，却是深深地失望了！中华民国，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也许本来就未曾存在过……革命以前，自己是奴隶；革命以后，反而是奴隶的奴隶了！烈士的血迹被踏灭，其实又何止于革命新贵的脚印？他觉得有许多国民同时也是民国的敌人……

他反对过，但是没有效果。

范源濂复任总长时，提出“祭孔读经”，他就是坚决的反对者。每年祭孔，都要经受一场重大的屈辱：作为一个执事官，虽然按照等级还够不上顿首或者鞠躬的资格，但也总得戴了冕帽，将“帛”或“爵”规规矩矩地递给诸公。这回，他同许寿裳、钱家治、张协和、张宗祥等从浙江同来教育部任职的五个人一起，联名写信驳斥“祭孔读经”的荒谬。该信一式两份，一份送范源濂，一份摊放在办公桌上，让大家观看。

结果，这几个人都遭到了报复，被排斥到外地去。周树人因为是社会教育司的，才侥幸免于外放。

周树人深知个人反抗的无力，何况反抗的武器惟有一支秃笔！写文章固然不能，写信也不得许可，那么剩下就只能作作日记了。可是，日

记里又能记些什么？ 晔，阴，雨——如此而已！袁总统就任之日，聊且写一句“天候转冷”，记录那令人彻夜失眠的遽变。无字可以纪念国耻，为了给纪念日留下一个永久性的烙印，当天，他自己给自己发了一封信，以期保留一个特别纪念邮戳——这是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呵！

但是，周树人不能，也不想做出彻底的牺牲。牺牲是无谓的，他知道，应当尽可能地保存自己。而且，自己活着，着实已经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了。他有家，有母亲，而且连信子外家的经济负担也得部分落在他的肩上。他沉重着呢。

1916年5月6日下午，周树人搬进了绍兴会馆西边的“补树书屋”。

从前，院子里长着一棵大楝树，因为被风刮倒，补种了槐树，故有“补树”的名号。据传槐树上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这屋子也就一直没有人住；书屋前倚供奉历代乡贤牌位的“仰葢堂”，后靠供奉文昌魁星之类神位的“晞贤阁”，真可以说是与鬼神为邻。

周树人正是为了逃避喧嚣的人声才住进这里的。在这鬼气森森的地方，他读佛经，抄古籍和碑帖，直到深夜一两点才睡。他房子里连糊冷布的窗也不留一个，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纳凉，从密叶的缝隙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 and 若有若无的星子。晚出的槐蚕，吊死鬼般在空中摆荡，每每冰凉地落在头顶上……

长久以来，他一直同古籍进行搏斗。起先，他一边麻痹自己，一边在线装书的死海里打捞越中先贤的遗迹和古小说的残骸。在南京，于办公之余，便常常同许寿裳一起影抄从江南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沈下贤文集》中的三篇传奇，曾经使他收获不少欢喜。可是到了北京，情况就有点不同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抄了《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谢氏后汉书补逸》、《云谷杂记》、《易林》、《石屏集》等，还参照诸本，多次校录《嵇康集》。除去钩稽小说的材料之外，他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历史，尤其是野史和笔记中来了。他发现，这些古籍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淘洗，尚有峻嶒的骨头和热血的蒸气。谢承、谢沈、虞预，他们都是故乡的先贤，功名淡薄而潜心著述者。谢承的《后汉书》，一反正统的风气，不作帝纪，是极其难得的。可是其草创之功，却已大都混杂湮没在后人的史籍和类书中间，他不禁深感先贤埋头苦干的寂寞了。至于嵇康，简直是硬干，“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和当权派不合作，敢于向庸俗虚伪的礼教宣战，更是为他所佩服。在政治高压下，不要说十年前为之鼓吹的“挑战反抗”，要作沉稳

的抵御已属不易，此中需要一种特立自持的精神。的确，他从嵇康的文字中秉承了作为异端的人格力量。古今无所谓界限，在他眼中，袁氏政权与司马氏政权是同样的黑暗！

在古籍的延长线上，他正式接触到了佛经。虽然，早在日本的时候，他就已经从章太炎那里一再听过“宗教救国”的宣传，但是，凭着对革命的信仰和从西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意识，总觉得先生对于佛学的过分强调未免有点走火入魔了。他怎样也想象不到，今天竟用了佛家的经典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进京之初，对于佛经还没有什么热心；1911年，书账从一种增至四种，表明了可怕的接近，而到了次年4月，购置的数量便大得惊人，一年中间已不下八十种。从这时开始，他不与别人接近，一个人到琉璃厂买了来拼命地啃，只是间或同许寿裳谈论一下佛经教义，或和住在故乡的二弟互相交流着看。

开始，他只是从佛经中抽取关于古典文学的某些资料，如《法苑珠林》、《大唐西域记》等，就具备这方面的用途。他刻印《百喻经》，抄录《法显传》，也都曾经着迷于其中广博的比喻与清丽的文辞。但是后来，作为必然的结果，他无疑侧重于佛经与整个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的事实。在读佛经的同时，也看庄老的著作，探寻三教合流的过程。当他对宗教哲学思想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旁及中国社会历史的病根时，他不能不受这方面的感染。不过，感染过病毒的人才能有效地抵抗病毒，这也是实在的。

佛教，以“苦”来解释人类世界的宗教，其中唯识学派对于主观内省的重视，华严宗对于彼岸性的精神世界——“法界”的追求，小乘教寻找自我解脱所作的坚苦修行，都使这位人类灵魂的勘探者产生很大的兴趣。阅读之余，他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时有许多难解的人生问题，不想他早就大部分给明白启示过了，真是大哲！”

为了躲避政府鹰犬的耳目，部里的人都各有一套防身的本领，连许寿裳也学会打漂亮的麻将，可是周树人什么也不会，在阅读古籍和佛经之余，只有玩古董。

1915年，他开始大量收集各种古物、古画、古砖和古碑，特别是汉代画像、六朝造像和唐代石刻，以及金石文字的拓本。购置不到的，还请人在外地代买代拓，或是借来摹写和抄录。罗振玉编的《秦汉瓦当文

字》刚刚影印出版，他使用二十二天时间摹写了全书。弄碑刻之类，的确是一件最消耗时间的工作，而他也乐得这种消耗。从拓本上抄下本文，与《金石萃编》等相校，从中发现可能的一个又一个错误，这样边录边校，往往要挨到深夜一二点钟。长夜漫漫，他真希望快点消耗完黑暗，否则就消耗完自己。

不过，在暗暗的销铄之中，他也时有振作的。他常常从别人所不经意处培养着自己的兴趣。譬如汉魏六朝石刻，以前的考据家只注重文字，而他却注重画像和图案的研究。这位自小酷爱美术，具有高度审美眼光的中年学者，在独辟蹊径的研究中，伤痕累累的心，遂沉浸在美妙绝伦的图案里而感受到少有的愉悦。

他颇有点自豪地对许寿裳说：“西洋名家交口称赞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怎知道其渊源是出于我国的汉画呢！”后来，他还编《汉画像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以期把寂寞中的收获留给世界。凭着碑石精美的雕刻，他窥测着那一时代的风俗习尚，撷拾历史的孑遗。当他几乎已绝望于文学前途的时候，曾有过别的动念，就是走进祖国的文化遗产中去，写他所触摸到的文学史、美术史、字体变迁史……

玩物往往丧志。在金石实物和拓本的包围中间，周树人的意向并没有沦丧，只是被压抑到了意识阈限以下。他仿佛如雪野中的动物，在黑暗里进行着一场冬眠。可惊异的是：对于文学的原始的冲动和愿望，仍然梦魇般不时地释放出来。

他极力推荐作人的译作，发表海涅的译诗，撰写《异域文谈》，这些活动，都象征性地说明他在暗暗作着绝望的挣扎。不过，放出阈很快就关闭了。其实他阅读古籍、佛经和从事金石研究，不都可以视作一种象征么？因为他毕竟从中持续着精神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是被压抑的冲动的要求和自我的意识阻力之间的一个折衷。用周树人自己的话来说，这叫“麻痹”，叫“装死”。当一个人无力抗争而又不甘颓废的时候，“麻痹”和“装死”，应当说是积极的。正是借此，他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

他有时也自轻自贱，至少对身体是这样。庄子式的随随便便，既拯救了他又毁坏了他。在北京，他恢复了东京时代那种俭省而又没有节律的生活。他习惯不吃早餐，由于教育部的膳堂办得很糟，午饭和晚饭，就包在“海天春”、“镒昌”一类小饭馆里，或者到附近的“广和居”去吃廉价的豆面炸丸子。时间来不及，就买点馒头、饼干充饥，再就是到街头

饭挑上买饭吃。要是自个儿弄饭吃，书桌上也往往只摆着一碗炖肉，一碗汤，从不晓得怎样改换菜蔬似的。持久的精神折磨和游击式的进餐，使他的身心同时受损，胃痛、牙痛、神经痛、气管炎、神经衰弱，开始交相出现。看病和服药，从此成为他的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一切的一切，都得适应环境。四周是漆黑的，你不能发光；四周是寂默的，你不能声张；四周是平和的，你不能动作——这就叫“适者生存”。一个战斗的进化论者，于是得以时时体味人生最深刻的一种悲哀——自嘲。

多少年以前，曾请族人刻过一个图章：“绿杉野屋”；而今是住进“补树书屋”里来了。没有野气，没有绿意，没有青春的气息。来京不久，收到作人寄来的小包裹，拆看内中戈庚所著NoaNoa，它所记叙的这位法国画坛猛将逃向泰息谛的生活，那是多么的令人神往！孤岛，野蛮人，像大自然一样纯真而美丽的风俗人情，那么强烈地诱惑着他的记忆和想象。可是，他已经不复能够回归到少年时代，回归到故乡和底层中去了。正是“而立”之年，他随同北迁的政府一起走向崩溃。此刻是置身在最高官僚阶层里，在张开着却又不断收拢着的大网中间。他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将是什么。好友陈师曾以刻有“俟堂”的印章见赠，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正是这层无可等待的意思吗？

无可等待也是一种等待——

那么，等待吧！

## 第二部 爱与复仇

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鲁迅《一觉》

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

——鲁迅《杂忆》人间鲁迅（上）

## 六、最初的战叫

东西方文化的撞击，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电闪雷鸣的辉煌瞬刻——五四时期。

蛰伏成为过去。

作为传统的反叛者，他的叫喊也许不算最早，但是，却无疑是最清醒、最坚实、最激越的人的声音。

### 40. 关于“铁屋子”的议论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忧愤和疾病的困扰中死去。在一个高度的政治文化专制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存废，可以足够牵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脉。独夫死后，强控制的局面立刻松弛下来。权力真空出现了。于是，在北洋军阀内部和南北军阀之间，陆续出现各种各样的角逐。而这时候，自由民主的潮流，在长久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可怕的骚动与喧哗。

中国社会，已经不复为武人专擅的世界。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崩解，知识分子迅速分化为独立的力量。科举制度的取消，最后切断了他们同官僚阶层的固定格式的联系，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稳定的附庸地位。他们重新寻找自己。外来的思想成群结队飞过中国的天空。不同方位的瞻望与追索，带来了一个共同的发现：面临的全面危机，并非仅仅由异族的铁骑所引起，传统本身才是民族变革的主要障碍。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同时开展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的斗争。这群自由职业者，不再学他们的兄长那样，把热血全都交付火铳与枪膛。异质的观念意识直接成为掌握中的武器。就从这个相对宽松的历史罅缝里出发，一支由《新青年》杂志所纠集的先锋队，开始向现代突进了。

爱与复仇/最初的战叫人间鲁迅（上）一代精英集中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坚持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原则，实际上保护了这些异端分子，为他们进一步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1917年1月，《新青年》主编

陈独秀被任为北大文科学长，编辑部随之从上海迁到北京。从此一场父与子、新与旧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继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首次高张“文学革命”的旗帜。

如果说古老的封建营垒——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那么，北京大学就是它的中心。

作为现代的人，再也不可能像古代的遁世者那样，可以全然不管秦汉魏晋的更替。对周树人来说，兄弟在北大，同学在《新青年》，根本无法割断自己跟时代思潮的联系。只要听得见涛声，他是不会拒绝融化的。更何况，他从来就不具备隐士的性格。

周作人是在1917年4月来到北京的。

两年前，作人便有来京做事的要求，为了离开绍兴，甚至说什么科员之类也都可以做做。但是，树人没有答复。理由同劝阻宋紫佩一样，以为潮流汹涌而无立足之地的缘故。当时，朱希祖算是尽了同学之谊，介绍作人到大学里教英文，没想到他在没有征求作人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径自回信谢绝了。直到最近，由于环境的好转，有人重新提议让作人到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他才改变了态度，等到取得蔡元培的书面答复之后，立即寄出六十元旅费，催促作人成行。

这些年来，他对时局的看法十分悲观，即使感觉到了某种变动，也仍旧以惯常的怀疑和忧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日子。

二弟到来以后，树人便把南向的居室让了出来，自己移到北头的一间里去。从窗门到室内诸物，作人都做了一番新的摆布，而他却一直生不出这份近乎闲逸的情致，每天办公回来，几乎完全陷入了古籍和金石拓本的围城之中。

记得他从日本归国时，曾着意带走一束樱花，而今到哪里寻找那片绚丽的回忆？想不到的是，他竟无聊到用木盒子养起壁虎来了。至于脾气，也越来越坏。他隐默时可以一言不发，激愤时就喝酒，仿佛立意要毁灭自己似的。夜间，不知道谁家的猫来屋上骚扰，他往往大怒而起，拿起竹竿追打不舍。总之，在作人眼中，大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一天，树人拿来几册《新青年》，交给作人道：“听季芴说，这里面很有些谬论，可以一驳的，你翻翻看。”

一个倡言“文学革命”的杂志，登的尽是古文，未免有点滑稽，但作人并不觉得它有怎样的乖谬。那么何以会招惹明敏如许君的非议呢？该是用了过去《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的吧？然而，二弟的看法便对吗？……

用手造的墙，把自己同时代隔离开来总是不好的，周树人想。

阴森的槐荫下，来客非常稀少。往昔的同学，只有许寿裳、张协和伍崇学尚有过从。每逢节日，他们便带了板鸭和各种食品，让树人吃上一点“人间烟火”。8月，一位稀客出现了。

他就是钱玄同。这位东京时代的老同学，现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做《新青年》杂志的编辑。有了头一回造访，他便每隔三五天来谈一次，一谈就是半夜，谈到兴头处，主人就留他吃饭，有时则同往广和居小饮。

显然，他怀有一种特别的精神使命。

是一个初夜。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在树人的面前坐下。因为怕狗，走路快了一点，所以许久还有喘气的样子。

他一面翻看着桌面的古碑的抄本，一面发问道：“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树人懂得他的用意了。《新青年》同人虽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并没有赢得社会上的广泛的响应，甚至连激烈的反对者也没有。这种境遇，与自己当年筹办《新生》的时候十分相似。树人想，他们该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却也并不感到就死的悲

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少数的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既然有了几个人起来，你也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希望。其实希望中国有所改革，有所进步，不也是自己的本意么？然而，无论是青年时候的慷慨激烈，或是中年以后的苍凉寂寞，而今都一一不复愿意追怀了。只是希望在于将来，又怎敢以自己的失望，证实他人之所谓实有的虚无呢？况且，自己所见的人物和事件就有限得很……

即使全然没有了希望，难道这黑暗就不该受到诅咒吗？……

当终于目送了同学的背影消融在夜色之中，周树人不免感到歉疚；聊可自慰的是，好在最后已经答允做文章了。

智慧痛苦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

对周树人来说，深刻是一种负担。人们大抵健忘，而他偏偏执著于过去；人们沉醉于好梦之中，而他偏偏直面丑恶的现实；人们所见是形而下的图景，而他偏偏还要继续探究形而上的世界，那超越个人本质的同一的精神实体。从民国成立到现在，人们欢呼过多少回庆祝过多少回？在他看来，不外是五色旗与龙旗的变换而已，民族的根柢并没有什么变化。俄国革命是成功了，但是对中国来说又何其遥远，况且还不知道到底改变了些什么呢。因此，对他来说，什么文学，什么革命，都不可能唤起如报人、青年般的热情。

至于决定给《新青年》撰稿，也无非是受了同情心的蛊惑而已。目睹改革者肩负了各种压力而挣扎着前行，自己竟默无表示，无论如何是可憎恶的。何不从旁呐喊几声，给他们壮壮胆子，使他们于寂寞驱驰间添一份慰藉呢？他觉得，自己离战士固然很远，但实实在在是不能当看客的……

时间一天天熬过去了，可文章还没有影儿。

## 41. 狂人：救救孩子

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

记》，署名“鲁迅”——

中国是一个吃人民族！

我们在被吃的同时也一样吃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小说以主题的大胆，表现的深刻以及格式的特别，引起了思想文化界一批敏感分子的注目。人们于是打听：鲁迅是谁？

自从答应了钱玄同，周树人曾几次试图进入创作状态，但都被一种海洋般弥漫的情绪覆盖了自己。写什么呢？写什么呢？

——吃人！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人世间一切残酷的、虚伪的、陈腐的现象，都从这样两个症结的字眼，获得了最生动的形象和最本质的说明。几千年来，在乡土中国，个人是孤立的、孱弱的、不堪一击的，社会可以通过众多的渠道消灭个性，其中包括由血缘关系组成的最亲密的家庭。所谓家庭，只是一个缩小了的社会，而社会也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无论是定于一尊的极权主义或是层层制驭的差序格局，两者都是一致的。因此，即使吃人的方式和方法有着各种差别：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伦理的，公开的，隐蔽的……却都无一不是联合进行，天经地义的！中国在黑暗里陷得太深了！非有全民族的伟大的忏悔，不足以拯救我们的现在和将来！

在日本，他曾经为“人国”的建立幻想过，呼吁过；想不到十年过后，一旦重新执笔，就又回到了本题。

可是，“吃人”的结论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吗？不会当成疯话吗？章太炎先生不就被人称作“章疯子”？在一个十足畸形、头足倒置的世界里，又有哪一个真正健全的人，不是被看做疯子而存在的？……

周树人想起一个人来了。

那是唏嘘的姨表兄弟阮久荪，一向在山西做幕友的，两年前，忽然

说同事要谋害他，于是赶紧逃到北京。可是没有用，他终于找到会馆，向你历诉众人如何如何跟踪他，说四处已经布置好罗网，再也插翅难逃了。最后，是你留他在会馆里住下。第二天清早，他就来敲窗门，十分惊恐而且凄惨地说：“今天我要被拉去杀头了！”说完递过一封绝命书，托你交给他的家人。在送他前往医院的途中，当他突然瞥见站岗的巡警时，那面色和眼神是何等可怕呵……

迫害狂……

就写狂人！借狂人的嘴巴说话！周树人马上想到尼采，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个狂人，他的话说得多么愤激，又多么精警！安特莱夫，迦尔洵，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写狂人心理，写下意识，写幻象和错觉，真是真切极了！对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一样是写社会的残酷和个人的不幸。

那个九等文官小书记波普里希钦，惟在精神折磨中，他才说了那么多暴露旧俄官场的话。到底，他是被关进疯人院里去了，虽然他追逐的目标是那么渺小……

小说的名目不错，可以按照它的格式写。周树人仿佛已经把握住了一个短篇的框架。但是，果戈理的单纯写实的手法显然是不适用的，情节在这里反而是一种窒碍，每则日记的日期也不必写的。总之，太具体的东西局限性也大。必须具有囊括性质。那么，就使用象征。一重诅咒，一重忏悔，一重警告。只有象征才能把所有这一切贯穿起来，将个别人物的活动环境推向一个更广延的思想现实中去……

狂人：受迫害者，见证者，同时也是觉醒者。那么，围绕狂人的将是怎样的一群？谁是传统意识的代表？谁又是社会和家族的代表呢？权贵，尊长，帮凶，帮闲，看客，许许多多沉沦未醒的人们……

溶溶的月光……

握笔的头一个晚上，就碰上这么好的月光。仿佛是一层暗示，明白，然而朦胧。灵感翩然而至。用文言把楔子写完以后，简直用不着怎么思索，他就纵笔写将下去：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赵贵翁和他的狗。门。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小孩子。好一个女人。陈老

五。狼子村的佃户。大哥。何老头子。海乙那。母亲和妹子.....

狂人语无伦次而又充满机锋，偶尔辍笔读来，竟也不禁暗自吃惊于语调的酷肖。他弄不清楚，自己何以会如此熟悉这位狂人，如同与朋友作断续的长谈，或听自己于暗夜间的喁喁的独白。

收梢了。

果戈理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这世界上没有安身的地方！大家迫害他！——母亲呵！可怜可怜患热病的海子吧！.....”孩子很好。孩子就是未来。反正已经绝望于自己的同辈，而下一代，倒是希望着他们能够得救的。好的，就这样。他往油灯的苗焰瞄了一下，援笔蘸了墨汁，迅疾写完日记的最后一则：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用什么笔名发表呢？总不能用真姓名。这时，他记起在东京期间用过的“迅行”的别号，心脏不知怎的竟狂跳起来。由于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他便决定沿用其中的“迅”字，表示开始于青年时代的事业并未中断，算是保留一点反抗挑战的意味；再冠以母亲的姓，这样一来便成了：“鲁迅”。

鲁迅的名字出现以后，立即以其特异的光芒，使原来见于教育部的档案和公文里的姓氏变得黯淡，黯淡到可以叫人遗忘了。

最令人感觉欣慰的，莫如朋友的赞誉。

在南京，许寿裳从鲁迅寄去的《新青年》中读到这篇小说，立刻从中辨出了好友的过人的思想和悲悯的格调，但看署名却姓鲁，不免感到困惑：天下难道还有第二个周豫才吗？

鲁迅很快便收到南京的来信。

他告诉许寿裳，小说确是他写的，最后还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虽则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借此，许寿裳肯定：死灰已经复燃，他要放火了！

## 42. 全方位进击：打倒国粹派

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不可能避免挣脱母体之前的阵痛。在中国，由于革命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僵固的制度和保守的心态中进行，因此尤其艰难。自从《新青年》标榜“文学革命”，而且日益显示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时，传统势力的反抗也就随之而至了。

20年代前夕。北京激荡不安。

此刻，“文白之争”已经大大超出了语言学范围。中国的文字，长期以来沦为上流社会的专利品，统治者实行政治统制和思想垄断的重要工具，因此，把书面语言同口头语言统一起来，以白话代替文言，使之为更多的民众所掌握，促进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播，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的重大作用，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白话文学的提倡者摇旗呐喊了好几年，直到钱玄同和刘半农合作演出有名的“王敬轩双簧戏”，一批死抱传统的自大的爱国者才从酣梦中醒来。形势急转直下。他们发现，这时已经是兵临城下了。

抵抗最早也最激烈的是林纾。二十年前，他曾经是先进的维新派分子，反对缠足，反对迷信，反对大家庭制，提倡兴办女学；此外，在杭州的白话报上作过白话道情，作过有别于传统形式的小说传奇，作过新乐府，其实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诗。此后，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小说，成为全国景仰的文坛领袖之一。还有刘师培、辜鸿铭、严复、章士钊等，都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并且都曾出过洋，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先后全都掉转头来对付以西方现代意识武装起来的革命派。历史开的玩笑未免太严肃了。

为了反对文学革命，林纾前后写了三篇文章，还写过两篇十分刻毒的影射小说。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他攻击新文化的倡导者“覆孔孟，铲伦常”，斥以大逆不道，企图胁迫这位“鬼中之杰出者”带头就范。为此，蔡元培进行有节制的辩驳，坚持了一贯的自由化主张。

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它必然地要同政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作为对文字的有力补充，林纾进一步运动国会中的同乡参议员弹劾蔡元培，迫使他们驱逐《新青年》同人。面对林纾之流的顽固抵抗，新文化阵营组织了一场阵容更为雄厚、火力更为猛烈的反击。

这时，《每周评论》和《新潮》已经先后创刊，阵地不断扩大。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对各种外加的非圣无法、离经叛道的罪名直认不讳，宣称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胡适提出系列建设性意见，强调文学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问题，尤其致力于理性主义的提倡和方法论的引进。李大钊接连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政论性文字，以罕有的热情，介绍苏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周作人则鲜明地提出“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口号，提倡人道主义，主张个性解放。钱玄同关于废止汉字和用罗马字代替汉字的激进主张，发人所不能发，有力地掩护了新文学的进击。主将们虽然各有自己的一套主义和主张，但反专制、反传统、反复古的大目标基本是一致的。

1919年，鲁迅开始介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既然已经进入同一条战壕，他就必须密切注意前头的方向和四周的枪弹，随时保持一种警戒状态。在同人中间，他特别欣赏“王敬轩双簧戏”，以为这种存心捣乱的精神是很可发扬的，虽然胡适等人认为不妥。黑暗势力实在太顽固了，非有强大到千百倍的攻击不足以损伤它什么。只要是真正的战斗，过激一点怕什么呢？何况这也不失为一种策略？在双方的力量处于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他是主张有非常的战法的。

反正旧势力溃灭的命运是无法挽回的了。关于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当刘师培伙同北大的遗老辜鸿铭、黄侃之流，加紧筹备《国粹学报》和《国粹丛编》的复刊工作时，他曾经给钱玄同发出一封信，用极端轻蔑的语调写道：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

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止于文字形式本身。在复古派背后，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文学革命绝不是终极目标，最持久最艰难的战斗，惟在国民思想的改造。

从呐喊的头一天起，鲁迅一直跟主将们保持同一的步调，写遵命的文字，然而也仅仅因为这是时代的使命而已。他是战士而不是喽罗，他有他的头脑和位置。早在留日期间，他便已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了；随着革命的成功、败绩、蜕变，尤其是近期发生的张勋复辟事件，使他不能不特别重视社会意识的变革。作为现今给自己布置的任务——思想革命，是他青年时期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与定型。由于他不想以主持自居，所以也就没有想到过要著大文作号召，仅在通信中向钱玄同表白了这层意思。

他写道：“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拂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关于思想革命的主张，可以说，是周氏兄弟共同的思想果实。直到次年3月，当作者首次把“思想革命”当作一面旗帜高擎起来以后，这封信才由《新青年》编者加上标题，在通信栏内发表。

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了“随感录”专栏，刊载对于社会和时事的短评。

鲁迅是从第二十五篇开始为它撰稿的，发表时署名“俟”，又写作“唐俟”。他清楚地知道，由历史沿袭下来的思想文化结构具有怎样的稳定性，自己以及周围的伙伴不见得就有超出于现实之外的突变。过分的执著与深刻的疑虑，使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虽说思想变迁不小，但于希望的有无到底没有大把握，只知道等候是不会错的。

从绝望中汲取力量的源泉，是真正的理性主义和英雄主义。鲁迅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真切；也许正因为他已经绝望于那腐败的一切，战斗起来也就显得格外凶猛，机警，每每击中要害。他写的“随感录”，凝炼，尖锐，一如匕首，什么国粹家的论调，大小官僚的经验，扶乩，静坐，打拳，以及冒牌的讽刺画，无一可以逃避其思想批判的锋芒。

鉴于爱国主义往往成为反对改革的掩体，鲁迅以为，必须集中力量攻击国家的弊病，暴露国民的劣根性。以此为出发点，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反对吃药的“国粹派”，自然成了他心目中的最可恶的敌人。

“国粹”是什么呢？他打了一个出色的比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

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野蛮文化的混合体。鲁迅没有停留在社会现象的罗列上面，犀利的目光，总是穿透事实而直及国民思想性格的底层。他指出，中国人“自大而好古”，而且没有“个人的自大”，而只有“合群的自大”，因此党同伐异、扼杀天才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自私，取巧，专谋时势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这就是国人的事业。中国社会的现状，简直是将几十个世纪缩在一时，许多不同甚至对立思想和事物挤在一起。这样，人们也便容易使出中庸、调和的老法子来。但结果如何呢？他写道：“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

鲁迅的深刻性，在于他不但批判了“旧思想旧本领的旧人物”，而且当“新人物”风头正盛的时候，揭露了他们“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二重思想”。

他指出，“新人物”可以搬用所有关于改革的语汇，制订各种关于改革的规划，但是却又步步设防，用了固有的原则对改革实行规限，实际上等于取消改革，延缓旧世界的灭亡。对于改革，鲁迅主张坚决，彻底，甚至不惜使用过激的手段。他说：“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究寻不出位置的。”

在反对国粹派的斗争中，鲁迅不但把社会意识同个人意识相联系，而且把爱国意识同世界意识结合起来。他认为，传统文化并不能决定自身的意义，只有从人出发，才能对它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作为传统，它不应当被绝对化和固定化，真正的落脚点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因此，在“国粹”和“我们”之间，他明确地提出了“保存我们”的观点。他说：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其实，“子孙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鲁迅自己也弄不清楚，他只凭着一颗善良的心灵，臆想孩子将来应当成为“完全的人”，有“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是基于人性的一种要求，不过，作为对现实世界的逆向观照，抽象的人性仍然是具体的。

他的目光常常含着哀矜，投向众多无主名的牺牲品，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身上。正是他们，以惨痛的死亡、畸形、无从反抗的沉默，显示了专制政体和封建礼教的非人性。他的“随感录”，开篇就是以妇女和儿

童为本位写作的。此外，他还写了两篇专论：《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愤怒地抨击中国的亲权、父权和夫权，讴歌尚未灭绝于名教的斧钺底下的人类天性，表示了使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希望。他以复调弹奏出自己的最深沉的心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早在《新生》运动期间，个人意识被他从现实存在中抽取出来加以特别的强调，标榜自我，张扬个性，体现了一种崇高的孤独感。到了20年代，他已经不能无视作为异己力量的社会传统的巨大压迫了，从失败和痛苦中生长起来的忧患意识，把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在他的身上。如果说他早期的文学活动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那么，清醒的现实主义便成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基点。

鲁迅的杂文，同他同步创作的小说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

这些短文以最直接的方式切入社会，干预时事，突出地体现了他的以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功利思想；他性格中的峻急的一面，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倾泄，致使讽刺和攻击永远伴随着一种无法遏止的激情。虽然，早期的杂文不及后来的尖刻与婉曲，但是从形式到语调都已呈现出了多元的倾向。作为一个文体实践家，他杂取魏晋文章的清峻通脱，唐人小品的精炼泼辣，直到章太炎的论辩文字的朴拙激切；在外国作家中，则取易卜生的愤世嫉俗，夏目漱石的从容机智，尤其是尼采的奇拔冷峭，使之熔冶一炉。在新闻性、政论性中间，明显地渗入哲理和诗情成分。在现代杂文的初始阶段，鲁迅以其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文体，超出于其他的专栏作家。

杂文和小说，构成本时期鲁迅创作的双翼。杂文是时事的折射，小说则是记忆的显影；杂文重在反映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急剧的局势性变化，小说则主要表现磨损面很小的国民心理的结构变化；杂文相当于讽刺喜剧，跳跃着一种热烈的、轻松的节奏，小说则是系列悲剧，流布着一种永恒的忧郁与沉思。

这时候，杂文所以不能完全取代小说的创作，固然因为他为往日的梦魇所笼罩，无力摆脱某种绝望或者依恋情绪的纠缠，而且斗争的情势尚且允许他有余裕咀嚼个人的哀戚；另一方面，当新文学运动起来以后，怎样的文章才算标准的白话文，便需要改革家们以切实的创作实践

进行回答，正如胡适所说：“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吾国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则吾辈今日纷纷议论，皆属枉费精力，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鲁迅坚持小说创作，是完全服从于新文学发轫期的战斗任务的。

继《狂人日记》之后，他连续发表了两个短篇：《孔乙己》和《药》，进一步深化“吃人”的主题。

孔乙己是在一家门面虽小，然而有着特别格局的酒店，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一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一口“之乎者也”的说话，表明他是封建遗老们所极力维护的“中国书”的受害者。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都被剥夺净尽，惟以“回字有四种写法”的矜持，“君子固穷”、“窃书不算偷”之类的自欺与自慰，以及关于“清白”问题的辩护，反映出一种特殊的自卫心理——仅余的一点自尊心。他匍匐于科举制度下面，结果却以这个制度培养起来的贫困和懒惰，惨死于另一个已经阔气的同类——丁举人的大棒之下！

与孔乙己不同，夏瑜是自始至终反抗官府的，关在牢里仍然劝牢头造反，说些“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样被认为不是“人话”的话。自然，他要遭到比孔乙己更为严厉的惩治：处死时，连鲜血也得被做成供人吃用的“人血馒头”！

吃人的方式各不相同，本质却毫无二致。围绕孔乙己和夏瑜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思想环境，其荒漠与残酷是十分相似的。

孔乙己一到酒店，所有喝酒的人都取笑他，故意提一些令他发窘和不安的问题。直到他被丁举人打折了腿，掌柜还是明知故问，惹旁人快意的说笑。隔膜，凉薄，以赏玩别人的苦痛为乐。茶馆主人华老栓，得知“人血馒头”可以治疗儿子的痲病，不惜亲自向刽子手买来，象征性地完成了一次专制与愚昧，强暴与昏迷的最黑暗的交易。

看客的形象，自幻灯事件以来，一直为鲁迅所未敢忘怀，所以，也就得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重复出现在他的小说之中。谋害死者的元凶到底是谁？读者不能不深思这样一个问题。

连最亲密的人也不能理解自己，的确是改革者的悲哀。夏瑜无论生前死后，都是被另眼相看，低人一等的。连他的母亲，也深以儿子的被害为大冤枉、大耻辱。在小说结尾，作者对墓地、花环和乌鸦等意象进行了精心的组合。由于某种特殊的“血缘”关系，两个扫墓的老女人出现

了。惟一的莫名来历的花环使其中的一个感到安慰，以为是儿子显灵，但又不能确信，于是怀着一线希望说道：“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吧。”可是，可惊怖的乌鸦，却哑地大叫着从树上飞走了，留下的是明明白白的拒绝。另一个女人自然经验不到这种快慰与悲哀，但是，她们所得的结果不也同样是一个无所有吗？既然如此，那么多的烈士为什么要流血？为谁流血？……

筹办《新生》杂志的时候，鲁迅曾经选定一批插图，其中之一便是墓地与乌鸦。关于死亡的主题，他太熟悉了。凡新的生命都是对于死亡的突破，这他知道；可是死灭之中一定会有新生的机运吗？写及夏瑜，想及秋瑾，他的心里便布满阴霾……

鲁迅除了杂文和小说创作，偶尔也写诗，全方位地向前推进。

柏拉图说，诗人需要一种疯狂；而中国新诗的最早的拓荒者，却几乎都是理性主义者。从形式上看，诗体革命的步子比小说散文的跨度要大得多，它必须越过诸如音律、对仗之类许多特设的栅栏。因此，作者们只要找到了可以入诗的材料，在这方面便显得格外用力，不见得有什么灵感。

一年之间，鲁迅以“唐俟”的笔名一共发表了六首诗。

在诗里，他诅咒那些“趁黄昏起哄”的昏乱思想，表达了对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文化思想的企望，而对被关在“破大门”之内的中国的黑暗、肮脏的现实，则表示了改革的决心。他的诗并不重在表现情感，虽然战斗的意气并不见得稀薄；其中，主要还是借助心灵的对应物，形象地阐释自己的思想。因此，比较同时的胡适、沈尹默和刘半农诸家，就没有他们的纪实性；他运用的全是象征、隐喻的手法，这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朱自清评价说“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大约指此而言，其实他并没有能够完全打破传统格律的限制。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他没有说谎。关于作诗的动机，当与写小说一样，是因为他有感于改革者的寂寞。待到报刊蜂起，称为诗人者陆续出现的时候，他这个打边鼓的也就洗手不干了。

诗这东西，在他看来，乃是发泄热情的器物。可是，如今他再也没有近似“摩罗诗人”的那种澎湃的热情了。他觉得在中国，需要对国民的病根作深入的揭露，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能够负担这项使命的文学，

自然要推小说和杂感，诗歌长于鼓动而短于刻画，相对说来，是缺少这种力量的。无疑地，他具有诗人的气质，且少年诗作就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情；但是过分的沉实多思，却注定当不成一个受宠于缪斯的“桂冠诗人”。所有与诗相关的生理和心理因素，都被他输入到散文作品里去，万不得已时不会戴锁链跳舞。

他是一个散文化的人。

## 43. 明天与梦

赵家楼起火了！

五四运动使沉寂的北京变作了一座活火山。如果说《新青年》的创办是一个信号，一种征兆，那么这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产生断裂的历史性象征。在断裂带，崛起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先进的生产力的未来代表，首次显示了变革中国现实的巨大的潜能。

1919年1月，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巴黎和会在英、美、法、意、日等“五强”的操纵下召开了。中国代表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在会上提出废除袁世凯政府对日承认的“二十一条”，以及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可是，帝国列强不但拒绝讨论，而且做出决定，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

“公理战胜强权”成了一句空话。中国知识界对巴黎和会的幻想破灭了。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高校的三千余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他们拟定了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学生们手执各色各样的标语和旗帜，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等等。有的还用英文和法文书写，画着山东地图及各种漫画。集会结束后，他们开始游行，口号如震怒的雷声此起彼伏，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队伍浩浩荡荡，从中华门开始，向警备森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由于巡捕和军警的阻拦，转而开往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愤怒的学生冲入宅内，把在场的章宗祥痛殴了一顿，然后放火！

火！火！火！.....

所有的喧声，火光，都在会馆的围墙之外。

孙伏园和北大同学一起，刚刚参加了集会游行，心里兴奋得很，完了独自跑到南半截胡同里来，找他平素最敬爱的先生。

见面以后，鲁迅随即问起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有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问得十分详细。

可是，孙伏园太早离开了队伍，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那样更为壮烈的一幕。当人流从讲述中滔滔而过，使孙伏园意外的是，先生竟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示。

这一天过后，紧接着就是罢课，讲演，销毁日货，大逮捕.....赵家楼的大火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

从报端的时态看来，中国也不是全然没有希望的，只是道路太迂远了。他总觉得这样。当人们都为眼前的变动亢奋不已，他已经看到了它的不祥的结果。他怀疑，这一回学潮是否是当年东京留学生的先驱活动的回声。在长达十年的沉默之后，一旦听到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集体的声音，他有理由唤起某种警觉，暗暗抵抗着，以免受到新的诓骗。昔日的风云人物，如今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改革者到了后来往往再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今日的卖国贼，不就是昨日东京的热血青年吗？除了思想革命，他不相信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改变国民的素质.....

对于自己，他就觉得很难摆脱那些毒气和鬼气的纠缠：一面作白话文，一面钻故纸堆；一面鼓吹自由意识，一面恪守传统道德。只要从旧时代过来，要蜕变成新人就很难。然而，青年一代又如何呢？世上到底有没有如自己所说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他始终凝视着无涯际的黑暗，逃不出“原罪感”的折磨。

既然他已经确定了思想革命的主题，那么，作为变革社会的一种方式，五四运动对他来说也就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如果说有，也只是把肩上的闸门放的更沉重，自觉更压迫罢了。希望是什么？他在东京时所珍爱的瓦支的画，画抚着竖琴的盲诗人，所有的琴弦已断，惟剩最后一根，在茫茫太空中作着只有诗人自己才能察觉的震颤。对鲁迅来说，思想革命，大约也就是这样一根生命之弦吧？

一年之后，正是5月4日，他在通信中谈到对传统和改革的看法：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法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看得出来，他对中国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鲁迅的内心很阴暗，很疑虑，有时甚至绝望到近于虚无，但是显露出来的锋刃却是斩钉截铁，坚定而且明快。“五四”当天发表的四篇“随感录”，简直可以看做是运动的预言或檄文，其中《“圣武”》一篇尤其激烈。

外来思想，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在中国有什么呢？没有精神的燃料，出声的弦索，共鸣的发声器，什么思想主义都与中国无关。秦皇汉武以降，历史的整数里面只有“刀与火”——权力崇拜。满足于威福，子女，玉帛的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保存死尸，就是古今一切大小丈夫的最高理想了。所以对于外来思想的侵入，他们才有了一种恐慌，极力加以防范。其实，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并非因为什么主义造成的。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怕什么自由主义呢？我们等级森严，甚至连人身也有各式各样的依附和买卖，又怕什么人道主义呢？最近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却没有听得人问什么是过激主义？虽然我们无从知道其中的实情，但可以肯定：“过激主义”不会来，只有“来了”是要来的。

真正抗拒了这“来了”的可怕思想，而牺牲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锋刃，用血液浇灭烟焰，这样，才会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之中，看出新世纪的曙光！

稍后，鲁迅又写作了两组短文，片断地记录了他的思想轨迹。

其中的“自言自语”，可以说是后来的《野草》和《朝花夕拾》的素描练习。而“寸铁”栏内的文字，精悍之极，真可谓寸铁杀人。

他指出，造谣说谎诬陷中伤等，作为中国的大宗国粹的存在，这是一个事实；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柔的小人昏庸的群众压迫排挤倾陷放逐杀戮，在中国又格外凶也是一个事实。但是，古来的许多鬼崇著作，却自行消灭了，而酋长也终于改了君主，改了预备立宪，又终于改了共和了，难道不也是十分彰明的事实吗？他终于用了最明亮的调子写道：“喜欢暗夜的妖怪多，虽然能教暂时暗淡一点，光明却总要来。有如天亮，遮掩不住。想遮掩白费气力的。”

天真的快亮了吗？

从小说《明天》，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所遭受的困扰。虽然这是一个假托的事实，但是，如果中国的出路问题没有成为鲁迅的意识中心，就不会选择“明天”的命题。在此前后，他有不少文章都是与这个主题密切相关的。

小说写的是一个孤苦无援的寡妇单四嫂子，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儿子一死，希望也就仅仅在于做一个会见儿子的好梦而已。即使暗夜为想变成明天而仍在寂静里奔波，于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天亮了，梦也就没有了。对作者来说，也只有当他完全进入了记忆之乡，我们才可能窥见他的心灵深处，那个蛊惑了人类几千年的希望之所在。而在他的杂文里，却是很难看到这种失落的悲哀的，他用理性给掩盖起来了。即使在这个短篇里，也都因为主将不主张消极，而自己又不愿将寂寞传染给青年的缘故，终于没有明白说出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只用了“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这样一个句子含混了过去。

稿子写好以后，便托钱玄同交给了《新潮》。

对于《新潮》，他一直抱有好感，并且给过不少具体的指导。这不但因为它是一个创作的杂志，重要的是，杂志的创办人是一群在校的稚嫩的青年。在鲁迅个人，倒是很想破破寂寞，从中闹出几个新进的作家来的。

如果说中国真有所谓希望，那么希望也只能属于这些青年。虽然，青年所给予他的印象未必便好，然而毕竟旧习不多，比较单纯，易于疗救和改造。五四运动以后，青年问题，在鲁迅的战略性思考当中无疑占据了一个突出的位置。

是8月的头一天，孙伏园找到鲁迅，笑嘻嘻地说：“还是请先生做点

东西。”

这是不应该推诿的。伏园才转到《国民公报》当编辑不久，应当不断支持他的工作，可是，此刻却想不出什么好名目，便说：“文章是做不出来了。有一个日本人的剧本却是很值得翻译的，只是双方正在交恶，有点不合时宜，怕读者不喜欢看。”

这个剧本，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

自从看了作人写的一篇介绍性的文章，鲁迅便设法把剧本找了来，读后很受感动，觉得里边的思想很透辟，信念很坚强，有一种很亲切的声音。

“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他觉得这句话特别精彩。

国家这个东西，虽然现在仍是人类真诚相爱的障碍，但相信总有拆除的一天。在剧本里，恶魔操纵了帝国主义，煽动它们互相残杀，而受害的是和平的人民。在惨酷战争当中，画家寻找艺术，乞丐寻找良心。在人类纯正的心灵之间，应当充满爱，充满同情和感谢。所有不把人当人的事，幸灾乐祸的事，压迫和掠夺别人的事，都应当从这世间消灭掉！可是在中国，社会上却大抵无端地互相仇视，争斗不已；现在成了世界上出名的弱国，南北还没有议和，打仗比欧战更长久。他觉得，这个反战的剧本对于中国读者是很合适的。作者让青年由一个“不识者”领进梦中去经历战争，那么让中国青年也都通过剧本去领略一回吧，让他们都去忧虑人类的命运，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来！

在半夜里，多么需要有上高楼大叫着撞一通警钟的人！

日本是有人了，所以他们是幸福的。中国呢？虽然仿佛有许多人觉悟，但他始终不敢相信，生怕是旧式的觉悟，到头来仍然免不了落后。即便如此，撞钟便没有必要吗？

晚上，他点了灯，看见书脊上闪光的金字，不由得忽然想起作者在《新村杂感》里的另一段话：“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而自己却总是用黑幔去遮盖它！他回想起白天的说话，不禁对自己怀疑了起来，接着是不满，恐怖，而且惭愧！

“人不应该这样的。”他想到这里，便立即动手翻译起来……

次年，从他正式到学校兼课时起，青年就不再是一组意念，一群影子，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结结实实的组成部分了。

## 44. 别故乡

故乡，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一种母性的魅力。这种近于“恋母情结”的东西，在鲁迅个人，则埋藏得很深，其中尚有数不清的诸如憎恶、厌倦、隔阂、烦恼之类的纠结。

从少时开始，家里遭到异常的变故，因此，阴暗的心情一直郁结着难以消释。加以现在，母亲和三弟留在老家，也仍然要受族人的欺侮，难怪年初同许寿裳通信时，连“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的话也说了。

很早以前，他就有过牺牲老屋，挈眷北迁的计划；适逢族人联合卖掉新台门，交屋的期限又定在年底，这样，在与周作人全家迁入八道湾新居之后，便仓促地赶返绍兴。

时值深冬，天色阴晦，寒风如吼。

鲁迅到家时已经很晚。家人见他回来，自然非常高兴，但也看得出笑容里的许多怅惘与凄凉。他先是坐下歇息，喝茶，但终于谈到搬家的事。鲁瑞告诉他，行李已经大体齐集，不便搬运的木器也小半卖出去了，只是收不回钱来。三弟建人原在县立女子师范教书，因为准备搬家才辞了职，近日把该办的事都办了，该寄存的东西也都寄存了，并作了登记。只是很多事情，必须等他回来才能决定；因为他是兴房的长子，只有他才配作这一房的代表。

“你休息一两天，拜望过亲戚本家，我们便可以走了。”鲁瑞说。

“是的。”

“还有运水，他每次到我们家总要问起你，很想见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大约这几天到家的消息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哦，很好！他现在怎样了？”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鲁瑞沉吟了一会儿，说：“夜深了，你还是先睡，等他过来了再仔细说吧。”

不知什么时候下的雨。头一次在阔别十年然而又将永别的老屋里过夜，听瓦顶嘶嘶的雨声，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清早起来，雨已停歇，而天色照例很阴惨。

鲁迅没有出门，盥洗完了，就由三弟陪着在屋内到处走走看看。桂花明堂左右的两株桂花树，早已花残叶落了。往日在这里听老祖母如歌的说话，还有小兄弟们的戏耍情景，都历历如昨，但同时又感到很遥远。靠近南墙，是搁花盆用的石凳和浇花用的石池，此刻是那么冷落：所有的花都不复存在了，惟留从日本带回的水野梔子，孤零零立在那儿。孤零零。它有必要留着吗？人去堂空。明堂的石板地上，野草几乎混同了泥土的颜色，而父亲手植的天竹却依然青青。画在廊厦的壁画也仍在的。但过不了多久，所有这一切连同房子，都将易主了……

午后，表弟郇辛农来了。鲁迅知道他喜爱花木，便将仅存的一盆水野梔子送给了他。台门里，人们进进出出，杂乱得很。其中，有看热闹的，有来道别的，有买木器的，也有趁机拿走东西的。像对面住的“豆腐西施”，就一边说着迂阔而尖刻的话，一边拿走了“狗气杀”。小堂前挂的赵孟的名画也都不见，不过鲁迅对它并没有特别看重，知道了只是淡然一笑，没有说什么。

天气一天天变冷。有一天，鲁迅才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回头一看，立刻站了起身，迎上前去。

来的便是运水。

他变化实在太大了，简直认不出来了。四十几岁的人已经满脸皱纹，大抵是终日吹着海风的缘故，眼睛的四周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粗笨而且开裂，活像松树皮。

“阿水，你介老了！”

运水站住不动，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色；翕动着嘴唇，却没有说话，但终于恭敬地说道：“大少爷，你做官，做老爷了！……”

鲁迅心里立刻透上一阵凉意，他知道，他们之间已经实实在在地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他说不出话。

运水回过头：“启生，给老爷磕头！”说完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孩子戴着小毡帽，套着银项圈，正是二十年前的运水，只是黄瘦了些。“这是老大，没有见过世面，总是躲躲闪闪……”

这时，鲁瑞闻声走来，打发建人的孩子领启生出去玩，接着招呼运水坐。他略一迟疑，然后坐下，将长烟管挨在桌沿，递过纸包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的，请……”

鲁迅问起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难呀！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小孩多，捐款重，年岁差，又不太平……”

他只是摇头，脸上的许多皱纹全然不动，如同雕像一般。大约他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一会，便提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

鲁瑞知道他家里的事务忙，明天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间炒饭吃去。

运水出去以后，鲁瑞很为他的景况叹息，对鲁迅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听他自己去拣择。

下午，运水帮工人鹤招清理完东西，给自己拣了几件：两条长桌，四把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台秤。他又要了所有的草灰做肥料，准备等周家启程的那天，再用船来载去。

此后一连几天，近处的本家和亲戚都闻讯前来看望。陈子英也来了。鲁迅一面忙着应酬，一面偷空收拾些行李。绝大部分书籍都得运到北京去，于是请和尚师傅做了十二个木箱装了，再卖了两担字帖画谱之类，剩下的都是些无法处置的东西，只好用火来消灭了。

烧到祖父的日记时，建人不免犹豫。桌子般高的两大叠日记。线装得很好的日记。用红条十行纸抄写的字迹工整的日记。他向大哥道：“这日记也烧掉吗？”

“是的。”鲁迅答道，但接着问：“你看过吗？”

“还来不及看。”

“我翻了翻，没有多大意思，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写这些有什么意思？”

建人忆起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心里想，总不至于都写姨太太吧？于是说：“他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的。”

“要带的东西太多，还是烧了吧！”

这样，两大叠日记本子，连同当年皇帝赐封的两副诰命，都付之一炬了。

在这期间，除了看望本家和接待客人，鲁迅还要参加族里的会议，在卖屋契据上签字画押；此外又到阮港祭扫过祖父祖母的坟墓，给父亲安葬好，迁了四弟的坟墓，如此忙乱着终于到了启程的一天。

运水早晨便到了，这回启生没有同来，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儿管船只。不过，最后一天也一样忙碌，时间已经不容许谈天了，纵使他们的心里各各有许多话要说。

傍晚。

乌篷船从张马桥开出，载满江深黛的暮色缓缓前行……

鲁迅靠着船窗，不时地探出头来，回望船后逐渐模糊的绍兴。

身旁的侄儿忽然问道：“大伯，我们什么时候才回来？”

“回来？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启生约我到他家玩去……”是一双乌亮乌亮的大眼睛。

……又是运水。又是童年。鲁迅全然投身于一种迷茫的忆念和想象之中。老家没有了。故乡没有了。从兹一别，再也没有了回程。所谓人生，其实不也是单程的吗？一切单纯、美好的过往，都如即时两岸的青山，纷纷退向身后，再也回不到眼前来了，再也不可能重见……

一年以后，他完成了一个短篇，就叫《故乡》。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他写下沿途的许多感受，重复着关于希望的主题：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

.....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45. 八道湾·绥略惠夫和他的影子

艰难购置的八道湾住宅，在鲁迅个人是相当满意的。这里房间多，而且空地大，用许寿裳的话来说，“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适宜于孩子们的游玩，却也正是鲁迅的本意，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孩子。

眷属随迁，不见得就能改变他恒常的生活状态。宅院分为三进，他在外客房南屋辟一处独居，让夫人朱安同母亲分别住在中间北屋相邻的房间里。平日，他们夫妇俩很少说话，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相互间怎么称呼。鲁迅常常到北屋来看望他母亲，只是不进朱安的卧室，显然执意抗拒着她的存在。后院倒也常去，因为作人和建人住在那儿。

对于朱安，他曾经说过：“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起来。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从鲁迅结婚的头一天起，鲁瑞就已经感应到了儿子的痛苦，但总希望他能够慢慢地有所适应。想不到过了十几年，他们不但不相谐合，反而越来越疏远。她问过鲁迅，朱安有什么不好？他只是摇头，随后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我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自然谈不下去了。谈话没有趣味，不如不谈……”到了北京以后，这种局面丝毫不见好转，鲁瑞深知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人生最痛苦的折磨。人总要过人的生活，如果折磨仅仅来自外部社会，还可以通过家庭内部获得一种弥补，一种柔情的濡润；倘使没有了润滑剂，在社会的摩擦和撞击之下，只好成倍成倍地毁损自己，那结果是更为悲惨的。

古人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鲁迅恰恰把对人的感情移到草木上来了。在自己住宅的窗前，他亲手栽植了一棵青杨，两株丁香。杨树萧萧多悲声，丁香花白而忧郁，幽幽地，就像为他自己开放似的。

他喜爱丁香。

由于他失去了那份最重要的人伦之乐，在宅院里，多几分热闹便多几分寂寞也说不定的。好在他已经习惯了孤独的生活，即使苦闷不时地如潮涌来，他也仍然能够抵抗，能够继续着他的精神事业。

入秋，在译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文之后，他简直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以罕见的速度，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虽然，留日时接触过《共产党宣言》，近期的《晨报》和《新青年》也都有着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方面的宣传，但他都不大以为意。6月间，接到陈望道寄赠的《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翻阅一过，觉得在大家都在空喊“过激主义来了”的时候，能够切实地做点“主义”的介绍工作是可称道的。不过，他仍然以为中国自有特殊的国情，对在东方的僵尸政治和蒙昧社会里移植这样的主义，究竟缺乏确信。所以，他更加倾向于少数先觉者的破坏抗战。从战略的方面看，他重视群体；从

策略的方面看，他重视个人。群体意识与个人意识的矛盾，构成了他的长时期精神困扰的症结之一。对于从奉旨清理的德文书中挑拣出来的这部小说，虽然不满于主人公后来的思想，而其中向社会复仇的暴风雨般的语言，此刻，却引起了他的深深的共鸣。

绥惠略夫是一个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的革命者。他在被押解的途中乘机逃脱，在彼得堡藏匿起来。死亡包围和追蹶着他，这种痛苦，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即便与所谓“不幸者们”也不相通。他们反过来帮助警察来追捕他，而且欣幸于他的死亡。绥惠略夫逃向一家大剧院，在无路可走的境地里，终于像对幸福者一样对不幸者们施行报复，向剧场中的观众开枪！

在绥惠略夫的头盖里，发出这样的声音：你是尽了你天职的全力爱着人类，你不能忍受那恶，不正，苦痛的大众，于是你的明亮的感情，对于最后的胜利，对于你所供献的各个可怕的牺牲的真理，都有确信的，感情，昏暗而且生病了……你憎，就因为你心里有太多的爱！而且你的憎恶，便只是你的最高的牺牲！……因为再没有更高的爱，可以比得有一个将他自己的灵魂……并非生命，却将灵魂给他的切近的人了！这不正是作者，同时也是译者的对于改革者的挽歌和对于病态社会的咒语吗？

《工人绥惠略夫》是“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但同时是“一部‘愤派’的书”。它通篇指示着改革者的命运，又确乎显出尼采式的色彩。鲁迅认为，在中国，像绥惠略夫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当然也并不希望其有，但那向不可救药的社会宣战的精神是令人神往的。他觉得，在民国以前和以后，都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绥惠略夫相仿佛；甚至现在，乃至几十年后的将来，也都同样有许多改革者要遭遇到绥惠略夫的命运。

反抗社会并不等于仇视人类。在《工人绥惠略夫》里，由于亚拉藉夫的泛爱主义思想被彻底否定，绥惠略夫的报复手段也就得到了相应的认同。这是鲁迅所以为可怕者。对于作者的代表作《赛宁》，他虽然为沙赛作为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及其认识价值作了辩护，但对沙赛的“无治的个人主义”却是持明显的批判态度的。在鲁迅本人，既没有一个单纯的人道主义者的悲天悯人的说教，也不可能有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暴戾乖张的行状。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同时为他所具有，像正负电荷一样不可或缺地结合在一块，只是彼此起伏消长，时时不同。如《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便是个性主义对人道主义在鲁迅身上的局部战胜。

对于颇受尼采影响的阿尔志跋绥夫，鲁迅简直怀有一种偏爱，紧接着，又译了这位俄国流亡作家的一个短篇《幸福》，并作附记，再次为他作了辩护。

在苏联，阿尔志跋绥夫被看做是一个反动的、颓废的作家。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如高尔基、沃罗夫斯基等，都有关于批判他的非常严厉的文字。鲁迅则认为，阿尔志跋绥夫虽然没有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伟大，而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他是写真实的，他的作品“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他曾把被批判的《赛宁》比做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鲁迅以为是不错的，于是反批评道：“攻难者这一流人，满口是玄想和神秘。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现实尚且茫然，还说什么玄想和神秘呢？”

对于生活，要求作家如实写出不是容易做到的，所以鲁迅特别指出：“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

人们往往把人从社会中分割出去，而对个人有更多的责难。理解人不容易，要理解一个敏感的、病态的天才人物就更困难了。关于这一点，鲁迅是有着深切而痛苦的感受的。

一连几年内，绥惠略夫的形象影子一样笼罩着鲁迅的创作。最突出的，要算差不多同时写作的《头发的故事》，无论是主题或格调，都酷似阿尔志跋绥夫。其中的N先生，冷若严霜，忧心如煮，简直就是中国的绥惠略夫，只差没有提上一杆枪而已。

说来平淡得很，这篇小说是由一个女学生的一绺头发引发出来的。

许羨苏是周建人在绍兴女师任教时的学生，秋季到北京投考，因为高师附近的公寓不收未入学的女生，在八道湾里寄住。不久，周建人去上海任职，鲁迅便无形中成了她的监护人。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后来鲁迅离京南下，她仍借住鲁迅的寓所，常常替鲁瑞管理家务和代笔写信。他们之间的通信，维持了许久一段时期。

当她刚刚考取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时候，校方下令短发的学生必须立即把头发养长；恰好她是剪了头发的，然而同另外的三个短发的同学一律拒不从命。为此，学校当局向各人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要求督促剪发。校长自己的头顶几乎秃到精光，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实在滑稽得可以。没法子，接连疏通了几回都不奏效，保证人周作

人一气之下把聘书退了，鲁迅激愤之余，也便有了关于头发的故事的产生。

一个月前，曾经做过一篇《风波》，其实说的还是头发。一根辫子搅起一场风波，那结果，竟平静得如同死水。九斤老太说“一代不如一代”，而六斤的双丫角还是照样长成了大辫子，装上小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地往来……

历史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多少故人，为了改革中国社会，或者饮弹而死，或者监禁受刑，甚至身首异地，踪影全无！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连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一场革命，轰轰烈烈，难道只是为了换得一块被叫做国旗的斑驳陆离的洋布？……

又是头发。又是头发。如今，剪发不但为军政官商所反对，连身为校长教员的太太小姐们也反对起来了。头发，已不复是改朝换代的标志，却也成了维系旧礼教的东西。又是头发。又是头发。这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使古今多少人吃毫无价值的苦呵！……

恰好再过几天就是双十节了，然而，人们也都还记得起来吗？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揭去一张日历，N先生的牢骚立刻爆发出来了——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活，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除去细枝末节，N先生和配角“我”都可

以看做是作者的两面；他们通过互补，合起来强化议论和抒情效果，从中造出些矛盾和隔膜来。冷嘲热骂，欲纵还敛，使读者在宣泄的畅快中又不能不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双十节增刊同时刊载了四篇作品，依次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鲁迅的《头发的故事》，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沈雁冰译的爱尔兰的独幕剧。

也许，因为《头发的故事》没有情节，通篇都是人物的独白，这种诗一样的直抒式语言，赢得了郭沫若的好感。对于自以为好的创作反而屈居在译文后面的编排次序，他颇为不平，于是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里，径给《学灯》的编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

这封信很快在《民铎》杂志发表了。

不料，郭沫若关于创作与翻译的这种态度，使鲁迅非常反感。他历来看重翻译，以为无异于偷运军火，其作用并不下于创作的。既然他认定了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当然不会对此保持缄默。从此出发，未久，人们也就果然看到了他们之间的相向的锋芒。

## 46. 教坛上：中国小说史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鲁迅重返一度令他十分厌倦的教坛。这个机会对他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从此，他成了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从“父与子”的对立立场，进一步站到与资产阶级学者名流相颉抗的新起点。在实际斗争中，他结识了自己的人生伴侣，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孤独者的生涯。

北京大学国文系打算增加一门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找周作人商量，请他讲授。周作人想，自己虽然未曾专门弄过小说史，家里倒搁着一部鲁迅辑录的《古小说钩沉》，可以拿来做参考；那么至少上半年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至于后半，再敷衍着看吧。他当时一口答应下来，事后心里总觉得不大踏实，便同鲁迅说起这件事，以为改由他担任这方面的教学更为相宜。鲁迅说试试也好，这样，马幼渔便把聘书送过来了。

对于从小接触的中国小说，可以说烂熟于心；当他想到要任课编讲义时，却不禁顿觉欠缺起来。虽然经过十多年积累，毕竟还是不够，尤其是唐宋以后的部分，无论作品或史料，都必须匀出时间来认真地搜寻。不过，他认为，有这样一个机缘也好，可以把被中国人视为“闲书”的小说理出一个端绪来。在目前，好像还没有人把小说当作一种并非卑贱的独立的文体，从中国文学史中分出来进行自成体系的研究。自己的此番摸索，虽然未必可以说在深山大泽中拓出一条大路，但是，哪怕插一些路标出来，也多少可以为此后的跋涉者省去若干查找的工夫。他觉得，工作着是充实的。

但是，现在，他已经失去大量购书的能力了。

一年多以来，政府一直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加以家庭大，开销多，统管经济的信子又爱花钱，这样便常常入不敷出，得靠借贷来弥补，有时候还被弄得相当窘迫。

在傅岳棻代理教育总长期间，他自己就曾加入部里自发组织的索薪团，带着面包和水，到财政部包围总长李思浩。那结果是一场骗局，长官签发的支票和应许的诺言，全都不能兑现，从此对索薪也就冷淡得多了。

在这人世上讨生活已是相当艰难，又遑论购书呢？许多珍贵的书籍，只好四出走动，向图书馆和私人借阅。单是为了评述《水浒》，他就查看了一千多万字的古籍。这途中辗转耗费了多少时间？除了他，不会有人知道。

从讲义的宏阔和谨严来看，鲁迅完全无愧于作中国现代的第一代学者。然而，他所见的黑暗实在太多了；自从借狂人的口喊了一通以后，要完全返回到古代去已经不可能了。从前往往苦于麻醉法不能生效，现在则是根本无须乎麻醉了。他天生是一个叛逆社会而又同时与自己作对的人物，一个永远无法平和无法冷静的人物，因而也就绝对做不成那种方巾气十足的所谓学者。一个深受压抑的骚动的灵魂，只要可能，总会从学术的束缚中奔突出来，在最需要安静的地方作最不安分的独白。

鲁迅在北大开课的消息，给学生群带来莫大的兴奋。

临上小说史课，预备钟还未敲响，教室里已经没有虚设的座位了。两人一排的座位常常挤坐着四五个人，找不到座位的就站在门边，走

廊，甚至坐在窗台上。本来，这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听讲的却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和别校的青年也不少，有的甚至是从老远的外地跑来的。

当鲁迅踏进教室，周围立刻安静得只剩下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课桌旁，用了探究般的眼光缓缓地扫视过听众，就开讲了。接着，有一种沙沙的细响发出，如千百只甲虫在干草上急急爬行，那是许多铅笔在纸片上作着记录。整段时间都保持着一种少有的静肃，只有当教育部委派的督学前来视察的时候，这种空气才会被打破。不过，虽然督学是奉命而来，又是按照视察的惯例悄悄进行，究竟难以避免陡然而起的驱逐的嘘声。这时，鲁迅必定停讲，把书本合放在课桌上，在不满方丈的教坛上来回踱步，直等到“嗤”的一声把督学最后送出门外去。

对于这种监督教学的作法，他感到十分可恶，但只幽默地对学生说道：“我生怕扰乱他检查，所以才停下，想不到他不检查便赶紧回去汇报了！”

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身材矮小，常穿的一件黑色的短短的旧长袍，臂弯上、衣身上打着惹人注目的补丁，皮鞋的四周也都缝补过。不常修理的头发粗而且长，根根直立，使整个方正的前额袒露出来。两条粗浓的眉毛平躺在高起的眉棱骨上，眼窝微微凹陷，眼角朝下垂着，仿佛永远挂着忧郁。在突出的颧骨周围，满布着深刻的皱纹，浓密的短髭一直遮掩到唇际。总之，样子是一点也不奇特，既不威严也好像并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平缓而清晰，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那拿着粉笔或讲义的两手，也从来没有作过任何姿势去演绎他的语言。表情也是那么凝静，即使他的话不时激起满室的笑声，以至于要被迫停讲，而他自己，苍白的脸上也始终不曾露出一丝微笑。

鲁迅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

在一个专制或是动荡的时代，思想始终是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中心。鲁迅讲课的特点，正在于极力突破课程的规范，把原来的小说史讲成了中国社会和国民灵魂的历史。因此，他从来不逐段逐句地照搬讲义，而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加以生发、穿插，处处显露出他所特有的思想批判的锋棱。

他对学生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讲到两种英雄，即“社会的英雄”和“非社会的英雄”，即旨在破除传统的英雄史观。岳飞

是社会的英雄，大家了解他的忠诚爱国，都敬重他。在一个“家天下”的中国社会里，他到底属于哪一个谱系呢？有一些真正的英雄，连所谓“正史”也往往不能遮掩其光耀，却为社会所不容：谴责，流放，杀戮，永远湮埋！这样的社会是正常的吗？能够改变的吗？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在座诸君作何感想？他没有直说。他的话，只是一种启示，一个方位，导引着学生作自觉的反思。

讲到文学现象，也并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上面。他比较了唐宋传奇，得出宋不如唐的结论，理由是：一、宋传奇多含道德说教，故不是好小说，因为文艺作了道德说教的奴隶了；二、宋传奇又多以古代为题材，不敢干预时事，忌讳太多，文情又不够活泼，自然不如以多谈时事为风尚的唐代传奇。在论述传统小说的演变时，他虽然注意到了艺术的独立价值，但始终不会放弃社会学方面的批评标准。他特别推崇《儒林外史》、《金瓶梅》和《红楼梦》，以为这几部小说具有真实的、讽刺的力量，表现了中国罕有的人道主义的胚芽。

从《会真记》里，鲁迅这样谈到中国人的矛盾性。他说，中国人矛盾性很大，一方面讲道德礼义，一方面实行起来又绝不相关；又喜欢不负责任，如《聊斋》的女性，不是狐就是鬼，不要给她穿衣吃饭，不会发生社会舆论和公共监督，都无非是对人不需要承担责任。中国男子，一方面骂《会真记》、《聊斋》，一方面又喜欢读这些书，都是固有的矛盾性的表现。

他重视学生的知识积累。其中包括最古老最僵固的古文字知识，但总是设法通过事物之间的多边联系，使知识激活起来。为思想革命的观念所辐射，这些知识以不同的整合方式，显示着世界的光明与黑暗，真实与虚伪，美好与丑恶；于是，欢乐与悲哀，热爱与仇恨，忏悔与愤怒……便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弥漫过来。当人们从感情的沉湎和激荡中间抬起头来，方觉鲁迅苍白冷静的脸上，有亲切的光辉浮动，如严冬的太阳……

每到上课，他经常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休息室，这时，许多等候他的青年便立刻把他包围起来。他打开十分醒目的黑底红色条纹布包，将许多请求校阅和批改的稿件拿出来，一面仔细地散发、讲解，一面又把新的接收过来。直到上课钟响了，他才拿起布包，夹在这些青年之中走上讲台。时间海绵般被他抓得很紧，总是两小时的课连堂上，课间休息的十分钟也用了。即使这样，他犹觉得时间不够用似的，越讲到后来越是加快速度，就这样拖延着往往忘了下课，直到下一门课的教授来拉门，

以等待的微笑催促他为止。

下课以后，他仍然处于被包围状态，有些学生甚至跑到途中截获他。他备有一根铅笔，来不及回答的问题就用它速记下来。有同学发现，在长长的归路中，这根铅笔也一直紧紧夹在他的耳朵上，没有放下……

被缠得太厉害，自然也有逃之夭夭的时候。

这时，鲁迅驾驶的是三匹马车：学术，创作，翻译。

在译事方面，仍然上承留日时代的宗旨，着重介绍弱小国度的作品，使国人更多地了解世界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族的命运和感情。

三年前，当周瘦鹃所译的《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三卷出版后，由中华书局呈送教育部审查注册时，他因为看到其中有一册是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的，不禁大为惊喜，立即带回会馆给作人看，于是两人合拟了一条评语，特别称赞了那些于哀情之外的更为纯洁之作，喻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

他以自己的翻译思想影响作人和建人。他们所译的文章，从篇目的抉择到跋语的撰述，也都或多或少参与了他的意见。他信上建议作人介绍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时，就曾批评沈雁冰他们过于趋鹜新潮，希望作人能够坚持独立的翻译方向。

在翻译俄国、芬兰、保加利亚、捷克文学的同时，鲁迅还翻译一批日本作家的作品，其中除明治时代的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以外，都是大正时代的新进作家，如“白桦派”的有岛武郎，“新思潮派”的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他们都反对流行已久的自然主义文学，不满于对生活纯客观的拘泥的反映，而主张尊重个性，表现自我，高扬理想而逼近人生，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色彩。

森鸥外的《沉默之塔》是一个恐怖的故事。鲁迅认为，它是很可以借来比照中国的。

小说写派希族内部分裂，把一批创作、翻译和阅读“危险的洋书”的青年杀掉，然后用车子运往沉默之塔喂乌鸦。“危险的洋书”的说法是一大发明，为了消灭异端而连累禁止一般的出版物，使“文艺的世界成为

疑惧的世界”。从派希族的眼光看来，凡是文艺，只要有点价值的，只要并非平庸的，便无不是危险的东西。小说写道：无论哪一个国度，哪一个时期，走着新路的人的背后一定有反动者的窥伺；只要遇到机会，他们就会起而加以迫害。只有那口实，会因为国度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危险的洋书”者，也不过是一个口实罢了。

鲁迅翻译的作品，几乎无一不是对中国国情的针砭，对非人类行为的猛烈的抗争。为了赚取五卢布而甘愿裸身站在雪地里被杖打的妓女赛式加，在无人诉语的境遇中服毒自杀的阿末，走投无路而终于被杀的美少年右卫门，他们惨苦的命运，都将使人永远无法忘怀。在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里，那些豪杰之士从小便如飞行家研究奇技一般，专门研究使别人吃惊的致死方法，“在他们，凡有生命以外的东西，是什么都贵重的；只有这生命，是无论和什么去交换，都在所不惜的。”

通过这些作品，鲁迅力图向中国读者揭示生命的本来意义，呼唤世间所缺乏的诚与爱；但是，对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固有的冲突却又不无困惑，在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驱除的孤独、寂寞与悲凉。

翻译与创作，对鲁迅来说是一致的，他往往把译事看做自己的思想情绪在别一渠道中的宣泄、补充与扩大。在写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天，当他在有岛武郎的《著作集》里读到《与幼者》一篇，便大有知己之感，翻译过后，还另外写下一则随感，其中说：觉醒的有岛氏“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灵犀一点，其实又何止于作者如此呢？

没有哪一部文学史批示说这些作品都是代表性的，它们的移译，全凭了鲁迅个人的兴味来取舍。这种自由选择，充分表现了译者高度的自主意识。

谈到这段在大学兼课的日子，鲁迅曾向郁达夫说道：“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又非得扮官不可。”

至于他的创作，其实也在“扮”，他说“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就是这个意思。由于他自觉思想太黑暗，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因此所说的话，也就常常与所想的不尽相同。有些感伤的情绪，也都主张掩盖起来，不必形诸文字的，他对刘半农发表的《寒食诗》就有类似的批评。从表达自己这方面看，恐怕翻译要少顾忌一些，少“扮”一些。那些意识

和潜意识中的阴暗面，只有到了《野草》时期才得以袒露出来。

或苦于“扮”，或乐于“扮”，人生之“扮”则一。而人格的辨识，惟在这苦乐之间。

## 47. 《新青年》的解体

历史总是要保持一个恒量。

五四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在斗争中负了盛名，但因此也遭了艰险。终于，陈独秀被捕入狱了，《新青年》随之停刊。1919年年底，杂志同人决议将编辑部转移到上海。

在沪出版的《新青年》，仍由出狱后的陈独秀负责编辑。这时，他变得更为激进，决心赋予手头这个复活的杂志以一种战斗的政治色彩。8卷1号，劈头就是他的《谈政治》，同期还开辟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革命后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紧接着，针对研究系利用《改造》进行的反动宣传，他又发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推动的作用。

所谓“研究系”，是一个麇集资产阶级政客的集团，狡猾善变是他们的共同性格。辛亥革命后，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别成立民主党、联合统一党、共和党，袁世凯时代合并为国会中的第二政党——进步党。尔后，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领袖人物又提出“不党”主义，自行取消了进步党。由此分化为宪法研究会和宪政讨论会。这两个派别不久统一为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这班政客依附北洋军阀，其中不少在北京政府中担任要职，此外还豢养些帮闲文人，共同窃食革命的果实。

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却过起了流亡生活。1916年，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在孤立无援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宣布恢复曾经一度取消的国民党，亲自奔赴广东，领导护法运动，试图捍卫共和政体和民元约法的尊严。但是，由于南方军阀的背叛，再次遭到失败。1919年，国民党改称为中国国民党。次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在护法的旗帜下成立非常政府，任非常大总统。从此，广州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一个新的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了。

空间的距离，往往带来心理上的隔阂。本来，《新青年》的同人们是为共同的全面反传统的意识所集结起来的，各自的世界观很不相同，随着政治季候的急遽变化，其中的差异性便作为深刻的裂痕出现了。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人事变动成了事情发生的诱因。

陈独秀赴粤前，先后给北京同人和胡适、高一涵发出两封信，报告编辑事务移交陈望道办理，以及编辑部人员的变动情况，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做了检讨，希望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以使杂志日后仍然趋重于哲学和文学。信中特别提到南方关于胡适和陶孟和接近研究系的传闻，希望他们有所警惕。

信是温和的。可是，在胡适看来，却不免有着虚矫的成分。目下的《新青年》，难道可以指望其改变色彩吗？在上海同人的主持下，任北京同人怎样抹淡也没用。鞭长不及马腹。他心里有一种亡失阵地的焦急与悲哀。虽然，他认为很有必要就接近研究系一事进行辩正，最后还是被当作私人问题给按下来了。他毕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有着相当涵养的人。《新青年》何去何从，成了他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提出解决《新青年》问题的三个办法。语调同样的温和，可是看得出来，里面极其深隐地表示了他的不满。

或者传阅原信，或者通知内容，同人们都知道了胡适提出的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趁此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由北京同人于9卷1号内发一个新宣言，略根据7卷1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术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三、暂时停办。

最后接到通知的是周氏兄弟。

这时，周作人得了肋膜炎，在家静养。鲁迅来到后院，同他商量过后，立即执笔回复。

思想革命始终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目标。当此新思潮汹涌而入的时候，他们认为，完全有认真加以研究和介绍的必要。只要有助于古老传统的崩解，就不应加以排拒。几年来，无论在思想革命或是文学革命方面，《新青年》都建立了很大的功绩。可是，作为在手的惟一一份杂

志，如果它一旦被改造成单纯的政治性质，则无论如何是可遗憾的。他们同胡适一样认为，要上海同人改变目前的方向相当困难，因此应当把编辑部迁回北京。这样，不但可以催促同一战阵的伙伴多做文章，充实杂志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北京既是旧垒中最坚固的部分，又是文化新军最早出现的地方，因此杂志留在北京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鲁迅个人，对胡适信中“不谈政治”的声明颇不以为然，于是，在陈述了两人的意见以后，对于这点特别做了说明。政治这东西，也并不为官场所专有，我们自说自的话，又何须告诉他们，乞请他们恩准呢？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胡适读罢，觉得鲁迅关于不必声明不谈政治的主张是对的，便立刻在第二天寄给陈独秀的信中补入了。

真是一个可敬畏的朋友！这几年，他一直是《新青年》中的一员健将。胡适记得，自己写了《贞操问题》，他就写了《我之节烈观》；自己写了《我的儿子》，他也就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几乎都是同时进行的。在他，也许并非出于有意的配合，但在自己方面总觉得是一种有力的声援。他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深入一层，但因此顾虑也就特别多；不过，倘以为不成熟的意见是决不会随意说出来的。

胡适的信发出没几天，李大钊就转来了陈独秀给同人们的复信。他没有想到，他的三条办法会激怒他的老朋友。

陈独秀对胡适将《新青年》“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的建议分外不满，他指出，提出另办杂志的主张，纯然是为了反对他个人；因而郑重声明，如果另起炉灶，将与《新青年》完全无关。

接着，胡适收到陶孟和转来的又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警告说，必须考虑与研究系接近的后果，不然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的末尾，还用了“言尽于此”的字眼，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味。

事情竟发展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在这个时候，周氏兄弟收到钱玄同的来信，并附李大钊等信札三件。钱玄同明确表态支持胡适，认为陈独秀说胡适追随研究系是神经过敏所致。信中集中攻击了中国社会，以为中国社会决不会比政府好，要改良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虽然，他不同意胡适反对谈“宝雪维几”，却认为马克思、“宝雪维几”、“安那其”、“德谟克拉西”，所有主义中国人都讲不上，只好请几位洋教习来教大家“做人之道”，等到有些“人”气以后再行推翻政府。

钱玄同的意见虽有偏激和颓唐之处，而重视国民根性的改造是不错的。鲁迅不解，陈独秀何以要把另起炉灶看做是反对他个人，另起炉灶有什么不好呢？要是反对个人而有利于大伙的事业，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考虑和讨论的余地？……

鲁迅给李大钊写信说，对于胡适提出解决《新青年》问题的三种办法，还是以第一种为好。应当有一个哲学文学性的杂志，而且，还须减少点特别色彩。

李大钊把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的意见及时通知了胡适，并且表示，有必要给陈独秀写一封信，辩明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

过了两天，胡适写了一封颇长的信，由北京同人传阅。送到鲁迅手上时，已经先后有五个人看过了——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

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和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始到。）我回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增补叙入。此条言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会。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术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像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

十、一、二十二

慰慈赞成此议。适。

一涵赞成此议。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王抚五。

我还是主张以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适注。看来分裂确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早些时候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其所以发生在《新青年》内部就绝不是偶然的。陈独秀们热衷于政治，胡适们却作超政治的构想；陈独秀们要做政治的实行家，胡适们侧倾向于走进研究室。既然信仰各不相同，难免有分裂的一天；现在连行动都已经颇不统一了，为什么还要强调统一思想？倘按照“中庸”的老法子，勉强凑合在一起，那结果恐怕比分裂还要坏！……

兄弟俩商议过后，鲁迅在胡适的信末以作人的名义写下这样一条意见：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趋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写罢，再将胡适和各人的意见看了一遍，觉得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十分注重《新青年》这个名目。他想，问题不在于挂什么招牌，倘使有一个杂志，其内容抵得上《新青年》的充实，为什么就非用“新青年”三字不可呢？何况，时代天天进步，新书刊也当层出不穷，难道其中就不可以产生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为什么一定要抱住一个旧有的名目不放，把它当成为既定的权威，不让有任何更改的余地呢？

过于看重名分没有什么意思，甚至他觉得有点无聊了。于是，在作人的意见下面，他又加了这么一条：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

这一个名目。树。看上一遍，心里忽然感到了一点寂寞、一点悲哀。  
《新生》与《新青年》。盲诗人与独弦琴。钱玄同黑色的大皮夹。会馆之夜。狂人。墓地。乌鸦。传过去又传过来的各种信函……凌乱地塞到一起，但一时间也没有怎么细想，便把信转到钱玄同那边去了。

分裂已成定局。

北京方面的来稿越来越少，而上海方面对胡适等人也不存什么奢望。在最后的僵持阶段，陈望道和陈独秀都曾先后写信向周氏兄弟约稿，希望在艰难中取得支持。

对于他们，鲁迅是颇怀好感的。特别是陈独秀，他对自己的创作，是《新青年》的所有同人中催促最力而且奖誉最多的一人。《域外小说集》的再版，也是经由他几度接洽的；此外，建议自己将发表在《新潮》和《新青年》的小说剪辑订正，准备付梓的仍然是他。对于朋友的恳求，自己还能说些什么呢？

很快，他寄出了小说《故乡》。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周作人系发起人之一。从这时候开始，《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这个新生的文学团体的机关刊物。

孙伏园主编的《晨报》第七版，由鲁迅命名为《晨报附刊》，带有一定的独立性，开创了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先例。

这两家报刊，同《新青年》一起，同时成了鲁迅创作的催生婆。

他说过，他自己并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然终不免呐喊几声，无非是出于一种“自害的脾气”，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而已。他自比为一匹“疲牛”，无妨废物利用，所以无论张家李家，也无论耕地挨磨，甚至做乳牛的活广告，也都可以任由别人拉去。

他写信给周作人说：“我们此后译作，每月似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果有不均之诮。”有时被友情拉拽得苦，为了应付，也就不能不动用一点“世故”了。人间鲁迅（上）

样章到此结束

需要完整版

扫下面二维码



或加微信：shuyou055

领取

## 十五、内战与溃散

在集团内部，要保持人格的独立是困难的。

他倾全力对付迎面而来的敌人，却又不得不提防来自背后的“工头”的鞭扑，和“同人”的暗箭。这种境遇，不能不使他的心灵受伤。然而，他忍耐着，支持着，决不因此叛卖自己的信仰。

### 109. 刨祖坟——中国文化心理探微

中国的所谓“民主”，与西方很不相同。它不是建立在维持个人自由、平等和独立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王道”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恩赐的东西。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政体的坚硬妊娠，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新的胎动，只能来自世界现代政治和思想潮流的外部撞击。在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没有改变之前，监督舆论，查禁书刊，各种利于统一控制的行政措施日趋强化，这种现象是必然的。

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一百四十九种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以及七十六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3月，特别市党部相应发出查禁书刊的密令。鲁迅的著译，均在被禁之列。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这是专司文化暗杀的机关。许许多多作品，在这机关里被肆意删改、禁止、没收，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赴法场一样。比较捣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艺术电影公司等文化机关的暴力行为，是又一种暗暗的死。允许刊行的不得不编的杂志，如《现代》、《文学》，或者填塞莫名其妙的文字，慢慢转向；或者稿子被抽得了无生气，以致终于完结。

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发起一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新文化运动”。一个大独裁者，政治流氓，厚颜无耻却偏要鼓吹“礼义廉耻”，毁灭文化却偏要大谈“文化建设”。他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救国建国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革命运动”，要求人们“做国家的一个良民，家庭的一个肖子，在学校里做一个规矩的学生，在社会上能做一个守礼法的君子”。总之，尽小民的本分，驯服到底。此外，国民政府还拨出巨款修建孔庙，明令规定孔子纪念日，积极推行尊孔读经，力图把外来的法西斯主义同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以求维护“安定”的

局面。

这种政局，对于一个已遭党国通缉的著作家，自然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鲁迅除作品被禁之外，还受到御用报刊的各种诬陷和攻击，谣言不断，他向来深居，不大出门，却说他远走青岛、香港；又说他得了脑膜炎；最可怕的还有“汉奸”帽子。他的信件遭到检查。母亲鲁瑞的来信，便赫然打着“检讠”的印记。

单是应付关于脑膜炎的谣言，便不胜其累。天津《大公报》载同人所办的《盛京时报》的消息，说鲁迅因患脑炎，医生劝诫从此“辍笔十年”云，鲁迅的亲友和读者，于是惊扰纷纷，不断写信前来探问。单为更正，便写了几十封信。他写诗赠台静农说：“横眉岂夺娥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一副满不在乎的戏谑调子。其实，他的内心是苍凉的。一个月后，为南宁博物馆书写的条幅，所选便是明末清初画家项圣谟的《自画大树诗》：“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漫溢在文字间的，显然是另一种情调。

横站的士兵/内战与溃散人间鲁迅（下）5月底，他作七绝一首，书赠日本友人新居格：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本人就是千千万万奴隶中的一人，论命运，只配一例地沉埋草野，哪里还会有动地的哀歌呢？心通万里，混茫一片。如果说，到底还有愤怒的爆发，也只能听于无声了！……

鲁迅深知他的危险处境，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即将临头。但是，他又不想离开上海，对于山本初枝邀他旅日，以及萧三转达的苏联请他参加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意向，全都加以婉谢。他告诉山本初枝说：“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他这样答复萧三：“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況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

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他何尝不想歇歇，玩玩，然而不能。命中注定要受苦，挣扎，拼杀，注定要受大人物的嫉恨和小东西的围困，有什么办法！

知识分子的属性并不在于拥有知识，犹如技术之于工匠一样，而是由知识培养起来的理性和批判意识。他们对人类命运始终给予最大的关注，现实问题不是他们所能回避的。可是，在一个专制国度里，莫谈国是是必须恪守的原则。而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批判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自己。他们不能不忍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鲁迅发表时事评论已经非常困难，他不能不迂回到敌后去重新开辟战场，把文化学范围作为他的扫瞄对象，这类杂感，构成为《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两个集子的主要内容。

文坛上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可以说是一场具体的文化问题的争论。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天津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赋闲”；接着又发表《论“海派”》，说“京派”作家态度“诚朴”，“海派”作家则“投机取巧”，“见风转舵”，明显的扬“京派”而抑“海派”。“第三种人”苏汶起而反驳，发表《文人在上海》，为“海派”辩解。鲁迅无意介入文人之间的这种近乎无聊的争论，然而，他却从中洞见了争论背后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更深层的东西。

在同一天，他作了相应的两篇短文：《“京派”与“海派”》及《北人与南人》，剖析处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文化中心的人们，尤其是文士的文化特质。

他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如此而已。在说到北京学界的时候，他特别评价了五四运动，以为是最大的光荣，而且迄今仍然留有历史上的光辉。五四运动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但是时过境迁，当年的战士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完完全全的向传统复归了。“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官之鄙商，在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政治中，已经相沿成习。至于

北人鄙视南人，作为一种传统，也都同样与权势者有关。他指出，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的北部，再携北人南征，于是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这里隐含着他所经常批评的卑劣的奴性。统治者必须治心，必须培养奴性。文化性格，文化心理，不能不打上阶级统治的烙印。他认为南人的缺点，是由权贵南迁带来的。那么，腐败颓废的风气，也就不独由近商者所招致。在这里，他看到了被称作资产阶级文化中同样混有封建主义文化的东西。亦官亦商，总之，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上流社会的文化。这是为他所憎恶的。

一年以后，他又写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揭露“京海杂烩”——“京派”与“海派”文人握手言欢的最新趋向，指出这种官商合作，都因为帮闲帮忙一样的“不景气”，一样的不能挽救其没落。对京沪两地为此喋喋不休的文人，他感到十分可厌，在介绍法国作家法朗士描写名妓泰绮思的小说之后，自白说：“我宁可向泼刺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在《北人和南人》中，鲁迅这样分析了北人和南人的文化特点：北人厚重，但厚重之弊也愚；南人机灵，机灵之弊也狡。从改造国民性出发，他借相书提出一个救治的办法是：北人南相，师法南人的机灵；南人北相，吸收北人的厚重。并且明确指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北京和上海是鲁迅先后生活过的地方，对栖聚在这两个地方的文人有过多方面的接触。因此，在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中，他能够很好地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文化历史的考察，把文化意识和阶级意识统一起来。在他的眼中，“京派”作家是封建主义意识的代表，拜权主义是其特征；“海派”作家是资产阶级、小市民意识的代表，拜金主义是其特征。前者封闭，倒退，墨守；后者势利，圆滑，善变。对中国文人的种种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在鲁迅晚期杂文中有更充分的展开。

随着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位置，作为启蒙思想者的鲁迅，给予严重的关注是必然的。

知识分子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自身的历史特点。鲁迅虽然对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受的压迫抱有同情，对他们潜在的能量多所期许，但突出的仍然是否定，是对植根于中国官僚政治社会的文化寄生性的批判。如果说这种批判，在北京时期集

中在政治方面，如对章士钊、陈西滢等在女师大问题的斗争，那么在上海时期，则更多地集中在文化方面，文章有《二丑艺术》、《各种捐班》、《四库全书珍本》、《帮闲法发隐》、《登龙术拾遗》、《“商定”文豪》、《大小骗》、《考场三丑》、《读书忌》、《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等等。后来论“文人相轻”，一至于七，都说明了他对文人的重视。其中，他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飞腾”的、“爬”了上去”的大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所期待的是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和干预意识，而这一点，又是大知识分子所最薄弱的，他们往往远离平民阶级和社会现实，而通过“天梯”，同专横、虚矫、颓靡的上流社会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在鲁迅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这种改造，不等于屈从于政治压力的人格畸变，而是人的自觉建设。人的建设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

这个时期的杂感，涉及众多的文化项目，诸如：饮食，居住，衣饰，器具，娱乐，礼节，婚姻，宗教，神话，歌谣，语言，艺术，等等。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小品的是，不仅在它们的灵智和文采，重要的是贯穿其间的文化批判意识。“刨祖坟”是一种办法，他试图以此动摇现代官僚政治及其文化思想的根柢。

中国的畸形社会，在这里是通过不同层面的文化现象加以呈示的。每一个现象都具有独立的认识价值，但又具有互涉性，从而构成为文化丛，表现出综合的文化意义。《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男人的进化》、《“小童挡驾”》等由人类自身的生产、延续和发展问题构成同一组杂文；《推》、《“推”的余谈》、《抄“靶子”》、《“吃白相饭”》、《“揩油”》、《爬和撞》、《冲》等，由上海所见的日常生活现象构成另一组杂文。这种横向组合，在更大层面上揭示出一个日趋商品化的社会的病态。取习惯经验的角度写成的杂文有：《礼》、《打听印象》、《吃教》、《喝茶》等；取神话、风俗的角度写成的杂文有：《中国的奇想》、《〈如此广州〉读后感》、《过年》、《迎神和咬人》等。这些杂文更多地从文化积累方面纵向组合而成，深入发掘传统文化模式中的同类价值意识。横向与纵向的交叉组合，又构成为一个个坐标，一个个网络，互相关联，互相生发，层层推进。鲁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凡纪念，“礼”而已矣。礼既是一种行为规范，但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如果说中国人最重形式未必便对，有时候又最重视实际，譬如“推”、“爬”、“撞”、“冲”，譬如“吃白相饭”，譬如“揩油”，譬如“吃教”都是。如果说中国人专重实际也未必全对，却又最爱奇想的，总是拼命的救死、逃死，回避现实。有些文章发挥得十分

漂亮，如《爬和撞》所总结的“跪着的革命”：向上爬而爬得上者太少，于是发生撞，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下面的人制造撞的机会，使大家花些小本钱，而预约一种好生活。这样，大家便都愿意来试试，爬着来撞，撞不着再爬……不断“革命”，死而后已。又如《吃教》，文章说小百姓叫耶稣教徒是“吃教”的，其实这两个字可以一样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什么“革命”，什么“主义”，对于他们只是一种时髦，一种招牌，根本不存在信仰。文章还说，“吃教”有“专吃”和“合吃”两种，宜于专吃的时代是必须定于一尊的，至于合吃，诸教也本非异致，所有主义都可以为我所用的。不同的是一碟全鸭，一碟杂拌儿，吃是一致的。

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商品经济在中国较为发达的地方。对于初步形成的商业文化、市民文化，鲁迅是文化人中最先予以关注的一个。但是，他并没有像后来更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礼赞商品对固有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冲击，从而带来社会全面松动的杠杆作用。他有他的关切点。作为一个启蒙家，他所注意的是商品经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畸形的精神产物。由于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所造成的类似西方的社会病，在乡土中国远未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他的主要力量仍然放在对黑暗政治和官僚文化的挞伐上面。

此间，进攻性最强的，要算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所谓“两三件事”，指的是中国的火、王道和监狱。有关“火”的一节，把神话和典故同现实中的烧书事件等联系起来，揭示广大奴隶的某种心态，即在《马上支日记》中曾经说过的，中国的一些人，对于神、宗教、权威是怕和利用。文中分析他们祭火神的心理说，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一样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的如果不祭，据说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然而，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这就是奴才与奴隶的区别。至于火神，权势者，又决不会因为有过讴歌感谢的人们而施行王道的。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们由事实而有所省悟，好不容易开起学校来，无奈学生们又年年闹事，于是到了国民党掌握政权，作为改正的手段，除了大造监狱，什么也没有。对于思想犯，则有着另一种叫做“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遵奉某种主义，排击某种主义，如此可以反省到死。所谓中国，不就是一座思想统治的监狱吗？

关于王道，文章这样指出：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

对立的東西，其實却是兄弟，在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倘說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說現在還有者，是新藥。在內山書店的漫談會上，魯迅對儒家思想和儒士的最高理想王道之類有過很深入的剖析。他說，儒家思想的东西，都是為政治家而寫的信條，是政府加以利用的东西，總之並非是庶民自己的东西。只要建立一個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強制人民，這是中國自古以來不成文的律法。這種思想統治過度強化時，就會發生有名的東西——革命，革命一旦巧妙獲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現了。在最初階級，政府還不能不據什麼主義說點新事情，後來不知不覺間又要跑回到原先以傳統思想強制人民的地方去了。這時候，什麼言論自由啦，結社自由啦，天下為公啦，宗教是鴉片烟啦，都會忘得一干二淨。一面說教，聲稱要符合時代需要，一面毫不留情地去鎮壓言論自由，禁止結社。說到文禁，甚至不問文章內容如何，只根據作者的名字就可以絕對禁止，對這種野蠻的行為竟至於滿不在乎，世界不論哪一國也沒有這麼干過的。

為了刨掉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專制主義的老根，在一段時間內，魯迅集中搜購了一批明清時期的筆記、野史、禁書和檔案等，邊讀邊寫了《隔膜》、《買〈小學大全〉記》、《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獄史反照了現實。

《隔膜》和《買〈小學大全〉記》都寫到奴才文人。前者寫生員馮起炎，聞乾隆將謁泰陵，身懷著作，意圖呈進，以“形迹可疑”被捕，那著作也並非反動，只是以《易》解《詩》，信口開河而已，結果得了個“于聖王之前，混講經書”的“狂妄”的罪名，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後者寫名儒兼孝子尹嘉銓致仕回家後，使兒子給乾隆送了两本奏章，一為父親請謚，二請許一群名臣從祀孔廟。結局是：“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因為皇上加恩，才改為處絞立決。文章說，慘案的來由，都只為了“隔膜”：不了解主奴是有着嚴格的區分的，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向主子進言，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却犯了罪，因為另有准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以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奴才是不能高出于主人的。比主人高明當然大“不可恕”，試想若非自以為高明，怎麼會提起意見來呢？文章對乾隆一類“英主”的心態有着很深刻的披露：“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于是而有學說，于是而有門徒，于是而有門戶，于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

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作为统治者的“文艺政策”，或“文化统制”，一方面是砍头，禁书，甚至“销毁”，不使与世人见面。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有关系的历史著作，无不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不是鉴定，便是评奖，使文苑中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还有，就是以统治者的思想形成一种势力，一种潮流，并且使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迎合这种潮流。总之，文字狱这东西，是不能说它没有有效的，中国人的奴性，就很可以从那博大和恶辣的策略中明白它的由来。

《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继而叙说文字狱，以及文字狱以外的统治者的虐政。笔调悠徐，却是十足的“舒愤懑”之作。

医术的虐刑，是都需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简直让人相信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科学。从周到汉，有一种专施于男子的叫“宫刑”，施于女性的叫“幽闭”，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令人吃惊。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粗分就有流氓式、官式。两篇文章都援用过的史例，是关于明朝永乐皇帝的。在他惨杀的忠臣里，有一个叫铁铉的，油炸致死后，将其妻女发付教坊做婊子，还要她们“转营”，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谓“守节”，在那时还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呢！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就这样一直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然而，中国的文人，却偏能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种种残酷的事实，自然是最好莫如不闻，也即“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无奈现实总是逃不掉，君子自己也就亲临了庖厨。大道是对于世事“浮光掠影”，随即忘掉，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或对于现实“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撒一点小谎，可以消解闷气，到后来便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于是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譬如铁铉的女儿发付教坊的事，让士大夫知道了，就有了她们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

知，赦出，嫁给士人的佳话。在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虽或被权势者的出色的文字狱手段所遮掩。不过，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更是代不乏人。“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

汉儒白云“舒愤懑”，那是什么东西呢！？

文章把治者的凶残和文人的乖巧对照着写，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以各种好看的名目逃避中国现实的才子们的轻蔑和愤慨。在《病后杂谈》的结尾，他竟把自己的未来的死也拉了上去，说：……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文章送到《文学》月刊，检查时被删去了五分之四，只剩下第一段，即鲁迅戏称的“只剩了一个头”。他要求将删剩的部分照样发表，意在悬头示众。但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作家据此评论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至于《病后杂谈之余》，由于检查官说不准登，也不说登，发行人就找作者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还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了一遍，并且把题目改作《病后余谈》，删掉“关于舒愤懑”这样一个副题，然后准予发表。直到结集出版时，被删改的文字才得以补正。但鲁迅是从旁加了黑点的，目的是要留下一个痕迹，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鲁迅的小说《呐喊》与《彷徨》，通过典型化的形式，几乎动用了他的全部的生活积累，确立农民和知识分子两大主题，囊括了中国社会最本质的恒定的东西。散文《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野草》，从社会转向自身，从外部转向内部，后者在小说的抒情性与讽刺性两大叙述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象征性。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以上创作，足以构成一个自足的文学体系。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万能的，都存在着某种能源危机。对于一个善感而又富于理性的学者型作家鲁迅来说，在生活上陷于囚人般的无法走动的境况底下，就只好借重固有的深厚的知识，发挥无尽的思想。自然，论创作的动机，鲁迅也并不在乎美学殿堂的建造。杂文的写作，就这样成了一种“合目的性”的生成物。在长达二十年的写作历程中，他的杂文是在不断的腾挪变化中获得丰富的。《热风》带有哲理性，《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富于论辩性，《二心

集》则以科学性和逻辑性见长，《伪自由书》可读作一组时事评论，新闻性、政论性非常突出。《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新的整合，显然是作者有意识地向文学回归。最新时期的杂文，多近随笔、小品，融合了前期的各种特点，而偏重于启蒙性、文化性和知识性。鲁迅杂文，原来包容了多种的文体风格，惟此时更趋精粹、成熟和稳定，从而构成为后人所称的“鲁迅杂文”的基本格局。文化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密切结合，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杂文的一大特点，是区别于其他小品文作家的地方。正因为这样，在发表时，它们才特别恩蒙了检查官老爷的注意、修整和扣压。鲁迅一生中使用的笔名共一百四十多个，单从1932年到1936年启用的就多达八十多个，可见此间的杂文的战斗性。

鲁迅曾经对许寿裳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十几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的确，黑暗势力是彼此相通的，即使在看来极不相干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缝隙的暴露，都足以牵动他们的神经。种种行政强制手段，其实是虚弱的本质的体现。尤其是权力者，几乎无时不在提防着自身的崩溃，所以镇压，暗杀，是一刻也不能松弛的。

包庇是决定了的，而暴露和抨击也是决定了的，倘使黑暗长存，作为人类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可以有奴隶，但不可能都是奴才。当同乡老友张梓生代替了黎烈文而主持《申报·自由谈》，向他索约稿件，他作诗答道：哪里有甘美的酪果供菩萨们享用呢？生来就不像莲花六郎有漂亮的脸蛋可以邀宠，还是算了罢——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

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

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

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燃烟卷觉新凉。新凉即晨凉。每当黑暗的压迫使他感觉窒息般的痛苦时，他就在心里安慰自己：天快要亮了，天快要亮了……

天亮是一种感觉。

感觉未必可靠，最可靠的，莫如绝望的抗争。

## 110. 分道扬镳：笑是什么？

高度的政治文化专制往往令人紧张、挣扎、奋起，但也容易使人变得逍遥、淡漠，日渐消沉。谁愿意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

20年代的“学匪派”之一，《剪拂集》的作者林语堂，于1932年9月创办了《论语》半月刊。该刊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写实主义的“幽默文字”，泛谈社会政治、世道人心，颇具自由主义色彩。待到销行正盛时，因“产权”关系，林语堂退出主编的位置，交陶亢德接办，杂志也就日益沦为“滑稽式的笑谈”了。接着，林语堂又邀集同人创办《人间世》半月刊，宗旨与《论语》差不多，标榜“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推重晚明式小品，而更显超脱。

从作者的阵容看，这两个刊物都带有兼容的性质。为此，虽然知道鲁迅并非同道中人，林语堂和陶亢德仍多次写信约稿。开始时，鲁迅也送过几篇文章给《论语》发表，以后便婉辞加以拒绝了。

这同他对刊物的看法有关。《论语》，由可恶的邵洵美所开办的时代图书印刷公司发行，成为“盛家赘婿商品”，固然是一个原因，更为不满的，还是内容的油滑无聊。《人间世》令人作萧然出尘之想，作风本来与他很两样的。他在信中回复陶亢德说：“搏战十年，筋力伤惫，因此颇有所悟，决计自今年起，倘非素有关系之刊物，皆不加入，藉得余暇，可袖手倚壁，看大师辈打太极拳，或夭矫如撮空，或团转如摸地，静观自得，虽小品文之危机临于目睫，亦不思动矣。”所谓“大师辈”，其实就是指林语堂、周作人们。《人间世》为了借重名家，曾几次要求刊登鲁迅的照片。他说，自己“向来厚于私而薄于公”，倘非私人请托而公诸读者，他是不愿意的，又说当作家是滥竽充数，自己实实在在是一个“伪作家”云云。凡这些，都不过托辞而已。这个带有严重洁癖的人，总是耻于与阔人雅士为伍，他不愿出卖灵魂。

1934年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翼下的微风文艺社曾讨论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并吁请出版界、报界拒绝发表他们的作品。

把鲁迅和林语堂并称是带有历史的反讽意味的。的确，他们曾经共

同战斗过，直到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在《论语》创办初期，林语堂也还曾撰写过一批政治性较强的杂文，如《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增订伊索寓言》、《中国何以没有民治》等，但是，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剧，中国道家出世无为的思想和英国绅士稳健雍容的作风，已经完全支配了他。他说：“人到文明了，有什么忧愤，只在笔端或唇角微微一露罢了”；又说：“东家是个普罗，西家是个法西，洒家则看不上这些玩意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想做个人罢。”林语堂以“文明人”、“自由人”自居，而鲁迅恰恰是这类人物的敌对者，而站在“下等人”、“奴隶”一方的。他们终于分道扬镳了。所谓“故人云散尽”，这也是一种“散”法。不同阶级不同文化的意向，就这样通过他们——社会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的分散聚合，演出许许多多令人感慨的场面。

对于林语堂，鲁迅是了解的，知道局面已经无法挽回。然而，为朋友计，他仍然一再劝诱林语堂尽一点文化人的责任，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情。

他有信给曹聚仁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了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朋友之道，所取的仍是一种古老的哲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1924年，林语堂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此后又写了不少提倡幽默的文章，但真正被誉为“幽默大师”，还是在主编《论语》之后。

“幽默”一词原从翻译而来，指的是文章的语调和风格，后来林语堂进一步确定为“人生之一部分”，“一种人生观”。并且推庄子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在他这里，幽默是同“性灵”、“闲适”、“超脱”连在一起的。“人生在世是为何，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吗？”总之是尽可能地远离政治，无拘无碍，享受人生。这样，立足于批判的左翼文学，在他看来，未免太“急功近利”，尖酸刻薄了。

由于“大师”们的提倡，幽默文学大有风行一时之概。文坛上的这种

非政治化倾向，当然不是以文学抗争社会的作家所能接受的。特别是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激烈反对“平和之音”，他势必要对所谓“幽默”实行坚决的掙击。他反对的不是一个作家、一份杂志，而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普遍状态。此间陆续写作的系列的“文人论”，与此大有关系。他简直痛恨中国式文人，在政治高压底下，没有什么比游戏人生、清谈艺术的态度更坏的了。

## 笑是什么？

在林语堂那里，笑是“会心的甜蜜的微笑”，是“引起含蓄思想的笑”，是符合“真正的喜剧的标准”的笑。鲁迅也说到笑。在他所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的前记里，就曾指出契诃夫式的笑“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在《过年》里，他还特别强调蔑视统治者的笑，战斗的笑。文中说：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笑可以解脱，也可以讽刺。很有意思的是，鲁迅和林语堂都分别把“幽默”同“讽刺”联系在一起。《论语》第6期的编辑后记，就曾这样宣称：“本刊的主旨是幽默，不是讽刺，至少也不要以讽刺为主。”林语堂在他的著名的长文《论幽默》中，同样把讽刺同幽默对立起来，从而加以排斥。与此相反，鲁迅多次明确指出：中国是没有幽默的。中国人本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更是难以幽默的时候。虽有所谓“幽默”，实在也只是“寻开心”，是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他在《“滑稽”例解》中还把“幽默”和“滑稽”作了区别。他说，中国有的是滑稽，但这和幽默相距甚远。日本人译“幽默”为“有情滑稽”，即是区别的所在。中国之自以为幽默或滑稽文章者，不过蒙“幽默”或“滑稽”之号的油滑、轻薄、猥亵之谈而已。

至于讽刺，是与幽默大两样的。鲁迅对讽刺的定义包含了两大要素：一是“有情”，一是“写实”。讽刺家必须是富于热情的战士。没有无情的讽刺，正因为讽刺家有了干预社会的热情和勇气，才能打破“瞒和骗”的空虚，写出真实来。他指出：“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论语》创办一周年的时候，鲁迅应约写了《“论语一年”》的文章，其中举了萧伯纳，达尔文和赫胥黎作例子，指出必须从同一现象中辨识不同质

的东西。同是蛆虫，猴子的亲戚，狗，就有大小、好坏的区别。就说狗，倘将“给阔人开心的吧儿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较，何如？现代中国的“幽默”，还不是《笑林广记》式，唐伯虎、徐文长、金圣叹式，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吗？

讽刺并非如开玩笑一般的容易。真正的讽刺家是社会讽刺家，他所对付的是全社会，主要是权力者社会和所谓有教育的知识者社会，因此也就必然要承担各种风险。没有独立人格的力量是无力承担的。在中国，讽刺家如此之少，事情还不是最明白不过的吗？

鲁迅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是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中国文人的脾气，他是清楚的，中国现实的危机他一样清楚。在他看来，小品文的盛行是必然的，没落也是必然的。他指出：“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有版税可抽者，尚且不容有“骚音怨音”，怎么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呢？

1935年有过一场关于杂文问题的论争。归结起来，就是如何看待杂文的社会性和文学性。对此，鲁迅是坚持了他的一贯的原则的，即把讽刺的严肃性和审美的独特性结合起来。对于杂文，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实践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理论批评家。

中国现代杂文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鲁迅的杂文，作为他的文学观的一种体现，正好继承了“五四”的战斗传统。在这里，文学首先是为人生的，因此它又不能不是否定的、批判的。在所有的文体中，杂文短小、轻便、灵活自然也宜于作“性灵”的载体，但因此也最能发挥直接的否定、批判的作用。他指出，杂文也即小品文不是“小摆设”，它的生存是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他说：“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他最憎恨奴性。在《漫与》一文中，他这样描述了奴隶与奴才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在文学上的反映：“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

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显然，林语堂等提倡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是属于麻醉一类的；而这批“高人兼逸士”，超庸奴，超现实，超责任，说穿了还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讽刺是杂文的生命。只要世间还有黑暗的事物，落后的事物，有待改革的事物，就一定有讽刺，有杂文。鲁迅杂文的讽刺是广泛的、多样的，他不但讽刺了权势者、奴才，还有奴隶。因此，那种认为鲁迅的杂文只用于讽刺敌人，而与人民无涉，以及“鲁迅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对鲁迅来说，杂文创作始终是一种“严肃的工作”。

早在《论语》之先，周作人便联合了俞平伯、废名、冯至、曹聚仁等，在北京创办了一个同人刊物《骆驼草》。他们宣称“不谈国事”，决心“讲闲话，玩古董”，“笑骂由你笑骂，文章我自为之”。杂志虽然只办了一年，但却吸引了一批文士的注意，“闲适”一路散文于是以一种群体创作的方式出现。周作人的文字被林语堂推为“闲适”和“幽默”的典范，而他本人也就成了“小品文之王”，日后《论语》派的精神领袖。

1928年，创造社曾经以“趣味”和“闲适”评论“语丝派”的周氏兄弟，鲁迅虽或写过“闲谈”、“漫笔”之类，但却以自己的愤火照见了历史，实在不能囿于题材的。周作人不同，一方面发表“人事的评论”，表现了他的政治敏感和“流氓”性格；另一方面又把为他所攻击的“旧文明”、“所谓礼”，奉为“生活之艺术”，鼓吹“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当国民党在血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它们的“党治”世界，他就在专制政治中感到“被鬼吃”的恐怖了。他说：“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于是，他声明不再写“祭器文学”，反对“一副野蛮神气”的“打架的文章”。即使偶有不平，也不过做做“精神上的体操”而已。这类略具“苦味”的“闲适”文章，结果，将对读者产生同等的作用：粗犷的人心，因此而渐渐变得平滑起来。然而，鲁迅并不改他的野气，他是始终好斗的。

在一次由黎烈文主持的宴会上，说到为《自由谈》写稿，鲁迅便说：“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呀？”陈子展问。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法？”

“骂法也多着。”

王映霞插话道：“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林语堂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是的。鲁迅不稀罕那份“忠厚”。在上流社会里，他不必讨好任何人。为什么要“忠厚”呢？他还嫌自己刻薄得不够呢！

对于二弟的思想变化，鲁迅是清楚的，他无时不在关注着周作人。其实，他对《论语》的“危机”与“出路”的说话，也都包含了对胞弟的批评和期待的。当周作人陷于众人的攻击时，他那深潜的温情，就汨汨流露出来了。

《人间世》以《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登了周作人的两首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羨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周作人的许多朋友都做了和

诗，熙熙攘攘，热闹得很。但同时，也遭到一批青年人的批判。

对此，鲁迅没有公开表态，但在写给曹聚仁 and 杨霁云的信中，却都分别替周作人作了辩护，给曹聚仁的一封写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愆，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对于国家的衰亡，当权者是无法推卸责任的。这是鲁迅的一贯观点。正是鉴于这种认识，他才表现出了对一般文士的宽容，其中包括周作人。从信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固然表示理解，而另一方面又不无惋惜之情。对社会的不满和讽刺，竟至于没有解人，这本身该是何等可悲的事——十年前，还是一个“思想革命”论者，写得一手“浮躁凌厉”的文章……

然而，两个人，早已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事实如此冷酷。无论作何种努力，是再也无法寻得灵魂对话的机会了！

## 111. 如此“同人”：林默与田汉

鲁迅的战斗的杂文观念势必要受到挑战。但是，挑战竟然来自左联内部，这是他所意想不到的。

其中，有号林默者，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人间何世》的文章，在批判《人间世》的同时，反对小品文，认为这种合“西方文学的自由主义同东方文学无力的骚人名士主义”的文章，是必须加以扫荡的。在左联，林默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左倾青年还特地开了会，反对写杂文，要写“伟大的作品”。他们表示，希望取得鲁迅的支持。然而，老头子沉默了。

于是，引发了来自自己营垒的第一支暗箭。

在《自由谈》，鲁迅以公汗的笔名，发表《倒提》一文。文章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此大鸣不平，以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又何补于归根结蒂的命运？古来就有所谓“仁人义士”解倒悬的各种胡说，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

犬”，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这类人物一多，当然大家要被倒悬，且送往厨房，也无人可以解救。在这里，鲁迅暴露了国民中的奴性心态，再度批判传统的恩赐观点。他说，我们究竟是人，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这意思本来是极明白的，但是，到了林默那里，却被理解为：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第二是受了西洋人的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对华人的虐待必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是从“古典”来证明华人没有出息。于是，他写文章下结论道：《倒提》的作者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

文章叫《论“花边文学”》，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

林默在文中还顺势否定了所有的杂感，认为颇尽八股的能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把这种文章名之曰“花边文学”，而《倒提》正是“花边文学”的杰作，而且断言，这类“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终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鲁迅编杂文集《花边文学》，即以林默所赠的恶谥命名，此外还特意将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下面。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击他是“汉奸”的来信并提，一例称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一方面，他吐露了在明诛暗杀之下，非写“奴隶文章”不可的愤懑；另一方面，对于“同人”的“背后的闷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回避”的苦闷。

从形式到内容，林默全盘否定“花边文学”，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与建设中的“‘大众语’文学”相悖，鲁迅在《论“花边文学”》发表的同一个月里，有信给曹聚仁，谴责了一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后来解释说，“所说的狗才”，“指的是《谈言》和《火炬》上的有几篇文章的作者，虽然好像很急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虽然林默的文章并非专论“大众语”，但当是包括在“急进”的论客之内的。他告诉曹聚仁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一段时间来，敏感而自尊的他，已经颇尝了一点左联里的青年战友所给的苦头。在回答青年作家关于文化团体处于停滞状态的说法时，

说：“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及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这种悲哀，是越来越紧地攫住了他。

1923年5月，国民党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尊孔读经，提倡文言，得到复古派的支持。商务印书馆附属小学校长吴研因著文反驳，从此揭开关于“大众语”论战的帷幕。

在上海，陈子展、陈望道、胡愈之等提出“大众语文学”、“大众语运动”的口号，《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和最新创刊的《太白》等报刊，分别刊出大批文章，痛击“文言复兴”的逆流，推进语文改革运动。

《社会月报》编者曹聚仁于7月间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意见的信，鲁迅先后两次复信，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他还写了十多篇有关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门外文谈》，可以看做是大众语运动的纲领。

方块汉字是和大众两立的，是特权者的东西，愚民政策的机器。为此，鲁迅坚决主张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在他看来，现代人的生存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了实行“大众语文”，就必须推广拉丁化的新文字。

但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普及拉丁化当是大众自掌教育以后的事情，根据一贯的“中间物”观点，他认为，现在一面要研究、推行罗马字拼音，一面当促进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使提倡者先行写作一些大众能够看的东西，然后逐渐地过渡到大众自能写作的新阶段。不然，造出一种所谓的“大众语文”，也还是特殊阶级的独占工具。他反对林语堂的“论语派”，称之为“另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提倡“语录体”，使白话向文言复归。在反对新旧复古派的同时，他又反对“迎合大众”，做“大众的新帮闲”。早在两年前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瞿秋白要求作家转换原来的路径，放弃“五四”以来所应用的欧化的口语，而去利用中国旧有的、原始的文艺形式。“大众语”与“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是有联系的，鲁迅与包括周扬在内的一些“彻底”论者不同的是，他没有放过“大众语运动”的实行者乃是远在“大众”之上的知识阶级，以及运动必须在现存的政治文化专制制度下进行这一基本事实，所以在谈到大众语文时赞成不得已仍可采用文

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做切实的准备和过渡工作。

他的关于反对专化，主张多元的观点，在“大众语”讨论中是十分突出的。他的目光，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超越文艺或学术的范围，而投射到整个的社会改革上面去。

在《门外文谈》里，有这样一段关于改革者的话：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有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论新文字》的议论更为深刻：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具有自省意识的知识者，鲁迅深知同类的作用和弱点，惟其过分地看重启蒙的责任，所以，他才对先天性的缺陷部分分外地感到痛切。

他写给曹聚仁的关于大众语的信，本是私人通信，不意被曹聚仁转发在《社会月报》上。更意外的是，因此引出署名绍伯的一篇文章《调和》：“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甚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到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昵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个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这就健忘的读者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来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似读了最后杨邨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文章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难道这竟是一种巧合？

善于调和。无原则。牺牲青年的生命，又太打浑了水。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器量。又是器量态度和年纪，苦了读者。“戟门坝上的儿戏”。

“调和”。首甲等人不也说是“调和”吗？

都是化名。林默即廖沫沙，绍伯即田汉，这他知道。然而，他们为什么要这般躲躲闪闪呢？互相间是否达成了某种默契？背后还有人吗？……

他从不期待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但是，却不能容忍随意的戏弄，反击是必须的，当他想及作者乃系身边的“战友”时，便又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他不愿意因此使敌人称快。林默的文章，不是也没有反驳吗？还是随它去吧！

只是，这种忍耐的确使他万分痛苦。

直到年底，他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绍伯的文章。文字不多，但分明显示了他的愤慨：……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他声明，这并非个人的事情；接着又指出，绍伯所施展的是“老手段”，言下是他所熟悉的，化什么装呢？

对于这段严肃的文字，左联内部有一些人是不以为然的。夏衍看了以后，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后来編集时，他在附记里完全拆穿这种把戏，指出：所以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是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在信里，鲁迅是把绍伯同林默挂在一起的。在另外给朋友的信中，这种并列的提法还有过三次。一者致杨霁云：“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二者致曹靖华：“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篇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经许多人的

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邨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得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去拿我做玩具。我终于莫名其妙，所以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三者，直到1936年1月，他还告诉徐懋庸说：“年底编旧杂文，重读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

4月，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慨然写道：“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画，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田汉的复函是在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发表之后两个月写的，不但毫无悔过的诚意，而且进一步采取隐瞒、戏弄的态度。

他说：“该文虽与我有关，但既非开顽笑，也非恶意中伤，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来提出抗议。”又说：“至于先生对于我（？）的批评，——如‘心口不如一’等，虽则自问缺点极多，然而那恰不是我的缺点，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信末，还特意作了一个“简单的声明”：“绍伯却是我的一位亲戚（表弟），他是一个很纯洁而憨直的文学青年，他写那篇文章的用意，却绝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是对于鲁迅先生他从来就很敬爱的。”“为了促起鲁迅先生的注意，绍伯便写了那篇文章”，“我也曾看过那篇文章，虽则很憨直的责任着贤者，却丝毫没有中伤鲁迅先生或曲解他的论点之处。这我以为是没有什么理由取得鲁迅先生的‘鄙视’与‘敌意’的。但鲁迅先生却再三的表示他的愤然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最后

说：“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凡是在同一的阵营中的，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我们应该更分明的认清敌友。’”这样，鲁迅反倒多出一份不分敌友之嫌了。

这样的信函，他当然是不会理睬的。

但是，廖沫沙和田汉的先后化名的攻击，确乎使他的心灵受伤。在此前后，《支那研究资料》译载了左联作家穆木天出狱前给国民党当局所写的诋毁普罗文学的报告，田汉和阳翰笙出狱后为郑正秋所作的挽联，都不能不使他怀疑左联内部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左翼立场。在他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党徒，人们从来不为哪一个信仰或首领拼命，总是随风转舵。这是很可慨叹的。

还有，把持左联的周扬，那种“元帅”和“工头”般的种种作风和办法，于他是更为严重的刺激。如果说，已经显露原形的朋友令他伤心，那么尚未显出原形的“同志”则多少要使他感到可怕。

## 112. 和青年奴隶在一起

鲁迅变得越来越孤独。

他简直不愿意接触任何陌生的客人，尤其是青年。他存在戒心。几年来，与他缠斗不已的，不是几乎全是青年吗？然而，就在他深居简出的时候，又有两个青年人前来纠缠他了。他命中注定要同青年厮混在一起，无论是好是坏。因为，对于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青年是惟一的生机。

这是一对青年男女：一个叫萧军，一个萧红。

萧红，原名张乃莹，出生在中国最东最北部的呼兰河畔。那是白雪的故乡。她一生下来，就被家人当作不祥的种子而加以歧视。父亲是家里的暴君。九岁时，母亲因病故去，她便随同慈爱的祖父一起生活。老人常常抚摩着她的头发，祝福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长大以后，不料境遇反而更坏。二十岁时，残暴的父亲逼她中辍女中的学业，嫁给一个官僚地主的儿子。因为逃婚，她成了哈尔滨街头的流浪者。后来，由于别人的资助，她来到北平读书，但结果，还是被骗

回到婚姻的笼子里。在哈市的一家旅馆，那位少爷纵情玩乐，过了一段的日子，突然逃之夭夭，留下她只身作为抵押房租的人质。当此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投稿《国际协报》求援。萧军、舒群查明地址，先后看望了她。借着哈市发大水的机会，萧军偷偷地从旅馆接出萧红，从此作为人生的伴侣，开始了长长的艰难的跋涉。

沿着温暖和爱的方向，萧红继续着她的追求。她的文学和绘画的天分都很高，做学生的时候，就画过电影广告，写过诗和散文。1933年5月开始小说创作，她以特有的抒情气质，写失业青年、佃农、惨苦的妇女，写革命者，写自由之魂。10月，她同萧军合印了第一个小说散文集《跋涉》，署名悄吟。然而，集子问世之初，却立即遭了禁止的厄运！实在太难了！活在这样的中国，要做成一件事情实在太难了！

但接着，两人连立足之地也将要失去，于是不得不像众多的东北流亡青年一样，漂流到关内来。

青岛是第一个停泊点。在这里，萧军任一家报社的副刊编辑，萧红则在家承担所有为家庭妇女所应承担的繁琐而沉重的工作：买菜，劈柴，烧饭，烙葱油饼，甚至变卖家具……在依然艰难的生活中，他们创作不辍，并且开始向长篇掘进。萧军写的是《八月的乡村》，萧红写的是《生死场》，虽然个人气质以及在作风上的反映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一样深切地眷恋着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一样有热血的灌注，一样有不屈服的奴隶的心。他们具备了作为作家的最可珍贵的素质，对于命运的痛苦的皈依。但于创作的前途，却缺乏足够的自信：这样的题材是合适的吗？所表现的主题是否有积极的意义？是否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合拍？恰好萧军从当地荒岛书店经理那里得到鲁迅的通讯地址，便鼓足了勇气，以个人名义给倾慕已久的导师发出第一封信。

鲁迅在收信的当天作了回复。针对信中提及的两个问题，他说：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恍如一只孤舟，在茫茫夜海上寻见了灯塔的光芒！两个青年贪婪地读着来

信，一遍又一遍，显得那么兴奋。信并不长，但是在他们的眼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都隐藏着深刻的意义，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萧军写了信，并把《生死场》的抄稿连同《跋涉》，一起给鲁迅寄出。

就在这时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报社的所有工作即将结束，个别人员也及时作了转移。萧军闻讯，马上给鲁迅发了一封信，然后同萧红一起搭乘一条日本轮船来到上海。

刚刚安顿下来，他们就迫切地想望见到鲁迅。这里固然有着一一种感情的牵系，也有着关于文稿的悬挂，但同严峻的生活本身是不无关系的。除了支付拉都路亭子间的房租，买一袋面粉，一只炭炉，一些木炭、砂锅和碗筷油盐之类，临行前从报社领取的四十元路费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样，在大上海，将怎样生存下去呢？……茫然之际，惟觉鲁迅是惟一的依靠，但是，要是不能解决呢？他们想，只要能见上先生一面而被迫离开上海，也当心满意足了……

萧军直接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但是，收到的复信却使他们陷于深深的困惑。“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时再说罢。”这种拖延，会不会是委婉的拒绝？

又过了两天，来信重提了见面的事，说：“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就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在这举目无亲的冰原般的世界，现在，他们可以取暖了。信里还提醒说：“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只是这种用心，他们暂时还不可能理解。青年毕竟是单纯而傲岸的。

这回多出了一条内容，就是问候“吟女士”。萧红领头抗议了。

鲁迅的回答很风趣：“中国的许多话，要推敲起来，不能用的多得很，不过因为用滥了，意义变成含糊，所以也就这么敷衍过去。不错，先生二字，照字面讲，是生在较先的人，但如这么认真，则即使同年的人，叫起来也得先问生日，非常不便了。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现在也有不用称呼的，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式，所以我不用。”这里，他再次说

明了一贯主张“硬译”和“重译”的根据，即中国人思维和语言的单一性和含糊性。老拳斗师轻轻一击，两个青年拳击者就伏倒在地了。

在接连的几次通信中，他们知道，鲁迅是深爱着稚气而不安定的青年的。但是，对于他们流露的稚气，他又很不放心。他一再告诉他们：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容易上当、受害。上海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看成虎狼，但也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有一封信，还特别通告说：要警惕白俄。其中，以告密为生的人很不少的。因此万不能跟白俄说俄国话，否则疑心是留学生就将惹出麻烦来……

充满长者的温情的信，常常使萧红想起故去的老祖父。她的心头，乃一次又一次浮起一张有着幽默的微笑着、慈和而又充满战斗激情的面影……

一个月后，渴盼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两个东北青年急急地来到内山书店。这时，柜台里面，有一个瘦小的老人正在检点着摊放在桌子上的信件和书刊，同两个日本人模样的人谈说着什么……

“你是刘先生吗？”老人瞥见萧军他们，立刻走了出来，问。

“是。”萧军点了点头，低声答道。

“那么我们走吧——”老人说了一声，走进内室，把桌面的东西快速地装进一幅紫地白花的包袱皮里，挟在腋下就往外走，谁也不打招呼。

这就是鲁迅先生吗？这就是鲁迅先生！……

萧军和萧红默默地跟在后面。寒风里，没有帽子，没有围巾；袍子，裤子，网球鞋，几乎全作深黑色。望着老人瘦削的背影，两个人的眼里都涨满了泪水，萧红差点要哭了出来……

鲁迅走路很快。不一会，他们便来到了一家咖啡馆里。

整个厅堂里几乎没有几个客人，其中竟没有一个是中国人。鲁迅拣了靠近门边的座位，招呼两个青年坐下，介绍说，这咖啡馆主要靠后面的舞场赚钱，白天这里很僻静，所以他常常把这里当成和陌生人接头的地方。

过了一会，许广平和海婴也来了。

“这是刘先生，张先生……这是密司许……”

鲁迅介绍过后，许广平立即把手伸了过来。萧红一面微笑着，一面握着手，眼前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她太激动了。

席间，萧军说了他们从哈尔滨辗转到上海的原因和经过，还讲述了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底下挣扎和反抗的情形。鲁迅简略地介绍了上海左翼文坛面临高压的现状，以及左翼内部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希望他们以后多加注意。

“他们已经通缉我四年了。”他说这句话时，特别缓慢，沉重而有力，如同喑哑的钟声在青年的心头震响……

最后，他把一个信封交给了萧军，说：“这是你们所需要的。”

萧军知道，这是所要借的二十元钱。即使如此，由于回去的坐车的零钱也没有，他还是直白地说了。

鲁迅听罢，笑了笑，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些银角子和铜板，放在桌子上……

把《八月的乡村》的抄稿交给许广平以后，萧军便同萧红一起告辞走了。走时，许广平向萧红说：“见一次真是不容易呵！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再见？”萧红没有话，只有默默地扬着手。

走进车厢，他们发现：远处，鲁迅直直地站着往这边凝望，许广平招扬着手帕，小海婴的一只小手也在不停地挥舞，庄重一如远别。

其实，他们很快又在一起聚面了。

大约过了半个月，二萧突然接到鲁迅请吃饭的信。地点是梁园豫菜馆。这意外的邀约，使两个青年人同时呆住了。两颗在漂泊生涯中磨砺得近于僵硬了的灵魂，因了伟大的热情的浸润，而变得从未有过的温柔。一封短筒，由一只手转移到另一只手，然后又转递回来，两只手一起把它平展开来。手在颤抖。字迹模糊。读着，读着，萧红的眼泪就簌簌地落下来了……

赴鲁迅安排的宴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萧军立即抄出一份上海的市街地图，查抄菜馆的位置；萧红跟着出门为萧军买了一块绒布料，日夜赶制新“礼服”。她不能让他像平时那样穿着破罩衫去见鲁迅的朋友们。

除去鲁迅夫妇和小海婴，赴宴的客人有茅盾、叶紫、聂绀弩和夫人周颖，连同萧军、萧红一共九人。此外，还有两个座位空着。

那是留给胡风和梅志夫妇的。按照鲁迅的解释，宴会本为他们的儿子做满月而设，至于缺席，他猜想当是没有接到信的缘故。

酒菜上来后，许广平到门外转了一会，看看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回来向鲁迅耳边说了几句，鲁迅便以主人的身份开始介绍客人。介绍到二萧，特别说明道：“他们是新从东北来的。”席间的谈话常常使用隐语，颇类土匪的暗话，其实他们全是熟识的，只有二萧是“闯入者”。然而，萧军并不客气，他见到聂绀弩尽是不停地给夫人挟菜，也就学他的样子，向萧红的碗里夹取她不易夹到的，或不愿把手臂伸长才能挟到的菜。这样，弄得萧红很不好意思，只好暗暗用手在桌下制止他……

总之，这一顿吃得很好，谈话也很愉快。在归去的路上，他们高兴得彼此挽着胳膊，飘飘然地小跑起来……

鲁迅这次宴客的目的，究其实，还是为了慰抚两位远来青年的寂寞，平日格外给他们多写信，也是这个意思。在通信中，萧军常常感叹在上海没有朋友。除茅盾外，其余包括胡风在内的几个人，此后的确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们都十分珍惜由鲁迅亲自培种的友谊。

其中，叶紫是鲁迅选定作为二萧的向导和“监护人”的。对于萧军的恃强蛮闯，鲁迅一直不大放心，认为必须有人从中加以诱导和制约。宴会结束时，独有叶紫，主动把地址开给萧军，这就和鲁迅的特别介绍很有关系。

叶紫是可信赖的：热情，善良，正直，坦诚，萧军几乎从见面的时候起就喜欢了他。而且，他一样有着曲折的经历。早在少年时代，他的父亲、姐姐和叔父都因为参加革命而惨遭杀害，于是开始逃亡。到了上海以后，先后做过教师、编辑，还曾为西林寺和尚抄写经文度日，生活一直非常困顿。目下，他正在同聂绀弩一起编《动向》，有时便带了萧军到几个编辑部之类的地方走走，见见“世面”，或者也可以算作是改

造“土匪”吧。

有一次，叶紫告诉萧军：“人们说你浑身有一股‘大兵’的劲儿，又像‘土匪’！”后来，黄源也曾经开玩笑说他“野气太重”。这些评语，颇使萧军感到屈辱，为此先后征询过鲁迅的意见。鲁迅回答说：“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不两样。”因此，他主张不要故意改掉身上的“匪气”或“野气”。由于环境的关系，一个人的习气总会多少有些变化的。但是，他又不得不一再告诉这位单纯的青年，说：“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这样教青年学会沉重，却常常要使鲁迅感到无奈与悲哀。

萧军能够领会鲁迅消解的话，由是，他更加深爱自己的灵魂。奴隶的灵魂。

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正在印刷中，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已经脱稿了。一天，叶紫对萧军说：“我们的书虽然是非法出版的‘私书’，也应当像点‘公书’的样子，譬如有个社名，有个发行的店之类，这样外面看起来就很有声势，于买书和卖书都方便，而且书官方也不致马上禁售，这是‘私盐官售’的战法……”萧军欣然同意，当即起了个社名，就叫“奴隶社”。至于乌有书店的名称，叶紫管它叫“容光书局”。计划最先出版的十种书籍，相应地，自然也就成了“奴隶丛书”。

他们把关于“奴隶丛书”的总体设想向鲁迅说了。鲁迅十分赞同，说，“奴隶社”的名目是很好的，奴隶和奴才不同，奴隶造反，奴才是不会造反的。在他的支持下，叶紫和萧军以“奴隶社”的名义共同起草了一个《小启》：“我们陷在‘奴隶’和‘准奴隶’这样地位，最低我们也应该作点奴隶的呼喊，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忍耐。”可以说，《小启》是几个不甘做奴隶者面对社会和文坛发出的公开宣言。

《丰收》出版后，被列为“奴隶丛书”之一，《八月的乡村》列为“奴隶丛书”之二，萧红的《生死场》原打算由生活书店公开出版，被检查老爷压了半年多，结果是不许可，只好自费印刷，列为“奴隶丛书”之三。

丛书三种的序文，都是鲁迅的手笔。因为是奴隶写的书，所以自有不同于“为艺术的艺术”的战斗的标准，正是从这里出发高度赞誉了小说

的成就。

对于《丰收》，他指出，这个由六个短篇构成的集子，与活在现中国的读者有着大关系。作者虽然是一个青年，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对于压迫者的斗争中，是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的。回顾封建专制的历史，他指出，中国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著作，文学作品更不必说。然而，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实，《八月的乡村》却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他几次引用胡适“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话，然后说，这书是于“心的征服”有碍的。一方面是奴隶，一方面是奴才；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序文以黑白分明的比较，显示着小说的主题：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生死场》同样是一部不能见容于中华民国，大背“训政”之道的作品。他十分欣赏作者以女性的笔触而能越出常轨，富于力度，它是能给奴隶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

丛书从写稿到出版和发行，耗费了鲁迅的大量心血。《八月的乡村》是萧红用很薄的日本美浓纸抄写的，字又小，几乎每页都要衬上一张白纸才能看清楚。为《丰收》代寻木刻家插图，也颇费周折，最后还是自己拿出五元钱，买了木板，交给黄新波刻制。即使短序一篇，也都颇费苦心，如《生死场》刻画人物的缺点，到了鲁迅这里，评介就转换成了另一种肯定的方式：“叙述写景，胜于描写人物”，显然意在袒护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难怪官方的走狗报纸对“奴隶丛书”的狂吠，总是处处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

——这个老奴隶！

总之，鲁迅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推举年轻奴隶。在此前后，他曾经向美国记者斯诺和伊罗生介绍了大批左翼作家的小说；在自己编选的中国小说集中，也都是侧重于后起的一代的。

斯诺是通过宋庆龄认识鲁迅的。他同情中国革命，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正因为如此，他能够感受鲁迅的伟大，认识到鲁迅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启蒙者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心灵的相通未必依赖神圣的血缘关系。不同的国度存在着同一度思想空间。鲁迅一直认为，有少数几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热爱，是远在于同胞之上的，因此他愿意聆听他们对中国的诅咒，而不能接受炎黄子孙在祖先祭坛上的喃喃颂辞。从接触中，他觉得斯诺是明白的、可信任的。因此，对斯诺和他的助手姚克共同编译的小说集《活跃的中国》，始终给予热

情的支持。

“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有一次，鲁迅向斯诺说道：“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

奴隶的命运，在他的思想中，一直是缠绕不散的基本主题。

“既然国民党已经进行了第二次革命，难道你还会认为阿Q跟从前一样多吗？”斯诺问。

“更坏。”他大笑道，“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那么，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

“我不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读过很多关于俄国革命前的东西，知道同中国很有些相似之处，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当然也可以学习美国，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还应当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当然，他所谓向民族的历史学习，是旨在寻求现代化改革的现实根据，而不是对专制主义传统的眷顾或回归。在这里，他展示了中国改革道路的多种可能性，他反对任何国家不变的模式，而倾向于批判的综合，主体的选择。

《活跃的中国》的编译工作，最先在上海进行，后来斯诺移居北平，便通过姚克同鲁迅保持直接的联系，持续几年，终于在1935年完成。正是接受了鲁迅的建议，他们才在专译鲁迅的原定计划的基础上，选择了柔石、张天翼、萧军、巴金、丁玲等人的作品。斯诺在介绍《活跃的中国》时，特别指出它的思想价值，说：“作为艺术，这本小书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是中国文学中抗争和同情的现代精神日益增长的重要表征，是要求最广泛规模的社会公平的重要表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第一次确认‘普通人’的重要性。”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人民性、战斗性，是主要通过“现在新出台的作家”去表现的。

伊罗生选编的《草鞋脚》，是与《活跃的中国》属于同样性质的中国小说集。

鲁迅同茅盾一起，应伊罗生的要求，完成本书的初选工作。为了介

绍新人，他们努力推荐哪怕是幼稚、脆弱的作品。“草鞋脚”一词，来源于鲁迅的演讲，书的序文也是鲁迅作的。在序文中，他指出，这“新的小说”，是战斗的产物，是“文学革命”时代的关于“人性的解放”这个文学基本要求的又一发展。为了文学事业的进步，许多青年在黑暗中以生命殉了他的工作。

如果说《活跃的中国》和《草鞋脚》是一个横切面，所显示的是中国小说的现实状况，那么手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则是一个纵剖面，呈示着新小说的创始阶段的全历程。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由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出版的大型文学选本，时间跨度很大，包括从1917年至1927年间的理论和作品，可以看做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总结。小说共分三集，第二集即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外的其他文学团体和作家部分，计划由鲁迅负责编选。当编辑赵家璧找他具体商议的时候，他就考虑到了检查官的问题。鉴于书报审查制度的严密，又要确保选本的客观性和完整性，鲁迅认为以他这样被政府通缉的“堕落文人”身份是不大相宜的。赵家璧答应愿意在通过审查方面作出努力，他便把事情答应下来了。果然，官方要将鲁迅的名字从编选者中除掉，另换别人。良友公司方面只好走后门，收买检查官，以保证鲁迅的选本和序文不受损害。

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这时候，鲁迅突然通知说“决计不干这事”了。

原来，他所写的《病后杂谈》发表时，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使他大为愤懑。他不想中检查官的诡计，把自己为《大系》所写的序文重新送交断头台，并声明，要用硬功对付他们。这件事弄得赵家璧相当紧张，再度约见鲁迅，把《大系》的整个进程说了，恳求收回成命。书店方面因此而白折费用，自然也在他的考虑之中。在赵家璧答允争取做到保持选本导言的本来面目的情况下，他犹豫良久，才决定着手编选。

他也不是不知道赵家璧的难处的。所以，临别时说，将来序文和选稿送审后如有删改之处，可由书店方面代为决定。

在这部艰难编就的小说集中，对于与他彻底决裂的“狂飚”的一群，虽然有所批评，却并未遮掩他们曾经有过的光耀。他不但收入了这些青年的作品，还在导言中摘录了高长虹、向培良等的大段引文，展示他们的特色和成就。

他喜欢他们的讥刺、暴露、搏击，喜欢他们内心的热烈，且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奴隶的。集内还收编了为他一度讽刺过的陈源夫人凌叔华的作品，而且做出肯定性的评述，指出：她以谨慎的文风，创造了与众不同的人物，从而显示了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重要的是不要忘却“世态”。一些“才子”所以为他所憎厌，都因为连这么一点俯视人世的真诚也没有。而做人的真诚不是容易具备的。

萧军写信给他说，高尔基对人民的爱是近于母性的，容易流于姑息。他回信说，在他自己，大约也是属于“姑息”一面的。其实，战斗者并非与“宽容”相敌对。不懂“宽容”为何物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斗者，自然，也惟有战斗者的宽容，才是卓具成效的宽容。

### 113. 家庭：“以沫相濡究可哀”

人们无论是思念亲故，或是祈祷上苍，都无非在寻找归宿，寻找某种精神依靠。萧红见到鲁迅以后，对于这位旷代的智者，便产生了深深的依恋。或许羁泊的灵魂，更加需要一个安定的处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境遇确乎是难以忍受的。

鲁迅，一株傲兀的大树，却以低垂的柔条伸向落寞的行客。

头一次到鲁迅家里做客，那情景，使善感的萧红终身难忘。是11月的雨夜。过11点了，萧红想到鲁迅身体不好，又听许广平说他伤风了一个多月才好，心里十分不安，几次拉着萧军想走，都被鲁迅留住了：“再坐一下，12点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这样，一直坐到快12点，他们才穿起雨衣告辞。鲁迅非要送出铁门外面不可。他为什么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值得这般的送么？站在铁门外面，鲁迅指着隔壁茶店上面挂着的写着“茶”字的大牌子，说：“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他伸出手去，几乎触到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9号的“9”字，一再叮嘱说：“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9号。”

9号。当然记住了。9，那是一个代表长久、永恒的中国字眼。

对鲁迅来说，又何尝没有一种依恋感？他凝听他们叙述着已经沦亡的故乡，大片苦难的土地和苦难的人们，一颗心便全然融入了一片苍茫岁月。他出身于破败的官宦家庭，却是十足的农民的儿子，每当想到乡村和农人的生活，就感到痛苦不安，难于自禁。折磨人的乡土感情呵！

整整一个夜晚，老奴隶和年轻奴隶的心在一起汨汨交流……

大陆新村9号——鲁迅辗转一生的最后的定居点。

弄堂入口处，满地铺着大块的水泥砖，出出进进有不少外国人，一些外国小孩也常常在院子里玩。鲁迅寓所的西邻住的是白俄巡捕，东邻是日本人，这种“半租界”的环境往往把人弄得很困难。

铁门后面是一个小花园，种着他喜欢的桃树、石榴树、夹竹桃、紫荆花。还有丝瓜和南瓜等。可以说，这是复制的百草园，关于少年时代的记忆的储藏地。可是，纵有阳光、乌雀，暮年多病的主人也已经很少有观赏的余绪了。

底层的前面是客厅，右边为餐室，中间用玻璃屏门隔开。客厅西面靠墙摆着瞿秋白走后留下的一只单人写字台，中央摆着黑色长桌，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里伸出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周围是七八张木椅子。另一边并排摆着两个带玻璃的书架，放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的全集。此外，还有许广平使用的缝纫机，海婴的玩具橱。

三楼前间是整幢楼房居住条件最好的地方，南面有小阳台，可以享用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可是，鲁迅让给保姆和小海婴了。后间是空着的客房，放着一张单人床、写字桌，也有书橱，供给少数远地来访的朋友，或是流亡者。

鲁迅住二楼。二楼也有两间，前间是工作室兼卧室，后间是储藏室，放着木刻镜框及其他什么。卧室横着一张铁架大床，上面遮着许广平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旁边站着抽屉柜。进门的左面摆着八仙桌，两旁躺着两只藤椅，大衣柜站在方桌的一排的墙角，但衣服很少，都让糖果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子给塞满了。沿着墙角靠窗的一边，有一张旧式小妆台，上面是一个方形的玻璃缸，养着一种不知名的扁肚子的灰色小鱼。不是金鱼。还有一只圆形小闹钟，三幅带框的木刻画，其余那上边都装满了书。铁架床靠窗子那头的书柜里里外外都是书，写字桌上边也是书，后楼还是书。书的世界。

写字桌放置于南窗的中央，铺着黑漆布，四角周围用钉按着。桌面是冯雪峰赠的带绿灯罩的台灯，白瓷的烟灰盒，戴盖的茶杯，小砚台，乌龟笔架，数支插放的“金不换”。除了书，就是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重重叠叠，把桌子给压满了，简直腾不出可以伸手写字的空隙地。

属于他的全部的时光都几乎用在这里。这里，是他与整个世界对抗的地方。写作习惯在下半夜，正是最黑暗的时刻。倦了，就坐在藤躺椅上，燃一根烟。到了害病严重的时刻，还在这里会客。客人走尽，就又燃一根烟，想一贯的主题，或是寂寞地想其他的心事……

平时，许广平很少上来。

女主人太忙了。

白天，她得外出买办日常生活的各种用品，有客人来，便上街买菜，回来还得下厨。此外，还得抄写、校对，甚或派送稿子。如果说有闲，就打毛线衣、剪裁、缝纫。海婴是极顽皮的，又得常常哄他，陪他讲故事。待到鲁迅卧病，她就更忙了。每餐，亲手把小心选好的饭菜端上楼去，按时间给病人吃药，按时间探试体温，试过以后还要在医生发给的表格上填写度数。为了鲁迅能够静养，一般的客人都由她在楼下接待。还有书报信件之类，都要她亲自拆看，必要的时候就告诉鲁迅。家庭的许多琐事，一一要她照管，比如年老的保姆病了，需要请假；海婴脱了牙齿，需要看牙医之类。她简直成了一部每天都在磨损着而又从不停止运转的机器。她陷入大量的事务里了。

像中国众多的家庭主妇一样，她勤劳而且俭省。女人都喜欢打扮的。然而她不讲究，在家里穿的衣服没有一件是新的，洗的次数多了，连纽扣也洗脱了。有一次和萧红在小花园里一起拍照，就是因为纽扣掉了，才把萧红拉到她前面给遮住的。她不但做衣服，穿的一双大棉鞋，也都是自己的手艺。

她是一个刚毅的人，承受着沉重的家务，以及各种忧患，却没有一个亲属朋友可以分担。她也不需要分担。她把一切辛苦默默地吞在肚里，没有怨恨，没有倾吐，积蓄多了才化做泪水悄悄溢了出来……

鲁迅深切地体会到许广平的那一份牺牲。平时，当他觉察到许广平的疲倦，会催促她赶快休息，抱歉于自己的不断工作而没有多聚谈的机会。许广平临睡前，他每每赎罪似的陪坐几分钟。“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好的。”于是他便躺在旁边，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文坛情形，直到友朋往来，家中琐事。谈到高兴时，还会说：“我再抽一支烟好吗？”同意了就更起劲地谈下去，直到许广平睡熟了，他才轻轻走开，回到写字桌跟前去。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题在《芥子园画谱》的扉页上，赠与许广平。全诗是：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究可哀。

聊借画图娱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回首间，流露着内心的深深的感激。

但是，两个人也不是没有隔膜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愈到了后来愈见隔膜，这才真正是“可哀”的。年龄的差异，师生的尊卑，生理上的病态与健康，都在无形中造成了一定的距离。作为女人，许广平对鲁迅更多地表达着一种敬爱与同情。此中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当鲁迅病重时，她把纸烟听子从床边拿走，若想吸一根，则由她亲自付给。收电费的打门，她得赶快往楼下跑，生怕多打几下，要惊醒睡去的病人。有一回说到鲁迅的病情，她对着客人哭了，但不敢以泪眼对鲁迅，在鲁迅要她上楼找东西的时候，她也是背转着身问要什么。她怕鲁迅多虑而引起伤感。她的面容坦荡，镇静，但是毕竟柔弱，内心有不可言说的凄苦。她是女人。

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不能不表现为不同的心理欲求。鲁迅是善感的，他渴望温柔。极其有限的活动环境，漫长而枯燥的写作生涯，病肺的特殊生理现象，加强了这种渴望。然而，在许广平那里，作为女性的柔弱的部分也许太少了些，因而在鲁迅的意识和潜意识里，都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妆台上方放置的三幅木刻，都是以女性为主题的，其中两幅是裸女，其实也不为无因。一幅《夏娃与蛇》：在茂密的花草丛中，一条蛇口衔苹果向她游来，这是一种供献？一种诱惑？夏娃头向外侧，却以性感的眼眸窥视苹果。一幅《入浴》：还是幽幽的花草丛，一个女人正在低头洗浴。池水澄澈。丰硕的臀部一半在水上，一半在水中，中间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细密的波纹。此时，有两只乌鸦落在头顶的弧形花墙上，也在作蛇一般的窥视。两幅木刻都是德国画风，但不是珂勒惠支的，而是毕亚兹莱式的。鲁迅出版毕亚兹莱的画集，主要是因为深爱那画面的纯净美丽。严格地说，带有若干的病态美，但是比起众多的圣母和维纳斯画像来，它却是本来意义上的健康，而纤细明净的曲线，充满着生命的原欲。裸体木刻所呈现的女性美，正是神秘的生命美。爱与死：永恒的生命主题。

还有一幅木刻画，小得和纸烟包里的商标画差不多，是鲁迅放在枕边不断拿出来自赏的。画面上，一个诗人手捏诗卷在朗诵，地面盛开着红玫瑰；远方，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跑。她是谁？她在追逐什么？爱情？春天？谁知道她在追逐什么？鲁迅有那么多

画，为什么单单选了这张放在床上呢？……

萧红不得其解，曾经问过许广平，许广平也不知道。

鲁迅有他自己心灵的隐秘。或许，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心灵的隐秘。

他一面渴望温柔，一面又排拒温柔。他执著于自己的工作，在工作时间，任何外界事物的干扰都是他所厌恶的，无论是塞耳的噪声，或是似水的柔情。内心的神圣使命是至高无上的。为此，也就往往使得爱人受伤。许广平是一直不高兴鲁迅专在深夜写作的习惯的。还是初来上海的时候，许广平见他良久伏在灯下写作，没有休息，便把双手揽在他的肩膀上，劝他把笔放下来。但是，她没有想到，他的笔是放下来了，却满面的不高兴，全身顿然像从温室里坠落里冰窖之中。稍后，他才解释说：“写开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时最好不理他，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事。”

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自我破坏。他属胆汁质，又属抑郁质。过分的严肃、沉静，突如其来的孤独感，都会使他得不到世俗的幸福。许广平承认，由于他永远处在奋斗的途中，对于家庭多少较一般人冷淡。从鲁迅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可以知道，他是意识到两人之间，冷静是有缺点的。当然，这也不仅仅出于自省。

除了年龄、性格、境遇的关系，鲁迅在家庭中的疏离感恐怕更多的源于许广平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现在，她已经从原来的“五四”新女性、学运领袖的反封建立场，向中国传统女性一面回归。为了应付家务，她跟笔绝交了，完完全全成了爱人和孩子的附庸。关心家庭多于关心社会，关心鲁迅的病体多于关心他的心灵，她倦于跟踪鲁迅思想的发展，作为个人的或是共同的理想已经不复具有原来的魅力。甘于庸常，可能不失为一种美德，但是在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思想战士看来，未免太遗憾了。

这能怪她吗？你自己没有责任？事务的泥沼注定要淹没思想的，难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把一切家务全都搁在她的肩上呢？一篇《伤逝》，其实所伤并非已逝的过往，而是望中的将来。阿随跟着子君，子君跟着涓生。生物链。都是“阿随”。那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预言。全人类共同的家庭悲剧，无法逃避的存在……

他一面渴求理解，一面又满足于孤独。感激，反抗，无奈，就这样一直纠缠下去。大大小小的冷战，也就相应地循环出现。

冷战是可怕的。有时候，只要许广平说了一句在他听来不以为然的话，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连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或者在半夜里大量地喝酒，或者像一匹受伤的羊，躲到草地去舔自己的伤口一样，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有一次夜晚过后，他就睡到黑暗的阳台地上，后来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睡下，这时他才爬起身来……

“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事后，他常常抱歉似的说。

“我得反抗一下，实地研究研究看。”这有时是许广平的答复。

他或者会叹息着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

许广平会回答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

这时，他会说：“这我知道。”

冷战虽不可免，许广平和海婴毕竟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了。每到灾难降临，他都会立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保护人的身份。他所以不愿意到异地疗养，固然有政治上、创作上的缘由，但也因为放不下家室之累。他说过：“相依为命，离则两伤。”他愿意承受这份负累。他是一个充满赎罪感的哲人，他比谁都更为清楚人类的宿命。

他无法超越。

到过9号小楼以后，萧红便成了这里的常客，尤其在与萧军闹矛盾以后，简直天天来，有时一天来两次，甚至整天的耽搁着不走。

鲁迅的家，成了她的精神避难所。

她喜欢鲁迅，鲁迅总会使她想起儿时的保姆，疼爱她的老祖父。她喜欢他那乡下老人般的平易、慈爱与安详。鲁迅也特别喜欢萧红，喜欢她英武中的柔和，活泼中的沉郁与孤傲，喜欢她过人的才气、不屈的追求，沉浸在乡土文学中的如同自己的那般苦恋的情怀。他希望她常来，

她的到来，就会像浓云里的一束媚人的阳光，为他唤回青春，驱去心头的寂寞。

9号。他们亲热得就像一家人。一起谈话，一起用饭，一起看电影。连小海婴也喜欢萧红，喜欢她连同她的小辫子。而在鲁迅面前，她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可以撒娇的小姑娘。

对于萧红的要求，鲁迅是无不加以满足的。萧红记得，连她提议做韭菜合子，做合叶饼，做这样那样吃的，每一提议鲁迅都必然赞成。萧红做得不好，他还是喜欢吃，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广平：“我再吃几个吧？”

鲁迅平时不大注意人的衣着，说：“谁穿什么衣裳我是看不见的……”可是，却很注意萧红的装束，时间过去许久，也还记得很清楚。

有一天，萧红穿着一件留着很宽袖子的火红色上衣进来，很高兴地问鲁迅：“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从上往下看了看：“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他评论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他就在躺椅上看着萧红，说：“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又说：“……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的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要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往两边扯，这样就更胖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长显得宽……”

他很有兴致，连萧红往常穿的一双短统靴子也一并地给予批评，说那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他说是应当放在裤子下边的……

“周先生，怎么靴子穿了那么久你不告诉我，到现在才记得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穿的不是另外的鞋子吗？”萧红诧异地问道。

他笑了，说：“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恰好当天下午要赴一个宴会，萧红要许广平帮忙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广平拿了许多种颜色的来，她们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许广平为了取笑，把那桃红色的举起来放在萧红的头发上，并且很开心地说：

“好看吧！多漂亮！”

萧红也十分得意，规矩而又顽皮地等着鲁迅往这边看她们。

鲁迅一看，就生气了，眼皮往下一放：“不要那样装她……”

许广平有点窘了。

这时，萧红也安静了下来……

又是一天的下午。鲁迅正在校对着一本别人的著作，见萧红走了进来，立即把椅子转向这一面，说：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刚刚不是来过了么？怎么说好久不见？即使上午来的一次忘记了，可是每天都来的呀……怎么都忘记了昵？

萧红怔住了。

鲁迅转身坐在躺椅上，笑了起来……

萧红以为他在开玩笑，其实不然。“好久”不是物理时间。在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

因此我所想望的只是旷野，高天和飞鸟。萧红在诗里写道。

她实在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为了逃避，决计远走东京。虽然，从异乡到异乡，不是她所愿意的。

这是1936年7月。

走前，鲁迅在家里为她饯别。对于她，改换一个生活环境好不好呢？鲁迅了解她，可是他没有说。他只叮嘱她在日常生活上所需注意的事情，说：“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萧红没有想到，这是她所能听到的一生最敬爱的人的最后一次说话。

一去之后，渺渺茫茫，关于东京的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是很可以叫人悬念的。萧红，悄吟太太，小耗子，你为什么还不写一个字呢？你不知道有人在惦记你吗？然而，要是能写，又能叫她写些什吗？……

当感情深沉起来的时候，是往往没有话说的。

## 114. 瞿秋白死讯·《海上述林》·《译文》事件

政府对思想文化方面的进一步箝制，使文学创作的局面更趋萎落。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编选感想》中表示，奇怪于现在的有些作品，仍然赶不上新文学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是对文学现状的一种检讨。

当然，这里面也有着文学内部的原因。作家或者偏重社会的解放运动而忽略人类的心灵世界，偏重文学的历史价值而忽略审美价值；或者片面强调个体自由而遗忘了时代，鼓吹艺术至上而失去应有的内容，各种主义的单向扩张与消解，致使新文学从五四原初的多元综合的饱满生命导向偏枯。翻译界也同样的不但没有起色，反而蜕化了。轻视翻译于是成了一种风气。无论书店或是杂志社，几乎都一例拒绝译稿。鉴于翻译的厄运，以及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的恶劣和创作力量的单薄，鲁迅决计创办一个纯文学的翻译杂志。

1934年夏天，黎烈文由于无力抵抗上海市党部方面的政治压力，和张资平等“无赖”文人的人身攻击，终于被挤出了《自由谈》。他是翻译的好手，这样，正好多出一个同道。为了使黎烈文在生活上和事业上不致造成很大的损害，就在他离职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鲁迅特地约请他和茅盾一起，共同商议成立译文社，编辑出版《译文》月刊。

考虑到文学社编辑黄源同生活书店比较接近，又同茅盾有些交往，因而托请他出面交涉关于承印的事，并挂名做个编辑。

接洽的事进行得相当顺利。书店的条件是：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一概不拟开支，如果销数能超出几千再订合同补算。当然，补给的数目是很小的，反正办刊物也不是为了赚钱，能够找到一个答允出版的地方就很满足了，何况在鲁迅他们看来，条件也不见得很苛刻。

关键在刊物本身。

自从双方做出《译文》于9月出版的决定以后，鲁迅便认真编辑起来了。8月9日这一天，他是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进行着的，以致引起剧烈肋痛。其时正值酷暑，雅士闲人，也当避往哪一处明山秀水去了，惟战士困守亭子间，不肯稍息。他致信给增田涉时，还很堂吉诃德地说：“上海又是九十度以上，鄙人正以满身痱子，作为光荣的反抗旗帜而奋斗着。”

《译文》第1期的稿件、插图等等均已准备就绪，鲁迅便通过茅盾约黄源到他家里会面，洽谈有关事宜。

不用茅盾介绍，他们本来早就认识的。鲁迅初来上海时有两次演讲，就是黄源做的记录。后来黄源为书店编一套新文艺翻译丛书，鲁迅介绍了一部稿子，付排以后，黄源把校样带到内山书店去，也都偶尔遇见过。因为听人说，鲁迅是不容易对付的，最好不要同他发生关系，便有意回避了。

这次见面，黄源才发现，鲁迅原来是一个最没有名人架子的人。他从前门进来，脱去长衫挂到衣架上，坐下来便谈话，想到什么说什么，随便得很。过了一些时候，他解开包袱，把稿子和画册等都交给了黄源。黄源一看，稿子的次序已经排定，内文用几号字体，插图缩多少大小，都一一加以注明。关于开本，他建议用23开，这样在书肆里可以同习惯使用16开的其他杂志一下子区别开来。茅盾和黄源听了，一致表示赞成。

“排印的格式怎么样？”黄源接着问。

“只要大方一点，由你计划去吧。”鲁迅随口应道，那口气，就像对极熟识的老朋友说话一样。

“那么，等样子排出来，我再送给你们。”黄源说。

“好的，你有信可以寄到内山书店，有事情请茅盾先生找我。”鲁迅嘱咐说。

“校样出来后，也送到内山书店吧？”

“不用了。路很远的，送来送去不方便，还是由你校吧。”

仿佛在故乡遇见多年不见的眼看着自己长大起来的父执辈，黄源感到十分亲切，立刻答道：“好，我来校。”

《译文》的前三期完全是由鲁迅亲自一手编定的。编到第三期的时候，他对黄源说：“从下期起，我不编了，你来编吧！”

以自己的能力担负得起吗？黄源迟疑着，没有说话。“你已经毕业了。”

黄源永远记住了耳边的这个声音。对于每个具有良知，愿意为中国做事的人，鲁迅都极力设法激发他的信心和勇气，尤其是青年。对此，黄源在《译文》的整个编辑过程中是深切感受到了的。黄源接编以后，每遇稿荒，要求鲁迅寄一点稿子，或写或译，总是立即寄来，从来没有拒绝过。但是在平时，黄源是不大向他要稿子的。那原因，固然有怕他太忙太累的成分，但主要还是为了多刊新进者的译品。即使鲁迅的稿子寄来了，在编排上，黄源也是竭力地把它放在一个不很重要的位置上。黄源愿意以认真的工作，体现鲁迅办刊的一贯精神，却不愿把他当做一面大旗来号召。

对于这种做法，鲁迅是满意的。

他愿青年人能够跨过自己前进，而且，完完全全地忘记他自己。

一天，鲁迅得到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他的心，像一件失去牵系的重物一样，一下子沉了下去。虽然消息未经最后证实，但他是相信自己的不良的预感的。

在上海，或许只有瞿秋白一人才真正当得起谈话的对手。故人一去，那份寂寞的纪念是可以想知的。瞿秋白在三楼住过的房间，条桌，雪白的桌布，桌面削好了的铅笔，毛笔，墨盒，信封，拍纸簿，桌前的

靠椅，单人床，一切布置依旧。他不愿挪动任何一件小器物，仿佛害怕因此给纯净完好的记忆弄出了一道褶皱似的。平时在家里，或是建人来了，有时候他会突然说：“不知何苦怎样了？”与其说是问别人，无宁说是追怀中的独语。

但是，谁也不知道，连杨之华也不知道。

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黑夜。因为鲁迅生病，杨之华特地跑去探望他。在二楼的房间里，她看见鲁迅坐在火盆边烤火，头发、胡子都很长，脸瘦削得厉害，眼睛深深陷下去，她坐在火盆旁边，问他身体好了一些没有？他没有回答，却问：“听说何苦在苏区病死了，这消息确实吗？”杨之华说：“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恐怕不会吧。”他让杨之华把情况打听清楚以后告诉他，又叮嘱说：“你自己也应当多加小心。”

为了免得他挂念，杨之华走后，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是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并不确。

不久，周建人亲自带来了一封信，上面赫然画着“福建长汀监狱署”的血红的大印。

一看就知道是瞿秋白写的，署名却是“林其祥”。信里的内容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作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便可释放我。”在这里，瞿秋白暗示了入狱的情况和口供，希望设法营救。

鲁迅立即把信转给了杨之华。

然而，怎样营救？

实在无法可想，而时间又不容拖延，鲁迅真想变卖了家产，由自己开一家店铺，出面进行保释。后来，杨之华找到一位牧师，说有一个开旅馆的朋友答应作保。他知道情况后，给杨之华送了五十元钱，同铺保一起，由他从邮局寄往汀州。

第二天，报纸便以巨大篇幅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

杨之华知道他不能活了，马上派人去看鲁迅。这时，鲁迅已神情麻木，没有言语，连头也抬不起来了……

但是，即便全然无望，鲁迅仍然极力设法进行营救。后来，许寿裳南来告诉他，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究竟要不要杀瞿秋白时，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这样的天才人物，在中国不可多得，主张不杀；但戴季陶等坚决要杀。这样，最后一条线路也被切断了！

他写信告诉曹靖华：“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此间，在给其他几位信得过的朋友的信中，也都同样表露了这种难言的悲愤。

6月18日，瞿秋白从容就义。为了保卫灵魂不受损害，他终于扔掉了自以为无用的躯壳。

鲁迅束手接受这一系列的打击。区区文人，还能做些什么呢？痛定之余，他觉得确有许多事情可做，而且得赶快做。首先想到要做的事情是，将死者的遗文搜集起来出版。除了做事，还是做事。做事就是对抗，是战斗，是生存者的全部价值。

过了几天，他在信中对曹靖华说：它兄文稿，很有几个人要把它集起来，但我们尚未商量。现代有他的两部，须赎回，因为是豫支过版税的，此事我在单独进行。

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又悠悠然。我看中国青年，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其实现在秉政的，就有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

此地出版仍极困难，连译文也费事，中国是对内特别凶恶的。关于出版瞿秋白的遗文，鲁迅跟杨之华的看法不一样。杨之华认为，作品最重要，翻译倒在其次。鲁迅表示说，遗作一时搜集较难，而且单是翻译，已有相当字数。全部付印恐怕既拖时间，又增加了经费，不容易办。因此，倒不如先将翻译出版，一面收集作品，等经济可以周转然后再作他图。集资刊印的几个人，也都一致同意这个意见。

至于出瞿秋白的纪念册，鲁迅是不同意的，声明不予加入，这个主张壕堑战的人，是以此为赤膊上阵，徒然暴露自己呢？还是以为“纪念册”一类的东西太空，不及出版文集实在呢？他不愿意说明理由。

鲁迅一面抚慰杨之华，一面搜集、整理、编印瞿秋白的译稿。其实，在鲁迅本人，是更加看重他的翻译的。

全稿计六十万字。从8月22日至11月4日，编成上卷；次年4月17日起编辑下卷，至9月连同校稿一并完成。在他重病不能执笔时，则由许广平赶校，毫不耽搁。在整个编印过程中，除了编辑校对之外，还得亲自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搜购纸张，拟定广告，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工作，只有从排字到打制纸版，由另外几个人出资托开明书店办理。

他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从翻译小说前面的小引，他看出瞿秋白是因为看了原著的插图而萌生翻译的动念的，编印时，也就顾不得体例的一致，将原有的图画全数插入。以插图增加读者的兴味，在这里实在不是重要的，用他的话来说，只是一点“悬剑空垆”的意思而已。

译文集取名《海上述林》。上卷《辨林》，所收为文学论文，1936年5月出版。下卷《藻林》，同年10月出版，所收为文学作品。全书共印五百部，一百部皮脊麻布面，四百部蓝天鹅绒面，装帧和印刷质量是中国第一流的。因为上卷的价值，鲁迅还准备出版普及版。校印的名义是“诸夏怀霜社”。“诸夏”即中国，“霜”是瞿秋白的原名，含义是很清楚的。

《海上述林》上卷出版后，他很宽慰地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么讲究的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其实在我也是一种纪念。”

许广平听了，觉得不大悦耳，好像包含了什么恶兆：“为什么？”

鲁迅似乎看出了她说话时不大宁静的神气，立刻解释说：“一面给逝者纪念，同时也纪念我的许多精神用在这里……”

到9月份，译文社同生活书店签订的一年合同正好满期。在新的合同签订之前，黄源提出，《译文》从第3卷起增加经费和页数。书店方面询及鲁迅，他说不知道，于是有人便对黄源大加攻击。这时，鲁迅赶紧弥缝，将增加经费的说法取消，但每期须增添十页，也不增加译费。合同经书店同意签字后，他也便签了字，然后再挂号寄给黄源。

黄源刚刚收到合同，还来不及转交书店，就突然面临了一场风波。

《译文丛书》的创办是重要的诱因。还是元旦的第二天，黄源和黎烈文同去鲁迅家里贺年，漫谈之间，产生了出版一套翻译丛书的构想。事情仍由黄源和生活书店接洽。书店经理徐伯昕接受了这个计划，于是工作开始进行。2月，郑振铎从北京来到上海，筹划《世界文库》，并决定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对于这个杂志，鲁迅是热心的支持者。他译《死魂灵》，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8月，邹韬奋回国，情况起了变化。邹韬奋决定由毕云程代替徐伯昕的经理职务，并通知黄源，说生活书店已经有了《世界文库》，不准备出版《译文丛书》。就这样，原来的计划完全被推翻。丛书必须另谋出路。

9月8日，鲁迅还在做着出版作为丛书之一的《果戈理选集》的好梦。他写信给孟十还，叫他赶紧译完《密尔格位特》，好着手译果戈理，说：“假如定果戈理的选集为六本，则明年一年内应出完，因为每个外国大作家，在中国只能走运两三年，一久，就又被厌弃了，所以必须在还未走气时出版。”当晚，黄源就跑来把生活书店不拟出版的情况告诉他了。

“你看怎么办？”鲁迅听了，丝毫不动声色，反问道。

黄源想了一想，说：“要么同文化生活出版社接洽一下看。”

这家出版社是由吴朗西和巴金主持的，吴朗西担任经理，巴金负责编辑。黄源很早以前就认识吴朗西，在东京时期，还曾一起住过。不过，他忧虑的是，他们都是文人，本钱又小，在原来的《文化生活丛刊》和《文学丛刊》之外，再加出《译文丛书》，在经济上是否有能力负担。

鲁迅说：“你先谈谈看。”

过了两天，黄源告诉鲁迅说，吴朗西和巴金愿意出版《译文丛书》，说：“定个日期，约他们在什么地方同周先生亲自谈谈，事情便马上可以定下来。”

“好的。你接洽停当后再告诉我。”

“沈先生和黎先生也请你去约请。”

黄源即刻到巴金那里，商定15日由黄源在南京饭店请客，译文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双方正式商定《译文丛书》的出版问题。

这一天晚上，同席一共十人。除译文社四人和文化生活社二人外，还有四位客人：许广平和海婴，鲁迅邀的胡风，以及黄源邀的傅东华。商谈十分顺利，出版条件以及初步计划印的书，也都谈到了。在把出版丛书的事情肯定下来后，大家便任意地谈天。席上，鲁迅还答应给巴金一部小说稿，编入《文学丛刊》。

一次亲切愉快的夜饭过去，紧接着，另一次气氛完全不同的夜饭在新亚公司举行。

17日晚间，茅盾和郑振铎来到鲁迅寓所，说是生活书店请饭，然后三人一同前往。同席的七人是：邹韬奋、毕云程、胡愈之、傅东华、郑振铎、茅盾、鲁迅。

晚饭时，毕云程突然提出撤换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要鲁迅承认。

这是未曾有过的恶例，到底出了什么事？

肯定是有人把15日夜饭的情况报告了生活书店，因此才迁怨于黄源，以为他从中捣鬼。傅东华？茅盾？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茅盾不知道？《译文》又不是我的私产，黄源也不是我的私人，他也是《译文》的主持人之一，为什么不可以表态？我们自己先商量好改换一个人，不是很容易的事吗，何必来这一套？……

局势完全布置好了，——阴谋！什么请吃饭，分明“吃讲茶”！……

鲁迅没有回答书店的问题，连饭也没吃上一口，放下筷子就走了。临走时，他告诉茅盾，请他约黎烈文明天下午到他家去一趟。

这一切，都是黄源所不知道的。

次日上午，恰好黄源收到鲁迅寄出的合同，加上《译文》有一些具体的编辑事务，便到鲁迅家里找他商量。“你来得正好，”鲁迅一见到黄源，就说，“昨夜生活书店约我在新亚开个会，谈《译文》问题，我说有关《译文》的事，是我们译文社自己的事。我已经约了沈先生、黎先

生下午到这里来，你就在这里吃午饭，然后一起谈吧。”

下午2时左右，茅盾和黎烈文如约前来。奇怪的是，鲁迅这一天很少说话，脸色很严峻。平时座谈，他不会是这样的。大家坐下不久，鲁迅就从衣袋里取出他已经签了字的《译文》的合同，放在桌面上。

他说：“昨晚的事，沈先生大概和黎先生谈过了吧？”

“谈过一下。”茅盾应声说。

鲁迅接着说：“我在这里不谈了。《译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经签了字的，昨天他们出来推翻了。”他随手指了指桌上的合同，又说，“这样，这合同不算数了。”接着，他拿起合同，将它撕成纸条，放下后，抬起头说道：“生活书店要继续出版《译文》，我提议，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

茅盾和黎烈文同声应道：“好的。”

“那么，”鲁迅转换了缓和的口气道：“请沈先生通知生活书店。完了。”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茅盾和黎烈文告辞走后，许广平大约怕弄出什么事情，急忙从内室赶出来。

这时，鲁迅才把新亚夜饭的事情对黄源简单说了：“那天晚上，他们应当找你一起去的，可是没有，搞缺席裁判。我的立场，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吗？”

许广平等鲁迅转过身，告诉黄源说：“那晚上，大生气极了，一进门，帽子一丢，就说，‘闹翻了，闹翻了。’大先生这样拼命出力，他们却这样对付大先生……”

鲁迅要黄源签署合同的提议，打乱了生活书店的计划。第二天，由邹韬奋亲自安置在书店里协理事务的胡愈之当面指斥了黄源，并且批评鲁迅，说他在新亚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最后他提出：“你去向鲁迅先生提出，要他收回成命，申明你不能签字，仍旧由他签字，如果你不答应，后果由你负责。”

三天后，黄源电话里告诉胡愈之，说他不敢向鲁迅说那样的话。胡愈之听了，砰然一声扔下话筒。

黄源挂起电话，立刻去找鲁迅，把胡愈之要挟性的谈话和自己的答复一一如实说了。

“你不应该说你不敢去说，”鲁迅看定黄源，微笑着说，“你要说，我去说了，鲁迅不答应。让他们来对付我好了。他们用的是釜底抽薪战术。不过你已经说了，算了，看下一步吧。”

又过了几天，黄源收到鲁迅的一封信，知道《译文》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信里说：前天沈先生来，说郑先生前去提议，可调解《译文》事：一、合同由先生签名；但，二、原稿须我看一遍，签名于上。当经我们商定接收，惟看稿由我们三人轮流办理，总之每期必有一人对稿子负责，这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事，与书店无关。只因未有定局，所以没有写信通知。

今天上午沈先生和黎先生同来，拿的是胡先生的信，说此事邹先生不能同意，情愿停刊。那么，这事情结束了。

他们那边人马也真多，忽而这人，忽而那人。回想起来：第一回，我对于合同已经签字了，他们忽而出了一大批人马，翻了局面；第二回，郑先生的提议，我们接收了，又忽而化为胡先生来取消。一下子对我们开了两回玩笑，大家白跑。

但当时我曾提出意见，说《译文》如果停刊，可将已排的各篇汇齐，出一“终刊号”。……他们如付印，就这样的付印，一面并将原稿收好，以免散失，因为事情三翻四复，再拉倒也说不定的。

.....

我想，《译文》如停刊，就干干净净的停刊，不必再有留恋，如自己来印终刊号之类，这一点力量，还是用到丛书上去罢。对于《译文》的停刊，黄源是深感惋惜的。不过，留恋也没有用。好在这几天，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精神准备；对于未来的出路，也有了具体的想法。

当天，他就到鲁迅家里去，告诉鲁迅说，《译文》既已停刊，在《文学》也站不住了，因此决定向傅东华提出辞职。

鲁迅无所表示。事到而今，不得不如此，但也只能如此了。

接着，黄源提出辞职后将马上去日本的打算。鲁迅也没有什么劝阻的话。本来，人手如此之少，他是很希望黄源留在国内做事的。但是，他想，黄源既做这样的打算，总有一些为自己所不可能理解的原由在的吧？

十天后，他写信给萧军，对于《译文》的停刊，黄源的出走，《死魂灵》的译载诸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黄先生当然以不出国为是，不过我不好劝阻他。一者，我不明白他一生的详细情形，二者，他也许自有更远大的志向，三者，我看他有点神经质，接连的紧张，是会生病的——他近来较瘦了——休息几天，和太太会会也好。

丛书和月刊，也当然要出下去。丛书的出版处，已经接洽好了，月刊我主张找别处出版，所以还没有头绪。倘二者一处出版，则资本少的书店，会因此不能活动，两败俱伤。德国腓立大帝的“密集突击”，那时是会打胜仗的，不过用于现在，却不相宜，所以我所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不过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

《死魂灵》已于上月底交去第十一章译稿，第一部完了，此书我不想再在《世界文库》上中止，这是对于读者的道德，但自然，一面也受人愚弄。不过世事要看总账，到得总结的时候，究竟还是他愚弄我呢，还是愚弄了自己呢，却不一定得很。至于第二部（原稿就是不完的）是否仍给他们登下去，我此时还没有决定。

现在正在赶译这书的附录和序文，连脖子也硬的不大能动了……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来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

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10月8日晚，黄源同吴朗西一起去鲁迅家里，签订《译文丛书》合同，并向鲁迅告别。出来后，他们再到新亚饭店去。在那里，巴金和吴朗西早已约定了几个朋友，设宴为黄源饯行，可是，到了新亚，黄源竟出人意料地说，他不出国了。

其实，当他还没有走出鲁迅的弄堂时，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想，留下来还是可以做点事的，至少在翻译方面。他总觉得对不起鲁迅，不愿意离开他.....

鲁迅是一定要做完他要做的事情的，即使失败了，他也得采用各种迂回的方式奔向既定的目标。

在他的努力下，《译文》终于复活了。在复刊词里，他否定了关于终刊的“折本”说，不无感慨地写道：“这一回，将来的运命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

他所翻译的《死魂灵》第2部，就发表在这上面，不再交给《世界文库》，即便那是有众多名人撑持的巨制鸿篇；就连在那里发表的第一部，也声明不给生活书店汇印。至此，实际上等于宣布完完全全跟他们决裂了。

## 115. 鞭子从背后抽来

自从瞿秋白和冯雪峰先后离开了上海以后，鲁迅与左联之间就失去了一层润滑剂。这中间，胡风也曾作过一段弥合的工作，但很快也就被迫中断了。在左联里，这个曾经在名义上被当成盟主的人，实际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左联。由于冯雪峰的安排，他在1931年下半年和1933年下半年两次担任行政书记。无论作为盟员还是领导者，他除了出席会议，很少参加其他活动。对于把左联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文学团体变为“政党”的做法，他是持保留态度的。因此，诸如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一次也没有去过。应当说，这同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热情也不无关系。他是一个书斋型作家。他的作品，与其说直接来源于生活斗争的经验积累，无如说更多地出自理论的演绎与知识的组合，在巨大的理性框架中，虽然不乏客观具体的细节描写，却少有主观介入的血肉相搏的激情。《子夜》也如此。不过，像这样结构恢弘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究竟是罕有的，出版以后，大大巩固了他在左联以及文学界的地位。这时，他辞退了书记的职务。

接替茅盾的是胡风。这项工作，是周扬要他担任的。

在留学日本的时候，胡风参加了日共党员小组，接着又参加了左联东京支部，进行普罗文化活动。其间，曾经回上海一次。在上海，他会见了冯雪峰和丁玲，周扬也是这时开始认识的。这次同左翼文化界的接触，他已经觉得，鲁迅和创造社在思想上的对立有很深的根源和社会基础，而且明显地反映在冯雪峰和周扬、穆木天的对立上面。当冯雪峰要他做文总的组织工作，或是做左联的宣传部长，他都没有答应。他感到惶惑。一方面，他担心资历和学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他害怕陷入宗派纠纷中间。但是，作为党组织的决定，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推不掉了。

胡风以全副的热情投入左联的工作。名义上由周扬兼管的宣传部门的工作，这时，也都一样原封不动地由他担负起来。他认为，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左联应当把重点放在文运工作上面。经过一段时间，他在宣传部下面分设了理论、诗歌和小说研究会，不定期地开会、研究，推进理论建设和各类创作。另外，还出了一个油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刊登有关左联的工作情况，分给盟员，借以维持一种组织上的联系。

每期《文学生活》，都由胡风亲自送给鲁迅。借此机会，他可以向

鲁迅谈些工作上的情况，并且拿取每月二十元的必要费用。

认真工作的胡风，很快赢得了鲁迅的信任。共产党内的一些重要的、机密的工作，比如搜集情报，筹措资金，甚至交通联络，都是通过胡风获取鲁迅的帮助的。被蒋介石逮捕关在南昌的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密信，仍由鲁迅交与胡风，鲁迅的具体意见也都由胡风一并转达。

在组织工作确定以后，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胡风通过朋友的关系，到孙科出钱主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当日文翻译，为他们出版的《时事类编》翻译有关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文章。这份职业，胡风曾向茅盾和周扬谈起过，而他们也都主张他前去的。1934年秋，穆木天被捕获释，突然向左联党团报告说胡风是南京派遣的内奸。空穴来风。然而，党团书记周扬并没有对胡风及有关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查，反而利用了穆木天的不实之词。一段时间以来，周扬发现，胡风爱闹独立性，经常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在常委会议上，除了胡风，任白戈和何谷天都是一致拥护他的。对于胡风的所谓“内奸”问题，文委领导林伯修、田汉，还有郑振铎、茅盾，也都先后起过传媒作用，产生很坏的影响。

而这一切，对胡风本人是实行保密的。

有一天，韩侍桁无形中透露了这种情况。他指责胡风说：“你老兄倒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穆木天在公安局，公安局对他什么人都问到了，就是不问你老兄。”这时，胡风知道已被出卖了，只好马上离职。

接着，他向周扬辞去左联职务。周扬顺顺当当地让任白戈代替了他。在左联里，他只挂一个名，不再参加任何活动；为了生活，也为了工作，从此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鲁迅说：“在中国，靠笔来生活颇不容易。”可是，对这时候的胡风来说，他别无选择。

左联自成立之日起，就被纳入党组织的范围内，这样，自然使它有别于先前出现的诸如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之类的一般的文学社团。党领导的路线、思想和作风，直接关系到它的存在状态，决定着它未来的命运。

左联成立后不久，便与相继成立的社联、剧联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左联和文总都设有社团，也即党组，直接受党领导文化运动的机构文委的领导。这种组织形式与苏联的“伏阿普”和“拉普”模

式差不多，机构重叠臃肿。文总的党团成员本来就是文委的成员，一套班子，却用两套招牌。其实，后来成立的“临委”，也还是这样一批人。

从1933年起，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都上升到了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位置。这时，周扬是左联的党团书记，阳翰笙是文委书记。1935年阳翰笙被捕后，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则由任白戈接替。夏衍、田汉分管电影和戏剧，他们都是文委的领导成员。

左联设有执行委员会，鲁迅最初也是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退了。实际上到了后来，执委会也形同虚设，党组完全代替了它的活动。当胡风被任白戈接替以后，左联内部的统一局面遂告形成。周扬大权在握，许多事情，他已经无须直接出面指导或干预，而让任白戈，乃至夏衍、田汉进行。最初，夏衍曾经说过重大的事情可以找鲁迅商量的，而这时，田汉已经明确告诉任白戈：鲁迅说，不想管左联的事，以后有事情不必找鲁迅，可直接找他。任白戈去日本后，由他介绍加入左联的徐懋庸接替了他的职务。徐懋庸也一样少有见到周扬的机会，周扬的指示，通常通过周立波和何家槐传达下来。

在左联内部，鲁迅根本无意做什么权威。早在集团成立时，他就主动撤出领导核心的位置，但也不想因此退居幕后，非要听所谓汇报不可。他不需要那份特别的尊重，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盟员而存在，而且愿意作为一个普通盟员而存在。当然，既在一个组织之内，他就必须关心整体的命运，同集体的战斗倾向保持一致。这是不成问题的。其实这也是他早年加入“新青年”之意，做自己愿意做的“遵命文学”。但是，这并不等于从此把自己变成某种工具，绝对服从来自“众数”或如旧式衙门里的“上峰”的意旨。在一个集团里面，他不能容忍存在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他憎恶对于人的任何形式的奴役。他要保持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保留自由选择的权利。

领导核心所以引起他的严重的关注，准确地说，主要来自对他本人所构成的实际的压迫。他对集团的全体命运的关怀，这时候，便同个人的压迫感统一到一起来了。当他一旦把握到了这种现实状况，自然地表现出一种警觉，对于民族未来的疑虑与怆怀。比起第一代的共产党人，他的个人阅历毕竟多出一个时代。对于封建帝制的专制压迫，他有着切肤之痛，并且由此培养出了超乎常人的敏感，和近乎本能的反抗意识。对于政党所由产生的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壤，他太熟悉了。

他是一个对国民性素有研究的人，对左联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他也

有着很好的了解。他认为，周扬是一个喜弄权术、心术不正、气量又狭窄得像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他曾经表白说，周扬同他见面时是一副虚伪的面孔，说同他感情很好，可就是不知道周扬那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说夏衍表面上是一个上海绅士，笑嘻嘻的，其实诡计多端，是站在背后的军师。至于田汉，他倒认为是一条糊涂虫，浪漫蒂克，敌我不分，所以一旦被捕，即在南京大演其戏，是毫不足奇的。

其中，最不满的还是周扬。

他在信中玩了点小幽默，对胡风说：“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也就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这里的“元帅”，就是指周扬。

党阀作风是他所憎恶的。周扬不但自己不做事，还指责别人不做事。令他特别生气的，就是指责他“懒”，“不写文章”。他说：“他们个个是工头，我有时简直觉得像一个戴了脚镣的苦工，不管做得怎样起劲，总觉得背后有鞭子抽来。”在信中，他还多次谈到过所受的这种指责。

在他看来，以“指导家”自居的周扬，不但故作激烈，吓唬别人，打击内部的不同意见者，而对于敌人，却是心平气和，且有“取悦”的现象。他认为，不少对于他的中伤，包括后来的“托派”、“破坏统一战线”等等罪名，都是周扬他们散布的空气，他们同“第三种人”，同上海滩一些以造谣污蔑为业的小报是有联系的。处在一个集团之中，却不能不承受一种“独战”之苦。他这样诉说道：“有时甚至使我多疑的毛病又起来了，想到要提防同营垒中人设置的圈套和陷阱。”

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明快起来的呵！他苦闷，他愤慨，他无法可想。有一次，杨之华到他家里去，提起周扬等人，他生气地说：“像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有一件事情是鲁迅不时提起过的，即关于左联的内部刊物问题。

胡风离开领导位置以后，便再也收不到《文学生活》了。他所说周扬他们出过一期，将左联从前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

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感到特别愤慨。他在一连写给曹靖华的三封信里都谈到这件事，指出这样一种可怕的局面：“到处是用手段。”

后来，周扬他们又要出《文艺群众》了，主持其事的徐懋庸向他募捐，他便说：“我没有钱。”以后，徐懋庸因为凑不够印费，又向他要过一次，他仍答道：“我没有。”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是大家的刊物，也就应该大家出一点，大家都负点责任，可是有人自己不做事，不想负责任而全然推给别人，怎么行呢？让别人做苦工，你光拿鞭子，这公平吗？但因此，便又说他“吝啬”了。令人奇怪的倒是，当徐懋庸把新出的刊物寄去给他的第三天，随即收到他寄来的二十元钱。

他对徐懋庸解释说：“开初我不给钱，是有原因的。左联已经有两年多不出机关志了，但常说要出，却竟不见出。我出了钱，刊物又不见，反而落得一个坏名声，说我有钱捐班，才配做左翼作家的。现在你们让刊物和我见面了，这一回总算没有失信，所以就寄给你那几张单子。”

周扬等人的作为对鲁迅身心的影响是严重的。因为是“同人”，所以他尽量地加以回避，这种苦境，他只有向个别朋友才谈起过。

4月23日，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写道：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多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总之，对于左联的核心，他已经完全失望，甚至对于左联也如此。萧军有意想加入左联，他的意见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不必进去。”总结起来，他觉得几年来，还是在外围的人们中间出了好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就酱在无聊的纠纷中，变得无声无息了。

9月，他在信中这样向胡风讲说自己：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

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我的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定仍旧很好的），但我确信我是对的。将来通盘筹算起来，一定还是我的计画成绩好。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倘使削弱外围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这时候，他居然寄希望于左联之外的力量了。对于一个在左联最困难的时候宣称自己为“左联之一员”的忠诚的老战士来说，这种变化，是相当富有悲剧意味的。

## 116. “一二九”运动·萧三来信·左联的溃散

长征红军在艰难中行进，经过遵义会议的斗争，长期遭受压抑和打击的毛泽东，终于打败了惟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教条主义者。虽然，他只是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重返军事舞台的前沿，但是他那脱胎于中国传统而又富于灵活变化的个人思想，对于众多来自广大乡村的红军将士来说，显然具有越来越大的精神凝聚力。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毛泽东思想的涵盖面开始遍及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并且渗透到国统区内，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远东及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确定为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苏战争，因此，极力要把日本点燃的战火控制和熄灭在中国土地上。“武装保卫苏联”，成了苏联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足以壮大到可以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于是把大量的军事援助倾注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只提供急需的药物、医疗设备和政治读物，以及不容违拗的指示。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挽救民族的危亡。会上，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中共代表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关于统一战线的建立，报告虽然提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

用的必要性，但是基本精神，仍然反映了莫斯科方面的政策立场。

自东北四省沦日以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相继发生，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12月9日，北平学生开始走上街头，愤怒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争取爱国自由”等口号，集中涌向新华门。国民党当局不但拒不接见请愿学生，还出动军警，用水龙、木棍、大刀等进行驱赶。在搏斗中，学生有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第二天，全市宣布总罢课。16日，市学联召集全市学生再一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打乱了政府的计划，以致傀儡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也不得不延期成立。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平广大市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他们纷纷送水和面包前往慰劳，抗议军警的无理镇压。

学潮的发生不是什么偶然性的爆炸事件，它反映了中国潜伏已久的深刻的政治危机。“一二九”运动以后，全国各地学生迅速响应，并且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形成为不可遏止的抗日救国的洪流。12月下旬，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上海大中学生组成了救国宣传团，深入乡村进行宣传。可是，没有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斗争的配合，学生运动要冲破反动政府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的破坏和屠杀政策而获得持久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接着，南下宣传团便被强令解散，成员遭到拘押，斗争只能以别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对于这次继“五四”以来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潮，鲁迅是关注的。但是，他有他的观察和评价角度。在本月19日致曹靖华的信中，他慨然道：“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当局是向来媚于权贵的，高教此后当到处扫地……”两天后，他又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北平学生游行，所违与前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次年1月，他还在信中向曹靖华说及学生问题，说：“北方学校事，此地毫无所知，总之不会平静，其实无论迁到那里，也决不会平安。我看外交不久就要没有问题，于是同心协力，整顿学风，学生又要吃苦了。”总之，他是悲愤的态度看待学生运动的。在学潮刚刚过后所写的《“题未定”草（六至九）》里，虽然他也称赞说北平的学生和市民并非庸愚，被愚弄诬骗压迫到现在而仍然“明黑白，辨是非”，也强调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最后的话，仍然是九年前的主张的重申：“不要再请愿！”在他看来，官民严重对立的现象是无法消除的。如果政府可以足够地代表国

民，那是无须乎请愿的；但是，要是不足以成为国民的代表，请愿下跪，流血呼号，又有什么用处！

鲁迅不相信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有可能成为爱国的政府。在学生斗争的压力面前，国民党政府做出某种保护人民的姿态，借以影响社会舆论，这是不足奇怪的。但是，它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实质决不可能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在同一天内，他写信给两位朋友，几乎完全重复同样的说话：国事至此，政府将有“保护正当舆论”之说，“正当”二字，加得真真聪明，但即使真加“保护”，也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如果不是依靠千百万奴隶自身觉醒的力量，而是寄希望于政府，在了一批军阀政客屠夫的身上，难道可以得救吗？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会议，着重讨论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问题，进一步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对蒋介石所作的必要的揭露和谴责，与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敌对态度是相一致的。但是，鲁迅并不十分了解共产党的真实立场，在上海，凭借国民党管制下的有限的几个报纸，他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的信息。这时，左联党组本来就处于与党中央隔绝的悬空状态，何况“周扬之流”又从中把他间隔开来呢！

在时局面前，他时时感到愤慨、苦闷与悲凉……

12月5日，他曾书写了自作的七律一幅赠许寿裳，云：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遗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同一天，还为友人写了两幅字，其一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再就是明人项圣谟的“风号大树中天立”的一首，只是，他写的已不只一次了。

数天后，他以唐代刘长卿的《听弹琴》书赠日本朋友：“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苦调”可堪怨慕而曲终人杳，“古调”虽然自爱却为世所弃，都是一种无人理解的寂寞。3月间，他为徐写：“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金家”，实系他所说的“文坛之闻人绅士所聚会之阵营”；这里说的“无俗声”，分明是阿Q式的自矜。又为今村铁研写：“顽绝绝顽绝，以笑为生业。刚道黑如炭，谁知白似雪。笑煞婆娑儿，尽逐光影灭。若无八角眼，岂识四方月？”“婆娑儿”既有人面狗心的文氓，也有善于变化的“同人”，“笑煞”此辈，当是何等自傲！但无论如何，这种近乎自恋情结的东西，是含有很深的孤独感在里面的。仍在同一天为增田涉所写的条幅，选取南宋郑所南的《锦钱余笑》，就不是偶然的了。诗云：“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错写字。”一切豪情都如虹霓在眼，瞬息而逝，幽默里包含着无力收拾的辛酸。

八年前，因为梦境的放逐来到上海，经过几番意气风发的论战，现在仿佛又回复到了当年的孤独彷徨的状态。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政治意识更强烈了，更深邃成熟了，他的寂寞感和悲凉感，无时不与复仇的意志胶结在一起。他的悲哀是独战的悲哀。他不再如过去那样，自觉孤独时就纵酒自戕，而是时时想到玩，歇，虽然实际不能。他要尽量地保存自己，以继续进行他的战斗。一场意义特殊的战斗，在他的意识中，其实才刚刚开始。

死亡的阴影.....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王明两次指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左联代表萧三写信回国，在组织上取消左联。另一位中共代表康生也以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为由，从中做说服工作。这样，萧三终于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由鲁迅转给左联。

信里写道：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

左联自成立至今五年余以来，尤其是从满洲被占及上海战争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而能积极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作了不少的工作.....

.....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

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见去年左联向I.U.R.W的报告），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新月”固然仍然是“新月”，“沉钟社”和周作人等仍退避现实，林语堂只是“幽默”而继其“一笑了之”的态度，“第三种人”多数以中立自命……

同志们！在这里我们要追溯一番左联关门主义之由来。我们以为左联之关门，要从其唱“普洛文学”说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出，马上便把左联的门关上了，因为这一口号，这一政策，便不能团结一班先进的，但仍未能一旦普洛化的文人以及自由派的作家，尤其在当初的时候普洛文学家对非普洛者的态度更只是漫骂，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这和苏联过去“拉普”之“非同盟者即仇敌”口号很相符合。这样一来便也使我们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于是我们不能打破一切政治上的困难，取得较公开的地位。……

因为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

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决定的呵。

……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认为：

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

……

自从巴黎举行的世界作家保障文化大会后，我想同志们已经很看得出这一趋势，I.U.R.W的命运，所以也会是很短的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策略，我们不是死板的书生。过去所做的有其过去的价值，现在如仍照过去的作下去，则是有妨碍于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即以苏联取

消“拉普”而改组苏维埃作家统一同盟一例亦可知是何用意了。何况在今年巴黎保障文化大会之后呢？

这是一个主要的重大问题，也就是我这封信的中心问题，很希望同志们过细讨论。

其次在创作方面。……我们追溯一下左联成立至今五年多以来的创作，或则专写工人斗争，或则专写农民暴动；而关于工人领导农村革命及反帝反封建的这一点，无论大的或小的作品差不多完全没有。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应该以左翼作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之革命动力，不了解工农联合革命来作解释，再，即检讨一下反帝的文学时，有大意义的保护上海战争，左翼作品很少很少描写过，写东北义勇军也是很关门的写法，此外描写工农民主政权的作品有一些，但写英勇的红军的也差不多完全没有……

第三在策略方面。……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文学”，我们不必空口反对他们这一招牌，而应把它夺过来占为己有，即充实它的内容。多写民族救国英雄，如东北义勇军事实，复活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痛骂秦桧，吴三桂，袁世凯……使成为革命民族战争时代的革命民族文学。  
……

末了，再重复一句：当此国亡无日，全国民众只有共同起来组织广大的人民反帝——抗日统一战线才可图救。政治上的口号，策略，我们作文学运动的至少是要追随它，符合它。说到这里，同志们大概都已很明白了，用不着多赘了，我便就此收笔。鲁迅很清楚，萧三的信不只代表他个人。

信里的许多观点，在他看来是混乱的，糊涂的，错误的。怎么可能把“新月派”和“第三种人”也拉到同一条战线里来呢？提倡普罗文学能算是关门吗？以前的几场论争，是不是都成了军阀混战？“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是普罗文学家对非普罗者的态度呢，还是权威者及其叭儿对普罗文学的态度呢？林语堂、老舍式的幽默算什么？文学界的郑、陈可以作政治社会组织的宋、蔡……等着看吧。关于创作，为什么写农村就一定要写工人阶级领导？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怎么可能要求他们写出工农化的作品？“东北义勇军也是很关门的写法”是什么意思？《八月的乡村》呢？算什么呢？复活岳飞、文天祥，大家做臣子，“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笑话！

“统一战线”是什么战线？“统一”到哪里去？国家，民族，不要忘记这样的字眼从来有利于权力者！

茅盾在他家里看了信。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说：看一看再说。

对于解散左联，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其实要说也说不清。左联内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严重性，他比任何人都有着更清楚的了解。他对人说过，“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岂止关在门外而已？还要鞭扑不止！1935年至1936年间，“鞭子”作为一种譬喻，也在信中就不知使用过多少次！但是，这种恶劣倾向的出现，并非因为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是出于党组领导，有周扬他们的那里做。他们不会因为没有了左联，就从此不做了……

其实左联早已布不成阵了，名虽存而实亡。那么，现在当有人提出要在名义上也将它取消掉，他为什么又不愿意呢？

左联成立时，他甘愿被利用，一者因为盟员们都属于文学青年，二者是为了对付当局。那时候，说起态度来，还不算怎么积极坚决的。可是，等到柔石他们牺牲以后，他就从感情深处把自己同左联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这是血的连结，真真正正的“血缘”关系。现在，要他把这笔血债忘记掉，全盘放弃这个柔石们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组织，他能够做到吗？不久前，瞿秋白也是被处死了的，单是处死一个瞿秋白，就足以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现在就要同杀人者携手联合吗？因为要联合，就要非把为杀人者长期以来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组织拆掉吗？而且得由自己人亲手拆掉！左联毕竟是战斗过来的。在左联内部，即使受中伤，受鞭扑，受压迫，他宁肯暗暗包扎伤口，也不愿意把内情公开。这种隐忍，不正是不愿看到仇者的快意的笑脸吗？现在，宣布解散它，简直等于向敌人宣告自己的失败！来信说，作文学运动的要追随符合政治上的口号、策略。什么叫政治？奴隶同奴隶主讲“统一”是哪一家政治呢？他常常说他自己不大懂政治。他的所谓不懂，只是不懂从事政治的手段或策略罢了，即使懂得也不会应用，懂得应用的是政治家，政治家和艺术家的歧途就出在这里……

此外，对于由外部或上面指示解散的做法，也不是他所能接受的。组织的成立与解散，都是组织内部的事情。关系到左联命运的大事，不管是谁的命令，都不能代替盟员自己的意向。因此，在把信转给党组之后，他期待大家有一次平等的讨论或磋商……

但是，他没有想到，解散左联的计划实际上早已在酝酿之中了。

早在10月上旬，“文委”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完成了它的重建工作。“文委”成员为周扬、夏衍、章汉夫、钱亦石、吴敏。其中，章汉夫和吴敏都是周扬介绍夏衍认识的。

周扬仍被推举为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他要夏衍在分管电影、戏剧之余，再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也即临委的胡乔木、邓洁取得联系。“临委”同样是未经中央批准，由原文委系统下的一些党员自动成立的。

新“文委”组成后不久，周扬等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分别看到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他们开始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而积极行动，萧三的来信，促进了具体计划的完成。12月间，周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扩大会，决定解散“文委”所属各联，其中包括左联，并且把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会上还决定“文总”解散后，成立一个新的党团实行统一领导。

左联解散问题，就这样很轻易地解决了。

但是，要解散左联，必须取得鲁迅的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都知道，这个老头子是不好对付的。研究的结果，最后决定由夏衍先找茅盾，通过茅盾了解一下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做法。

1936年正月初，夏衍约了茅盾到郑振铎家会面，把解散左联和成立新组织的决定说了。他问茅盾有什么意见，茅盾便说，还要考虑考虑，等同鲁迅谈过以后再说。茅盾处事从来是谨慎的。夏衍说，因为鲁迅不肯见他们，所以，这事情只好托请茅盾转告。完后，他们约定三天以后听候回音。

茅盾向鲁迅转达了夏衍的意见。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要是赞成抗日，参加进来也不妨。但是，这个组织的核心必须是左联，倘使左联解散了，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我们不但统不过来，结果恐怕还得被人家统了去。看来，这个问题他早已考虑成熟了。

茅盾如约将情况告诉了周扬和夏衍。夏衍极力辩解说，组织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不就是核心嘛！茅盾表示愿意把这个意见再传达给鲁迅。

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谁知鲁迅听了，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笑了笑，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就不相信了！”茅盾见这么说，知道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弄不好还会被鲁迅怀疑是周扬的说客，于是托郑振铎把鲁迅坚持不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自己尽量回避不再与夏衍见面。

事情不能因此耽搁下来。周扬决定让徐懋庸以组织的名义，再次找鲁迅谈。鲁迅毕竟是鲁迅，绕开走是不行的。

然而，无论徐懋庸或是茅盾，出使都没有结果，鲁迅一点没有改变原来的意思：不赞成解散左联。

在左联常委会上，徐懋庸汇报了有关鲁迅的情况，并且表示赞同鲁迅的意见。这回出席指导的不是周扬，而是胡乔木。在徐懋庸讲话之后，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说，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

讨论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把左联解散。会后，胡乔木还特地找徐懋庸谈了话，要他继续去打通鲁迅的思想。

于是，徐懋庸第二次去见鲁迅，把会议的决议和胡乔木说的一套道理向他说了。他听了以后表示：左联是大家的，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社会上就会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徐懋庸把这意见带回给周扬。周扬起初说，这意见很好，等讨论一下再说。但是，过了几天，他对徐懋庸说：“讨论过了，认为文总所属的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其他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为了这事情，徐懋庸第三次找鲁迅。这一次，鲁迅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过了几天，周扬又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理由是，此时正在筹备组织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将要成立。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又成立，就会被国民党把救国会看做是文总的替身，于救国会的存在不利。

于是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说明这一切。鲁迅听了，脸色一沉，一言不发。徐懋庸觉得很窘，赶紧告辞走了。

一度轰轰烈烈的左联，就这样从中国文坛上悄然消失！

1936年4月，徐懋庸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有这样一段记录，“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时，向鲁迅问起左联的情况，鲁迅回答是：“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接着，又在《光明》半月刊上看到鲁迅复何家槐的信：“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他觉得鲁迅意气用事，不顾事实，于是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左联解散问题，我是前前后后多次报告了你的。解散得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你说不知下落，则非事实。”

他很快收了鲁迅的回信：……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显然，这是一封绝交信。

但是鲁迅所拒绝的，绝不只是一个徐懋庸。鲁迅不会不知道徐懋庸

的角色的分量，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就曾经这样指出：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即便是一群又如何呢！这个几十年前便曾神往于尼采歌颂过撒旦且为“人国”呼吁的人，是不能为“众数”所改变的。个人的独立与尊严，对他来说，是太重要了！

## 117. 中国文艺家协会·两个宣言

随着左联的解散，一个新的统一组织的成立也就必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其实，作为实践中前后出现的这样两个问题，在周扬方面最先是同时加以考虑的。

而贯穿此间的，是“国防文学”口号在文艺界的影响。

早在1934年10月，周扬就以“企”的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并且在文中提出“国防文学”作品的创作在中国的急迫性。一年过后，周立波进一步撰文确定“国防文学”的内涵，“是反帝反汉奸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识上的武装”。他说：“国防文学营盘里的任何朋友的通行证，上面只有简单的两句话：‘我是中国人！我反对汉奸和外敌’！”与此同时，何家槐等也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还列举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古代的文臣武将，鼓吹“民族英雄”的“复活”。在中国，“国防文学”作为一个统战口号被大力提倡，是由周扬定调的。1936年2月，他征得文委内部的章汉夫、胡乔木、夏衍等人的同意，设法在组织上传达贯彻这个口号的精神，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一时间，不仅上海、北平、广州，连日本东京的左联盟员和文化界，也都纷纷发表赞成这一口号的文章，于是，迅速形成了一股“国防文学”热。

3月间，原先叫“作家协会”而后叫“文艺家协会”的新组织积极筹备起来。

出面同各方面联系的是郑振铎和傅东华，而这两个人，在左联常委分工中是归周扬负责联系的。郑振铎和傅东华为了加强号召力，又拉了茅盾做发起人。茅盾自觉到他在文坛中的特殊地位，当左联内部明显地分成两派的时候，他不愿意失去任何一方，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大体均等的距离。现在，平衡打破了，“国防文学”派，也即大家所称的“周

扬派”，已经明显地呈现出压倒的优势。他必须趋同，即使不想重新获得什么，至少也要保持原有的位置。

对于茅盾，鲁迅是了解的。他最不满意茅盾的地方，是在《译文》事件中的暧昧态度，以及传播有关胡风的谣言。

《子夜》出版后，左联内部有过很热烈的讨论，周扬还曾写过一篇讨论总结。大家认为，《子夜》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我国长篇小说的最大成就。而它最重大的意义所在，就是以艺术的形式，形象地回答了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所接触的问题。鲁迅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虽然他也认为《子夜》的创作为叭儿文人所不及，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并不认为这部作品具有永久的价值。他不喜欢太客观的东西，茅盾求他为《子夜》的英译本作一篇序，他不愿意写，便把这件“很麻烦的事情”转托了胡风。让茅盾求助于一个有“内奸”嫌疑的他的朋友，本身就是一件很带戏剧性的事情。

虽然在他与茅盾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但是，还不至于发展成为很大的矛盾。总的说来，茅盾还是尊重他的意见的。

在一封信里，茅盾谈到全国的救亡形势时说：“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他回信说：“现在就觉得‘春天来了’，未免太早一点——虽然日子也确已长起来。恐怕还是疲劳的缘故罢。从此以后，是排日=造反了。我看作家协会一定小产，不会像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些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对于这个在左联中还能较为保持中立的人，他一如从前，坦率地表白自己的看法，根本想不到茅盾居然会成为作家协会的核心。

他一直认为协会与郑振铎的经营有关。在4月1日致曹靖华信中，他批评郑振铎使用权术，指出许多青年作家远而避之的情况。到4月26日，他告诉曹靖华，茅盾已经同郑振铎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并且掌握了指挥权。究其本意，是为了“救《文学》”。也就是说，这里边同样包含了借“统一战线”以营私的性质，保护的还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十天后的信，他再次讲述了这种情况，说：“此间莲姊家已散，化为傅、郑所主持的大家族，实则藉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似亦在内。旧人颇有往者，对我大肆攻击，以为意在破坏。但他们形势亦不佳。”“莲姊家”，即左联；“旧人”，包括了左联的同人；“毛姑”，就是茅盾。

在同一封信内，鲁迅还写道：《作家》，《译文》，《文丛》，是

和《文学》不相合的，现在亦不合作，故颇为傅郑所嫉妒，令喽啰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近日大约又会有别的团体出现。我认为这是好的，令读者可以比较比较，情形就变化了。这里透露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文艺家协会以外的“别的团体”的出现。

鲁迅所以对组织别的团体发生兴趣，是因为可以借此打破由周扬等人计划，傅、郑出面主持的“大家族”的一统天下。整个文坛的情状令人十分忧虑。曾经与鲁迅发生论争的创造社的一群，开始同原来对立的文学研究会合流。人际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和组合。多年来尚未消除的思想矛盾，经过左联这一共团体的阻遏，而今有了进一步扩展的趋势。集结在鲁迅侧面甚至背面的这批人，当年还是文学新人，现在快要成为“元老”了。这是一股无论凭资历或是实力都是足于左右文坛的力量。如果能够端正方向，致力于中国现代文艺运动的建设当然很好，但是问题恰恰不是这样。这个由少数几个人以党或国家民族的名义组织起来的“众数”，居然以最时髦最堂皇的理论和口号威吓同类，排斥异己，把大众的事业当成为“大家族”的产业。鲁迅何尝不知道“统一战线”的重要呢？早在左联成立的时候，他就一再强调战线的扩大问题。他指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还警告说，“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然而，“统一战线”的倡导者而今居然成了“破坏”者，甚至还放出有关他的什么“托派”之类的流言！所谓“统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据说是“国防”。如果说，“国防”在苏联还可以看做是防卫工农国家的话，那么在中国，防卫的岂不正是屠杀工农的国家吗？“国防文学”的引进，一开始出于周扬等少数人的教条思维，可是到了后来，这一口号从理论到实践都直接受到了宗派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以“统一战线”为目标的组织，文艺家协会表面上是扩大了“团结”的范围，骨子里头仍然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本质上具有排他性。惟“国防”中心，惟“国防文学”中心，像这样一种中心意识怎么可能有浩浩荡荡呢？如果这也可以算作“统一”的话，那么，它跟历来的封建主义“大一统”有什么大区别？

鲁迅的批判思维使他无法接受一个与中国的政治现实不相符合的结论，不论它来自共产国际或是其他的权威机构，而他的反抗众数的尼采思想和叛逆性格，也都支持了他的选择。我们固然不能做外国人的奴隶，但也决不能做本国人的奴隶。奴隶的地位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因此，不管周扬怎样反复派人游说，让他加入协会，他都加以拒绝。具体到人事问题上，无论是周扬、夏衍，或是郑振铎、傅东华，这时候都是

为他所厌恶的。这老头子太偏了。他宁肯一个人独立于飞沙走石的世界里。

在一次谈话中，邓洁对他说：“我们有现代武器，何必用原始武器呢？”

他立即回答说：“要看这现代武器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所谓“现代武器”，就是指的这类统一的庞大组织。相对言之，“原始武器”当然是指独立作战的方式了。问题是，鲁迅并不注重组织形态。左联前后的变化所给予他的教训太深刻了！

从2月到5月，他在多次通信中，表明了对于协会的决绝态度。

另一方面，随着协会的筹组所显示出来的可预期的效果，以及在实际上给予他和其他一些青年作家的压力，成立另一团体以打破目前的作家阀式的垄断局面，一度成为他的意愿。但是，也仅仅属意愿而已。从根本上说，他不属于周扬一类的组织家和活动家。

中国文艺家协会经过四个月的酝酿，终于在6月7日正式成立。

成立大会在大西洋西餐馆举行。到会有七八十人，青年人不多。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宣读了茅盾起草的宣言，还有协会章程。按照会章规定，加入者得由会员两人介绍，再经理事会通过；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资历和经济条件都有着严格的限制。在组织方面，由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九人，候补理事五人，成立理事会；由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五人处理经常事务，理事会设总会、出版、调查、研究、联谊等五部，每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及干事若干人。机构重叠，颇有衙门化的倾向。照章选出的九位理事，其中四位是《文学》的主编和支持者，还有两位是原文学研究会的，另两位是《光明》的主编，徐懋庸则属文委。茅盾是常务理事召集人，计划中是可以统领整个协会的工作的。周扬、夏衍不在宣言上列名，宣言中不提“国防文学”的口号，都是会前早经布置好了的。虽然会上也仍然有人提议把“国防文学”写入宣言，但是没有通过。这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于听从领导的安排了。

会议议决，把周扬等人办的期刊《文学界》当作协会的会刊，由徐懋庸负责。此外，还一致通过了致鲁迅的慰问信。给一个拒绝本团体的人致以慰问，也当算是会议上的一件颇具喜剧色彩的事情。

不过，鲁迅曾经参与筹划的别一团体始终没有成立，只是在文艺家协会成立后的一个星期，发表了一个宣言，名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经过鲁迅作某些文字上的修正。与《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大会上宣读通过的办法，而是采用分头联系，说明原委，个别协商，征求签名的方式。两个宣言在字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实际内容却也有着微妙的出入。《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强调“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贯穿着“国防”的精神。《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一开始就从民族危机的长期存在引发对“现实”的思考，在“争取民族自由”的大前提之下，强调宣言者保持“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工作，也就是强调斗争的持续性和多面性，强调构成“民族”的分子的自由。这种个体自由，不应因为“统一战线”的确立而泯灭。

有一个名叫时玳的文学青年，写信请教鲁迅是否加入文艺家协会，鲁迅的答复是：“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假使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信中还说到文艺家协会的发起人向他射“冷箭”的事，劝他不妨和大家接触，以便在实际中明白协会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所谓的“作家”，还有“指导的英雄”到底是什么东西。

恰好，在写给时玳的另一封信中，谈到协会之外的流产了的别一团体的宣言：《文艺工作者宣言》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定，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有人赞成，自然很以为幸；不过并不用联络手段，有什么招揽扩大的野心，有人反对，那当然也是他们的自由，不问它怎么一回事。无论有无组织和团体，鲁迅所看重的是“各人自己的实践”。实践来源于各人的自觉性和自主性，那是不能以行政或非行政的“手段”来加以规限的。

协会成立后，除了热衷于口号问题的争论，并没有什么活动。在章程中所列举的像组织分会、召开例会、从事研究诸项，都不过是慷慨一时的空言。当然，这同会员的立场本来不够坚实，战线是“吓成的战

线”有关；而鲁迅态度的公开化，对于这个统一体也不无分化的作用。到了10月份，协会的重要领导人茅盾便离开上海，回家乡写他的长篇去了。

早在协会成立前夕，鲁迅就这样向曹靖华说起这个组织的情况：“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沉，或变化的。”推测的话，竟成了一种预言。

## 118. 《故事新编》·匆匆来去的《海燕》

1935年12月，正当左联面临解散的危机时期，鲁迅一连写了四个取材于上古史的短篇小说：《理水》、《采薇》、《出关》、《起死》。这种特别的兴致和出手速度，实在是出人意料的事。

早在北京时期，他就说过，史书是可以翻翻的。其价值就在于：“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年头，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重提了翻阅史书的事，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这四篇作品，正是“刨祖坟”的产物。作者为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人们找到了各自的原型，是关于现实的伟大而深刻的寓言，在自称“油滑”的叙述中，到处闪耀着天才的隐喻的光辉。

同时，它们又是作者借以“抒愤懑”的最合适的情感形式之一。在这里，生活内容和形象画面不但丰富了杂文般的讽刺力量，而且抒写了内心深处的孤独感、爱，与无助的悲哀。

《理水》，可以看做是一篇放大的“包围新论”。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曾经写道：“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理水》中的大禹，就是这类“脊梁”人物的代表。小说写他处在三层包围之中，最近的一层是“大员”，也即特权阶层，他们即使下去考察灾情，也是前

呼后拥，威风十足，吃喝玩乐，不识民间疾苦为何物；所谓工作，也无非是听汇报，看“条陈”而已。外面一层是文化人，他们聚集在文化山上，食粮也都是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有余裕研究学问。当洪水浸野，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养尊处优，清谈终日，满嘴谰词，粉饰太平，是一群现世制度的辩护士。最基层的是所谓“百姓的代表”，他们的职责一是传达“大人的吩咐”，二是把“体面”化了的民情呈报“上头”。这三层包围都可以统称之为“文化包围”，目标全在于使被包围者脱离大众，昏于世事，结果“龙驭上宾于天”。

但是这种结果，作品并没有直接显示出来，与其说，大禹一样的“脊梁”人物被“消灭于黑暗中”，毋宁说是被黑暗所“消融”。有意思的是，黑暗是以充满光明的太平景象加以透达的。

在鲁迅的笔下，大禹是一个面貌黑瘦粗手粗脚的大汉，连袜子也不穿，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他出门没有仪仗，连随员也是乞丐似的；议事毫不虚骄，没有繁文缛节。首先，他是一个实践家，为了查明山泽的情形，征求百姓的意见，不辞辛劳，到处奔走，以致在外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有主见，不但不惮于关于他的各种流言，也不顾大员们尤其是老官僚的实际阻挠；坚持以富于创造性的“导”法代替“老大人的成法”——湮。在整个混浊的环境中，大禹的确是一位举世罕见的光辉的人物。然而，悲剧也恰恰出现在这里。传统的保守势力，毕竟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他的改革方案又得不到百姓的了解，在大众传媒中，他始终是一只黄熊，跟他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最后的演变是必然的。当舜爷确定他为接班人，托他管理国家大事之后，皋陶就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个别领导人改变了，但是，作为统治集团的全体却丝毫没有改变，制度和法律，仍旧是专制的老一套。

小说的结尾写道：……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制度法令没有本质的改变，人民的文化心态依然如故，习惯和适应着这一切。古老的僵死的政治内容，于是从新领导新法令中得到合理的延续。大禹的蜕变是渐进式的，将来如何不得而知，然而这开始却不是好兆头。

小说饶有意味的结尾令人想起年头写的另一个短篇《非攻》里的墨子，也是一个禹似的人物，连外表也都一样像乞丐。那劳形苦心、扶危济急的“贱人的东西”是他所具备的。他活在一个战争频仍、灾难深重的时代。在得知楚王打算攻打贫弱的宋国时，他一面布置学生在宋国备战，一面长途跋涉到楚国，凭自己的口舌——“义的拒”，先后降服了公输般和楚王，解除了宋国的危险。

墨子一生行义，只求有利于人。他的只身使楚，就并非为了个人的利益，也不是接受了哪一位王者的派遣，而是出于“兼爱”，——内心的使命。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义士，一心为了宋国反而为宋国所拒绝。

故事的最后这样写道：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了大雨，到城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此种无路可走的晦气，实在不能比大禹结局的辉煌。然而，两个具有喜剧色彩的结尾，都一样带着深隐的悲剧意味。墨子和大禹，在中国历史上，是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坚苦卓绝的象征性形象。在这里，鲁迅一方面检讨传统文化，一方面考虑现实政治。远在塑造阿Q的时候，他就思考了“阿Q党”在几十年后的存在问题。近几年的政治经验，同一营垒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环绕左联党团为中心而活动着的一些党员人物，不能不唤起他的新的警觉和某种不信任感。通过《非攻》和《理水》，他表达了对未来中国的前途的隐忧。

《采薇》、《出关》、《起死》三篇，更多地把焦点放在文人集团上面。

伯夷、叔齐兄弟并非《采薇》所要着意表现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他们只是一个坐标，一面反光镜。由他们所反射出来的对面的人物才是重要的。

他们原是辽西的孤竹君的儿子，因为逊让王位，先后一起逃走。两人在路上遇见，便一同找西伯——文王，进了养老堂。不料文王死后，周王竟然扔下老子不葬，“以臣弑君”，出兵讨伐起纣王来了。他们认为国王不仁不孝，于是冒死进谏，遭到拒绝后，决计离开养老堂，不再吃周家的大饼，到华山去吃些野果和树叶打发残年。又不料，遭到华山大王小穷奇的搜劫，而且勒令滚蛋，他们不得已坚守首阳山，不食周粟，

采吃薇菜度日。倒霉透顶的是，不用多久就又来了一批看客，还引动了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以及阿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在这样的质问底下，他们不胜羞惭，只好绝食饿死了事。

这两个古典式人物，是坚守主义者。为了一个信仰，他们可以交付生命的代价，姑不论信仰的内容如何。比较起来，小丙君简直不名一文。他原是妲己的舅公的干女婿，做着祭酒，因为知道“天命有归”，便带着五十车行李和八百个奴婢来投明主了。而这个变节小人，居然大义凛然，斩钉截铁地指责起他们在吃“我们圣上”的薇，气势汹汹地批判他们，说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既不是孝子更不像良民。鲁迅不只一次慨叹中国人缺乏真正的信仰，多的是见风转舵的党徒。这里的小丙君，可谓其中的代表人物，没有信仰正是他的信仰。

阿金是小丙君府上的婢女，奴才的奴才。她的聪明，全在于通晓主子的心思，留声机一般重复主子的语言。奴性的发展，甚至使她比主子更势利、更刻薄，当伯夷、叔齐死去，她散布关于“故意饿死”的谣言，说是上山奚落了他们几句，傻瓜就撒赖绝食。老天爷看见他们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可是贱骨头不识抬举，得步进步，居然动手杀鹿来吃。老天爷讨厌他们贪嘴，便叫母鹿从此不要去。因此，他们的饿死全在于自己的贪心。这样，她就又很轻松地把可能的责任推卸干净了。她是一个十足的谣言家。以谣言杀人是更可怕的。

还有小穷奇。他以打劫为业，却有一套十分动听的君子言辞，露骨的虚伪令人作呕。要钱，就说“请你老赏一点马路钱”；要物，就说“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要搜查，就说“小人们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贵体。”当他确定他们是两个穷光蛋时，便做出十分恭敬的样子，拍着伯夷的肩膀说：“老先生，请您不要怕。海派会‘剥猪猡’，我们是文明人，不干这玩意的。什么纪念品也没有，只好算我们自己晦气。现在您只要滚您的蛋就是了！”比起伯夷、叔齐的迂直，相去实在太远。鲁迅在介入文坛论争之后，多次描画过这类人物，如《论辩的魂灵》、《牺牲谟》，还有1928年关于“流氓”的杂文系列。大半年以后，他愤而写《半夏小集》，开头一小节就是类似的暴露：他们以最时髦最漂亮的名义，掩盖剥夺别人的勾当。

看客形象的创造，是《采薇》一篇中的重要内容。鲁迅早期的“反庸众”思想，可以在这里找到继续发展的线索。对于一个启蒙战士来说，

群众必然要成为他关注的对象和主题。

当周王出兵时，大路两旁就挤满了民众，站得水泄不通。人们在威风凛凛的王爷面前，个个肃然起敬。伯夷、叔齐的进谏，使人们万分惊恐；而听得姜太公称之为“义士”，便又赶紧让开道，恭而敬之地放他们走了。民众没有定见，因为无须思索，重大的事情惟听帝王和圣贤的训示。战争发生后，无论哪里，总有一群人眉飞色舞地听讲来自战地的故事，津津乐道于纣王的宝贝，头，姨太太，以及姨太太是否漂亮，妲己是否为狐狸精所变，娘儿们的脚如何等等。还有特地上首阳山看伯夷、叔齐的人。有的当他们名人，有的当他们怪物，有的当他们古董。甚至于跟着看怎样采薇，围着看怎样吃薇，指手画脚，问长问短，令人头昏。而且对付还须谦虚，略不小心，皱一皱眉，都会有人说是“发脾气”。也有几个小姐太太之类看了，回家去都摇头说是“不好看”，上了大当云，于是，参观者日渐减少。但当伯夷、叔齐死于石涧的消息一传开，就又哄动了一大批来看的人，一直闹到深夜。人们听到阿金姐说兄弟俩死于贪嘴的故事，临末都会觉得肩膀的轻松，甚至恍恍惚惚地想像着他们拼命的大口吃鹿肉的情形……

仍是自私、愚昧、凉薄的一群。他们简直无始无终地存在，从《呐喊》、《坟》和《热风》的时代一直绵延至今。

所有这些人，都是环绕鲁迅而实际活动着的，是以构成可怕的生存环境。但是，他是一个意志力十分顽强的人，他必须持续着他的对抗，而至于陷入情绪的纠缠，无论悲哀，无论愤怒。《出关》中对老子的刻画，便鲜明地表示了他的态度。

《出关》发表后，就有不少的批评，或者以为攻击某一个人，或者以为是作者的自况。左联的人邱韵铎指作者本人就是老子，说：“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子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堕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为此，鲁迅特地写了《出关的“关”》，否定以上两种意见，并且指出邱韵铎是用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将一篇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闭了。邱韵铎把仅有的“孤独和悲哀”这样一份无为的精神遗产硬派给作者，当是一种有意的错误，如作者所疑心的。

但是，老子形象有着作者的影子，却是一个无法推脱的事实。

说老子与作者有某种相似之处，是因为：一、小说里说孔子和老

子“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孔子是上朝廷的，老子却走的是流沙。流沙是与朝廷对立的。鲁迅自己就曾有过置身于沙漠之中的比喻，他并不惧惮，也不想遮盖“灵魂的荒凉和粗糙”，甚至有些喜欢这“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二、老子非常明敏，他看透了别人背地里算计或掇弄他的鬼把戏。对于知己知彼这点，鲁迅每论起来，是颇有点自得的。三、老子被称为“老头子”，而且小说里面还笔涉“牙齿”，他是被说成爱“发牢骚，闹脾气”的人，这些都是读者所熟悉的称呼和说法。在小说中，老子一直被利用，这是无法避免的。而在鲁迅的书信中，也都不时有着被利用的记录。

然而，鲁迅并不承认老子是一种自况，最重要的是：孔老相争，孔子以柔进取，老子却以柔退走；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子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因此，他不惜将老子加以漫画化，然后送出关去。结末的关尹喜讥讽老子道：“这家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这段话，可以看做是鲁迅对老子思想批判，至于出关的结局，自然也如关尹喜说的：“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逃避现实的人最终必将为现实所报复。就整个的精神实质而言，鲁迅是道家思想最坚决的反对者，因此把老子说成是他的自况是他所不能同意的。就对现实的态度而言，应当说，他更倾向于孔子式的积极进取，只是相反的与“朝廷”对抗而已。而老子式的“‘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满口空谈，不做实事，与他印象中的左联的一些领导者倒是十分近似的。

关尹喜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政客式人物。在全篇里，除了一声吆喝以外，并不显得凶险，但比起周围一类的角色，却是城府甚深的。当远走流沙的老子来到关上，他听到报告，见面就即刻滚鞍下马，说是“机会难得”，躬请“老聃馆长”到关上讲学。然而，还不待回答，四个巡警就把老子扛上牛背带走了。为了郑重，讲学的时候，关尹喜让巡警、签子手、探子、书记、账房和厨房全来听取“教训”。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安排，作为导演的关尹喜不是不知道。要老子写讲义的事情他不在场，实际上，仍然是出于他的意旨。所以，当老子交稿的时候，他显得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又非常惋惜，坚留多住一些时，看见留不住，才又换了一副悲哀脸相，答应了，命令巡警给青牛加鞍。一面自己亲手从架子上挑出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来，送给老子做路上的粮食，并且声明：这是因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优待，假如他年纪轻，饽饽就只有十个了。

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得体，无可挑剔。直到老子走后，他才解下了虚假的面具。这里，他的所有议论、作为，都几乎无一不暴露着内心的阴暗。

关尹喜让老子折腾了那么长时间，让公家花费了不少的饽饽，按理应当非常珍重《道德经》讲义稿，其实不然。小说的最后一段，就是写他把两串木札“放在堆着充分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一个令人颇为费解的问题是：既然关尹喜如此作贱哲学手稿，那么又何必装得那么认真的留老子写它呢？在这里，“充公”的字眼是很可注意的。关尹喜打发老子的时候，所选的饽饽恰恰也是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的。表面上，关尹喜不徇私情，不谋私产，一切为“公”；而骨子里头，却掩藏了更大的私欲，即盗名欺世。为做官而做官，这是有别于《理水》中的大员的又一类官僚的哲学。

有人认为，鲁迅在借关尹喜讽刺傅东华。的确，译文事件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憎厌一些人的精于算计，善于盘剥。此外，文坛中的作家阀倾向也是他所反对的。然而，即使关尹喜的形象构成借用了与傅东华有关的细节，也并不等于傅东华。鲁迅是向来不用单独的模特儿的。倘要从某一具象中寻出原型来，在鲁迅的小说中是不易做到的；尤其是这类的新编故事，一个人物，往往身首异处。在《出关》中，关尹喜是把握着一定权力的人，如果把作为关官的关尹喜同老子的部分表现结合起来，或许倒可以看做在实际生活中，致使鲁迅不得不横站相向的“工头”、“总管”式人物的肖像画。

《起死》里的庄子，其唱高调与老子相近，无赖之处颇类小穷奇，而善于做戏，又很像孔子和关尹喜。杂取了种种人而合成的这一个，从整体上，则更具“第三种人”的特色。

庄子说：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奴才也就是主人公。这种相对主义的理论，是必然导致“做人要圆滑”的处世哲学的。司命知道他能说不能行，于是使一个在庄子看来不知是活是死的骷髅还原成一个汉子，赤条条的向他索取衣服。开始时，他指责汉子“糊涂得要死”——“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待到被汉子缠住不放，他就威胁说要把汉子扭去见保甲了。最后，当汉子揪住他，并且扬言要揍死他时，他便图穷而匕首见，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吹起来，巡士应声跑来以后，他任由汉子与之互相纠缠，自己竟逃之夭夭了。他身为“隐士”，却一心见王者；以超脱自命，却备有警笛，趋附权门，实际的寻求庇护；斥人为“利己主义者”，自己倒是自私至极的小人，所谓“彼亦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十足的滑头主义、机会主义，无非借貌似客观、辩证的理论掩盖自己的实质性倾向罢了。

鲁迅指出：“我们的有些人，阵线其实倒和他及第三种人一致的，虽然并无连络，而精神实相通。”可以认为，庄子形象的创造，是包含了鲁迅对“第三种人”，以及在左翼文艺队伍内部，鼓吹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一类人物的憎恶和讽刺的。

这几个小说，形象地凝聚了他在这一时期里的紧张思考，和深受压抑的战斗激情，它们在短短一个月內完成，足见其中人物，在他的胸中已经存活许久了。

1936年1月，他把它们，连同数年前写作的同类故事编在一起，交由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故事新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小说集。

鲁迅的处境越来越艰困。这时，连可供发表作品的地方也变得非常有限了。

《申报?自由谈》、《太白》、《涛声》等都已经停刊，有些刊物，如《现代》、《文学》则是他主动退避的，个别的像《作家》虽然保持着正常的联系，但也渐渐不满于它的平和，过多的从营业上着想，以致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而排斥一同进军者。

外力的围剿且不必说，他的过分的坚持与执著，就要把他逼到一个孤独者的位置。他要求太高了。曲高和寡。

对于杂志，他还是很想由自己来办，就像当年办《莽原》一样。这时，恰好萧军和聂绀弩都写信给他说要办刊物，他担心这样会分散火力，便建议他们同胡风合在一起来办。大家同意了。于是，聂绀弩找曹聚仁出面负担编辑和出版的法律責任，虚拟了“史青文”的假名字做编辑人，“海燕文艺社”发行，总代售则是“群众图书公司”。解决有关“钻网”的必要的技术性問題之后，由胡风把稿子集合，刊物很快就出来了——《海燕》。

刊名是胡风提出来的，鲁迅所写，借用的是高尔基的同名散文诗的寓意。可以说，这是鲁迅继《萌芽》、《前哨》之后在左联内部，同青年奴隶们一起战斗行动的又一新计划，但也是最后的计划。

第1期，他送去小说《出关》和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七）》，还有两则小杂感，以及瞿秋白译的高尔基的文学论文。第2期，他又为刊物续写了《“题未定”草》的两章，为日本读者写的文论《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还有一篇因被审查机关禁登而搁了一年多的随谈《阿金》。此外，还有两篇小杂感。他是尽了全力支持这个刊物的。

《“题未定”草》最后四章，提供了知人论世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与他看重时代与人民的整体的价值观念相联系的。在文章中，他批评了各式的说梦者，痛斥了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无聊，无耻与下流的“文学”，鬼蜮，变节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评述一个伟大的天才作家因专制时代的重压而被扭曲了的残酷的事实，与此同时，严正指出中国“一般的人们”是没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百分之百的忍从的，“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他说：“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这是一个天才的发现。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他从来反对调和和统一；在这里，也多少可以窥见他在日益变得响亮的“国防文学”的口号面前拒绝参与的实质性的东西。《阿金》借说俗事而论国事，全篇充满机警的隐喻。的确，所写是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然而她所具有的足够闹出大乱子的威力全在于主子是外国人。身为奴才而以主子自居，阿金可谓画出了某些中国官方人物的嘴脸，同时隐含了将为“自己的主人所回复”的悲剧命运。难怪它要遭到扣压，鲁迅自己就怀疑，审查官是认定他讽刺宋美龄的。另外的四篇小杂感，或抨击专制主义，或反对奴才思想，大都是同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专制中国这一大环境相关的。在这一时期，他特别喜欢谈论主人与奴才变节者一类名目，应当是很引人注目的。可是，人们却偏偏忽略了这些文字符号后面的伴随着灵魂震颤的伟大而深刻的思想。

《海燕》第2期出版后，政府有关方面就马上找曹聚仁算账了。这时，曹聚仁不得不把他知道的关于刊物的情况说了，并且声明不做它的发行人。

事后，曹聚仁写信给鲁迅作了解释。鲁迅答复说：“我不会误会先生。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

此略小节而取其大。”他是始终把仇恨投向统治者社会的。

但不管如何，《海燕》再也无法呼啸着飞翔了。它永远消失了。四围所看到了，依然是一片翻滚的乌云，喑哑的大海，灰的低矮到快要贴近波涛的天空……

## 十六、 反抗死亡

在最后的岁月里，他横站着作战，瞻前顾后，格外艰难，终至于在心力交瘁中仆倒——

然而，无声的中国，犹在倾听他的日夜呼啸的灵魂……

### 119. 冯雪峰返沪·“两个口号”论争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

他此行担负着共产党中央给的四个任务：一、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获得的情报及时报告中央。二、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三、了解和寻找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为中央下一步恢复上海党组织的工作做好准备。四、附带管一下文艺界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行前，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几次嘱咐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待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

到达上海后的第二天，冯雪峰立即来到鲁迅家里。这时，鲁迅同许广平看电影去了，幸好老女工还认识他，便把他领到二楼去。在静候的当儿，他总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想象着别后几年第一次见面的愉快的情景。

终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冯雪峰立刻站起来，迎上前去同上楼的鲁迅握手。客人的突然出现，并没有使鲁迅感到特别兴奋。他不习惯地伸出手来握了握，就抽了回去，悄然说道：“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这倒是冯雪峰没有想到的。

当晚，冯雪峰留住在三楼的后楼，直到两个多星期以后找到了房子

才搬走。住下来以后，冯雪峰才发现，先生的精神面貌起了相当大的变化，虽然仍然固守着人格中的那些最基本的成分，而某些信念却遭到了损害。

冯雪峰认为有必要向鲁迅灌输更多的光明的、乐观的信息，因为他一直置身于黑暗的包围中间，要完全避免压抑的情绪是困难的。晚饭前和吃晚饭的时候，冯雪峰滔滔不绝地谈苏区，谈长征，谈党和毛泽东，还有目前的政治形势以及党的最新制订的策略，全都告诉了他。他微笑着，一面慢慢呷酒，撕火腿，不发一言。只是临末，他才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么一句：

“你们从那边打过来，该不会首先杀掉我吧？”

横站的士兵/反抗死亡人间鲁迅（下）晚饭后，继续着同一主题的谈话。鲁迅在藤躺椅上从容地抽着烟，脸上泛着酡红，不知是因为烧酒或是话题本身的刺激，样子颇有点亢奋。但当冯雪峰停止了说话，微笑着期待着他的反应的时候，他却又用嘲讽的口吻说话了：“看来，我可真的要落伍了……”由于冯雪峰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处境，不明白他的感慨到底从何而来，一时没有话说；而他也并不需要什么回答似的，自说自的话。他说话时很平静，简直让人怀疑，他在独自赏玩着他的牢骚：

“近来我确实觉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么地方玩玩去，什么事情也不做……”

“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

“……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

牢骚话说得多了，便不能不引起冯雪峰的注意。

可是，鲁迅又好像不以这样的牢骚为然，偶尔也会说些笑话，缓和一下空气。最后，他还说了他很想到什么富翁家里去做门房的话来，认为那是最省力和最不会惹是生非的职业，说得自己也笑了。

“不”，冯雪峰接着说，“那也不见得安静，人家哪里会打听不到呢？鲁迅做门房——又是小报最好的题目！那时候，将会天天有人访问你，人数加起来，肯定比到动物园里看动物的人还要多！”

说罢，两个人就忘记了一切似的高声哄笑起来……

哄笑过后，鲁迅忽然记起了什么，起来走到桌子跟前，检出两年间他所印的画集和插图的书，送给冯雪峰；接着说起他正在编校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的事情，这时，冯雪峰也就把瞿秋白在瑞金时的情形，以及被捕和就义时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

第二天，鲁迅比往日起来得早，9点过后，就衔着纸烟上三楼看冯雪峰来了。这时，他谈得最多，大约在他的观察中，冯雪峰同周扬他们毕竟不是同一气类的人，是可以信赖可以说话的吧。他毫无保留地倾泄着对周扬、夏衍和田汉等人的不满和憎恶，在列举他们的种种表现以后，就不只一次地说着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一群‘战友’！一群‘指挥家’！……”说的时候，有时皱着眉头，有时又流露出轻蔑的态度，并且加以哄笑。最令他气愤的，是因为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和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而遭到的各种攻击。他说：“‘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又说：“还提出‘汉奸文学’，这是用来对付不同派的人的，如对付我。你等待着看吧。”他还告诉冯雪峰：“我曾经几次被指为‘汉奸’，去年小报上又说我将要‘投降南京’。现在，他们又说我‘破坏国家大计’，‘托派’……”

关于生活书店、《译文》，以及茅盾日渐疏远他的情况，他也都说了。他并不想到要冯雪峰为他做什么事情，他说起这些，仅仅出于一吐积闷的愿望而已。孤独是一种哲学。他不需要借助任何力量拯救自己，而且根本不相信存在这样的力量。

冯雪峰不愧为党的忠实的卫士。对于鲁迅，他一方面力图以党的政策立场影响他、改造他，使他符合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标准要求，符合某种规范；另一方面又把鲁迅当作战斗的工具，武器，一种伟大的力量加以利用，以实现党的战略意图。在他返沪以后，鲁迅实际上成了统战的对象，同时又是统战的力量。当然，鲁迅始终没有忘记坚持自己，例如加入文艺家协会一事，就拒绝了冯雪峰的劝告。鉴于斗争情势的逼迫，他也不是没有过任何克制，迁就，或妥协的地方。如对茅盾、对郭沫若、对周扬，甚至关于“托派”一类时行的提法。但是，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放弃一贯的原则。无论是个人的人格，还是大众的利益，都不许蒙受损伤。

按照原定计划，冯雪峰很快同茅盾见了面。一个星期之内，他还会

见了宋庆龄、沈钧儒，以及史沫特莱等人。关于上海文艺界，他了解到，茅盾的基本倾向接近周扬，而与胡风相对立。对于胡风，茅盾竟毫无掩饰内心的不满情绪，这是他所意想不到的。

最早见到的党员是周文，其次是王学文。大约过了二十天左右，冯雪峰请王学文约周扬见面，周扬拒绝了。周扬不相信他是从陕北来的，要他把证件拿出来，并且散布说他“假冒中央名义”、“钦差大臣”、“勾结胡风”、“假借鲁迅名义”等等。其实，冯雪峰遭到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他来到上海以后没有首先找周扬和“文委”的人，而先找了胡风，特别是没有同他们商量之前，就和胡风商量提出与“国防文学”口号相对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显然，周扬拒绝会见是对冯雪峰的抗议。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纷争的文坛，应当如何动作呢？冯雪峰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体验，心里颇感为难。

从个人情感上说，冯雪峰是偏于胡风而远离周扬的；从党性原则上说，周扬的确有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但是，“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有号召力的，事实上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把它当作一面旗帜挥舞，容易投合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统一战线”的名义底下，可以网罗许许多多人物，包括左翼文坛的反对者。作为一种现象来看，又有谁说得清楚权力欲和革命性的区别呢？周扬长期担任左联的领导人，左联解散以后，他不但没有失去如鲁迅所说的“元帅”、工头、“总管”的位置，反而扩大了影响，而几乎覆盖了整个的上海文坛。局面已经形成。在与周扬为代表的错误倾向做斗争的同时，是必须注意维护党内的团结的。不要一下子就搞乱了。平衡斗争与团结是一门吃力的艺术。说到底，周扬还是同志。

从思想到行动，冯雪峰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士。他首先是属于党的，然后才是个人的。以同周扬斗争的全部情况来说，他既是新口号的制订者、论战的参与者，又是中间的调停人。而这，也正是他与鲁迅所表现的很不不同的地方。

胡风是在内山书店得知冯雪峰返沪的消息以后，主动到鲁迅家里看望他的。

征得冯雪峰的同意，鲁迅让许广平把胡风引到楼上。这时，他们正在静静地谈话，招待胡风坐下后，又继续说下去。

前几天，中央特科的吴奚如要胡风替军委向鲁迅要了三十元钱，然后把一个小纸卷给了胡风，算是收条。胡风把这收条交给鲁迅，鲁迅连看也不看，就把它放进烟灰缸里。

冯雪峰用谈闲天的口气谈长征情况，谈党内斗争，和毛泽东从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策略和顽强的性格。他说：“周先生的韧战精神，后继有人了……”

对于毛泽东，他是十分佩服而且友善的，并且力图以此感染和影响鲁迅。所以，才有了以鲁迅的名义赠送火腿，在他代鲁迅草拟的公开信，以至后来的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写上毛泽东的名字一类事情。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工作者到走过二万五千里路的革命实际工作者，他不能不为领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而对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一切生成物，包括思想意识的透彻理解，他究竟缺乏一种更为宏放的超越的目光。

次日，胡风如约去看冯雪峰。话间，提到“国防文学”口号，冯雪峰觉得不大好，还说潘汉年也觉得不妥当，让胡风提一个口号试试看。胡风想了想，提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文学”。冯雪峰说，不如用党中央提的“民族革命战争”，“人民文学”则改作“大众文学”。胡风说，“大众文学”在日本是指类似中国鸳鸯蝴蝶派和武侠小说的，冯雪峰认为，以前有“大众语”、“文艺的大众化”的说法，有一定基础，加上在正确的意义上使用，是不至于引起误解的。

又过了一天，冯雪峰告诉胡风，口号确定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周先生也同意了，要胡风写文章正式提出来，当晚，胡风翻阅了手头的有关材料，便以饱满的激情，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文章针对“国防文学”口号在政治原则上的阶级投降主义和在文学思想上的反现实主义，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现实的生活基础，以及反映在文学方面的新的美学基础。它着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该说明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说明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谁是组织者，谁是克敌的主要力量，谁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民族奸细。文中强调作为反帝运动的最高形态的民族革命战争，以及以民族革命战争为统一主题的文学同人民大众生活的血缘关系。

胡风把文章送给冯雪峰，冯雪峰不作任何改动就交还了他，并说鲁迅也看过了，认为可以，要他找个地方登出。结果，他交给聂绀弩，转给《文学丛报》发表了。

徐懋庸以同样的题目，著文在《光明》予以反击。他责问在提新口号的同时，为什么只字不提“国防文学”口号，说：“这在胡风先生，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文章仍然是这样一种逻辑：我们的民族革命战争乃是国防战争，需要国防政府，所以文化工作也需发挥国防作用，文学之应为“国防文学”，其理自明。

半个月以后，周扬同在《光明》发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对胡风作了同样的指责，说“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可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

胡风感到有责任再作一些解释，正当他试图撰文反驳时，被冯雪峰制止了。

冯雪峰说，沉默有时是最好的回答，一切由他调整处理，胡风服从了。冯雪峰担心把事情闹大，给“统战”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其实，应当说，他是力避同周扬们发生正面冲突的。前些天，他曾通知胡风说已特准入党，并在组织上和他单线联系，但是后来又说党内难搞，让胡风留在党外。显然，他有他的难言之隐。

此前，徐行有文章批评“国防文学”口号。虽然文章强调斗争而否定联合，存在着如其他一些“彻底”论者的不切实际的缺陷，但是其对大有产者的揭露，和对穷苦大众的反帝力量的披示，无疑地给了“国防文学”口号以有力的针砭和补正。此刻，“国防文学”派的所有枪头，都从徐行那里掉转来对准胡风，和由他著文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至此，正式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烟腾雾罩的所谓“两个口号论争”的帷幕。

胡风是沉默了，但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也都陆续在《夜莺》、《现实文学》、《文学丛报》上发表；《夜莺》还出了一期“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徐懋庸和周扬的文章一发表，同类的文章也就纷纷出现在《文学界》、《光明》等刊物上面，以及于日本东京《质文》；《文学界》也出了“国防文学特辑”。比之对方，攻势愈加猛烈。

这时，冯雪峰觉得很棘手，甚至有些惶然。

当胡风的文章还未发表以前，文艺界便已经引起了有关新口号的各种议论，有说口号是陕北来人某某提出的，有说胡风提的口号是陕北来人批准的，有说是请示过鲁迅的，不一而足。“国防文学”派的文章有许多反对胡风的话，其中有不少是针对鲁迅的。这样，他，还有鲁迅，便同胡风的名字一起，被连带扭到两个口号的纷争里去了。

他的任务本来是搞统战工作的，结果是分裂和对立的情况更为严重。然而，撒手不管已不可能。作为调整手段，除了压胡风以外，就是通过王学文，或者茅盾，劝告周扬从根本上改变对鲁迅的态度，不要再散布说鲁迅“反对统一战线”之类的话。对于口号问题，也从原来的立场上退了一步，试图采取正确解释“国防文学”口号的办法，以期达到和新口号同样的目的，于是提出两个口号并存一说。最重要的是，借用鲁迅的威望，动员鲁迅正面发表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无论如何，鲁迅的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就在这个最需要旗手的时刻，鲁迅病倒了！

也恰好在这个时候，鲁迅收到一个署名“陈仲山”的来信，以及附寄的刊物。此前，不是有流言说他是“托派”么？如今“托派”果然找上门来了，可见影响之巨。他从来无党无派，十年前就明确反对许广平加入严密的政治团体，现在竟然有人拿什么组织的罗网来套他，怎么不叫他愤怒呢？

来信首先反对的是“斯大林党”、“莫斯科官僚”，其次是“中国康缪尼斯脱”，再就是联合战线这“背叛的‘新政策’”。在苏联，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虽然没有开始，但是在显示着卓著的建设成就的同时，确也并存着不少制造冤案和死亡的事实。由于后者尚未成为足以威胁全社会的重要趋势，因此，在苏联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包括为国民党政府所敌视的情况下，维护苏联的声誉仍然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责任。对于苏共党内的派别斗争，鲁迅应当有所了解，不管他的留苏朋友对此做出怎样的反应，至少他的书账中就列有《论新反对派》的书目。但是，现在不是全面评价托洛茨基，“托派”，以及苏联党内斗争的时候，重要的是打破关于“托派”的流言的包围。他必须一边倒。斗争的情势不容许他有片刻的犹豫或耽搁。而到了需要公开表态的时候，他也决不会像一些聪明的理论家那样只说些不着边际或模棱两可的话。关于政党，他所重视的并非纸片上的纲领，而是政治实践中的表现。在中国，比较在朝的

专制腐败的国民党，他只能选择在野的，至今仍在为人民大众的事业而流血奋斗的共产党。即使在实际生活中出现周扬一类共产党员的纠缠，也未致改变共产党在他心目中的整体形象。他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论及“党社”，说是应当以“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为判断根据，不会是无的放矢的。对来信称共产党把战略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的政治军事路线为“军事投机”，他是不以为然的。他不满意这种类乎诬陷的说法。为什么一定要仿照苏联十月革命的范式呢？他最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现代统治者。虽然，“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将会在未来的历史上出现许许多多难以克服的弊端，但是，道路别无选择。而这些“中国的康缪尼斯脱”，却的确是在踏踏实实地战斗着的。对于战斗的人们，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如果说到民族的希望，希望不在这里在哪里呢？难道可以指望一个以屠杀同胞为惟一事业的政府，统领整个民族去抵御外侮？他们不是早就把自己的民族推向黑暗的深渊里去的吗？

关于战争，鲁迅曾经指出：“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所谓“国防文学”，其“国防”不也正是对他们的指挥权的确认吗？“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这样的“联合战线”不是他所能接受的。从前，他在《〈行路难〉按语》中写道：“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否则，此后是洋人和军阀联合的吸吮，各处都将和香港一样，或更甚的。”作为奴隶的一群，不但不去努力争得自己的基本人格、基本权利，反而出让这种权利！一个丢失了个体人格的国度，有什么可能赢得独立健全的“国格”？

然而，争取个体人格并不意味着对联合战线的否定。惟有联合战线的力量才有效地阻遏、抵抗政治当局的叛卖行径，有效地打击侵略者。重要的是，在联合的同时，必须确立它的主体和核心，不要由自己出卖自己。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谁也不会赞成取消联合战线的，为什么要如此嫉恨联合战线呢？

在接受《救亡情报》记者的采访时，鲁迅对于联合战线的态度，已经有了再明确不过的表达。他说：“民族危机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战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义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覆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因为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当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所谓“最正确，最现代”的民族解放斗争，就是同

社会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斗争，是人的解放的斗争。

基于这种思想，他同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领导权”问题，对他来说，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的口号，就不但是几年来的普罗文学的合理的发展，而且应当是一定程度的由于前者的偏枯，以及其他原因而致濒临中断的以“人的文学”为标志的五四文学运动的启蒙精神的连续。他的思想深度，超越了具体的现实政治而到了无人追及的境界。即使冯雪峰，即使胡风，或者侧重于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或者侧重于反对国民党政府，都无法对这样一颗伟大的心灵做出全面透彻的理解。

某种程度的隔膜，误解，善意的利用，在他都可以想见的，可以接受的。最令他愤慨者，是有意的歪曲和无耻的诽谤，而且竟出于“同人”！现在，叫“陈仲山”的不就找上门了吗？“托派”居然把你引为同志，向你表示亲热，你有何话说呢？

一天下午，冯雪峰去看他。他见到冯雪峰进门，马上从床上竖起身来，探手到枕头底下取出“陈仲山”的信和随寄的几本刊物，递给冯雪峰说：“你看，真的来了！可恶不可恶！”

冯雪峰来前，便打算劝他就统战问题发表一个意见，这时正好碰上了机会，读罢信，随即鼓动说：“他们自己碰上来了，就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吧！”

鲁迅说：“让你处理吧！”

冯雪峰回到自己的寓所，立即代鲁迅拟了一封回信。写好以后，便约了胡风夜里一道去见鲁迅。这时，鲁迅的病情很严重，静静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听得冯雪峰念完以后，没有说什么，点点头算是表示同意。他从中注重的只能是大的方面，实在无暇顾及任何细节了。

鲁迅的同意鼓励了冯雪峰，回去后又用鲁迅答问的形式拟了《论现在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试图总括鲁迅，实际上也是他所要求的关于两个口号的意见。其中说：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流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

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立场。第二天夜晚，冯雪峰带上稿子，又约了胡风一道去见鲁迅，念给鲁迅听。鲁迅依然没有说话，只略略点了点头。

关于口号，本来他无须再说什么。提口号发指示一类本不是他要做的事情。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做是运动的领袖。他重视的是实做，何况对此早就表示过自己的态度。但是，既然冯雪峰出于工作的需要，认为有必要由他再声明几句，那么就再说一回吧。文稿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总的口号，“国防文学”是随机性的具体的口号，又说两个口号并存是无碍的、有益的。这种表述符合他一贯的开放态度。左联解散了，虽或说新口号可以算作它的灵魂而存在，然而，这灵魂是只能以自身的强壮吸引和改变异己者，而不是排斥异己者的。他重视实质性的问题，可是又并不主张把所有作家“统一”到一个口号之下，尤其是文学思想，那是无法以同一个模式来规限的。无论批评或创作，文学应当有着非常宽广的道路。对于冯雪峰来说，从原来提出新口号以代替旧口号，到主张两个口号并存，则多少融合了协调文艺界关系这样一种实际的考虑。他们在步调一致的情况下，反映了十分微妙的差异。又如对周扬的批评，鲁迅始终没有放过人格方面的审视，正如当年批评“创造脸”一样，而冯雪峰则完全出于党内的思想原则的斗争。

两篇文章都署名O.V笔录，故意使人猜想是胡风的笔名谷非的头字，免得怀疑到是冯雪峰自己。看来，他现在每走一步都颇费苦心。

文章在创刊的《现实文学》中同时刊登了出来。为了扩大影响，冯雪峰还送到周扬等领导的《光明》半月刊去，但是被拒绝刊登。后来，他找了茅盾，又请托茅盾把文章转给周扬、徐懋庸主持的《文学界》。结果，《文学界》只登了其中的一篇，即《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排在后面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但是，跟着排了茅盾以致编者信的形式写成的对于此文的解释，再就是编者写的《附记》，说明编者实际上仍然是重视它的。

茅盾假借胡风的文章引起青年方面的疑问和不安这一情况，努力表明胡风的“缺陷与错误”。他提出一个简直无懈可击的观点，说“口号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口号的力量，在于给它的解释者如何以及它的正确的运用”，实际上是要保持“国防文学”口号已经占得的地盘。

《文学界》的编者按走得更远。它一再指责新口号的提倡者对“国防

文学”口号采取无视的态度，还说新口号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大背“统一战线”的原则。编者利用鲁迅的名字作为招牌，却以摘句的办法歪曲了鲁迅的基本意向。如果说，茅盾的文章以拥护两个口号并存的方式肯定“国防文学”口号，那么编者按则以“阶段的特殊的现实”推翻并存说，维护“国防文学”口号的正统地位。

鲁迅的文章发表以后，赞成的文章并不多，而宣扬“国防文学”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却连篇累牍，有增无减。

上海是两个口号论争的漩涡中心，但是波及的范围很广，远至日本东京，也都引起过不小的骚动。

东京左联支部建立于1933年秋冬之际，由魏猛克、陈辛人、欧阳凡海、黄新波、林焕平等流亡青年逐步组成，长期以来，一直被置于周扬的领导和影响之下。1935年7月，任白戈就是受命到日本领导东京支部的。在一个短时间内，还仿照上海方面的机构模式成立了文总，把左联、社联、剧联、学联等工作一并统了起来。

左联相当活跃，经常举办文艺座谈会和各种活动，先后出版的刊物有《东流》、《杂文》、《质文》等。大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的郭沫若，成了左联盟员和留学生群的精神领袖，他住在千叶，不时出席左联的聚会，指导工作，甚至修改文章。刊物约他写稿，丛书要他作序，是从来没有被拒绝的。

几乎与鲁迅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的同时，郭沫若在上海《文学丛报》和《文学界》分别发表了《在国防的旗帜下》和《国防？污池？炼狱》。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初稿，是作者认为有必要改变笔调而“流产了的东西”，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文中，他把“爱国”分为两种，凡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其主张“爱国”，所爱的自然是帝国主义的国，可称为污池式的爱国主义者；而生在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大家觉醒起来要认真地爱国，那么所当取的必然是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是炼狱式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除了像“国家主义者”等替“强权”做内应工作的“国贼”以外，都可以看做是炼狱式的爱国主义者的。所谓“国防”，是由救亡运动，即积极的反帝运动的大联合，而目前文艺界树起的“国防文学”的旗帜，得到多数派的赞成，正是广大的统一战线，它的出现，是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的。因此，

他建议把“国防文学”进一步扩张为“国防文艺”以期团结更多的文艺家，他认为，“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关于文艺创作，他反对一色的涂抹而主张多样的统一，表现了一个富有创作经验的诗人的识见。但是，以“国防文艺”的口号统一作家，毕竟为宗派主义留下了可容隐匿的洞穴。实际上，他在文章中也都流露了这样的倾向，把怀疑和反对“国防文艺”口号说成是“对于统一战线不肯积极地参加”，是一种带白手套革命的“洁癖”。所以，他最后颇带挑战意味地说：“前进的主义不是跨在云端里唱出的高调，不是叫人洁身自好地在亭子间里做左派神仙。请大家把‘白色的手套’脱下吧。”

“左派神仙”当是有所指的。恰巧，在三年前的一封“假名夹杂着真名”，其中有“郭冰若”者攻击鲁迅的公开信里，就曾经出现过“戴白手套的革命论”之说。

稍后，郭沫若又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东方文艺》表示了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

在答问中，他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国防文学旗帜下边的”。其实，周扬等在正式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时就已征得了他的同意。他说，因为在政治方面，早就有国防政府的提倡，文学界的人，又以国防作为联合战线的标帜，所以得到多数派的同意是当然的。他批评了对国防文学的不信任态度，特别严厉指出：“更有一部分人，标新立异地提出了什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来和国防文学对抗。这些都很明白的是错误的理论和举动。”

这时，周扬找人写信给东京支部，要他们对“国防文学”口号表态。魏猛克和任白戈去找郭沫若商量，决定召开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的发言一致支持“国防文学”口号。郭沫若亲自把会议记录编成专辑，名为《国防文学集谈》。

在这篇“集体论文”中，要点也无非辩护“国防文学”口号，以及批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扰乱和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比起论战的其他文章，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其中，郭沫若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他以插科打诨的态度，嘲笑了据说是由什么“理论家”编出来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高度评价“国防文学”口号对巩固统一战线的作用。话间，他还把夏衍的《赛金花》和洪深等的《走私》两个剧本看做是国防文学的重要建树。当与会者一致指责胡风的时候，他惟一的一个批评了鲁迅，说：“鲁迅先生把国防文学分为岳飞式

与非岳飞式而立在后者的立场，我看这里有点语病的。我们应该分为‘真岳飞式’与‘假岳飞式’。真正的岳飞我们是应该欢迎的。”应当说，他所批评的并不仅仅是所谓的“语病”问题。在这里，“岳飞”是一个符号，是某种意识的代表。对“岳飞”的欢迎与否，表现为民族救亡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在郭沫若的发言之后，林林附和说：“郭先生所说的岳飞和鲁迅先生所说的岳飞不同，我们欢迎郭先生所说的岳飞！”

这不是没有根由的。在此以前，“国防文学”派还曾召开过几次大型的座谈会，讨论“国防文学”问题，《赛金花》的评价问题等。以集团行动的方式，人为地强化某种理论的优势，实为四五十年代以后文艺批判运动的滥觞。这时，为郭沫若在会上所推崇的《走私》，也是最初的集团创作。

集团势力是可利用的。以政治手段推行文艺运动，是一大发明。

茅盾读到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其时正在病中。他觉得文章对“国防文学”的解释很有见地，于是引发了他的思路，认真比较了两个口号的不同：“国防文学”是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是对左翼作家说的，是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

其实，对于两个口号的实质性的区别，茅盾仍然缺乏透彻的理解，也就是说，他至今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最初作为“国防文学”口号的拥护者的立场。

冯雪峰探看他时，对他说，读过一些论战的文章，总的印象是周扬他们没有要停止论争的样子，对鲁迅和他的意见并不尊重。又说，他们反对两个口号并存，是排斥不同意见、“只此一家”的宗派主义。他说，胡风他们有宗派主义，而周扬他们又以宗派主义回敬。冯雪峰说，目前要害是周扬他们的宗派主义。

说到对两个口号的解释，茅盾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把“国防文学”看做创作口号是欠妥当的，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冯雪峰听了，建议他写一篇文章把这个观点提出来。

文章由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弟弟孔另境草拟了初稿，标题定为《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初稿基本上把茅盾的意见写进去了，只是对周扬的批评严厉了一些，而且还点了徐懋庸的名。茅盾觉得不妥，在草稿

上作了修改，加重了对胡风的批评，删掉了对徐懋庸宗派主义的批评，对周扬则着重指出他把“国防文学”作为创作口号的危害性。此外，文章还表示，希望善于“内战”的朋友即速停止“内战”。

文章由徐懋庸在《文学界》登了出来，但是，紧排在本文后面的便是周扬的反驳文章：《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原来编者把原稿先送了周扬审阅，所以文章还未发表，反驳的文章就已经写好了。这种“内定”的作法，也未尝不可以看做是一种发明。

周扬全盘否定了茅盾提出的观点，坚持“国防文学”口号既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又是创作活动的指标。他反对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运动。他是始终不忘把“国防文学”同“统一战线”联系在一起。他批评茅盾滥用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等等的名词，对于茅盾在文中阐述的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作家在创作上需要更大自由的观点，也同时给予驳斥，并引用高尔基的话说：“创作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绝对的创作自由的说法是有害的幻想。”

周扬的文章和《文学界》编者做的手脚，使茅盾十分恼火。本来，他是站周扬一边的，即今的对于两个口号的解释，也不过对“国防文学”口号的一次小小的修正和补充罢了。他根本想不到周扬会如此拒绝他的意见，而且，如此地急于反驳！

这时，冯雪峰又上门做争取工作来了。冯雪峰对茅盾说，你主张对他缓和，现在该有了教训了。目前阻碍文艺界团结的是周扬，是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胡风是错误，但我批评了他，他就不写文章了；而周扬，谁的话都不听，自以为百分之百的正确。于是，建议茅盾再写一篇文章，把主要问题放在周扬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上面，集中予以反击。

茅盾同意了。

这回的题目叫《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文章送到《生活星期刊》时，正当鲁迅的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在《作家》上发表而引起轰动的时候。邹韬奋婉转陈词，建议茅盾不要发表，还劝告说是以不介入文艺界的纠纷为好，茅盾坚持发表，说周扬连调解人都打了，是非答复几句不可的。

文章发表后，周扬再没有回答。在周扬看来，茅盾是出卖他的人，因此特别忿恨。一天，他同苏灵扬、周立波、沙汀等四人一起拿了棍子，要到茅盾家里去揍茅盾一顿，恰好被夏衍遇见，当场阻止了。也许，周扬最终觉得棍子和文章都不见得奏效，所以才放弃了。

## 120. 万言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发表后，鲁迅以为文章总算较为清楚地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多少澄清了一点容易引起混乱的思想理论上的问题，对于类似“托派”、“破坏统一战线”等横加于自己的罪名，也都因此一并有了辩诬的机会，应当可以有安静一些的时候了，想不到英雄们不但没有退隐，反倒更为神气，雄赳赳地打上门来。

是徐懋庸的一封信：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晃晃，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朋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全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

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真是骄横恣肆，达于极点！

信中虽然攻击的是巴金、黄源、胡风几个人，其实是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挑战，不放过任何异己者。写信的虽然是徐懋庸一人，背后却是一伙。他们何尝维护什么统一战线？白天里讲的冠冕堂皇，暗夜里做的又是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有左联的时候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忍耐了这么久，早就想做一篇文章，写它几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或也可以算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然而，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一直拖了下来。而今，箭在弦上，是不得不发的了！

就在鲁迅收信的当天，冯雪峰来看他。他余怒未息，一边把信递给冯雪峰，一边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不是挑战是什么呢？过一两天我来答复！”

冯雪峰觉得，这是公开批评周扬和解决两个口号纷争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是非答复不可的；但是，看鲁迅的身体远没有恢复健康，又因为六月间曾以“O.V”笔录的形式，代他草拟过两篇文章，还算符合他的意

思，看完信后便说：“还是由我按照先生的意思去起一个稿子吧。”

“不要了，你已经给我替过两次枪了。这回，我可以自己动手。”

临走时，冯雪峰仍然向鲁迅要了徐懋庸的信，说：“让我带去再看。”回到住处，当晚就动笔起草了一篇公开信模样的文章，用意是给鲁迅做个参考。如果可用，他想就这么发出去，省得让一个病人再耗费心思，而且也免得拖时间。

鲁迅看了拟稿以后，平静地说：“可以的，但我要重新写过。”隔了一会，又补充说：“前面部分都可用，后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来弄吧。”

过了二三天，冯雪峰再到他家里来时，稿子已经由许广平誊抄出来了。拟稿几乎全被红笔勾画过，还有整整四页，是他用毛笔在白宣纸上加写的。

全文的题目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前面部分基本上是冯雪峰代拟的，说的是鲁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关系。其中说这个口号是鲁迅提的，是冯雪峰有意借鲁迅的威望，以图缓和空气，停止国防文学派的攻击。鲁迅接受了这个要求，关于两个口号的解释，即使有些地方与本人的原意不大切合，鲁迅也没有作什么改动，只要在大的方向上没有太大的出入，就无须字斟句酌，尽可以让它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和完善。

统一战线问题。文章说：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无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文章对各种不同派别的文艺家表现得相当宽容，但是对动辄加入以“破坏统一战线”罪名的“指导家”，则是十分的严厉。文章说：“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两个口号问题。文章认为，问题不在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为了推动左翼作家奔赴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而提出来的。这名词在本身，比“国防文学”的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文中特别驳斥了“标新立异”的说法，说：“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

为了有效地孤立和反击周扬、徐懋庸等人，冯雪峰在拟稿中对茅盾和郭沫若有意做出让步和妥协的姿态。

文中有几处提到郭沫若，并且引用了他的话，其实不是不可以省略的，郭沫若明显地属于国防文学派，但是只要有那么一点意见，或几句说话是可取的，就立即加以利用。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一事曾经同茅盾商计过，算是冯雪峰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为了表明新口号在文艺界中的代表性，同时也为了表明鲁迅一向愿意同茅盾合作的态度，冯雪峰在拟稿之前和茅盾商量，要求同意有这样一个事实。既然冯雪峰以共产党和他个人的名义要求他，他也就同意了。此外，质问《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也的确是很牵强的。这里以几部名作并提，无非为了提高《子夜》的声价，以换取茅盾的好感，争取他对参加议决新口号一事的确认，和在实际行动中对新口号予以进一步的支持。

如果说拟稿的前面部分在于政策和口号的理论分析，倾向于理性的冷静，那么后面增写的部分则主要从事人格批判，充满着搏战的激情。

增写的部分是从这里开始的：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从此，在“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之后，又多出了一个新名词：“四条汉子”。

在交代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时，鲁迅更多地说到胡风，从而证明“田汉周起应们”的发昏、说谎、诬陷、造谣，如何的“左得可怕”。其中，“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这样一句近于定评的话，是原稿没有，后来加上去的。他严正声明说：“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友情之于他，其神圣并不亚于信仰。正由于过分地看重友情，所以才不惮于“同人”的背叛，“朋友”的反目，而至于珍爱孤独。

文章几次提到上海的一份小报《社会日报》。它任意诬陷鲁迅和鲁迅的朋友如胡风、巴金、周文等，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鲁迅在年初有信给茅盾说：“我已连看了两个月，未曾发见过对于周扬之流的一句坏话，大约总有‘社会关系’的。”这种关系无非是宗派关系，因宗派性活动而成文中所说的“天罗地网”。

宗派主义与权力的结合是十分可怕的。由于领导者的运动，于是才有了大布围剿阵的“群仙”，或是纠集在大纛之下的“群魔”。鲁迅多次在信中作过类似的表示：“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在这篇公开信里，他丝毫不掩饰对于周扬和徐懋庸的憎恶。所称无论是“文坛皇帝”、“奴隶总管”，或是别的什么名目，都无非说明他们实际上在维持某种旧式威权，不但于革命毫不相干，相反是可以将革命扼杀的。

他的憎恶是有道理的。在原稿的“周起应之类的青年”那里，他多加了一个“轻易诬人”的限制词。最后一段，在说到徐懋庸时，也加重了严厉的语气。“否则”之下，原稿为“只一味的这样卑劣下去，就毫无救药，这样的青年于中国毫无用处的”，终于改定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有害的。”但是，在批评的同时，也可看出鲁迅为人宽厚的地方。譬如原来“周起应如果肯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仍无妨碍他将来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一句，改成“自然周起应也许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便透露了内心对于青年的希望，虽然两个“也许”的使用，同时也强调了一种不信任感。至于徐懋庸，文中也把他同用谣言来分散艺术界的力量，近于“内奸”行为的“破落文学家”区别开来，说他“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虽然“已经糊涂得可观”。

严厉也好，宽容也好，当鲁迅从事批评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就不只

限于目前中国文坛的病象，中国的未来是他所忧患的。青年就是未来。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这样的大题目之下，罗织人罪，戏弄威权，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者乃至采取“实际解决”的行动，那么一旦放大了“领导权”，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多年以前说的“阿Q党”，岂非不幸而言中了吗？

最使他无法忍受的就是专制和奴役。他知道，在中国，“朕”即天下的皇权思想是如何的深厚广大，源远流长。所以，他在指出无凭无据，即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这种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的恶劣倾向以后，特别强调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所谓革命，就是人的解放运动。解放别人，也解放自己。如果在革命的队伍中复又产生新的“横暴”，就必须以新的革命手段把他除掉！人不是生而为奴隶的，自然也不是生而为“奴隶总管”的。人应当是，而且也只能是自己的主人！

这篇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问题，也超出了文艺问题。它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统一战线的个人宣言，是对于被诬枉的有为的青年的辩护词，是投向左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挑战书。

它一经发表，便被称为“万言长文”，立刻在上海、北平、东京文化界引起强大的反响……

这时，茅盾给郭沫若寄去一封信，希望他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能与鲁迅的步调保持一致，正确地引导青年，使论争早日结束。郭沫若没有回信。他不但没有接受茅盾的意见，反而写了一篇颇长的文章，明确地把矛头从胡风那里引向鲁迅。

文章在9月10日《文学界》1卷4号刊登了出来，题为《苗的检阅》。全文充满反语，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称作调遣大家作“现代的模拟战”，“把自己人认成为假想敌”，是有意挑起“文艺家的内战”。文中假借某些“朋友”对公开信的所谓“家丑外扬”、“使仇者称快”的评语，表明影响的严重性，从而要求撤回新口号！

郭沫若一再表示说，新口号的提出在手续上不完备，在意识上欠明确，是不大妥当而且没有必要的，不仅是“标新立异”而已。它的出现，使文学界起了一种类似离析战线的纠纷。他认为，鲁迅对两个口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不大妥当”的，因而“青出于蓝”的茅盾从那儿出发，

为安置两个口号的苦心也是空费了的。两个口号的对立之所以使人们感到棘手，都因为鲁迅的存在。因此，为了消除这种对立状态，只好由鲁迅主动撤回一法。这就是文中所说的问题的“明朗化”。他引用鲁迅公开信中的“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等语，进逼一步，说：“我据这些语句来推想鲁迅先生的意思，大约是在这场纠纷上，要叫胡风诸君委曲一下，让‘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继续着它的顺当的进展，而从此愈加‘实做’起来。假使我这个揣测是不错，我是极端赞成的，我想茅盾先生也不会有甚么不同意。”又说：“以那样见解，态度鲜明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决不会一意孤行到底，以不正确不正当的口号来强迫青年来奉行的。”又说：“像这样明达事理时常为大局着想的我们的鲁迅茅盾两先生岂肯在大家得到了明白的解决之后，一定要为争执一个口号使纠纷纠纷到底吗？……”

此外，文中还曲解了鲁迅关于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无条件联合的观点，以及茅盾关于“创作自由”的口号的阐释，不指名地攻击他们当人们“焦头烂额地从事着救亡的时候”，为佳人才子和鸳鸯蝴蝶派文学争“特权”，使之产生消极作用和负面效果。对公开信中提到的悔过转向的问题，也都有着别有意义的申说。他反对“把敌人的武器当成武器”。

这样的文字，是只有郭沫若能写的。直至现在，应当说，他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原来的“才子”气和“流氓”性。9月下旬，《今代文艺》以醒目的标题登出他的《戏论鲁迅茅盾联》：“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更为明显地反映了他的认识和心态。

茅盾不敢正视郭沫若的挑战，反而认为：“郭沫若先生的《苗的检阅》是‘澄清’空气的一大助力。”在《谈最近的文坛现象》一文中，他居然把郭沫若文内的称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一类反语当作正面的论点加以引证，虽然在文章的结尾，仍然坚持了他后来的意见，即两个口号并存说。

冯雪峰对茅盾的争取工作是有一定成效的，茅盾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立场的偏移，多少增加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影响力。然而，这样一来，也就造成了他在文学界中的尴尬地位。他本来是“文艺家协会”的中心人物，而周扬们的系列行动，在鲁迅、巴金等人看来是意在向协会以外的人们挑战的。因此，他势必要失去原来的大批簇拥在周围的人们。而当他倾向于新口号之后，又与胡风等不相融洽。处在宗派主义阴沟四布的地带，这个一贯精明而谨慎的人，便不能不考虑人

际关系的平衡，以防失足落水。

但是，在东京，一个统一的团体开始分化了。

“龟裂”的现象不是产生在新口号提出之后，而是在郭沫若建议撤消的时候，这也是颇带戏剧性的。东京支盟分成两派，魏猛克、陈辛人等表示赞成新口号。就是这个魏猛克，曾经撰文嘲笑鲁迅从“坟”里爬出来欢迎萧伯纳，还曾画过一张《鲁迅与高尔基》的漫画，把高尔基画得很高大，鲁迅画得很矮小，意在讽刺关于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说法。不过，后来总算彼此消除了隔膜。鲁迅的人格是具有感召力的。

随着形势的变化，文学队伍的变化，随着《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以及后来的鲁迅逝世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也就渐渐地自行消失了。

徐懋庸在乡下看到朋友寄来的载有鲁迅长文的《作家》，心里很不服气。回到上海以后，又遭到周扬、夏衍和从前左联常委会的几个人的批评，陷入了里外夹击的境地。

周扬他们认为徐懋庸给鲁迅写信惹了大祸，于是批评说是“个人行动”、“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等等。使徐懋庸不满的是，他们自己却毫无检讨之意。况且，说是“个人行动”也不全是事实，信里的基本内容，还是批评者经常议论到的，只是由他捅了出去而已。对于左联的解散，他原来是不同意的，然而既然解散了，又还有什么“组织”和“纪律”可言呢？说起同鲁迅的“团结”，还好意思说出口吗？这几年与鲁迅方面的联系工作，还不是靠他去做吗？还有，鲁迅在文章里所揭露的事情，绝大部分是他们所干而他竟不知道的，现在居然要他一个人负起责任来了！

徐懋庸极力争辩，但是没有结果。

他既感委屈，又不免愠怒。过了些时候，他又开始采取“个人行动”，把一封已经写好的公开信，叫《还答鲁迅先生》，交《现代文艺》发表。

在信中，他指责鲁迅不应公布私信，说藉此引起多人的恶感相威胁，是一种“恶劣的拳经”。鲁迅因替胡风辩护而尽情暴露左联内部的人事，形迹近于“告密”；尤“糊涂得可观”者，是对于周扬等人的公开批

评，“株连”，“诬及”他以外的“他们”，是有违极通常的情理的。他在信中坚持了对胡风、巴金、黄源等人的看法，还称胡风为“鲁府的‘奴隶总管’”，继续进行攻击。此外，还引了鲁迅的话打击鲁迅，说所谓“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者，正是鲁迅自己的行为，鲁迅是企图通过他而打击大批的青年的。最后，他以反语写道：“为鲁迅先生的‘威严’计，我是宁愿发现一切真是如他所说的那样的。不过如果真是那样，则足见两间之正气，一贯的真理，实为鲁迅先生独占得太多，而青年们分有的太少，这在鲁迅先生，当然是光荣的，但对于中国，恐怕也是‘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罢！”

发表前，徐懋庸曾经给周扬等人看过，他们不让发表，怕惹出更大的乱子。但是，他毫不理会这个“集体”的意见。他豁出去了。

自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周扬在文艺界中的地位大不如前，要像先前一样开展工作并非易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组织上人事上的变动。7月底，共产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这时，冯雪峰可以名正言顺地管文艺界的事情。他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改组或撤消原来的文委，停止周扬对文艺界的领导工作。虽然，计划没有最后实行，但是其中的矛盾和压力，周扬不会感受不到的。9月20日，《作家》就曾发表过冯雪峰化名吕克玉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对周扬等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以及理论上的机械论观点，给予了原则上的批评。其中，称周扬等为亭子间里的“土皇帝”，希望他革除动不动称对手为“反革命”，为“汉奸”，为什么派的恶习，“虚心点，不再胡闹”，都是很严厉的警告。

鲁迅逝世后，文艺界曾经成立过一个临时核心组织，周扬没有参加。卢沟桥事变后，他便从上海到南京，经南京办事处到延安去了。

郭沫若在《苗的检阅》里，指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违反了“对内的纪律”。原来“国防文学”派的人，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徐派”，也有认为鲁迅在公开信中是用了对敌人的讥笑怒骂的态度，对待自己同一战线的人的。于是，《社会日报》闹哄哄地接连发表《鲁老头子笔尖儿横扫五千人，但可惜还不能自圆其说》、《读鲁迅先生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应向徐懋庸先生辩白的几句话》、《梅雨以大义责鲁迅》之类的文章，对鲁迅施以攻击。显然，这是称鲁迅为“托派”、“破坏统一战线”等流言的一脉余波。

鲁迅憎恶那些动辄以维护“统一战线”，捍卫“民族利益”的名义，绞杀

个人正当权利的行为，正如当年憎恶那些麇集在“正义”、“公理”的旗子底下，参与镇压学生运动的正人君子者流一样。他甚至把这种纯然从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出发，任意诬陷和打杀民族精英的作法，称为近于“内奸”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社会正义的存在。他所否认的，只是非正义的正义形式而已。而他本人，正是一个独立不羁、无所畏惧的正义者，所以才敢于在所有人都宣称“一致对外”的时候，发动这场“内战”。在他看来，惟有“内战”，才能除去迷幻的毒饵和专事破坏的蚁冢的。这个观点，早在左联时代他就强调过。何况这次“内战”，严格说来并非出于他的发动；只是从他那无法阻挡的凌厉的攻势，以及论战的彻底性来判断，反而显得是挑战的一方。

挑战就挑战。其实，他一点也不在乎名分上的这种纠缠。他习惯了。如今，写下“万言长文”，犹觉意犹未尽呢。文界败象，公开信只不过公开了很少的那么一点罢了。他几次写信告诉朋友说，拟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载过后，再作一文，使徐懋庸辈的嘴脸暴露更加清楚而有趣。

其中，致王冶秋云：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可是，等不到文章写成，他就一病不起了。

## 121. 以工作对抗死亡

“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对鲁迅来说，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战胜的敌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敌人是他所无法对付的，那就是死亡。

凭着对于生命的敏感，他知道属于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尤其是看了一些来信和文章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之后，心头不时地蒙上一层阴影，连文字也都不免透露出某种悲怆的气息。他不是那种“视死如归”的人。他是那么顽强地眷恋着生命，眷恋着中国，眷恋着那许许多多与他紧密相关的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们。死去的使他意识到生存的责任，所以活着，就不仅仅为了亲属和朋友，为了众多的辗转于重轭之下的劳苦大众，也为了对头，为了不可一世的权势者、叭儿，“同人”中的英雄、昏虫、高贵的忏悔者。每当想起死后的情景，想起小报的恶意

的诋毁和众多快意的笑脸，他就感到浑身发热，骚动不已。只要活着，他宁愿长此遭受通缉，过囚人般的日子，忍受所有非人的折磨。只要活着，他宁愿放弃一切，留下一支“金不换”就足够了。他对生命的欲求是无限的。生命“金不换”。如果换了别人，也不是没有办法拖延死亡的，譬如休息，疗养，与尘嚣隔绝的生活，然而，他却不能接受这类姑息的方式，只要能坐立，他就必须工作，谁都没有办法劝止或禁止他，使他停顿下来。每当他体温升高，告诉他那是因为工作的缘故，他总是马上否认，说是正因为晓得什么时候要发热才赶快把工作做完的，后来甚至说出这样的理论：如果不会发热，固然可以做工；但是如果发热，那么就得起赶快做工。生命与工作，对于他是二而一的东西。如果生活仅只意味着悠闲与安适，不是别一形式的死亡吗？

命运注定了这个珍惜生命的人要以加倍的速度损耗生命。没有谁命令他这样做，全凭内心的指示。

他陷于生存的最大的悖论，他无法解脱。

就这样，他和死亡彼此缠斗不息，直到一个战胜了另一个。

自从3月初到狄思威路的藏书室找书，中寒骤患气喘之后，他身体便日见消瘦，大不如前了，但他是仍旧工作着，并不特别地注重休息，除了翻译《死魂灵》的第二部以外，还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了一篇序文，写下《写于深夜里》、《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等好几篇很带分量的文字。

到了5月的前半月，他的精神呈现出极度疲惫的状态。许广平劝他休息，找医生疗治，几位美国友人，亲自带了鲜花来看他，还带来了宋庆龄馈赠的茶叶和糖食代致探候之意。爱人和朋友的关怀使他感激，但是，他谢绝了一切劝告。他不想像一个病人那样过生活。到了月中，不管他是如何固执，也不能不去看医生了。

这里，连日记也得由许广平代抄，日本医生须藤诊断为胃病，其实是不确的，18日以后，每天的日记都有发烧的记载，病情渐深，就注射“荷尔蒙”之类。但是人倒更难看了，整天靠着藤躺椅，脸色铁青，不言不食，不想动弹，差不多永不离手的纸烟也放弃了，睡觉是似睡而睡的。可怕的“无欲望状态”。28日，等胡风到来，许广平就偷偷把内心的焦虑告诉他，托他向内山老板研究一下病情。次日，须藤来给他注射强心针时，无论牛奶、橘子水等通通都不想吃了，情状十分危急。

冯雪峰找到茅盾，让他通知史沫特莱，转请她的治肺病的专家朋友立即前来为鲁迅诊治，但是事先并没有告诉他，大家都认为，他是决不会同意的。因为前不久，史沫特莱也曾向他提起过这意见，结果不能实行。他的病一直由须藤诊治，一旦请别人诊断，就等于不信任须藤了，他觉得有失朋友之道。当史沫特莱把邓医师请来后，许广平仍旧怕鲁迅拒绝，不敢上楼对他说，只好请冯雪峰先谈。冯雪峰把一切都推到史沫特莱身上，说她实在太热情，而且医生既已请来，就让看看也没什么，否则太使她为难了。他听了，皱了一下眉头，也就同意了。

听诊以后，邓医师走到史沫特莱面前，神色很异样。史沫特莱问病情如何？回答说“严重”；又问严重到什么程度？回答是“恐怕过不了年”。这时，史沫特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医生说，鲁迅是他平生所见第一个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像这样两肺都有病，而且病得这么厉害的，如果是欧洲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了。他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亲自诊治。只要病人同意，马上就可以办的。“当然，”医生最后补充说，“他不会听从我的劝告。这些老守旧派、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是不相信现代医学的。”

他的观察没有错。的确，鲁迅最终坚持了自己。但是这并非出于愚昧和保守，他不知道，鲁迅本来就是一个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人。

医生走后，作为临时翻译的茅盾把医生的诊断，以及住院的建议告诉了鲁迅，甚至把如果是欧洲人，则早已死掉了之类的话也都说了，大家都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反而以为，告诉实情会增强他对于身体的信心，同时也可以由此使他真正重视治疗。可是他不相信，他说大家骗他，就算做医生的说得严重一点也不是什么可骇怪的事。接着，他简直用了责问的口气说：“当别的人正在斗争，吃苦，死，而你们却要我在床上安安静静地躺上一年，对吗？”

史沫特莱哭了。她知道，要打动这样一个钢铁般的汉子，她已经无能为力。

鲁迅虽然不同意住院检查，但在心里，却是很感谢史沫特莱的。事后说起来，他还感叹道：“她实在太感情了，感情对于病人，其实是不好的。况且外国人看生命又比中国人看得重。……好在我不会受什么影响。”

但是以后不多几天，他果然病得连日记也持续不下去了。

这时，住在医院里的宋庆龄，闻讯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的耽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为厌恶入医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

痊安

六月五日宋庆龄这般的言辞恳切，你能漠视吗？

除了上海的朋友，还有远方的也都不断写信来，如萧三，如曹靖华甚至亲自前来探候，如许寿裳、郁达夫、许钦文，还有过海而来的增田涉。他们也都怀着同样的忧虑，同样以恳切的言辞劝你入院治疗，或易地休养，你能漠视吗？

其实，你不是不知道得了肺病的，早在十年前大病过那么一次，你就已经把病情完全弄明白了，但是你不愿让人知道，尤其是许广平，你不愿让爱人苦痛。现在，事情已经无可隐瞒了，你如何减轻她的苦痛呢？虽然一切她都默默顺从了你的意思，难道她心里没有执拗和违抗

么？譬如这么多朋友的规劝，你能说，没有她的意见参与其中？怎么能够漠视呢？

关于疗养，应当说，他不是没有让步的。

到了7月，他的病开始转好，能够按日写日记了。这时，他开始较为认真地考虑关于离开上海到外地疗养的问题。总之苏联是不去的了，即使连住地、路线、联络人等，都曾几度有人做出过安排。一是不懂话，行动不便，二是先前曾经有过说他“拿卢布”的流言，他不愿这么轻易地为流言所俘获。当然，还有别样的原因。至于日本，那是消磨了他一生中最为热烈激昂的青春时代的一个地方。二十年来，他是时时有所系念的。这一切，内山和须藤都各自挑选了自认为合适的住地劝他前去：一是长崎，一是镰仓。在镰仓，还有须藤的很漂亮的别墅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表示离沪之意，甚至面约了郁达夫同去，看岚山如丹的枫叶，但也每每踌躇。直至8月底，因肋膜病尚未痊愈，还不能停止服药，加以时分已入秋凉，居处山中海滨，容易伤风，于身体更为不利，这才初步取消了转地疗养的计划。

最后促使他全盘放弃这个计划的，还是南京来人的缘故。

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来到内山书店，对内山说：“老板，无论如何也得停止到云仙去了，现在那边来说，是不是可以到德国去？意思是这干扰了蒋介石，所以希望我去德国。说到云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败。因此我不去了，总而言之我不去了。”

这人正是他从前的学生李秉中。

6月间，李秉中曾经来访过，接着来信专门提及解除通缉一事。信中问到鲁迅对此的态度，如果有意，说一切手续可由他担当处理，并且保证无损于师长的尊严。鲁迅根本不愿向政府求情，他也同时认为，李秉中这样做，不可能没有交换条件的，因此，婉言回绝说，自己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由它去的。

早在蒋介石自任教育部长的時候，就曾派鲁迅留日时的同学张协和找过鲁迅，说很想同他会会面。并且说，只要鲁迅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可以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要求，也可以办到。但是，鲁迅拒绝了，结果，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的职位也就随之被裁撤。

李秉中的信，是否与这段往事有联系呢？

几年来，形势的确起了不小的变化。蒋介石从主张他去日本到去德国，也都不是没有理由的，至少可以被认为，鲁迅是听命于他的，这样，一旦宣传起来，就又热闹了许多了。现在不就颇有人在传说关于他出国的消息吗，他们料定要走的，什么地方也不去，如何呢！他作为知识者的代表，是有比权力者的代表更为强悍的地方在的。

当然，鲁迅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身体的代价，安全的代价。逝世前，他化名刻制“周裕斋”图章，十分急迫地托周建人觅屋，打算搬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根本不打算离沪疗养，到多次反复拖延实行，甚至最终抛弃整个计划，这中间有着许许多多的干扰因素，而最大的内驱力，仍然是他不愿离开工作；而且这种工作，只要离开中国这块土地，这种氛围，是无法有效地进行下去的。须藤警告他不要多动，以防疲劳，只需静静地躺着。他的答复是：“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接着，他告诉须藤：“我请你看病是有条件的。”须藤问：“什么条件？”他说：“第一，是要把病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的一个月可以治好，我宁愿动动的化两个月治好。第三，假如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拖延是为了工作，不工作而一味拖延，在他是办不到的，他还几次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是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活的。”

他以工作麻痹自己，慰藉自己，鼓舞自己；以工作对抗死亡。

他以工作答谢所有关心他的朋友，回敬憎恶他的仇敌。

赶快做，是他的一个原则。

只要疾病能够允许做轻微的活动，他就立即恢复了写作。7月，他开始写了一篇《〈呐喊〉捷克译本序言》，8月继续进行，9月的成绩超过8月，10月又写了好几篇。虽然有些文章题目有点可怕，而笔意纵横，强劲泼辣，却是一如从前。

在民族危难最深重的时候，驯良的人们往往容易宽容或忽略国内统

治者的专制本性；叭儿或昏蛋，甚至将最高统治者当成为“民族领袖”而加以鼓吹。在答徐懋庸的信中，鲁迅虽然迁就了冯雪峰关于“国防”的某些提法，但是，却始终没有放过目前在“国防”口号掩盖下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斗争。民族压迫到底还是阶级压迫。在最后一个年头，他不惮“破坏统一战线”以及“汉奸”等等的恶谥，以明确的阶级意识，更为猛烈地抨击了中国整部国家机器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写于深夜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全文充满了一种激情的呼喊，而且透着彻骨的讽刺的力量。它给史沫特莱以深刻的印象，称之为“一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

有一个叫曹白的青年，因为从事木刻运动而一度被捕，过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出狱后到上海教授艺术劳作课，业余时间仍从事木刻创作。出于对鲁迅的敬爱，他创作了《鲁迅像》，《鲁迅遇见祥林嫂》等木刻作品，并送往即将在上海展出的全国第一回木刻联合展览会。展出前，上海市党部检查官对参加展出的作品进行审查，把其中的《鲁迅像》抽去。曹白十分愤慨，把它寄给了鲁迅，接着在信中诉说了因为从事木刻创作而坐牢的个人历史。鲁迅复信时，要求曹白把坐牢的经过写出来，准备介绍发表。后来，他考虑到可能因此引起当局对曹白的进一步的迫害，终于以曹白的《坐牢记略》为基本材料，扶病写成《写于深夜里》，交给史沫特莱送英文刊物《中国呼声》发表，并将中文原稿发表在《夜莺》月刊。文章由五个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的章节构成。它从介绍珂勒惠支的版画说起，说明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类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接着是论“暗暗的死”。这两节都联系到曾经是中国现代木刻的提倡者而暗暗死掉的柔石。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在临刑可以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观看的人们还可以喝彩，并且宣扬开去。现代的统治者连这样一点“恩惠”也没有，他们缺乏“成功的帝王”有胆放死囚开口的自信的力量，其实是更为残酷的。于是，他悲愤地写道：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再接着，他以童话的形式，暴露整个反动国家的专制、虚伪、腐朽的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

态。这些权力者是根本不要“法治”的，惟其如此，才能以随意变化的策略，保护其压迫和屠杀人民的特权。他们也有所谓经典，法律，法院，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东西呵？

中国现实的荒诞性：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母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都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

出版有大部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最后，是直接引用了曹白的信：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

……

我还用得到“上诉”么？“服”得很！反正这是他们的法律！……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呢？难道一场全民族的战争，仅仅是为了保卫这样一个暴君和酷吏所统治的布满监狱和屠场的国家吗？如果说不，你的爱国立场丢到那里去了？正因为陷于这种集体意识的包围，所以，当“国防文学”口号颇为流行的时候，他保持了理论上的哑默，直到冯雪峰把他逼出来为止。但是，他没有放弃的工作是，努力打破对于中国现存的国家制度的幻想。可以说，这也是他对“国防文学”口号的一种间接的反应方式。他在这一阶段里对于中国的“黑暗国情”的暴露，是与他对被注入“国防文学”口号中的错误的解释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批评小说“里面有些还不真实”，“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他认为作者“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不应早早地从东北回来，不等“再丰富了自己以后”便进行创作，文中说没有人指出“许多问题”，实际上是射向鲁迅的一支冷箭。

为此，鲁迅也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有力地予以反击。

躲在“三月的租界”里，却来指责“八月的乡村”的“不真实”，事情本身就富于反讽意味。文章说：“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而狄克的一味求全责备，是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而且，指责是如此含糊，大可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却分明是比列举十大罪状的做法更为有害。

为什么要提出“执行自我批判”呢？据说是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何谓“我们”？何谓“他们”？对于其间的阶级的界限，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可以认为，这也是鲁迅对于“统一战线”的理解。

对于《八月的乡村》，周扬也写了一篇书评，对小说的缺点多所指摘。为此，鲁迅曾经很气愤地对徐懋庸说：“你看过一个美国电影片子吗？那是讲的白种人在非洲探险的事情的，白种人用暴力征服黑人之后，把黑人作为奴隶，却从黑人中挑选一个顺民作这些奴隶的总管。这总管，每当白人主子来察看的时候，就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而且特别起劲，表示对主子的忠诚。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资本家所豢养的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吗！”可见，《三月的租界》一文，并不只是针对张春桥一个人的。

在提倡“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认为“国防的主张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这种“主题中心”论，割裂了生活，限制了作家，对于创作实践来说是十分有害的。鲁迅大病稍愈，即写了《这也是生活……》一文，对这种左倾高调，以及与此有关的创

作现象，进行了含蓄的然而却是很有说服力的批判。

文章从病中的身边琐事写起，写喝水、休息，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于是说：“这也是生活。”而人们往往轻视这等平凡的生活，以为是“生活的渣滓”，甚至一看也不看，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其实，生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只是注重其中的“一片”，即使如何重要，也不过如盲人摸象，以偏概全，陷于错误的。文中说：“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又说：“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的。”在这里，鲁迅随手列举了被视作“国防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即夏衍的《赛金花》，讽刺说：“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的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还有一些“激昂慷慨的文章”，如教人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这种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自然是无可訾议的，然而这是真实的生活吗？即使是“最中心的主题”，就可以游离于生活之外的吗？文章强调生活的互涉性和整体性，以及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多样性和真实性，指出：“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8月间，鲁迅把几天中陆续写下的几则小杂感放在一起，以一种带毒的植物命题，曰《半夏小集》。

这些小杂感，对相当一些“国防文学”论者在立场上和思想上的投降的倾向，以及文坛上的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现象，作了十分简练、十分尖锐深刻的批判，最后的几则，则表述了他内心的无法遏止的愤怒和轻蔑之情：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这是明亡之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

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

庄生以为“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无毒不丈夫，形之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作为缺点较多的人物的模特儿，被写入一部小说里，这人总以为是晦气的。

殊不知这并非大晦气，因为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

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便回避我，我常想这样的劝止他，但可惜我的毒还不到这程度。当鲁迅把原稿拿出来给冯雪峰看时，就说：“也许你不以为然。”待雪峰看完后，还没有表示意见，他又说：“其实也没有很大意思！倒不一定要发表的。这里也看出我的‘小’来！”对于冯雪峰有关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和具体做法，鲁迅不是没有保留意见的。正因为连最亲密的朋友，也都有着一种距离感，他就很自然地觉得他的这些思想和情绪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还当他被疾病缠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他曾经对许广平说出他做的一个梦。梦中，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

于是用力投出去，正好掷在敌人身上……

梦后不久，病减轻了。一切险恶的征候都逐渐消失了。

这种压抑的痛苦和宣泄的快意，都不是别人可以领会到的。

鲁迅说：“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他永不相信权力者能变得洁净起来；而当有人，不是用血而是用墨为权力者进行洗刷，他的憎恶就会远在权力者之上。他这样对人说过：“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使他不得不格外费力地横站着作战，就因为这批“蛀虫”的存在。他不能放过他们，因为他不能放过为他们所放过的双手沾满血迹的权力者。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以最为强烈的欲望，表达着在所有作家中几乎惟他所独有的饱浸了个人情绪的一个主题：复仇。

最突出的例子是《女吊》和《死》。

《女吊》写的是他故乡社戏中的一个角色：女性的吊死鬼。因为做童养媳备受虐待，终于弄到投缢。然而，女吊不肯如此作罢，都准备作厉鬼以复仇。鲁迅用了极其优美的文笔，描绘了乡间这个刚烈不屈的鬼魂。他称女吊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就因为她是带复仇性的。作为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的象征，女吊的确可以使上海的一群憎恶报复的“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在她的形象的光照之下变做呆鸟！

文章一开头便引了故乡先贤王思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鲁迅承认，自己是很喜欢引用这句话的。有黄萍荪者，在呈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和叶溯中二人的嗾使下，主办小报《越风》。他一面在报上诋毁鲁迅，一面又接连写信向鲁迅约稿。鲁迅统统不复，最后，才写了一封不足一百字的短信回答他。其中说：“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所谓“奉报”，就是“报仇雪耻”。

《女吊》的最后一段，也是以这样意思的话作结的，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

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死》当然可以看做是鲁迅写的遗嘱，因为里面的确有着这么几条：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但是，它又不太像遗嘱。五六月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他确曾预感过死，但临到写作《死》时，体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觉得离死又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在文章中，他能够那么轻松地，甚至可以说是放肆地戏谑死亡。有日本朋友去探望他，问起他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篇“像遗嘱似的文章”，竟引得他哈哈大笑，以致感染所有在座的都愉快地笑了。当时，他给日本朋友的印象就是：淘气。

如果鲁迅仅仅懂得仇恨，懂得报复，他就会与那些嗜血的狂人无异。实际上，他并非如此而是充满着仁爱，充满着一种极其温柔细腻的感情。惟其有了这种人性的、人道主义的内容，他的报复性行动，才富于如此魅人的力量。在他那里，既有电闪、雷鸣，也有晴天朗月，有氤氲的云气。那是一个完美的人格世界。

爱，同时构成为他晚年创作的另一个母题。

他是那般深爱着他的故乡。愈到了后来，愈是怀念那里的山水和人

物。而这一切，他都只能以一种无望的温情去抚摩。有一次，徐诗荃在他面前夸说故乡湖南的山水之美，如潇湘八景之类，不意被他打断了：“唉！你莫说，到底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在他的诗中，出现“禹域”、“吴娃”、“越女”的字样，都寄托了一种浓郁的乡思。而几次写“菰蒲”，其实是“莼鲈”的变换了悲剧色调的说法。连老屋都已经卖掉的故乡是无法返回的。故乡，至今对他来说，只能成为对抗上流社会的精神力量，以及自己受伤时的洗涤剂。他写《女吊》，还有《我的第一个师父》也都一样，既闪烁着战斗的意志，又浸透了忆念的深情，后一篇的结尾，平易叙来，却有着一种拂拭不掉的淡淡的哀愁，永久的哀愁：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远在北平的母亲和兄弟，也无时不在他的记念之中的。对绝交的周作人，虽或有文章反对其观点的谬误，但在大关节上，却始终表示着兄长的关怀。他不赞成有些作者对周作人的过于苛刻的责难，以为这样，反而会使人陷于消极。对于周作人送李大钊之子李荣华赴日留学一事，他表示赞赏，对周建人说，在这个时候能做别人不肯做的事，可见是同情革命的。他还曾说过，周作人的某些意见要比俞平伯等高明，还引了周作人论文天祥的一段话，说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而有些人却一笔抹杀，是不应该的。后来，当文艺界的一个救国宣言公开发表时，他曾在那上面仔细寻找周作人的名字，心里十分焦虑。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了名，怎么会没有周作人呢？他特地告诉周建人，遇到这等大题目，是不可过于退后的。

在《女吊》完成之后，他曾打算写两篇类似的文章，一篇关于“母爱”，一篇关于“穷”。计划中还想一直写下去，凑成一本像《朝花夕拾》一样的小书。“这以后我将写母爱了”，他对冯雪峰说道，“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在日常说话中，他便常常讲起母性和母爱，譬如在攻击摩登妇女有乳不给儿子吃的时候，在谈及珂勒惠支及其版画的时候，或是谈及纯厚的农妇的时候。关于“穷”，他也多次谈到过。他说，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又说，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珂勒惠支作品的两大主题，其一是母爱，其一是反抗。而穷，也正是社会群体反抗的原因之一。穷人的命运始终是他所关心的。

当他深情地眷恋往事的时候，总会想到他的老师，特别是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位：藤野和章太炎。

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作翻译《鲁迅选集》时，曾就选目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他的回答是：“悉听尊便，只有《藤野先生》一篇，是我希望能够选入的。”他几次向日本朋友打听藤野的情况，一直没有结果，自然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寻得一点消息的。但无论寻到或寻不到，总不失为一份纪念吧，直到增田涉最后一次来看他，他在病床上仍然问起藤野，然后低低地叹息似的说：“先生还是没有消息，看来，他大概已经不在世了……”

10月份，他接连写了两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后一篇竟未定稿，他就是一种深深的缅想中逝世了。

关于章太炎，许寿裳和周作人或褒或贬，都不是他所同意的。许寿裳认为，章太炎以“佛法救中国”的主张应当得到弘扬，显然肯定了其中的思想糟粕。而周作人等，又以章太炎一生中的错失而加以否定，甚而做出“谢本师”的决绝的表示。的确，章太炎由革命家退而为宁静的学者，身衣学术的华袂，粹然成为儒宗，既离民众，渐入颓唐，是一生中的缺憾。但是，鲁迅认为，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至于一些文侏作文大肆奚落以自鸣得意，他是不能压制内心的愤怒与轻蔑的，说：“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在文章中，他高度评价章太炎的革命意志和光辉业绩，誉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所以，章太炎手定《章氏丛书》，删除了先前战斗的文章，他以为是十分有害的“儒风”。死去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曾经战斗过。对此，他不由得感慨系之：“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在这里，他表示的仅有的一点不宽容，恰恰是章太炎的宽容。所谓“爱对头”，就是爱斗争。惟有斗争，才不至于掩护邪恶。斗争于他是爱的重要的表达方式。

两年前写的《忆刘半农君》，也是这样一种表达。对于曾经一度作为《新青年》的战友之一刘半农，他称之为袭击敌人的“好伙伴”而表示亲近。他赞扬了刘半农的活泼、勇敢和在战斗中的创造。此外，还辩护了为人们所批评的“浅”。但是，他也毫不掩饰对“据了要津”之后的刘半农的疏远，以及内心的遗憾之情。文章的结尾写道：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

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为亡故的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他也是从革命的贡献这个方面给予热情的肯定的。序文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他维护了亡友，也同时维护了一种文学精神，表现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十分深邃的社会学眼光。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是他的话。

为了《海上述林》下卷的出版，使他陷于重病之中仍然念念不忘。他托冯雪峰催促排字局赶快排印，在信里还写过这类意思的话：“翻译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尔基也于最近去了世，编辑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虽然如此，但书却还没有校完。原来你们是在等候着读者的死亡的吗！”简直是质问，是带泪的嘶喊！

他一生都在嘶喊。然而，嘶喊为了谁呢？

当他病了，当他不得不暂离了他的壕堑——书桌，只要从酣睡中醒来，他就得沉重地抬起眼睛，穿过屋内的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凝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他的爱太博大了！

病中，他以瘦骨嶙峋的双手反复抚弄过两部画册，编选并催成了它们的出版。其一是《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是《苏联版画集》。后一部画册的序文，还是由他口授，许广平记录的。

他以画册，向中国读者直接呈示了珂勒惠支“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的“深广的慈母之爱”。他让人们明白，画集中有不同于希特勒的别一种人，他们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美而有力，是和我们一类的朋友。这个一直被认为是“人性论”的反对者，还曾特意指出：“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他介绍苏联版画，一样意在增进中国读者对苏联的了解，是不但在艺术方面

的。

在回答日本朋友关于中日关系的问话时，他说：“我认为，两国的‘亲善’，要在中国的军备到达日本的水准时才会成为可能。但是，谁也不能担保要经过多少年才行。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就会不但不吵闹，反而会很友好地玩了……”他是何等焦灼地期待着中国，以及所有弱小国家的壮大成长，何等焦灼地期待着被压迫民众的壮大成长！这种期待，简直焚毁了他的心！“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他在《我要骗人》中这样写道。“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这是他稍后在《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中写下的话。然而，世界上又并不存在达此目的的便当的方法，只好一面走，一面寻求着光明。他为他看不到人们彼此披沥真实的心时光的到来，而深感悲哀。

每当内山完造讲到中国民族的富于悠久性，只要稍微讲到一点乐观的话，他就会马上说：“老板，我反对，我是非常悲观的。”他不是那样浅薄的历史进化论者，尤其对于中国的前途，他认为，循环和倒退是决不会没有可能的。他不只一次把将来的中国比做沙漠，自然，却也不只一次地表示他要为改造这沙漠而斗争。

无论是悲观，是激愤，是无情的战斗，都是爱的奔流。

他说过，创作总根于爱。其实他的一切行为都根于爱。他爱中国，爱人类；他由于这深沉的爱而成了伟大的解放和自由事业的忠实的服役者。

这时候，他一面跟病魔搏斗，一面跟世上的恶鬼搏斗。除了“赶快做”，跑步一般匆匆完成了摆在手头的那么多的工作以外，还计划着写作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完成一部中国文学史。这两项创作和学术计划，将更为直接地体现他对这个古老而多难的民族以及它的少数精英的热爱与期待。谁能彻底知道，他有着多少辉煌的梦想呵！然而，魔鬼们却过早地把他扼杀了！

一生中，他是那么顽强地一直向前开拓着，虽然也时时回顾，但几乎完全停顿下来作历史性的总结，在他是没有过的。

现在，他要出《三十年集》了。他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大计划呢？难道是出于对生命的不良的预感？作为一种纪念，他感到安慰，抑或怀

着昔日为《坟》写作后记时的哀伤？

7月间，当他同许钦文最后一次晤谈时，很郑重地说：“从搜集印在《坟》里的稿子起，我已经写了三十年。翻译的不算，总有三百万字，出十大册，也已有点厚了吧。”当时，许钦文便暗自吃惊，以为这分明是关于后事的计划。

——这才是真正的遗嘱。

内心的忧伤是无法压抑的。当他一旦把手头的纸笔放了下来，那潜伏着的阴郁的情绪，就会立即前来袭击他。但看这种时晴时晦的不稳定的心情，就足以说明，他的最后的挣扎有多么的艰难！

## 122. 木刻展览会·谈孔子、鬼、自杀及其他·在壕堑中仆倒

衰老与死亡，都是鲁迅所极力回避的。对于将尽的生命，他的态度是既超越又痛苦的。他是那般的热爱生活，怎么可能做到庄子式的随随便便呢！

这是两年前的事。

徐诗荃来访，赠了一方名印，文曰“迅翁”。他在日记中记录此事时，写道：“不可用也。”他不喜欢“翁”字。翁字太尊，且含“老头子”之意。从高长虹到创造社到最近的小报，都拿年纪来“射”他，自然是他所不愿意使用的。但有一层很深潜的心理因素，就是经不起老与死的提示。

即便在他想到战斗的时候，也都会因为这种提示，而有于心不甘又无可如何的伤感。他写信给山本初枝，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紧接着，就是“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这种憾恨，或隐或显地伴随他度过了最后的几年。直到6月大病期间，他的情绪，便临到了一生的最低点。

然而，病情一旦转好，他的情绪也就马上变得明朗起来。在一个晚

上，他对冯雪峰说：“总不至于即刻‘翘辫子’了……我在1927年住景云里的时候，也生过一次像这次一样的大病，真的昏迷，几乎要‘翘辫子’，但一愈就是十年。我不大相信西洋医生的话。今年的病，也和那次差不多，那么大概总还有十年吧。”说罢，胜利者似的哈哈大笑起来。

到了10月，他的病情的确好了许多。他自己，以至他的朋友，也都认定死亡离他是远了。

8月。下午，鲁迅到八仙桥青年会参观“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

这位中国现代木刻之父，以他罕见的热情，提倡和推动着黑白木刻这一艺术运动的发展。对于木刻青年，他通过对话、通信、提供艺术范本等多方面的渠道，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木刻是一门艺术，作为艺术的形式技法，是需要认真研究、实践和提高了。但是，青年在木刻队伍中建立健康的艺术倾向，显然是他更为关注的问题。关于“中国精神”、“中国风”，关于“沙龙绘画”，关于内容的“小资产阶级的气氛”，以及艺术家重在“经验”的表现等等，他都不只一次地有过独特而深刻的表述。他强调新兴木刻的人民性、现实性，而又极富于开放性，富于广阔的艺术视野。他一直梦想着中国木刻运动能拥有一支旌旗蔽空的部队，现在，继去年由平津木刻研究会发起的木刻联展，又由广州现代版画研究会接力进行，这是不能不使他感到兴奋的。即使身体怎样不行，他也必须看一看，何况展出只剩下最后一天。

这一天，会场相当热闹。

像鲁迅这样身材瘦小、衣着平常的老头子是不会惹人注目的：惯穿的长衫早已褪色，衫襟和袖口都有明显的污痕；一顶至少用了十年的咖啡色呢帽，此刻仍然戴在头上，而且故意拉了下来，几乎要碰到鼻子，只露出半个瘦削的苍白的脸庞，和鼻下的一横厚厚的胡须……然而，人们还是立刻发现了他。大约等待已经许久了。

“鲁迅先生来了！”

“真古怪！”

“……”一片杂乱的笑声和问候。

曹白迎上前去，向鲁迅招呼。鲁迅仰起脸来很兴奋地说：“哦哦，你的信我收到了，你的信我收到了。仗不会打的：我不搬家。嘻嘻。”

“我也这么想。……不过，搬家的那种胡乱和吵闹，会使人很不好受的。”曹白再想不出什么话说了，只好一个劲地捏自己的手。

“受惯了。嘻，我们一起看画吧。”

这时候，另外几个青年也都围了过来，跟着他一起看。

看到一半的时候，他坐下来，拿了批评簿翻看着。当他看到那些题着“艺术之光”、“力的艺术”之类的批评时，他就指着说：

“这是匾。”

大家轰地笑了。

还有一些意见说，展览会最好开到贫民窟、灾区，或穷乡僻壤去。他看到这里，便说：“这些都是不会做事的呆鸟！”

大家又轰地笑了。

也许他有些累了，说：“我们歇一歇吧。”说罢，把帽子摘下，额上冒着细微的汗气。

于是，大家围着小茶几坐了下来。除了鲁迅，其余还有四个人：曹白、林夫、陈烟桥、白危。

陈烟桥和白危有事情先谈，他们请求鲁迅为一个人的东西做一篇“序”。鲁迅听到这个名字，露出很反感的神色，摇摇头说：

“什么？他在段祺瑞手里就压迫我的。——我不会做！我不会做！叫他请别人去！”

看见他这样子，陈烟桥和白危就不再说了。

这时，林夫插话问道：“近来身体好了些吗？”

“稍好一些，不过也还时常发热，不能随便做事。”

“现在也还服药吧？”陈烟桥问。

“服的，……害肺病真没办法，要是我年轻倒还有法子想。……”他说到这个，一阵咳嗽就把话打断了。

“先生可打过空气针？”白危问。

“那没有。打的都是药针，一共打了六七针，现在好些了。”

“那么就再打打。”

“我也这样想。”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脸色显得有点可怕。

“先生应该休养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建议说。

“呵，我怎么能够休养呢？像我这种人是无法休养的。”他笑了笑，接着说：“我的父亲又没有留下遗产给我。病也没有法子想。不写文章就活不下去。嘻哈。”

“但你的毛病没全好，也得息息呢！”曹白说。

“息得太多，也就很无聊。”

曹白提起他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他立刻说道：“不要说他了！他明明晓得我有病，不能写什么，这么一来不就想气死我吗？哈哈，但我哪里会……我就斜躺着，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了四晚，写成功了。我是不放过他的，太可恶了！我不给他气死……哈哈！”

“但你的《死》也写得太悲哀了！”

“没有法子想，我只能这么写。”他伸手到衣袋里掏了一阵，很久才掏出一个小纸袋。白危以为他带来了药片，还问他要不要开水，不知道纸袋里装的是香烟，他掏出一支点着，后来连香烟灰也索性弹在里面。

他忽而记起了什么似的，问曹白道：“你就在新亚教书？”

“是的。”

“那学校——我的侄女儿在那里上过学，要打手心的。现在还打

吗？”

“还打的。”

“为什么要打手心呢？”他望了大家一眼，叹息似的说：“孩子是最怕这种刑罚的。”

接着谈木刻，谈翻印画册，他又变得兴奋起来了，有时候笑起来，眼睛就像小孩子一样，眯起一条缝，只是说话多了，呼吸就会跟着迫促起来，连下颚和太阳穴也都痉挛般抖动着，露出久病的痕迹。

“我总是吃亏的，”他自嘲似的说，“几乎每印一次画集，都要赔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都通通送光了。”

一支香烟刚刚抽完，第二支又接了上去。

“那本你告诉我的《拈花集》，什么时候出版呢？”曹白问。

“呵，恐怕一时还不能吧。钱都差不多赔光了：印珂勒惠支，印《海上述林》……”他说到这里，很有兴致地忽然问道：“珂勒惠支的选集印得怎么样？”

“好极了！”大家都说。

“这都是我亲自衬纸，亲自校阅，——多的抽出，少的补上去的。”

“你有病还……”

“嗯。别人做的不如意呢。”他说：“而且，我送了一本给作者。”

“珂勒惠支收得到吗？”

“不是直接寄给她，是叫人转去的。”

“谁？”

“武者小路实笃的哥哥。他是日本驻德的公使。不知会不会收到？”

“叫官转去，我想总不会有什么毛病的！”曹白笑着说。

“我也这样想。”他说着，嘻嘻笑了。

“先生可知道珂勒惠支现在住在哪里？”白危问。

“她现在已经回德国了。希特勒自然要抓她的，不过，大约已经订下了条件：不准教书，不准出版画集，要她安分守己地做个贤妻良母。”

“还有那位刻《士敏土》插图的梅裴尔德呢？”

“呵，那恐怕早已死在希特勒的‘仁政’之下了。”他表示很惋惜，接着又说：“所以，我要翻印珂勒惠支的版画。在世界上的女画家中，她是最值得我们介绍的。现在那画集都选定了，可惜的是没有钱来再版。”

正当他说得入神的时候，座位旁边有人持着照相机“咔嚓”一声将瞬间的情景拍下来。他向那人扫了一眼，像怀疑，也像是厌恶，话也因此中断了一下，随后又照样无所顾忌地谈了下去。

这回谈的是苏联版画。他说，家里虽然已收藏了不少，但苦于没有时间整理，也没有钱翻印。有人问他能否拿出来公开展览，他摇了摇头，说：

“这恐怕很难。譬如在这里，政府是一定要和我捣蛋的。”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调，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借用日本青年会吗？日本领事馆要来看，也不行。上次我所以把法国的作品也拉来同苏联的摆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它们看得莫名其妙。”

说罢，他大笑起来……

又谈了一阵，第三支香烟也抽完了。这时，他站起身，扭了扭呢帽，把它戴在头上，说：“我们再来看一看吧。”然后，轻捷地走近墙壁跟前去。

大家又跟着他看了许多的木刻，听着他随时作出的中肯而委婉的批评。他指着画面说，这人的脚骨断了，手太长了，而不说是解剖学的错误；他说这不像中国人，饥民，而不说是轮廓和明暗的错误；他看见刻的群像，就说面孔都是一样的；他看见战争，就说战云不大对，去看看克拉夫兼珂的吧。

“先生以为这回的作品怎样？”陈烟桥问。

“自然进步不小，但人物总还刻不好，素描的功夫太差。”说到基本功，鲁迅又提到珂勒惠支，赞叹地说：“她的功夫实在太深了，尤其是光线的凝散，布置的非常有力。”他说柔石死后，已经寄信给珂勒惠支，请她画一幅被害的图画，以作永久的纪念。但珂勒惠支来信说不能，因为她没有看过真实的情形，而且对中国的文物又太生疏，没有答应。又说对于同样的一幅画，她也要画上两三遍。于是，他总结道：“那种作画的认真的精神，我们应该学学她。”

他主张多作素描，如果环境不允许，就作速写，又说，有关的参考书也要多看。当有人反映说真正可作参考的书并不多时，他很有同感地说：“所以，即使赔钱赔功夫，也得印画册。只是画册要印得好，对于学习的人才有用。但那样，成本就要贵了。有钱的不想买，没有钱的又买不起——就只好送。哈哈！”

“赔钱赔功夫——你真是一个傻子呵！哈哈！”

“由他去吧。哈嘻……”

整个展厅沉浸在一片温和而又活跃的气氛中……

最后，鲁迅说要走了。曹白他们才知道，三个多小时已经过去。对于一个病弱之躯，要耽溺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实在是难于承受的。大家的心里充满歉意，然而又很希望能留住他，听到他更多一点关于木刻艺术的意见。这时，走过来两位洋记者，为首的一位同鲁迅打过招呼之后，就立刻向大家介绍他的太太：

“My wife, ——”

“唔……”鲁迅若无其事地唔了一声，拉低了帽子，就急急地走开了。

萧军从青岛回到上海，就急于要看鲁迅。10月15日，他带上从北方带回来的五个石榴和一袋小米，约了黄源一同前去。

黄源带的是一个小小的高尔基木雕像，是一个刚从日本回来的朋友托他转交的。鲁迅拿过雕像，端详了一下，饶有兴致地对他们说：

“雕得不坏，很像。……”

这时，海婴拿着一个石榴进来，看见那雕像，立刻爬到桌子上，嚷道：“这是爸爸，爸爸……”

相随着进来的许广平也问道：“雕的真是你吗？”

“喔……我哪里配！……这是高尔基……”鲁迅说着，把小像轻轻地放在身边的桌子上，又让雕像的正面朝着自己，又说：“雕得很好，简单……这是‘立体派’呢！……”

他把头靠在藤椅的枕托上，眼睛望着顶棚，思索似的静静地抽烟；接着，便起身呷了一口茶，向黄源发问道：

“《杜勃洛夫斯基》去看过了没有？很好。”

不久前，他重看了这部电影，曾特意写信催促黄源也到上海大戏院看去。那电影最后的复仇的一枪，使他感到十分痛快，简直逢人都要称赞一番。

“又在做宣传了。”许广平笑道。

“还没有，准备今晚同萧军一道去看。”黄源告诉他说。

“我没有看过原作，不知他是否完全依据原作改编的。譬如，其中有一场小杜勃洛夫斯基叫村子里的人放火烧死关在他家里的四个官员，普希金那时有这种想头，自然要被杀死了。……”

接着，他问起萧军北行的情形。萧军说了沿途所见的渔场、盐场，还有日本人经营的炭坑等等，然后说到泰山，问他：“你去过泰山吗？”

“我只是在外面看了看……我是瞧不起泰山的……”

不知怎样，在鲁迅的眼中，泰山总要跟孔夫子联系起来。

前不久，他为日本杂志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说起这个由权势者捧起来的圣人，“留声机”，“敲门砖”，他就表达了“愚民”的不敬，和自己的憎恶……

萧军说：“孔老二小天下的地方我也见过了，其实他还没有到全山三分之一的地方，就小起天下来了……”

“孔老二他是没有见过‘山’的。”鲁迅接着说。

萧军告诉他，在游山时，还曾买了几张碑拓。他说，那上面也没有什么好碑的。总之，沾着圣人或阔人气味的东西，他都不会喜欢。

“我是不懂，也不管好歹，只是觉得好玩便买了两张，”萧军咧嘴笑道，“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一角钱的‘泰山石’笔架……今天忘了……没带来……”

“那不忙。”

为了不要太多地干扰他的休息，两位青年谈过一阵就告辞走了。

在归途上，萧军谈起他所得的印象，认为鲁迅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黄源听了表示同意他的观察，但跟着责备他适才同鲁迅说话的声音太大，以致鲁迅也不得不提高声调，这样于一个肺病患者是很不好的。萧军一边解释着，心里一边想：下次再不要这样了！

17日午后，鲁迅同胡风一起来到鹿地亘的住所。

鹿地亘是亡命中国的日本年轻学者，由内山完造介绍认识。这时，他正在翻译《鲁迅杂感选集》。因为有了疑问，帮助翻译的胡风前去找鲁迅，这样，鲁迅就亲自来了。

见到鲁迅使鹿地亘夫妇十分高兴。池田幸子担心鲁迅被北风吹坏了身体，连忙关上所有的门窗。

“坐吧。”热心的主人让鲁迅坐家中惟一的帆布椅子。

“这似乎是不稳当的……”鲁迅说着，亲自拉过来一把方形的木椅坐下，池田幸子上前为他加放了一个小小的红垫子，同时大笑着说起有一次胡风坐折了椅子的事情。

“请把这个送给日本朋友。”鲁迅把《中流》连同英文的Voice of china，以及两册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同放在桌上。然后告诉鹿地亘说：“这一次写了《女吊》。”

文章的写成，无疑给他带来莫大的快慰。说话时，脸部全被笑意挤成皱纹了。

“先生，我上个月写了《死》，这次又写了吊死鬼，下次该写什么呢？真可怕——”池田幸子听胡风说过鲁迅肺病的严重情况，以这样濒临死亡的人，竟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死亡的题目，是她所不敢想像的。

鲁迅笑而不答，突然问道：“日本也有无头的鬼吗？”

鹿地亘回答说：“无头鬼，没有听说过，但脚是没有的。”

“中国的鬼也没有脚，似乎无论哪一国的鬼都是没有脚的——”

于是，在鲁迅和鹿地亘之间，古今中外文字中的“鬼”便成了共同的话题。胡风和池田幸子因为从来未曾听说过别人把鬼这种东西说得这般有趣，不时地发出愉快的笑声。

鲁迅接着说起在绍兴教书时踢“鬼”的故事。

“从学校回家的路是这样弯曲的，”他用细长的手指在桌沿画了一条弧线，说：“但有一条斜行的近路，是经过坟地的。一天晚上，我在学校耽久了，回家时我选了近路。两边草很高，我在小路上走着走着，忽然看见有个白东西向面前走来，走到面前就像石头那样不动了。唉呀，我当然不信鬼类的东西，但也有点害怕，这里跳动起来了——”

他按着干瘪的胸部，继续说：“回头呢？还是怎样？没有法子想，只好仍旧往前走了……白东西不动……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人蹲在那里。我喝了一声：‘在干什么呀！’踢了他一脚，他就向草中逃走了，到了家里以后，还尽是心跳，那似乎是个小偷。”

说起鬼来，好像他有许多特别的感兴，又说：“最可怕的是日本的鬼，在日本戏里有的，是叫做什么呀？呵，是的，叫牡丹灯笼……还有御岩。我在仙台时常常花费八分钱站着看戏，可是御岩很脏，是讨厌的。”

“中国的鬼非常奇特。”他介绍了女子常常变做鬼魂，又常常有与鬼魂亲昵的男人的故事，以为这是很真切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的东西。“因为是鬼，只好在夜里出来，在不必要时就隐灭了，别人不会知

道，而且无须给予。我以前想：若有那样的鬼倒是好的。”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候，风大起来了，鲁迅时时地咳嗽着。池田幸子几次想用空烟盒代替痰罐递给他，又怕他发烦，弄的心里非常不安。

“鬼的时节在日本是夏天，所以在那时演戏，现在已经是秋天了，鬼要渐渐隐退了吧……”

鹿地亘说完这句总结性的话，鬼魂真也仿佛隐退了。只是，自杀接替它而成了新的话题。

“现在说吊死吧，这也是女人常做的。”鲁迅说：“在中国，吊死在男子是很少的。据传说是因为死了的鬼魂来把活人哄去，所以有这种自杀。古时候王灵官这个人把男吊打死了，所以剩下来的就很少，而女的却没有被打死，便常常出来带了活人去。因此说吊死鬼，照例是指女人无疑的。”

他又说：“女人自杀，近来往往用吞咽金子的办法。因为金子是重的，停在肠里会引起肠炎。这种自杀，因为不是直接的，要费相当时间，所以弄得有的人结果不愿意死了。医生使金子和排泄物一同出来的方法来救治。女人等痛苦停了之后，最先查问的事是：‘先生，我的戒指呢？’……”

大家不禁大笑。

鲁迅每说到鬼或自杀，都带有破坏偶像的启蒙意味，而且也像他的文章一样，时时闪耀着尖锐的讽刺的光芒。

“我要静默三分钟，”他从衣袋里取出体温计，说：“每天四点钟左右都要测一次体温。”说罢把体温计插进口内。一时默然。

“热倒没有。”过了一会，他说。

“时间太短咧。”

“这是因为必须给医生看的，这样就可以了。”他这样说，立刻把体温计装进衣袋里去了。

跟着的话题是对八仙桥的木刻展览会的批评。

“先生，听说你去看过展览会了。有那样的成绩，实在令人惊异。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木刻艺术运动像这样进步的还有吗？”

“嘿！的确很有进步，我也没有想到会进步这么快的。”说起木刻，鲁迅变得更加兴奋，眯缝了眼睛说话，好像木刻画就在面前展开似的。他说：“不过人的脸孔都像外国人，中国人是有中国人的脸孔的……可是青年们肯努力，这样就很好……”

说起青年，胡风不禁想起他在几天前说的一段话：“中国将来如要往好的方面走，必须老的烧掉，从灰烬里产生新的萌芽来。”完了还加重地说：“老的非烧掉不可。”……

他们又说了许多话，鲁迅才告辞回去。他阻止胡风送他，这样，胡风就同鹿地亘立即回到楼上工作了。

送他的是池田幸子。门外，她向一个瘦小的背影挥手道：

“好好保重，再会！——”

从鹿地亘那里回来，时候已经不早了。傍晚，周建人过来，便一直谈话到11点，没有丝毫歇息，他太亢奋了。

周建人走后，许广平立刻整理卧具，催促他休息。他坐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睡下来的时候已经是1时了。3时半，他忽然坐了起来。许广平见状也坐起来，仔细观察他的呼吸，像是气喘初发的样子，接着咳嗽，气息也渐渐变得急促起来。他告诉许广平说：“一直睡不好，净做噩梦。”这时正当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为了减轻他的痛苦，许广平把自己事先购置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给他服了。按照说明书的规定，陆续服过三次，然而病态仍然不见减轻。

后来，他连斜靠着休息也不行了，只能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膝而坐。许广平坐在他身边，分明地听见他心脏咚咚的响动，心里十分难受。

他叫许广平早上7点钟去托内山打电话找医生。6点半左右，许广平

就匆匆盥洗起来，准备出去。他坐在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上眼镜给内山写便条。许广平见他气喘得厉害，要求他不要写了，由自己亲口托请好了。他不答应，仍旧执笔写下去，歪歪扭扭地，几乎每个字都要改正了又改正。写到中途，许广平又一次请求他，不要再往下写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了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短短的几行，然后交给许广平。

内山粗粗一看，立刻觉察到问题的严重，心里不免一阵悸动。鲁迅平时写信，字迹总是非常工整的，今天却凌乱得快不能辨认了：老板：

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拜托你，请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替我办！

草草顿首

L拜十月十八日看完信，内山马上打电话给须藤，随后立即赶到鲁迅家去。

这时，鲁迅无言地坐在桌前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脸色很坏，呼吸是异常的困难，内山告诉他，须藤医生很快就会来，说罢就按摩他的背部。过了一会，许广平也过来按摩有关部位。

所有这些动作，似乎都不能缓解他的病情，内山只好劝他服用他从家里带来的鸡蛋油。他顺从地吃了，结果，还是不能生效。

当内山和许广平仍在按摩着他的背部的时候，须藤来了。鲁迅见到须藤，便断断续续地说：“从4点钟起，哮喘又发作了，请快替我注射。”

须藤早已把注射的手续准备好了，马上在他的右腕上打了一针。过了一两分钟，他说：“怎么搞的？总是没有效果。”须藤又加打了一针。几分钟过后，他的呼吸好像是平缓一点了。这时，须藤从旁观察着他那指甲已经发紫的手指，一边嘱咐给他用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

过了一些时候，他要内山停止按摩，说自己已经好一点了。等到快8点，内山因店里有约会，只好拜托须藤照顾他，然后匆匆离去……

日报到了。

“报上有些什么事情？”他一直关心报纸。

“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许广平告诉他，“你翻译的《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

她熟悉他的脾气。敌人写他的文章，他倒未必急于要看，他最关心的还是和他有关系的书的出版。往常，到了晚间撕日历时，他常常要提起：“明天什么书的广告要出来了。”他怀着对自己的写作即将出版的兴奋的期待，熬到第二天早晨，等报纸到手，就急急寻找这方面的消息。如果报纸来得迟，或报纸上没有按预定的计划登出广告，他就会立刻显出失望的样子，于是也就虚拟了种种变故，直到广告出来或刊物到手为止。

许广平以为，他知道了《译文》和《死魂灵》的消息，就可以安静下来。然而他不，立刻要许广平把报纸和眼镜一并拿来。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的广告，看了许久才放下。原来，他记挂的并不仅仅在于他个人。

注射，吃药，中午还吃了大半杯牛奶，然而仍然喘息不止。下午，冯雪峰前来，但是他已经不堪病苦的折磨，不能说话了。

6点钟左右，内山叫来了看护妇，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看来效果还不错，他已经能够安卧。须藤观察了一会，以为大约不妨事，交代说明天再来，便回家去了。随后，内山也回到了店里，但是仍然放心不下，先是派了一个店员到鲁迅家里住下，吃饭过后，又亲自请来了石井医生。

诊察的结果，说是非常严重，内山便同许广平商量把周建人也叫来。

周建人到来不久，冯雪峰又来了。这时，许广平劝内山回去休息。内山怕她太操心，一直过了子夜，这才起身告辞。

马蹄钟嘀嗒嘀嗒响着。无边的寂静，夜太可怕太漫长了！

连看护妇也睡去了。这时，由许广平看护病者，给他揩汗，好几次

揩他的手时，他都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不肯松开……

“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声音是那么温柔。

“我不瞌睡。”

为了使她满意，许广平就在他对面的床脚上斜斜靠着。

他不时地抬起头来看她，她一样报以深情的凝睇。有时候，她还陪笑着安慰他说，病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就又躺下了……

后来，她给他揩手汗，他还是照样地把她的手紧紧握住。但是，她没有勇气回握了。她怕刺激他，怕他难过，便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轻轻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他似乎有些烦躁，好几次推开被子，她怕他受冷，又连忙盖好，过一刻，他又推开。看护没有法子，告诉他心脏十分衰弱，不可乱动的。他才不大推开……

过了5时，看护提前给他注射，叫许广平立即把医生找来。然而，等医生赶到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体温也渐渐地消失了……

冯雪峰、胡风、萧军、黄源、雨田来了；

宋庆龄来了；

内山、鹿地亘夫妇来了——

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种悲哀、沉重、静肃的气氛中……

人注定是要毁灭的。但是，有多少人是在抗拒的行动中毁灭的呢？毁灭于枪林弹雨的战场，也许能激起人们一种英雄主义的仰慕；如果在一个小房间里，在书籍和稿件的毫无危险的包围之中，在紧张然而悄无声息的连续的写作之后猝然毁灭，还能唤起那种搏斗的悲壮感吗？……

《日记》写着“星期”二字就中断了——

然而，灯亮着。手稿摊放着。“金不换”无声地站在笔架上……

没有人怀疑他不是战斗中仆倒的，倒在落满箭簇的壕堑内；倒在以他的血肉筑构的掩体旁边，倒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 123. 民众的葬礼

鲁迅的死，给上海带来极大的骚动。

当天，《大晚报》刊登了由治丧委员会发出的讣告，次日的《大公报》、《新闻报》、《申报》等也都发表了讣告全文：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消息从上海辐射出去，迅速传遍北平、天津、青岛、太原、开封、厦门、福州、广州、香港、无锡、昆明等全国各大城市。远届莫斯科、日本、朝鲜、南洋，以及更多的地方。报界纷纷称誉鲁迅为“文坛巨星”、“思想界的权威”、“中国文坛之惟一领袖”、“中国文坛底最高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英勇战士”，把他的逝世看做是中国以至全人类的重大损失。旬月之内，各政党、团体、个人的函电，接连不断飞来……

治丧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蔡元培、宋庆龄、史沫特莱、内山完造、沈钧儒、萧三、曹靖华、许寿裳、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在冯雪峰最初起草的名单曾特意加入毛泽东的名字。但是，除了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其他报纸均未见披露。

宋庆龄，这个中国惟一的由一个女性组成的党，以光辉的民主思想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在一个特殊的战斗场合——悼念鲁迅的全部活动中，起到了为任何人所无法代替的重大作用。

鲁迅是一直到死也没有被解除通缉令的，对于他的丧事活动，政府当局肯定要严密进行监视。19日凌晨，冯雪峰对宋庆龄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将必定遭到杀害。宋庆龄当即承担了公开出面主持丧仪的工作。虽然她的处境也很恶劣，长期深居简出，但是为了向敬爱的朋友作最后的告别，她愿意付出一切。

这时，她想到一位律师，就是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当即赶到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钧儒一口答应下来，并马上办理。次日，她同冯雪峰、沈钧儒、许广平一起看过墓地，随后又在茅盾夫人孔德沚的陪同下，从许多家外国百货公司中挑选了一副价值

三千元的西式棺木，盛殓鲁迅遗体。

当鲁迅遗体从瞿秋白生前赠送的藤架床上移至万国殡仪馆以后，冯雪峰就藏到周建人的家里，同沈钧儒、许广平和周建人等商量问题，布置胡风等负责治丧处的实际工作。他是遵奉中国共产党的指派参与丧事处理的。

按规定，瞻仰遗容的时间是从10时开始的。但是，因为凭吊者愈来愈多，早上6时左右，就有一群青年男女慌忙赶来了。开始在门口设了一张签名桌，并分发每人黑布一方，后来，因为凭吊者愈来愈多，赶制已来不及，于是只好签字，发布也就来不及了。到了10时，院子里实在无法容纳太多的人，便将殡仪馆的大门关起来，等一批人出来了，再让一批人进去。连一个个的行礼也改作一批数人行礼。在众多的凭吊者中间，有鲁迅的朋友，但更多的是从不相识的群众；有教授、作家、知识者，但主要的是成长中的青年学生，甚至是目不识丁的工人和市民。他们国籍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但都共同怀着对于鲁迅人格的崇高景仰，对于鲁迅精神，表达了一致的自愿的追随。

门口悬着“鲁迅先生丧仪”的白布横幅。在鲁迅遗像下面，放着许广平的献词：“……悲哀的氛围笼罩了一切，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周围摆满了花圈、花篮，各式的挽联、挽诗和挽词。蔡元培的挽联：“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王造时的挽联：“死者赶快收殓，埋掉拉倒；生的主张宽容，那才糊涂。”姚克的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胡子婴的挽联：“国家事岂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断咒骂；悲痛中别无他说，只好劝大众继续斗争。”郭沫若和徐懋庸也都送来了挽联，郭联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地北遍招魂。”徐联是：“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有的挽联，字迹就像小学一年级学生写的一般稚嫩，言辞也极其简单，如“鲁迅不死”，“哭鲁迅”等，下面是一大堆陌生的名字，或者什么名字也没有，代替的是什么：“工人识字班”、“店员读书会”之类，朴素的文字里有着更为沉痛的力量。

作家孟十还在悼文中记录了一则十七岁的孩子的日记：十月二十一

日，晴。

午后和两个同学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看鲁迅先生的遗体。一进殡仪馆的大门，就挤在许许多多人中间了；大家都在签名簿上签名，我们也签了，都是横写，用的钢笔。随后招待员给我们缠了黑纱，我们就走进礼堂去了。我们在鲁迅先生前面连行了三次礼，心里觉得很难过，几乎要哭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极可敬爱的大文学家，他是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中国从此少了一位最有用的人物了！

我们半个月前才读完他翻译的《表》，很喜欢这书，容易懂，以后他再不能给我们译书著书了，想想，这有多么让人悲哀呀！我祷祝中国的学生们，都来学习鲁迅先生，将来把中国治好起来，使中国在世界上做一个强国。我们不可忘记鲁迅先生哪。尤其是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的产业！

明天要到市中心参加运动会，没有方法来给他送殡了，想要请假，体操教员就一定先不允许，唉！在鲁迅遗体旁边，有多少为泪水所充盈的眼睛缓缓地绕了过去。缓缓地，一队又一队，比行进在绝壁和滩涂之上的纤夫还要艰难。没有裂天的号子，只有迫促的呼吸、啜泣和哭声……

然而，都一样悲壮，一样需要内心的坚强……

22日下午，出殡前，万国殡仪馆的门口和马路上占满了人群。许多人为了最后看上鲁迅一眼，就像决口的河水，不断地往里面冲去。而湖水一般平静的地方，正在练习唱挽歌：他是我们民族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

唤起大众来生存……突然，有一个声音在空中叫道：“诸位！现在需要扛挽联的一百六十人！扛花圈的一百人！愿意替鲁迅先生扛挽联的，请站在草地的左边！愿意替鲁迅先生拿花圈的，请站在右边！其余的，请到门外去自动排队：四个人一排！……”

顷刻间，就有了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巨大的白布遗像，用了悲悯而坚毅的眼睛，俯视着人群。由欧阳山、蒋牧良执掌着“鲁迅先生殡仪”的白布横幅走在最前面，紧跟着是鲁迅的灵柩，由鹿地亘、胡风、巴金、张天翼等七八个人抬着。歌声起了：“哀悼鲁迅先生……”于

是，一支上万人的队伍与歌声相纠结，开始在长长的马路上蜿蜒……他是我们民族灵魂

他是新时代的号声……路线原定为：胶州路、赫德路、爱文义路、卡德路、同孚路、福煦路、大西路、虹桥路，而后至万国公墓。捕房以防止扰乱秩序为由，进行阻挠。于是，人们不得不临时改变方向：胶州路、极思菲尔路、地丰路、大西路、虹桥路……队伍从租界经过时，骑马的印度巡捕得得地在两旁巡逻。行出中国界，就由黑衣的缠腿的中国警察接代了，所有长枪，全都上了刺刀，短枪也挂好了把子，简直如临大敌。

但是，当群情激动的时候，是只有武器害怕思想，没有思想害怕武器的。一支哀军继续前进。前面，“民族魂”的绸旗逆风飘动，挽联如人们一样低垂着头，花圈上的花朵，在痛苦的颤抖中不时落下来，这时，女孩子们便连忙弯腰拾起……他是我们民族灵魂……巨大的遗像，仍用了悲悯而坚毅的眼睛，俯视着人群……

队伍沿途散发《鲁迅先生事略》、《纪念鲁迅先生要继续鲁迅先生救亡主张》、《哀悼歌》、《挽歌》，以及全国学生会《哭鲁迅先生》等传单，唱着歌，喊着口号：

“继续鲁迅先生遗志，打倒帝国主义！”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打倒汉奸！”

“打倒卖国贼！”

……

后来，嘶哑的喉咙里终于像燃烧的子弹一样迸出了流行的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纠察队员忙碌地前后奔跑；救护队员提着热水瓶，给骄阳下烈风中喘息着的人们送水；电影公司的汽车驶过，在赶拍葬礼的新闻片子……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发进行的，而且是在当局的压迫和监视下进行的。权力和金钱都不能驱使他们，他们服从的惟有民族生存的意志。现在，一

个人死去了。他们知道，那是天地间的正气，是他们赖以拯救自己垂亡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的精神。

今天，鲁迅成了一个象征。

所以送葬的人才这么多，而且愈来愈多，将近虹桥路时，队伍足足有二里多长！

到达万国公墓，已是4时半左右。这时，太阳过早地沉没了，灰黯的云絮和古树的枝桠杂乱地压在人们的头顶。千万个喉咙一片哑然。凄厉的秋风扫过，枯叶纷纷飘坠，在人们的脚下发出簌簌的巨响——

葬礼开始了。

奏过哀乐以后，主席蔡元培作了简短的报告，说有欧美人参加，也有日本人参加，这是一个国际性质的纪念会。人们当即向挤在人群中的日本人鼓掌，喊道：“拥护日本劳苦大众！”

沈钧儒讲演说，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但是，今天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他问：中国的政府哪里去了？人们又一次鼓掌，高声喊道：“民众的葬礼！”“民众的葬礼！”……

宋庆龄始终陪着许广平。这时，她在热烈的欢迎中和群众见了面，但是，由于激动，她已经不能多说话。那精神，还是同《立报》记者说的：鲁迅先生的死，是中国的一种重大的损失，纪念他的办法，是要把他那种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说完，不断揩着涌出的泪水。在杨铨遇害之后，她从来未曾这样痛哭过。

章乃器说，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会写文章，而是因为他为世界上最大多数的被压迫的人说话。在他的一生中，永没有背叛了大多数而向少数人屈服的。又说，现在有许多人，他们在某一个时代，的确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得了民心，可是过了一个时候，他们又把廉价买来的民心高价出卖掉了！……

邹韬奋也讲了话。然后，讲话的是萧军，他是代表了治丧处同人及鲁迅生前支持的四个刊物讲话的。他大声说道：“鲁迅先生的死是他的敌人逼死的——是他的敌人要他死。现在他已经死了，可是，难道他的

敌人就胜利了吗？”

人们立刻呼喊响应：“没有胜利！”“没有胜利！”“他的敌人绝对不会胜利！”

巨大的遗像，仍用了悲悯而坚定的目光，俯视着人群……

在安息歌的哀声中，在千万颗心的绝望的依恋里，一面白缎黑绒的“民族魂”的大旗，轻轻地覆盖在灵柩上面……

许广平一直在哭泣……

当群众中又跑出一些人来拥挤着把灵柩抬进墓穴，她向水泥椁上撒了第一把土——多么沉重的第一把土！愿你安息，安息，

愿你安息在土地里！……人们手拉着手，围在墓穴四周，歌声和哭声缠裹在一起。墓穴填平了。暮色降临了。伟大的地之子终于回归了大地。可是，当人们陆续走散，便只余一片苍茫、沉寂的荒原……

这时，西天竟出现了一弯微红的新月！

陪伴他的只有这一弯新月！

月亮，正是他所喜爱的。在无边的夜色里，它放着淡淡的光辉，但却是纯净的、惟一的光辉……

次年，许寿裳从北平到上海，特地来到墓地看望他，带着一环花圈和万千思绪。寂寂归途中，吟成这样一首诗：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是的，依然长夜，长夜，长夜漫漫……

然而鲁迅死了！

鲁迅死了——敲钟人在哪里？

1989年11月14日深夜修订版后记

书稿校改完毕，翻开当日的《南方周末》，恰好见到黄宗英回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文章。

1957年7月。“反右”运动风云初起。

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举行座谈。席间，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发问：“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略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文中所载，最早见于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文字略有出入，对话内容是一致的，但不久，这段故实即为学者所否认，以为证据不足。而今，“现场”中人站出来说话了，何如？然而事实又开出了另外的难题：果真如此，应当如何解释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前后论述的矛盾性？如何确定鲁迅在中国政治革命中的基本立场？

对于鲁迅，毛泽东从来是既有赞扬，也有批评的。抽象的赞扬如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英雄”和“三个家”的论断，鲁迅逝世周年在延安做的新“圣人”的演讲；具体的有论鲁迅的晚期杂文、《阿Q正传》、《自嘲》诗等。毛泽东横空出世，雄视古今，从未如此高度评价一个人，因此很自然地被一些大学者和小丈夫当作“神化”鲁迅的滥觞。对鲁迅的批评则相当婉曲，如宣告“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的讲话，通过对鲁迅杂文所作的历史性规限，实质上否定批判的普遍意义；也有明白批评的，在给周扬的信中，就指鲁迅对中国农民革命缺乏认识。由于批评性意见不多，流布范围较小，所以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只记得鲁迅称说的那类“阳面大文”的赞誉之辞。其实，在毛泽东那里，鲁迅的精神遗产以其固有的价值，已然被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这样的资本，同样可以垄断，可以流通，可以随机使用。所谓“团结，利用，改造”，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对待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毛罗对话”中的意见，相对而言应当算得是“私见”，令人震惊的是，这私见却被毛泽东本人公开了。

毛泽东何以在这时公开他的私见？是否出于一种文化策略的考虑，即所谓“阳谋”？对此可以存而不论。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个适时公开的私见，是早已形成的成熟的看法呢，抑或率尔作出的错误的判断？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理解鲁迅的政治哲学的问题。

我认为，毛泽东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判断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

一、无论是新政权还是旧政权，对于权力，鲁迅始终怀有个人主义的反抗；二、鲁迅对强制性的政治思想运动是反对的；三、鲁迅的反抗方式只能是写作，一旦停止写作便一无所有；四、鲁迅是不妥协的，自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是不妥协的。早在20年代，鲁迅便做过一个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揭示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冲突的必然性；40年代，在延安一度“挂帅”的王实味也写过题作《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明显地搬用鲁迅的观点。凡这些，毛泽东是清楚的。他的关于知识分子“两重性”的论述，就不仅来源于马列主义的经典，而且来源于中国的历史教训，以及他个人的人生阅历和斗争经验。他深知，像鲁迅一样的知识分子，本身含有反利用的成分。对于知识、观念形态的东西，他不抱信任的态度，对它们的工具性一直保持警惕；他认为，那是可以超越阶级和时代的界限，既能为革命所利用，也能为反革命所利用的。

# 修订版后记

在鲁迅的思想人格的深层结构中，我们观察到，真理、权力、自我三者形成怎样一种互动的关系。而权力，确实是居间最活跃的因素。对于权力，鲁迅同福柯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即认为它无所不在，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权力可以通过话语进入真理，使真理异化或失效，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明显的例证。对鲁迅来说，真理不可能是超验的实在；它是一团活火，通过对权力——首先是话语权——的对抗，同时通过自我关怀、自我证实与自我反思，进入道德主体并有助于自身的完善。人类的真理说到底是个人的真理，与人类主体性息息相关，所谓“根柢在人”，是认知与伦理的叠合。可注意的是，鲁迅自青年时代说过“悲真理之匿耀”的话以后，不复提及“真理”，甚至公然嘲笑“公理”、“大义”之类。他是坚持真理性而反对真理话语的。

政治权力无疑是多元权力的核心。当鲁迅以真理——“人”——的尺度审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机构时，他不能不一再陷入绝望之中。虽然他呼唤先觉战士的产生，自己却是后知后觉，所以不断有着蒙受“革命”的威吓和欺骗的记录，但也因此得以确认自己的“奴隶”身份。事实可以校正真理。现代奴隶的存在就是一个真理。鲁迅以权力划界，将社会分出权力者和无权者两部分，又以自由划界，将无权者分成奴隶与奴才。对于权力者，他是对立的，挑战反抗的。他的反抗立足于自我，是个人性的，即使介入斗争的集体，也常常与组织——形成新的权力中心——相冲突。在他那里，权力总是呈强势的、控制的、压迫性的，尤其是国家的权力。为此，他决不希图通过国家代理的方式，利用权势者实现自己的理念；他的理念，其实也是属于社会而非国家的。这正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胡适等智囊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

在中国，发端于19世纪末而盛行于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两个思想成果：其一是宣扬个人自由与个体自治；其二，提出并实行以个人为起点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接纳了这两个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运动是这一激进思潮的产物。后来运动转向了，队伍分化了，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作新的聚合，这些都可以视作权力关系的变化；但是，权力的性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鲁迅这个堂吉诃德，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以个人的方式推进思想革命。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进行的社会革命，是对政治权力的根本性消解，但是，由

于目标过于远大，又是独立进行，故而看起来简直近于无效。学者指责鲁迅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倘从国家权力中心的观点——“国家的理性”——看问题，自然是不无理由的。

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杀人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惟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对此，鲁迅是清醒的，准备充分的，所以称作“绝望的抗战”。他不但反对专制统治，而且反对“奉旨革命”，临到最后，还夺“元帅”的“鞭子”，拒绝进入“统一”的“天罗地网”。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

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异常尖锐地指出鲁迅身上的突出的存在：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其实在此，他已经有力地触及了个人行为背后的隐形结构。然而，鲁迅的自由——权力哲学长期成为禁区，即使有人论及，也都十分薄弱。而今，毛泽东以猜想的形式打破了这个禁区。我们发现，在科学研究中，猜想可能比实证准确。

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过，即着手写作这部鲁迅传记，完成已是1989年。整个80年代中后期，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鲁迅世界——中间，感受是深切的。传记的框架，也就是鲁迅的人间性，可以说就在真理、权力、自我三者的互动关系上展开，自由与权力构成基本的内在张力。90年代的空气很祥和，鲁迅的话题似乎颇吵闹。至今翻检旧作，仍然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增添的，除了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订正一处史实以外，也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删汰。而这，正好是自己多年不见长进的根据，很教人汗颜的。

传记从写成到一版再版，深获李士非、岑桑、尚钧鹏诸先生的关怀与帮助；出版之后，又获不少专家与杂家的谬奖，尤其是辗转传来的一些无名青年的书信和电话，使我长怀感激而且不安。今年6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唐元明先生诚邀再版，除了认真修订，言辞的答谢实属多余。

是鲁迅把我和众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联系到了一起。由是，我再次被告知：一个人的力量有如许伟大！

2002年12月21日，旦祥村

# 第四版后记

承蒙王培元先生的盛意，在时隔八年之后，《人间鲁迅》得以新版面世，是很可感谢的。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有两大文化现象同鲁迅有关：其一是知识界把鲁迅当作“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群起而攻之，曰“褊狭”，曰“左”，曰“仇恨政治学”，如此种种，是同“告别革命”、“反思五四”一类宏论一起出现的。其二，是教育界把鲁迅作品清理出教科书之外，为此，还曾引发媒体一时的哄闹。对于前者，我曾作文略陈己见，于后者则未置一辞，无论怎样，却始终认为，这类现象的发生是正常的、必然的，无非是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不足怪异。至于鲁迅的声誉是否因此受损的问题，看看他本人的自白便可以知道，他说，“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污蔑……”他原本便不想活着讨人喜欢，身后被人“纪念”，——简直太骄傲了！

仅仅因为有人对鲁迅施与攻击以显示其优越，至今觉得重版这部关于鲁迅生平的著作，还有那么一点意思，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我不认为传记就一定是纯“客观”的书，在这部书里，一样寄存了我的爱憎，不平与抗争，向往与追怀。

此记。

作者

2010年1月20日